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漢語語源學

任继昉 著



H139
R481



● 任继昉 著

● 重庆出版社出版

漢語語源學

[illegible]006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冯克焕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郑汉生

任　继　昉　著

汉语语源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插页7　字数213千
1992年6月第一版　　1992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66-1670-8/H·30

定价：7.4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语源和语源学"、"语源学原理"、"词族的结构关系"、"语源的研究方法"四章构成。取材丰富，理论性强。作者通过对具体语源现象的分析，把同一词族中音义关系较近的词联系起来，以确立大小不等的词族，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理论研究框架，并开创性地设计了一套层次分明、定义精审、分析力强的语源学概念术语体系，把语源学的内在规律阐发得十分清楚，同时卓有成效地把历史比较语言学引入到语源学研究中去，为语源学从训诂学、词义学等部门独立出来做了很好的贡献。

序

蒋　礼　鸿

汉语语源的研究，我们的前辈已做了好些工作。汉代刘熙著《释名》一书，目的在探索事物得名的由来，已经涉及语源问题了。他的书里，有好些是牵强附会不足信的，但给后人指出了探求语源的方向，其功绩是应予肯定的。清代是我国语言文字之学的鼎盛时期，大师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其中有不少考论汉语语源的资料；而程瑶田的《果𧕿转语记》，则明白地提出考求语源的理论。后来章太炎先生著《文始》，有系统地阐述了汉语语源。杨遇夫先生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里有不少释词的篇章，提供了探索语源的宝贵资料。不过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结合古今中外的语言实际，详细地讨论汉语语源学理论的著作，迄今尚不多见。任继昉同志的《汉语语源学》，就是为填补这个空缺而写的。他的书参考了几百种古今中外的文献，有条有理地把汉语语源学理论展现出来，足备同行参考讨论。希望他更进一层，在汉语语源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作出更好的成绩来。

序

王 宁

任继昉同志的《汉语语源学》即将正式出版，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

汉语的词源问题，曾经是传统语言学的老课题，在文字训诂学与音韵学里都占有过一席之地。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外语源学的影响下，词源材料的整理和汉语语源理论的探讨也有不少新成绩。任继昉同志对过去的语源研究的诸多论著进行了钻研、辨析、归纳和梳理，希望在继承的基础上总结出汉语语源学的较系统的理论，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尽管在漫长的年代里，从不同角度上涉猎语源问题的作者很多，论著纷繁，对语源材料经过不同角度的整理，资料浩瀚，但在科学方法论尚不成熟的古代，众说纷纭，鱼龙混杂，理出一个头绪很不容易；加之汉语与记录它的汉字独具特点，生搬国外语源学的方法难以行通，因此，任继昉同志的工作是很艰苦的，读完他的全稿，可以看出他投入的工力是不小的。

这本书确定了汉语语源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从多方面阐发了汉语语源学与其他传统学科及现代学科的关系，初步找到了汉语语源学在当今科学体系里的位置，为这门学科从训诂学、词汇

学等部门中区别出来、建立独立的理论体系作了许多基础工作。作者以严密的思想，设计了汉语语源学的术语系，使传统词源研究中的不少混乱的问题得到澄清。这些工作，都具有开创性。

汉语语源问题涉及到很多复杂问题，建立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任继昉同志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但是，这本《汉语语源学》的出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汉语语源学的研究，将要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更多像任继昉同志这样的中青年语言学工作者，将会在汉语语源的资料整理和理论建设中作出远远超过前人的巨大成绩。

一九九〇·六·四

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钱伟长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光远	马　洪	王梓坤
冯之浚	卢　云	卢鸣谷
汝　信	刘大年	刘东生
李振声	张致一	宋叔和
邱式邦	季羡林	周光召
罗涵先	郎景和	费孝通
胡亚东	钱伟长	程理嘉



作　者　简　介

任继昉，1954年5月1日生于河南省固始县蒋集乡童庙村。1973年春高中毕业，先后任教于村小学、乡中学；1979年秋考入开封地区师范学校，于1982年夏毕业留校任教；1984年秋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攻读汉语史，于1987年夏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春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攻读汉语史，于1989年底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河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论文有：《汉语语源研究的方式、方法、阶段论》(《语言研究》)、《语源研究的立体式方法》(《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汉语大字典·木部〉指暇录》(《古汉语研究》)、《"华夏"探源》、《伏羲再考》等。

目 录

序……………………………………………………蒋礼鸿
序……………………………………………………王 宁

第一章 语源和语源学……………………………1
第一节 语源释义……………………………1
一、语源的概念……………………………1
(一)词的语源……………………………1
(二)词族的语源……………………………2
二、语源的定名……………………………5
(一)关于“词源”……………………………5
(二)关于“字源”……………………………6
(三)关于“语源”……………………………7
第二节 语源学释义……………………………8
一、语源学的概念……………………………8
二、语源学的性质……………………………9
三、语源学的任务……………………………12
(一)同族词的系联……………………………13
(二)词族的组合……………………………14
(三)语源的推求……………………………14

(四)理论的研讨……………………………15
第三节　语源研究的意义……………………17
一、语言学意义……………………………17
(一)语言研究意义…………………………17
(二)语言教学意义…………………………20
二、历史学意义……………………………23
三、文化学意义……………………………27
四、思维科学意义…………………………33
第四节　语源学与相关学科………………37
一、语源学与语言学其他学科……………38
(一)语源学与语义学………………………38
(二)语源学与音韵学………………………40
(三)语源学与文字学………………………46
(四)语源学与语法学………………………48
(五)语源学与社会语言学…………………50
二、语源学与社会科学……………………52
(一)语源学与历史学………………………53
(二)语源学与文化学………………………56
(三)语源学与思维科学……………………60

三、语源学与自然科学……………………62

第二章　语源学原理……………………67
第一节　语根的起源……………………67
一、自然的发音……………………68
二、动情的感叹……………………72
三、音响的摹拟……………………77
四、形态的模仿……………………85
第二节　同族词的孳乳……………………89
一、类比孳乳……………………89
二、分化孳乳……………………94
三、转变孳乳……………………98
四、抽象孳乳……………………100
五、特指孳乳……………………102
六、关联孳乳……………………103
第三节　词形的变易……………………104
一、古今变易……………………104
二、方俗变易……………………110
三、构词变易……………………113

(一)缓急变易 ……………………113
(二)赢缩变易 ……………………114
(三)重叠变易 ……………………116
四、书写变易 ……………………117
第四节　词族的形成 ……………………120
"骨碌"词族简谱 ……………………122
一、圆形义 ……………………122
二、块状义 ……………………123
三、屈短义 ……………………124
四、圆全义 ……………………126
五、浑沌义 ……………………127
六、糊涂义 ……………………128
七、旋转义 ……………………129
八、运行义 ……………………129
九、回还义 ……………………130
十、范围义 ……………………131
十一、拘律义 ……………………132
十二、卷束义 ……………………132
十三、纠结义 ……………………133

十四、勾曲义 ……………………………133
十五、穹隆义 ……………………………134
十六、坑洞义 ……………………………135
十七、空疏义 ……………………………136
十八、晓灵义 ……………………………138

第三章　词族的结构关系 ……………………143
第一节　词族的结构层次 …………………143
一、语根 …………………………………145
二、根词 …………………………………147
三、同族词 ………………………………149
四、词群 …………………………………151
五、词族 …………………………………156
第二节　词族的内部关系 …………………158
一、意义关系 ……………………………158
(一)横向联系 …………………………159
(二)纵向联系 …………………………165
二、语音关系 ……………………………168
(一)同源同派 …………………………169

(二)同源异派 ……………………172
(三)声韵关系 ……………………180
三、词形关系 ……………………186
(一)单音式同族词 ………………186
(二)联绵式同族词 ………………191
(三)叠声式同族词 ………………195
(四)合成式同族词 ………………196
四、字形关系 ……………………198
(一)字形关系的复杂性 …………198
(二)字形关系复杂性的成因 ………206
(三)字形关系复杂性的利弊 ………209
五、亲缘关系 ……………………211
(一)同源词的对应 ………………213
(二)同源词群的对应 ……………214
(三)同源词族的对应 ……………217
(四)语音规则的对应 ……………217

第四章 语源的研究方法 ………………220
第一节 平面式方法 ………………220

一、音系法 ……………………………221
二、义系法 ……………………………226
第二节　沿流式方法 ……………………233
一、形沿法 ……………………………234
二、音沿法 ……………………………239
(一)以形设源 …………………………239
(二)以音设源 …………………………241
第三节　溯源式方法 ……………………242
一、音训法 ……………………………243
二、构拟法 ……………………………247
第四节　立体式方法 ……………………250
第五节　研究的阶段 ……………………253
一、平面系联 …………………………253
二、沿流串联 …………………………254
三、构拟溯源 …………………………256
四、立体组合 …………………………257

引用书文目录 ……………………………259
后　记 ……………………………………279

第一章

语源和语源学

第一节　语源释义

一、语源的概念

语源，是语言中的词和词族的音义来源。语源是一个总概念，它又可分为词的语源和词族的语源这两个层次。下面分别释之。

（一）词的语源

词的语源，是一个词的音义来源，即一个具体的词音义最初结合的缘由；若该词为名词，则指其所以得名的由来。请看清代程瑶田《果裸（蠃）转语记》中的一个例子：

属镂，短剑也，即所谓"鹿卢之剑"也。《专诸传》："以匕首刺王僚。"匕首，短剑，长尺八寸。故左太冲《赋》

曰:“勇若专诸，扶揄属镂。”呼匕首为“属镂”，是属镂短剑也。……侏儒，短人。《释名》云:“棳儒犹侏儒，言梁上短柱也。”《方言》:“自关而东、赵魏之郊，蜘蛛或谓‘蠾蝓’。‘蠾蝓’者，‘侏儒’语之转也。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之‘蝳蜍’。”余谓“蝳蜍”即“蠾蝓”之转。是故“属镂”，余以为剑之短者，“属镂”犹“蠾蝓”也。〔1，页3、6〕（此处方括号内的序号数和页码数，系指引用书文出处。可参见本书书末附录：《引用书文目录》，以下均同）

这里，论证了短剑“属镂”的名称来源于体短的蠾蝓（蜘蛛）。“属”镂”是一个具体的词，其上古音为 tiwok lo〔2〕、〔3〕，与“蠾蝓；的上古音tiwok rwo相近。蠾蝓体短，故其名称的语源意义为“短”属镂因在体短这一特征方面与蠾蝓相似而得名，故其名称的语源意义也是“短”，“蠾蝓、属镂”这两个名词的语源意义相同。再从人类的认识过程来看，“蠾蝓”一名应产生在前而“属镂”一名在后，因为当人们能制造刀剑的时候，对蜘蛛早已不陌生了，“蠾蝓”一词也应产生已久。因此，说“属镂”的名称来源于“蠾蝓”，是可信的。

像这样一个具体的词的音义来源，是直接的、近距离的，因而可以说它是“近语源”。

（二）词族的语源

在可能的条件下，将有着同一音义来源（包括近源和远源）的所有的词全部系联、汇集在一起，并分成若干个相关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意义层次（即词群），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词族。这整个词族的音义来源，就是词族的语源。

例如，《果裸转语记》一书（今仅存一篇），按照殷孟伦的分析，

可分为五个较大的意义层次：

> “果裸”之转，疾读之则“瓜”也，此以“瓜”为始语，声转则名为“果”为“蓏”，《说文》别之以在木、在地，骈举之则曰“果裸”，施于物为“栝楼”、为土蜂（引者按：指“蜾蠃”）、为鸟名（引者按：指“果蠃”），以形并圜全，故命名从同，此其一。圜全之义衍绎之而为曲屈，故舟之“艄艛”、人之“佝偻”、车之“枸篓”、轮中之“蔿蒌”，莫不皆然，此其二。圜全之义又衍绎之而为敷布周匝，故“荷，芙蕖”、绡名“竹孚俞”、“藨蔍”华开貌，其体如是，并其邻类，此其三。圜全者，动非止静，若抽陀螺，故又衍绎之而为旋转之形。《方言》：“抠揄，旋也”，《尔雅》：“蚹蠃，螔蝓”、“扶摇谓之‘飙’”之类称是，此其四。圜体连缀，复衍绎之而为稀疏适历，稀疏适历者，盖论其状，如岑岭之连蜷，浪潮之追逐，群幅之并建，情意之牵引也，故由“孚俞”转而为《方言》之“愸愉，悦也”。如“扶胥”，如宫阙城隅之角“浮思”，如“娄娄”、彞也，如“容与”、旌旗高低之貌者近之，此其五。凡斯数端，其义故相因而成……是诸义者，亦皆相推相引，而以成名。是故“果裸”之名，其朔则一，乃充类至尽，浩穰滋曼，而名逾三百，适其势之有然也。［4，页265-266］

这就是说，《果裸转语记》包括了五个较大的词群：1．圜全义词群；2．曲屈义词群；3．敷布周匝义词群；4．旋转义词群；5．稀疏适历义词群。这五个词群，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词族，姑称之为“果裸”词族。那么，“果裸”词族的语源又是什么呢？令人遗憾的是，《果裸转语记》的作者没有能够深入推求下去，这一

方面是由于作者的认识局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时代局限所造成的。现代的训诂学家们对这个历史之谜进行了新的探索。张寿林说："物体圆者，流转有声，音近Gulu，初民模仿，以为称谓。"[5，页178]潘孳行说得更形象："今模仿一物体滚的声音为gululu或kululu，初民却因了物体和声音的连带关系，就把这些声音和这样的物象联络在一起，模仿了做称号。"[6，页427]古代文献的记载和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证实了他们的这些推测。《庄子·盗跖》："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现代科学家在对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等类人猿的考察中发现："他们的食物，大致有三种：一是富有汁水或果肉柔软的果实，二是植物的嫩芽、茎和叶子，还有就是有些树上的硬果。"[7，页126]果实不仅是类人猿的主要食物，同时又是他们的玩具，"小猩猩们喜欢玩圆形的、硬壳的、网球大小的树果。他们手脚并用把它们扔来扔去，或者把它在身上滚来滚去。"[7，页116]果实还可以用来作为武器，"许多不同种属的猴子和猿最常见的一种使用工具的行为，是投掷一连串的坚果、松果、树枝、水果、粪便和石头打击入侵者"[8，页33]。人是由猿类进化而来的，由现代人类近亲生活的画面，可以窥见原始人类生活之一斑。"人类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发展历程内，人是完全靠野果为生的，事实上，自农业产生以来的历史与全部人类历史相比，还不到2%的比例。"[9，页342]我国考古工作者认为，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就是"采集森林里多种植物的果实、块根、种子、鲜枝和嫩芽"以为食粮的[10，页3]。因此，我们现在说"果裸"得名于原

始人类对于果实之类圆形物体滚落时的声音“Gulu”的模仿，有着充分的根据。对于“果裸”词族来说，k-l-(其更早的声母形式为*kl-)就是它们的语源。(*号表示构拟的原始语言形式)

这种词族的原始语源，即通常所说的“语根”，它统率了整个词族，因此可以说是“总源”、“总根”。

综上所述，汉语的“语源”应包括两个不同的层次：1．单个词的语源(近源)；2．词族的语源(语根，总源)。二者互相依存，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完整的汉语语源体系。这种成系统的语源，才是完全的语源；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层次，这一体系就失去了连续性和完整性而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了。

二、语源的定名

(一) 关于“词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学界多使用“词源”一名。虽然“约定俗成”，但尚有未安之处：

第一，使用混乱。“词源”一词出现得较早，可以追溯到唐初。如骆宾王《早秋出塞寄东台祥正学士诗》：“昔余迷学步，投迹忝词源。”宋之问《祭王城门文》：“理阅探索，词源论讨。”此“词源”皆指文词之源流，以水源喻文词之层出不穷。可见，这一名称资格虽老，却不是今天所说的“词源”。此为一。宋代词学大兴，张炎撰《词源》二卷，专论音律词法；近人蔡桢为之疏证，于是《词源疏证》摆上了各图书馆的书架。此为二。近世又有工具书《辞源》，字虽有别，音却无异(其实，“词”、“辞”通用，“辞典”即“词典”)，而其编者又意在标明“语词的来源”，这个“源”实指语词在文献中

的最早出处，也不是指词的音义来源、得名之由。此为三。如果再挤进一个音义来源之“源”，则“词源”就有四种意义了，又都是“风马牛不相及”，使用时不免有些混乱，徒然增加了理解的困难和使用的麻烦。

第二，含义过窄。目前国内外对“词源”的定义一般是“一个具体词的起(来)源”，这个定义专指“词的语源”尚可，却显然不能包括整个词族的总语源。这种缺陷，有识之士已经有所觉察。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尔就曾中肯地指出：“词源学并不以解释一些孤立的词为满足，它要研究词族的历史。”[11，页265]而要将整个词族的总语源也包括进去，“词源”这一名称就难以容纳得下，因为“词是语言中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即单个词，不是词族。要将“词和词族的语源”这一体系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表达出来，“词源”一词就难当此任了。

（二）关于“字源”

“字源”，是一个与“语源”相关而又有别的概念。说其“相关”，是因为汉字的形、音、义三方面有着互相纠缠的瓜葛；说其“有别”，是因为字源和语源这两个概念的实质不同。关于其联系，我们将在后面的有关部分详加论述；这里只讨论二者的区别。

“字源”一词的资格也比较老。从唐代开始，历代都有人使用“字原(源)”一名。据《崇文总目》记载，唐李腾撰有《说文字原》一卷，五代林罕撰有《字原偏傍小说》三卷。《宋史》著录了三部以“字源”为题的文字学书：《艺文志》除《字源偏旁小说》外，还有娄机的《汉隶字源》六卷；《魏王廷美传》有赵光继的《广韵字源》。元代周伯琦又撰有《说文字源》。入清以后，从事字源研究的人更多，如蒋和有《说文字原集注》及《说文字原表》，吴照有《说文字原考

略》，汪立名有《钟鼎字源》……；近人约斋（傅东华）又撰有《字源》一书，今人陈政有《字源趣谈》……。

可见，"字源"一名，历来都是作为文字学书的书名，专指文字的起源沿革，并多以汉字部首为字源。"所谓字源，应指构成汉字形体的一些基本偏旁，主要是一些独体象形字和少数会意字。"[12，页42]"字原的本义，殆指文字之母体，繁衍之本原也。"[13，页2]这与"语源"所指之义显然不同。从其着眼点来看，字源意在文字形体的来源、造字的理据，而语源意在词的音义来源、造词的理据。

例如，原始人模仿果实掉落滚动时的响声，口发"＊kl-"之音，意为"有果子"、"吃果子"之类，音和义就这样结合在一起，久而久之，约定俗成，"＊klua(果)"这个词就初具雏形了。＊kl-是这个词的语源。这个词在人们口头使用了几万年之后，到了距今二三千年的时候，人们才为这个词造字，于是出现了有形可识的果（金文），"字义为果实之'果'，故倚木上画⊕，象果形，为倚文画物，由物形⊕生意。"[14，页3729]其后小篆变作果，《说文·木部》："果，木实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这是字源。仅从时间上来看，字源比语源少说也要晚几万年。

（三）关于"语源"

与"词源"、"字源"相比，"语源"这一名称就年轻得多了，总共只有百来年的历史。它起初是日本人使用的。据《日本国语大辞典》记载，它最早见于日本近代作家夏目漱石（1867—1916）和森鸥外（1862—1922）的作品中，写作"语源"或"语原"[15，卷八，页59]。至于这个词是日本人借用汉语中的成词，还是用汉语的"语"和"源（原）"另造的新词，难以遽断，有待于进一步查考。不

过，因为它是用汉字书写的，意义又相当明确，易于理解，所以"出口转内销"也是自然而然之事。但其引进的时间，因为资料不全，未能详考。仅从《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来看，以1907年出版于上海的《学报》第1年第3号所载宝云的文章《国文语原解》为较早。当然，随着资料的进一步发现，对于国内最早使用"语原(语源)"一词的时间，还有上推的极大可能。

从使用情况来看，"语源(语原)"一词的意义比较单纯，一般是指语言中词和词族的音义来源，首先是语根的起源，即语根的音义来源。虽然也有用"语源"来指语词(文字)的最早出处的[16]，但偶一为之，不足为训。因此，"语源"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是比较明确的。

第二节　语源学释义

一、语源学的概念

语源学是研究语言中词和词族之起源及演变的历史过程的一个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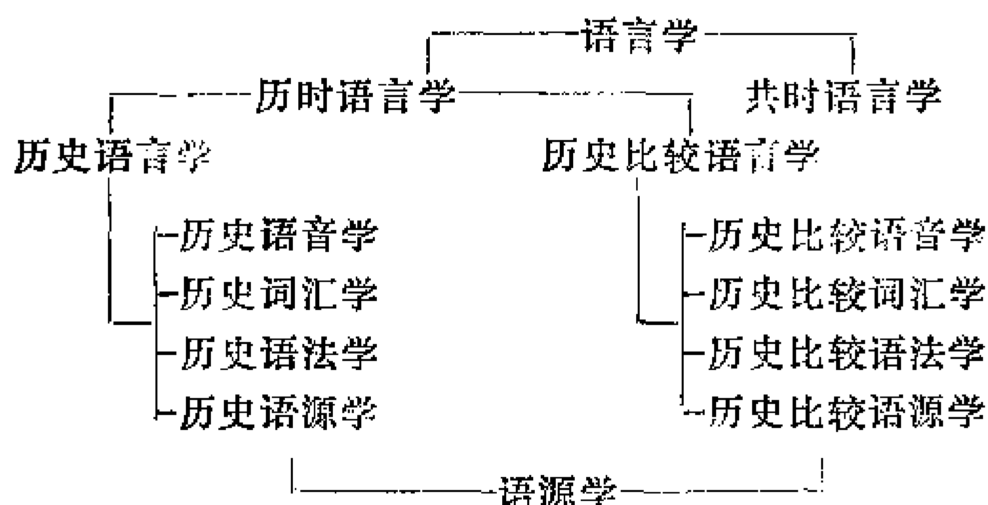
词和词族的起源已如前所述。它们的演变，主要是指一个语根如何孳衍派生，不断发展，逐渐形成词群乃至词族的。从起源时的形式到现在的形式，这一整个历史过程就是语源学研究的对象。追溯其起源是溯源，梳理其流变是沿流。语源学的研究，就是要溯其源，沿其流，起源与流变并重，溯源与沿流并举。

上面所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的语源学。如果再将对词的词汇意义的历史演变和借词的研究包括进去，就成了广义的语源学。但是，严格说来，对词的词汇意义(词义、语义)的历史演变(扩大、缩

小、转移等）的研究，应当属于历史词汇学（历史语义学）的研究范围；对借词（外来词）的研究则应属于语言接触学（contact-ology）的研究范围[17，页21]。二者实际上都属于词汇学的范畴，而不属于语源学的范畴。为了明确语源学的范围和界限，本书主要是对严格意义上的汉语语源学进行讨论。

二、语源学的性质

语源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专门学科。对语源学的语言学性质，我们只要看看下面的图示，就可以一目了然：



从上图可以看出，语源学属于历时的而非共时的语言学。它是区别于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而相对独立的一门学科。按照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的不同，语源学又可分为历史语源学和历史比较语源学：用考据的方法研究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源，例如汉语的语源，这是历史语源学；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同一语系各亲属语言的语源联系，例如汉藏语系各亲属语言的语源联系，这是历史比较语源学。二者的衔接、结合，就构成了完整的语源学。

历史语源学的研究方法，是以一种语言中各个历史阶段的有

文字记载的语言事实为依据，研究其“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历史演变。它的特点是只研究已知的语文资料，而不涉及史前未知状况，其上溯的本源是有限度的——直至有文字记载的最古文献为止。因此，它“无法完成全面探求词汇历史的任务，只能给词汇史提供某些资料”[18，页377]。如果将历史语源学的研究方法加以延伸和扩展，通过对亲属语言、方言等现有语言事实的比较研究而推求无文献时期的远古语言状况，以已知推未知，就进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领域了。

历史比较语源学的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进行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比较，寻求共同的语音对应规律，建立对应体系，并进一步构拟史前的语言——“原始共同语（基础语）”。这种原始的语言形式，类似数学里的“公分母”（习惯上用＊号表示），可以看作这些亲属语言的共同语源。

例如，“果蓏”一词，在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易·说卦》：“艮为果蓏”。至于它的意义，各家的注解可就热闹了，有云“木实谓之果，草实谓之蓏”者，有云“在木曰果，在地（草、蔓）曰蓏”者，有云“果，桃李之属；蓏，瓜瓠（瓞）之属”者，有云“有核（实）曰果，无核（实）曰蓏”者，有云“有壳果，无壳蓏”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果蓏”的更早形式是什么呢？古代文献中没有明确的现成答案，历史语源学到此也只能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但我们看一下汉语方言与汉语的亲属语言——汉藏语系其他语言中“果实”的说法：

广西容县方言：kluo果裸[122，页70]

侗语：glai、klu果实[19，页65]

标敏瑶语：klau桃[20，页36]

错那门巴语：kle、gle桃，glek果核[21，页166]

土家语：khalau果核，kua、lathu瓜[22，页172、174]

观察这些方言和亲属语言材料，可以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语音形式 * kl－。难怪“果”字有“古火、鲁果”二切，即读 k－ 又读 l－了；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说文》何以“果”、“檋”二字并列，并训“木实也”了：它们是原始共同语音形式—— * kl－分化的结果。其分化的过程是：复辅音 * kl－逐渐分离，中间加入元音而成双音节 k－l－，用汉字写就是“果裸”，初指落地有声的树木果实，后来又扩大范围，包括同样是圆转的瓜蓏，而至于木实、草实，在木、在地不分，因而可以写作“果蓏”，这就形成了联绵词。联绵词再进一步分化，即成为两个各自独立的单音节 k－、l－了，就是现在所读的“果”、“檋”，“瓜”、“蓏”。现在看来，这四个字似乎互不搭界，毫无瓜葛，其实它们“五万年前是一家”，本是一棵树上结的果、一根藤上结的瓜。再参照前面提到的古文献中上古“民食果蓏蚌蛤”的记载，以及对猩猩等人类近亲生活情景的观察，* kl－来源于原始人类摹拟果实滚落响声的结论，更是确定无移了。千余年来扑朔迷离的难题，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引导下，一旦走出峰回路转的重峦迭嶂，岂不是“柳岸花明又一村”吗？

历史语源学和历史比较语源学，恰好组成了接力研究的两个阶段：历史语源学是基础阶段，历史比较语源学是后续阶段。两个阶段衔接、结合起来，就能够将语词一一加以研究，穷其源，考其变，揭示词与词的渊源关系，追溯词的形式和意义的历史一直到共同基础语，而建立它们的原始型。

例如，关于汉语“四”和“自”的关系，杨树达说：“‘四’之为言‘息’也（‘四’与‘息’古音同在‘没’部）。《说文·四篇上·自部》：‘自，鼻也，象鼻形。’”《广雅·释诂上》“鼻，始也”条王念孙疏证：“‘鼻’之言‘自’也。”“四、自、鼻”三字古音同韵部，而声母却不同：“自”为“从”母，“四”为“心”母，二者同属齿音，还不算太远，而“鼻”是并母，唇音，唇、齿相隔太远。王念孙只是认为“鼻、

自"同源，却实在无法弄清二者的声母关系。到此，语源接力研究的基础阶段——历史语源学的研究任务已经完成；继续探索"鼻、自(四)"的声母联系，最终确定它们的同源关系，并进而构拟其原始型，这一研究任务已落到历史比较语源学的肩上。我们看汉藏语系亲属语言中"鼻"、"四"的说法：

苗语：butsɔːŋ鼻(勉瑶语)[20，页15]，

pamʑə、poze，鼻pʑei，四[23，页168、197]

古藏语：bʑi　四[24，页91]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鼻、四"的共同声母是 ＊bʑi－，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鼻、自、四"的原始形式是bzit[25，页94]。到此，语源接力研究后续阶段的任务也基本完成了。

历史语源学与历史比较语源学互为表里、互相依存。没有个别语言的历史语源研究，历史比较语源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根本无从比较。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指出："当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能够安全的着手以前，在各语系当中，还有一种伟大的工作期待完成的。中国语里的语词必须依照原初的亲族关系把它们一类一类的分列起来，在台语和西藏缅甸语里也是如此。从此，而且只是从此，我们才可以把这三大语系的'语词族类'加以比较，而期待可靠的结果。"[26，页2]同样，没有历史比较语源学，个别语言的历史语源学就无法摆脱就事论事、偏执一隅的局限，而常常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况。只有二者密切结合，进行接力研究，才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因为二者可以互相启发，互相参证，互为补充，互相促进。

三、语源学的任务

语源学的研究，要完成系联同族词、组合词族、推求语源和研

讨理论这四项任务。前三项是实践工作，后一项是理论工作。

（一）同族词的系联

同族词，顾名思义，就是同一词族中的词；换句话说，就是有同一音义来源的词。系联同族词，往往是把同一词族中音义关系较近的词率先系联到一起。系联的结果，就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词群。例如《果裸转语记》：

> 《尔雅》："果裸之实栝楼。"高诱注《吕氏春秋》曰："穗，果裸也。"然则"果裸"之名无定矣，故又转为"蜾蠃、蒲卢"，细腰土蜂也（《说文》云："'蠣'又作'蜾'。"）。《尔雅》作"果蠃"。又转为鸟名之"果蠃"（《广韵》："蠃，桑飞鸟也。"）。又转为温器之"锅𥫗"（见《集韵》）。"栝楼"、"果裸"之转声，疾读之则"瓜"也。转之为"瓠瓡"，《尔雅》云"钩，䕬姑"是。又转为"蝼蛄"，谓之"蛞蝼"也（《方言》云）。又转为蛙名之"蝼蝈"（《月令》："仲夏蝼蝈鸣。"郑注："蝼蝈，蛙也。"《释文》引蔡云："蝼，蝼蛄；蝈，蛙也。"《夏小正》："三月瑴则鸣。"《传》云："瑴，天蝼也。"《尔雅》亦曰："瑴，天蝼。"注："蝼蛄也。"……按"蝼蛄"即土狗，吾歙呼"剢田狗"……）〔1，页1、2〕

这里，把同属于"圆转"这一意义层次的"果裸kualua、蜾蠃 kua lua、果蠃kualua、锅𥫗kualua、瓠瓡kolo、蛞蝼kuatlo"等同族词系联到一起，组成了语源意义同为"圆转"的一个小词群。同样，上引《果裸转语记》中的"檈儒、侏儒、蝺蝓（蠩蜍）、屡偻"等同族词，也组成了语源意义为"短"的一个小词群。

（二）词族的组合

由同一原始语源即语根生发孳衍出来的各个同族词，与语根的关系有远有近，或直接或间接。按照它们与语根意义关系的远近，可以系联成不同意义层次的词群。例如，由语根＊kl－派生出了很多同族词："为'侏儒'、为'莱菔'、为'馎饦'、为'欂栌'、为'睽罛廓豁'，则出自圜全之义者也。为'拘留'、为'金叵罗'、为'窭数'，则出自曲屈之义者也。为'飒纚'、为'瓠落'、为'俌匐'、为'扑索'，则出自敷布周匝之义者也。为'蜻蟀'、为'苏涂'、为'蝼略'，则出自旋转之形者也。为'于思'、为跳丸剑之'挥霍'、为'瘯蠡'、为'络索'，则出自适历之状者也。"[4，页266]这些不同层次的同族词，可以系联成圜全圆转义、屈曲义、敷布周匝义、旋转义、稀疏适历义这五个较大的词群。把这些由同一语根孳衍派生而又层次不同的词群，按照其意义的远与近、关系的直接与间接、生发孳衍次序的先与后，加以排列组合，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果裸"词族。将初步系联而成的词群再度缀连起来，组合为词族，是语源研究的一项极为重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三）语源的推求

语源的推求，自然应该包括词的语源和词族的语源。但是，随着同族词的系联和词族的组合，词的语源往往"水落石自见"，清楚地显露于我们面前。

例如，短剑"属镂"的语源，随着"棳儒、侏儒、蠾蝓（蝳蜍）这些同族词的系联，我们根据这些同族词之间语音和语源意义的联系加以分析，再对这些词发生的先后次序进行判断，即可得出。

这样看来，推求语源这一任务的重点，是在词族的原始语源即语根的推求上。在第一节里，我们运用古代文献和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推求“果倮”的原始语源，就是一例。更多的例子，请参看第二章第一节“语根的起源”部分。

（四）理论的研讨

语源学的研究，仅仅有同族词的系联等实践活动还不够，还必须将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加以总结，对失败的教训加以分析，对遇到的问题加以探讨，形成理论体系，并反过来用以指导实践。

语源学理论的研究状况，直接影响着语源研究实践的开展：理论的明确，能促进研究实践顺利进行；理论的僵化，会阻碍实践的前进步伐；理论的困惑，会导致实践的摇摆徘徊；理论的失误，也会将实践引向歧途。

从当前的研究工作来看，就有很多问题亟待从理论上加以探讨、澄清。举例来说，仅是属于语源学原理方面的理论问题，就有以下这些：

1．语言中的词，是由少到多、由简至繁、由含混到清晰，逐渐发展而成的呢，还是一下子就全部出现、本来就齐全完备的？

2．语词起源的“摹声说”、“感叹说”与语言的“劳动起源说”，是分别从具体过程与客观条件两个不同角度加以讨论，因而二者存在着一致性呢，还是唯心主义观点与唯物主义观点的根本对立？

3．最初的词起源时是有一定的条件、根据、缘由、契机呢，还是无缘无故、无凭无据、任意出现的？

4．荀子所说的“约定俗成”旨在宣传语言规范化呢，还是探

讨语词的起源问题？“约定俗成”指的是用词过程呢，还是指造词过程？约定俗成的结果为什么正好是这样？比如说，汉语的“果裸”为什么正好采用的是k－l－的语音形式，而不是别的什么形式？“果裸”与“骨噜”,“蒲卢”与“扑噜”，语音形式为什么如此相像？

5．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讨论名物之间的客观关系呢，还是从语源学的角度探讨人们为事物命名的主观行为？名称与事物之间的客观关系与人们命名的主观行为能否混为一谈？

6．用摹声方法所造的词，仅限于“噼哩啪啦”之类的象声词吗？那些不能发声的事物和抽象概念的名称，与当初那些因摹声而造成的语词之间，有没有可能因人类的思维联想作用而存在着派生孳衍的关系？

7．词族、语根究竟是否存在？语根是如何孳衍发展而形成词族的？有没有可能把它们研究出来？

这些理论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僵化凝固、似是而非者多，新鲜活泼、明确可靠者少；语言学界盲目附和、照抄照转者多，独立思考、大胆探索者少。可以说，在探索语源的道路上，布满了一道又一道人为的路障，使人望而生畏。不拆除这些路障，语源研究工作就难以走出徘徊、停滞的困境。

理论研究的不足，还突出表现在直到目前尚没有一个语源学体系上。正如唐超群同志最近指出的那样：“我国语言学家对词源及字源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但是，如何建立一个词源学体系，从理论上对词源的性质、类型、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等加以阐明，如何确定词源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及其与词汇研究其他方面和邻近

学科的关系，深入开展词源学研究等等，似乎尚未真正提到语言学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27，页28〕

要搞清、理顺这些理论问题，建立起语源学体系，一方面需要利用多种学科研究的成果，重新加以讨论、阐述，正本清源，用以指导实践；另一方面，也要在研究工作实践中大胆探索，拿出有说服力的实例来，推动理论研究的进展。总之，语源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既有充分的实践，又有丰富的理论，语源学体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第三节　语源研究的意义

语源的研究，不仅对语言科学，而且对其他学科，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又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一、语言学意义

语源研究的语言学意义，包括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这两方面的意义。

（一）语言研究意义

1．语源研究是探求整理词汇系统的必由之路

王力曾经指出：“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象是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

系着的。这里所讲的同源词，就是词汇的系统性的现象之一。”〔28，页545〕可见，词汇的系统性客观存在，并且隐藏较深，只是由于研究的不足等原因，“此种条贯尘翳数千年，不曾显见于吾辈之面前”〔29，页51〕，有待于深入挖掘、努力探索罢了。语源学的研究，就是要揭示词汇的类聚群分的系统，探求其同条共贯的联系，“令诸夏之文，少则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纪”〔30，页94〕。“盖语根既明，则由根以及干，由干以及枝叶，纲举而万目张，领挈而全裘振。”〔29，页50〕《果裸转语记》就使人们在这方面开了眼界。

2．语源研究是传统训诂学向纵深发展的最高境界

章太炎曾指出：“夫治小学者，在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31〕黄侃也曾说：“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32，页181〕“求训诂之次序有三，一为求证据，二为求本字，三为求语根。……字之本义既明，又探求声义之由来，于是求语根之事尚焉。”〔33，页2、3〕杨树达也说过：“语言之根抵，欧洲人谓之 Etymology，所谓语源学也。……于是训诂之学可以得一统宗，清朝一代极盛之小学可以得一结束”〔29，页50〕。可以说，探求语源，系联词族，是训诂学向纵深发展，走向系统化的必由之路；语源明，词族清，这是训诂学的最高境界。

3．语源研究是编写完备字典、辞书的迫切要求

五十多年前，杨树达曾大声疾呼：“近世一般人颇感于旧式字典之不完，而欲重为编纂。然余观西方之字典，即极寻常之种类，亦必附有语源，备人寻检。今之欲编新式字典者，附载语源乎？抑不载乎？若不载耶？何以异于旧者也。若附载耶？将从何

措手也？故吾意必语根研究明白，而后始有真正之新式完备字典之可言”〔29，页51〕。《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于1934年制订、1949年3月修正报告的《〈中国大辞典〉概述》的“编纂条例”中，“关于字音者”第五条说：“每组同音字后，或列‘语根试探’一栏，将各本字音近通转之各字，依国音顺序表以国际音标而胪列之，以通古今音义之邮，使一字多义之音源（语根），在字义栏后，结出纲领。”〔34，页140〕为此，当时《中国大辞典》的编纂者还写了一系列长编性质的单篇释词论文，如黎锦熙后来收入《汉语释词论文集》中的一些论文，就包括了考证语源的内容。几十年后，“这部历史性的《中国大辞典》（应改称‘《汉语大辞典》’）”〔34，页143〕副主编、吾师蒋云从先生又重新提出这一问题，认为《汉语大词典》（即原《中国大辞典》）的编写应该“推溯语源，说明词族。如《水浒全传》最多出现‘刺斜’一词，四十六回：‘只见一彪军马从刺斜里杀将来。’六十一回：‘刺斜里一个人大叫道：“好汉没遮拦穆弘在此！”而《说文》有‘趚，侧行也。’《广韵》去声箕韵：‘庩，偏庩舍也。’这三个词同有偏斜的基本意义而各有其具体意义，是属于一个词族的。又如《诗经》‘溯回从之’的‘溯’是逆流，‘薄言往诉’的‘诉’是辩解，《楚辞·九章·橘颂》的‘苏世独立’的‘苏’是违逆。《荀子·议兵》的‘苏刃则死’的‘苏’是抵拒，唐宋人所说的‘诉酒’、‘诉醵罚钱’的‘诉’是推辞，基本意义相同，具体意义、书写形式不尽相同，也是一个词源嬗变而成的词族，如能搜抉出来加以系联，岂不是很好地体现源流吗？”〔35，页339〕遗憾的是，正在编纂中的《汉语大词典》却未采纳这些贤者之言，反而删去了原有的“语根试探”一栏。这就不能不使人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汉语大词典》还未能成为“异于旧者”的“真正之新式完备字典”。不独此一书，至今国内编写的各种字典、辞书，还没有一部能达到这一要求的。也许有人会说：那样做是

不可靠的，会有损于字典、辞书的科学性，还是“宁缺毋滥”的好。殊不知，即以西方辞典而论，有不少词的语源，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英语“tennis”一词，义为网球。网球何以叫tennis呢？有人认为，它可能来自发球人的招呼——中世纪英语的“tenetz！”、现代法语的“tenez！”，等于现代英语的 take（接着）。也有人认为它来自古法语的tenies（源于拉丁语的 toe-nia，带子），结带为网，即称“tennis”。还有人说它源于埃及三角洲的一个城市Tinnes，这个城市在中世纪以产亚麻布出名，因网球最初是用亚麻布做的〔36，页79〕。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说明词的来源时，还有个最后的办法，标上 Sourceunkonwn（起源不明）了事〔36，页68〕。即使是同一词典，也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修订，包括其语源的解释。例如，《牛津英语大词典》（原名《按历史原则编写的新英语大辞典》，简称 OED）是所有英语词典中“最为壮观的一部，甚至被称为‘辞典之王’”。其简编本“从1944年它的第三版首次印刷以来（另外两版分别是1933 年和 1936 年出版的），已经作了三次修订，1973 年的修订最为彻底，大多数词源都作了更新。”〔37，页382〕这样作，非但无损于其科学性，反而提高了字典、辞书的利用价值，何乐而不为！语源需要不断修订，其他内容又何尝不需要修订！如果说字典、辞书不载语源、词族是因为语源研究的不足而无从着手的话，那就迫切要求语源的研究必须加快步伐了。

（二）语言教学意义

同是在五十多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杨树达指出：“二十年来，大学教育成绩无多，即以国文成绩论，亦有每况愈下之势。其原因固大半由于学者之弛懈，而吾辈任教者不能与学者以有条理系

统之知识，致令彼等对于汪洋浩汗之训诂，在校时已有望洋之叹，出校后更无线索可寻，亦岂毫无责任之可言哉！假使故训条理清明，则学者断不致有望洋之叹，而记忆有捷径可寻，吾敢断言其成绩必远超乎今日之上”〔29，页51〕。杨先生所言为“大学教育”。其实，语源知识不仅对高等教育，即使是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同样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伍铁平先生讲过这样“一个确有其事的故事”：

> 有一个学生长期分不清经线和纬线，哪个是连接南北的纵线，哪个是连接东西的横线，常将二者弄混。后来教师给他讲训诂学知识，告诉他“经”(jing) 和“茎”(jing)、“颈”(jing) 是同源词，都是从直立得义。植物的茎虽然有缠绕茎、攀援茎、匍匐茎等多种，但大多数植物的茎都是直立茎，如松柏、甘蔗等的茎。人的头颈除开歪脖子以外，都是直的。偏旁“坙”的意义本是“水脉”(《《就是“川”，原是水的象形)，也是从直得义。“径直”、“直径”、“胫”(小腿)都同直义有关。经过这样一系连，“经线”自然是指纵线，学生一下子就记住了，再也不会同纬线混淆了。这说明词源知识对汉语学习（不论是汉族人还是外族人学习汉语）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合乎记忆的心理机制的。良好的记忆象爬山，必须找到支撑点，这就是一定的联想关系。词源联系就是一种极好的支撑点。〔38，页34〕

词与词之间这种“联想关系”，在汉语中并非个别现象。《中学语文教学》上就曾介绍过陆宗达、王宁先生举的一个例子：

> “凳子”的“凳”，原是“登”的派生词，早先字也写作“登”。刘熙《释名》说：“榻登，施之承大床前、小榻上，登以上床也。”早先的凳子很低，《晋书》记载：“何无忌与高祖夜谋，其母置凳于屏风上窥之。”妇人立凳上，刚能窥头于屏风，可见凳不那么高。以后加高了，充当坐具，登以上床的功能不存在了，命名的源由也就被人遗忘了。〔39，页59〕

如果再举一反三，把“蹬”（足踹物）、隥、磴（台阶）、镫（马鞍具）”等词系联在一起，不就组成了一个词群了吗？这样，教师所教与学生所学的，不再是零零散散的单个儿词，而是一嘟噜一嘟噜音义相关的词（这组词里字形也相关）；词汇教学活动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念经说教，而是生动活泼地听讲故事，即使是小学生也乐于接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可见，适当地运用语源知识进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词与词之间的联系，通过联想规律，记住新词。随着语源研究的深入与语源知识的普及，我们将会看到，语源的知识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增强教学效果；它在外语教学中适用，在汉语教学中同样适用。

我们不妨再将目光放远一些，看看世界的未来。“现在，汉语已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运用于电子计算机。二十一世纪的新一代计算机将采用声控系统，将彻底屏弃键盘，汉语的优越性将充分发挥。英国《新科技杂志》原主编、科技发明报导专家迈克·克鲁斯先生在1987年12月发表谈话指出：汉语将成为声控计算机的第一语言。他相信，总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们将必修汉语，并以汉语语音来声控电子计算机。因为汉语只有四百多个基本音节，而英语则多达一万以上；汉语每个音节最多四个音素，每个音节都

有四声变化。在汉语中，音义相结合，读音可以知义。汉语又有简洁洗练、意义深刻之优点。一个个形、音、义结合的方块字，集中了大量的信息，而且音节清晰、易于辨别，这就使汉字成为大大优越于线形文字的理想电脑语文，从而使汉语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第一语言。国外友人不无幽默地说：'最好从现在起就教孩子们学习汉语。'"[40，页115]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正在呼唤它的第一语言要迈开走向世界的步伐。但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汉语语源的研究却大有拖其后腿的可能。索绪尔把世界语言分为两种类型："语法的"类型语言，可论证性（即有理据性）的词占优势；"词汇的"类型语言，任意性（即无理据性）的词占优势。并说"超等词汇的典型是汉语，而印欧语和梵语却是超等语法的标本"[11，页184—185]。英国语言学家厄尔曼干脆用自己的话将索绪尔的意思更明白地表示出来：汉语是理据性最缺乏的语言[41，页105]。这一观点，固然出于这些西方学者对于汉语语源的无知，却也反映了我们在这一领域里研究的严重不足。这种落后状态，与汉语将来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与二十一世纪对于汉语的要求也不适应，因此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语源的研究，应该为促进汉语走向世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历史学意义

"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42]语源研究，就它的本质来说，是要把各个词的来源的研究，跟有关语言的整个历史以及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确定它们的历史。词的历史跟人民的历史，有比语音的历史或语法构造的历史跟人民的历史紧密得多的联系。所以，要研究词的历史，特别需要联系人民的历史来进行[43，页90]。英国著名科学

家贝尔纳即指出："语言是现今活着的古代遗物。语言研究应该是研究各期各地物质文化的一切残存遗产的基本补充工作。研究语言并研究物质文化残迹，再加上目前存在的原始民族来作证，就应该能提供古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图景。"[44，页39]

民族的起源地、国家名称的来源，是历史研究中常常需要弄清的问题。例如，商族起源于何处，为什么称为"商"？这是商史研究首先触及的问题。在学术界，对商族的起源地提出了各种说法。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及文献记载这几方面的情况都表明，商的起源地应在漳水一带。这方面的考证，以杨树达的《释滴》最为精湛：

> 龟甲文有"滴"字，《殷虚书契前后编》凡四见，然《说文》、《玉篇》、《广韵》皆无其字，《集韵》虽有其字，泛云"水名"，未能确指。考殷代屡易国都，大抵皆在大河南北。滴水盖亦河南省境之水，以字音求之，盖今之漳水也。……今字作"漳"、甲文从商作"滴"者，古"商、章"音同(伍铁平先生见告："商"为书纽，"章"为章纽，章书旁纽，而非同音——引者)。《说文·三篇上·商部》云，"商，从外知内也，从冏，'章'省声。"《白虎通·声音篇》引刘歆《钟律书》云："商之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汉书·律历志》文同，《律历志》固本之刘歆也。《白虎通·商贾篇》云："商之为言章也，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书·费誓》云："我商赉女。""商"，徐仙民音"章"。《匡谬正俗》卷七云："'商'字旧有'章'音。"《水经·河水篇》云："又东北过杨墟县东，商河出焉。"《郦注》云："一曰小漳河。"此皆古"章、商"通作之证也。[45，页47、48]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臣不如弦商"，《吕氏春秋·勿躬》作"弦章"。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第三》："商读为'章'，'章'与'商'古字通。"从字形上看，"滴"是水名，故从'水'，'商'声。"滴"去水旁则为"商"。因此，如称水之名则为"滴"水，称族之名则为"商"族或"商"人。商族之名，由"滴"而起，这就是商人族称的来源[46，页265]。

语源的研究，对于确定民族的起源及其与其他民族的亲属联系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关于现代的壮族、傣族，一些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根据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它们与古代的东夷民族有着共同的来源[47]、[48]。语言学家则从历史比较语源学的角度，将侗泰语族的语言与汉语进行了比较考察，得出了语言上的强证，证明"历史上东夷集团的语言就是后来逐渐演变为侗台语族的一种语言。"诸如：爵，为一种酒器，其形取象于雀，其名亦得之于"雀"(参见第二章第一节"语根的起源")，其自上古至现代的语音演变为：*tsjak>tsjak>广州话 tsœ:kt。令人惊异的是，现代广西龙州壮语"麻雀"说作tɓɔ:k，而这个字也有"杯子"的意思；云南傣仂语"麻雀"tsɔk，也有"杯"义；国外傣语"麻雀"说作ka—tɓɔ:k(kra—tɓɔ:k)，这个字也有"高脚杯"的意义。"汉台两语的这些同源字的音义之间的联系，结合古器物、古民俗来考虑，其远肇于东夷，隐约可辨。"[49，页164]可见，"民族的起源，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和语言的起源联系起来。""探讨民族起源而不考虑到语言，那就等于在森林里闭着眼睛寻找道路。"[50]

对于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语源研究同样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例如，清代中期，四川农民起义军中有一支号称"啯噜"的队伍。为什么称为"啯噜"？这只有从语言中寻找答案。原来，在当地的汉、藏、彝族语言中，都以"gulu"之声来形容圆圆的事物和旋转

的动作；汉族地区的手工业工人以事物的形、声特征称呼该事物，如眼睛叫“二咽噜”，即反映了眼珠的圆形和转动不停的特征（现代汉语还说“眼珠骨噜噜地转”。）；藏民称经轮为“渴鲁”；彝人打仗时口呼“咽噜”。这就说明，在四川地区，无论汉、藏、彝族语言中均有“咽噜”二音，用来指称圆形事物，形容旋转的动作。而称为“咽噜”的武装集团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行动迅速，往来如飞。因此，民间据以称它为“咽噜”，是极有可能的。[51，页256、257]

文物考古工作，有时也需要语源学知识的帮助。例如，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遣策中，第46号等简所记器物有“椑榹”一名，考古工作者定为一种盘的名称，这种盘子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叫了这么一个名称？朱德熙、裘锡圭二先生为此考释说：

> “卑虒”是叠韵连语，音或转为“匾虒”。玄应《一切经音义》六：“《纂文》云：匾㔸，薄也。今俗呼广薄为匾㔸，关中呼𥟽㔸。”与此音近的联绵词还有“㯅㯕”。《广雅·释木》：“下支谓之㯅㯕”，王念孙《疏证》：“……椑之言卑也，以其卑下也。”“斯”、“虒”皆支部心母字，“椑㔸，𥟽㔸、匾㔸、㯅㯕”，显然都是一语之转。𥟽㔸训广薄，㯅㯕为下枝，以㯅㯕命名的器皿也必然有卑下浅平的特点。《说文·木部》：“榹，盘也。”《方言》五：“甂，陈魏宋楚之间谓之題，自关而西谓之甂。”郭璞注：“今河北人呼小盆为題子。”《广雅·释器》：“題，甂也。”“題”、“虒”古音亦极近。椑榹和榹、題应该是同类的器皿。

对照出土实物，可以肯定椑榹是一种较浅的盆盘类器皿的名称。[52，页63]这样，我们对椑榹的形体特点、得名之由就有

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三、文化学意义

罗常培曾指出："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转，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53]他后来在《语言与文化》一书的开头部分写道："美国已故的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的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合，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柏默(L. R.palmer)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由这些话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密切，……"[54，页1]。所以，美国学者J. R. 赫尔伯特说："事实上，词源学确实很重要，也很有趣，这不仅是因为词的最原始意义常常在今天的语言中保留着痕迹，还因为它对于揭示人类文化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55，页38]

随着文化事业的日趋繁荣和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古往今来的各种文化现象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力图从各个方面加以探索。语源的研究，就是对文化现象探索、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世上的万事万物是怎么得名的？这恐怕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问题。这就要依靠语源学来解决了。《果裸转语记》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为我们回答了不少事物的得名之由。今略加分类，列表如下，以便观览：

物类 声类	植物	动物	器		物		身体	地形	食品	建筑	其他
	圆	短	圆	曲	短	疏	圆曲	曲	块状	曲短	
k-l-	果裸 栝楼 瓠瓠 瓠瓠 屈龙	蜾蠃 果蠃 蛞蝼 渠略	锅镳 箹簏 毂轮 毂辘	拘篓 禹篓 鞠辘 岿罶			佝偻 朐䁖 喉咙 毂辘 (拳)	岣嵝 穹娄 句廉 蟹螺	河漏 谷仑 卷娄	蘧庐 穹庐 囷鹿 柧棱	
p-l-	扶留 苻离 蓓蕾 苻娄	蒲卢 蚹蠃 蜉蝣	普鲁 叵罗 蒲篮 瓿甊 杯落				痱癗	部娄 培塿 附娄 杯楼		薄栌	
l-k-		蝼蛄 蝼蝈		鹿觡							
l-p-	莱菔 芦菔	蚲蜚									
k-t-	弧毒 骨朵 果堕 活脱	科斗 活东 蝌蚪	骨董 胍肫 (杖头)		渠答		胍肫 (大腹 貌)				

续表 1

声类	植物	动物	器物				身体	地形	食品	建筑	其他
t-k-			终葵								
t-l-	诸虑 滴露		豆筥 杔栌	舳舻	属镂						都卢 妯娌
l-t-	菈蓫		碌碡 篓篼								
k-r-						氍毹					
p-r-			蜉蝣		扶揄	罘罳					扶摇
t-r-	茱萸		蜩蝓 螗蟟								
k-n-						渠挐					
t-n-			朱襦				侏儒			棳儒	
k-	瓜 菅				干 槛		拳				

表续 2

声类	植物	动物	器			物	身体	地形	食品	建筑	其他
k-k-	[illegible]姑 萑苇	蜓蜗		蘧蒢							
p-		蜱				笆 筏 桴	巴				巴 扶跌
p-p-	芘	蚍蜱 蚍蜉							波波		
l-	蔂	鹿	轮 辘		橹 阑					丽 梁 廇	
l-l-		留离	辘轳 [illegible]轳		鹿卢				[illegible]		娄罗
t-	葵		椎		盾						
t-t-	菵蘲									螮蝀	

续表 3

声　类	植物	动物	器		物		身体	地形	食品	建筑	其他
p-k-	芙蕖				庋渠						
p-t-	雹突								馎饦		
p-o-		蚨蚜									
o-p-			瓯瓿								
o-l-		鹦螺					伛偻	瓯窭			
o-			罂				握				
r-r-		蝛蝓									
k-s-	蘧蔬	蠼螋				窭数 钩须 渠疏					
p-s-					扶胥 扶苏 蒲胥 夫须					浮思 罦罳 浮罳	

续表 4

声类	植物	动物	器			物	身体	地形	食品	建筑	其他
s-p-						罝罘					
s-l-	蒺藜						瘯蠡 瘯瘰				
l-s-						络索 流苏					
t-s-	出遂										
s-t-	苏涂										
s-	茨					绡					
s-s-						骚杀					子胥

由上表可以看出,《果裸转语记》为我们解释了所以得名之由的事物,涉及植物、动物、人体、器具、地形、食品、建筑、人名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多姿多采的古代文

化画面。这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大河之源、大树之本。“没有语言就无所谓文化。”[56，页302]当今研究中国文化者，应该由此开始才是。这说明，在当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57，页24]。

例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伏羲、女娲，经闻一多考证，其名称来自匏瓠、瓜，二者都是葫芦[58，页59、60]。伏羲、女娲为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始祖，因此有人将中华文化概括为“中华葫芦文化”[59]。如果再打破砂锅问（纹）到底：匏瓠、瓜又因何而得名？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一“‘果裸’词族表”作出圆满的回答。

四、思维科学意义

法国著名的生理学家贝尔纳曾说：“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最好的窗口。”乔姆斯基曾写了《语言和心理》一书，指出：“研究语言的长远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研究中有可能对心理学的某些中心问题提供一个清晰、明确的表述，并对这些问题提供大量证明。……语言研究能够有助于理解心理过程的性质和结构。”[60，页103]罗常培也指出：“从许多语言的习用词或俚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54，页11]苏联的阿巴耶夫说：“词的历史不仅与人民的外部世界有关，而且跟人民思维的历史有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语言中保存着人们在许多世纪中努力认识、思考和支配现实的引人入胜的记载。如果词源研究不仅注意到词的历史的形式方面，而且还注意到它的内容方面，那么，这种词源就可以对阐明人类思维的历史提供丰富的材料。人们通过什么途径认识某种现象和关系并用语言表达出来，怎样借助于语言认识现实和‘掌握’现实，怎样利用思维的抽象能力从许多具体的、个别的形象和表象，构成一般的、抽象

的概念——对阐明这种种问题，词源研究都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例证材料。”[61，页20]

我们看上面列出的“果裸”词族表，可以从中发现人类思维的一些规律：

1．模糊——清晰，再模糊——再清晰

“语言的古老性和语言的模糊性是成正比的。”[62，页45]在为各种不同事物命名的过程中，原始人往往求同存异，抓住这些事物的共同的或相似的特征，引申触类，以已知推未知，以此名命彼名，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异类而同名的现象。刘师培就曾指出了这一现象：

古人之于物类也，凡同形同色，则其呼名亦同。《说文》云：“瓢，蠡也。”蠡与螺同，“蠃”为“螺”字之正体。螺之大者可剖之为瓢，与匏瓠剖为瓢者同形，故瓢亦谓之“蠃”。《说文》又云：“蜾蠃，蒲卢，细腰土蜂也。一曰虒蝓。”又“蜗”字下云：“蜗，蠃也。”盖三物同名为“蠃”。其所以同名者，皆以形圆而中细得名。蜾蠃转音又名“蒲卢”，而“蜾蠃”之音又转为“果蓏”，《说文》云：“栝蒌名果裸。”盖栝蒌亦为圆形，故字异音同。果蓏又作“果蠃”，“栝”、“蜾”，“蒌”、“蠃”皆系双声。若近人称瓠为“胡卢”，或曰“蒲卢”，其音亦由“果蠃”通转。盖瓠亦形圆中细之物。“蒲、瓠”双声，莫不取义于圆转。今江淮之南称物之圆转不已者恒曰“圆滚卢”。故物之圆而易转者，古人皆称以此名。植物之果蓏、胡卢，动物之土蜂、蜒蝓、螺蛳，所由异物而同名也。即取名不同，其音亦不甚相远，则以在有音无字之前仍为一字也。又

《尔雅·释木》云："边，要枣。"郭注云："子细腰，今谓之'鹿卢枣'。""鹿卢"二字与"瓠"字为双声，即系"瓠"字之转音。形圆中细之物咸谓之"鹿卢"，故凡物之形圆中细者可谓之为"瓠"。观于此例，则植物、动物之得名，非以物类区分，实以物形区别；物形相似，则植物、动物均可锡以同一之名，非若后世之物各一名也。[63，页1—3]

这种"凡两物相似者，即锡（赐）以同一之名；此物近于彼物者，亦假彼物之名"[63，页3]的方法，是原始人命名造词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用现在的眼光考察一下"果裸"词族中的同族词，就会发现，这些词的语音大同中还有小异：或声有小别，或韵有小异，或调有不同，或倒言之（蛞蝼＝蝼蛄）。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方言的差异、古今的变化之外，恐怕也不能排除人们有意识地变换其辅音、元音或声调以示区别的可能性。字形的差异就更明显了。同是"kua(koa)lua"一音，瓜果名写作"果蓏"，昆虫名写作"蜾蠃（蜗蠃）"，小鸟名写作"果蠃"，炊具名写作"锅镙"，相互有别，不再混同。这反映了人类思维由初期的模糊、含混到后期的清晰、明确的发展过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原始语言，一开始就是由声音的囫囵不清的非音节过渡到清晰的音节音。"[64，页268]

当然，人类认识的这种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反复过程。语言中的词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造出的。每当需要为一个事物命名的时候，人们就要将这个事物的特征与已有了名称的事物的特征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点，而不管这两个事物各有什么独特之处，然后以已有的语音形式加以命名。这实际上是忽略甚至有意抹杀、混同事物之间的特点和区别，可以说是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使名称模糊化。不这样做，就无法用现成的语音形式来为新认识的事物命名。每当造出一个相似的新名称时，就经历了一次由清晰到模糊的过程。但是，人们在使用这个新名词时，还要利用种种办法，例如语音屈折、文字形体变化等，加以区别，使已经模糊了的概念再清晰化。命名时的有意模糊化与用名时的力求清晰化，就构成了思维的矛盾运动。人类思维的这种模糊——清晰、再模糊——再清晰的过程，接连不断，以至无穷，总趋势是由最初的浑沌模糊到最后的清晰周密，反映了人类思维呈螺旋状上升的发展趋势。

2．具体——抽象，再具体——再抽象

在人类思维的萌芽阶段，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具体的，如各形各色、大大小小的果实等具体事物。久而久之，人们发现，这些果实的形状都是滚圆的，于是抽象出了圆转的概念。然后，人们又以“果裸”所具有的“圆转”这一抽象特征去比附其他具有相同或类似特征的东西，如土蜂“蜾蠃”、小鸟“果蠃”、饮具“锅鑑”、食品“谷仑”等。这样。抽象的圆转概念一旦落实到一种具体的事物上，又具体化了。但是，人们发现，有些物体，并非是象果裸那样的立体圆，而是一种平面的圆、块状的立体形、屈曲的形状等近似的圆形，由这些具体的物体再抽象出相应的块状、屈曲、圜全等概念，如“囫囵”等。这样，人们的思维又一次从具体到抽象，进行了一次新的飞跃。先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这一系列过程十分清楚地表明：“这种周而复始的螺旋式前进，使人类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概括的发展历程。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人类的思维都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发展、变化和革命性飞跃。”[65，页1]

第四节　语源学与相关学科

语源学不仅和语文学的其他学科，如语义学、音韵学、文字学、语法学、方言学等有关，而且同社会科学各学科，如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思维科学有关，甚至与自然科学，诸如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学、数学等也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不仅仅是思想和感情的反映，它实在还对思想和感情产生种种影响。”[66，页139]大千世界，无所不有；反映在语言里，自然也就万象杂陈了。对此，清代深通天文、历算、史地、音韵、训诂、考据等学的戴震，曾经结合自学经历，深有感触地说：“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纵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

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67，页183〕语言现象如此，而语言中的语源现象，则又反映了人类对于世界万物的最初认识，因此，语源与物质世界及人类精神世界的密切联系就显得尤其突出，语源学的研究，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相邻或相关的各个学科。

一、语源学与语言学其他学科

语言学的其他各个学科，都是语源学的近邻。这一点，我们通过前面“语源学的性质”部分的那幅语言学各学科关系图，就看得十分清楚了。正如索绪尔所说：“词源学把某一个词当作研究的对象，必须轮番地向语音学、形态学、语义学等等借用资料。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它要利用语言学交给它使用的一切手段，但是并不把注意力停留在它非做不可的工作的性质上面。”〔11，页265〕

（一）语源学与语义学

语源学和语义学是一对孪生的姐妹，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对于一个具体的词来说，语义学要研究它的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以及基本意义、引申意义等，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例如，“果”的基本意义是“植物所结的果实”，而其他意义“事情的结局、结果”、“实现，信实”、“胜”、“有决断”、“美”、“饱足”等义则是由基本意义引伸而出的意义〔68，页147〕；以上的各种基本义和引申义都是“果”的词汇意义，也叫词义、语义；“果”可以在句子中用作名词、动词、形容词，充当主语、谓语等——这是它的语法意义；

中性，可以用来比喻"事情的结果"等——这是它的修辞意义。所有这些，都是语义学研究的范畴。而语源学则要研究词的最初的音义来源，它的语源意义，它当初音义结合的缘由，即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例如，"果"之所以叫"果"，是因为当初原始人类模仿果实滚落的声响而造出了这个词，它的语源意义是"圆转"。

语源学与语义学的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源学可以帮助语义学更精密、更准确地分析词义

我们看《果裸转语记》中的一个例子：

> "果隋"，即"果裸"也。《史记·货殖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汉书·地理志》作"果蓏嬴蛤，食物常足。"余谓此"果蓏"谓草木实，即高诱所谓"橞，果裸"之意。"裸"转为"隋"，《索隐》："隋，徒火反。"……《史记正义》："'隋'今为'𢱧'，上古字少也。'果𢱧'犹'𢱧叠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𢱧'之语。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𢱧叠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晓'裹𢱧'之方言，修太史公书，乃云'果蓏'，非太史公之意，班氏失之也。"余谓班氏是，然'隋'、'𢱧'亦自可通。[1，页12-13]

如果不是从语源上来探讨，我们很容易轻信张守节《史记正义》的"'果𢱧'犹'𢱧叠包裹'"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而误以班固将"果隋"写为"果蓏"为非。今人符定一所编《联绵字典》就因为各个词是独立成条的，不容易发现"果隋"与"果蓏"的联系，因而误信了张守节《正义》的话[69，辰，页149]；台湾编的《中文大辞典》亦承其误

[70，卷17，页85]。而朱起凤所编《辞通》将"果裸"、"果隋"编在一处，对照比勘，就能很容易地判断出二者的关系了[71，页1477]。

可见，语源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古训之是非，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语义。

2. 语义学有助于语源学的研究

词义的引申，是人类思维发展的结果；同族词的孳乳，同样反映了人类的思维的发展。二者的发展过程多有一致之处。例如，上面提到"果"的一个引申义为"饱足"，《庄子·逍遥游》："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陆德明释文："果然，众家皆云'饱貌'。"因此，肚子饱或吃饱肚子叫做"果腹"。柳宗元《憎王孙文》：充嗛果腹兮，骄傲欢欣。"今人形容肚腹胀满凸起曰"肚子鼓鼓的。"这就提示我们：乐器之"鼓"，是否因其凸肚挺腹的形象而得名？只是人们对于"果"kua是从其充实饱满的内含和滚圆凸起的外观这两方面同时着眼，而对于"鼓"ka则仅仅着眼于其圆凸的外观而已。

词义的引申发展过程，常常可以给我们提供人类思维的发展线索。这对于我们把握人类的思维过程，据以探求语源、系联词群乃至组合词族，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二）语源学与音韵学

语源学与音韵学的密切关系，我们通过《果裸转语记》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1. 语源学必须以音韵学为利器

程瑶田能写出《果裸转语记》，绝非偶然。他师承精于音理、长于审音的音韵学家江永，又是一代小学大师戴震的师弟。江永

首创"同位"[72](声母发音部位相同)之说，其弟子戴震作《转语》二十章，推阐"同位"之理，并另创"位同"(声母发音方法相同)之说，以"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概括转语规律。与戴震关于转语理论的探索相呼应，程瑶田作《果裸转语记》，从转语实践方面进行探索。文中"突厥致书隋文帝曰：'伊利俱卢设莫河始波罗可汗'"句下自注云："'伊利俱卢'，所谓双声迭韵。'伊、俱'，'利、卢'为双声；'伊、利'，'俱、卢'为迭韵。然以字母言之，'伊'为影母，属喉；'俱'为见母，属牙音。牙、喉声不同矣。今证之以此，则二母不得别为两声。益信戴东原以'见'为喉之发声，'影'为喉之收声，为得自然之音位也。"[1，页2]"可见他已看到戴震《转语》二十章。"[73，页66]又云："昔吾友戴东原语余云：'夫政也者，蒲卢也。蒲卢，转变捷速之谓。'然则'抠揄'即'蒲卢'之转。戴氏之云，与《方言》合矣。"可见他们师兄弟是少不了切磋琢磨、商讨学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果裸转语记》是在当时的音韵学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写成的，是因声求义探索词族的一次可贵的实践。

再从语源的构成成分来看。词的语音形式和语源意义的结合，构成了语源，但二者的表现形式却很不相同。语音形式是一种外在的、表层的形式，可以一望而知，如"果裸"、"蜾蠃"、"果蓏"、"锅𬭚"的语音形式同是k-l-，这很明显。而语源意义却是内在的、深层的形式，非经过一番挖掘，就不能窥见其真实面目。如上列四词，只有经过排列、比勘、考索，其语源意义"圆转"才能显现出来。这样一来，要揭示潜藏于深层的语源意义，不能不从其外在的表层形式——语音入手。因此，语源学的研究，不能不仰仗音韵学的知识。可以说，音韵学是语源学用来探索词族、揭示语源的一把锋利的解剖刀。没有了这把利器，语源研究也只有束手无策；没有音韵学，就没有语源学。

2. 语源学为音韵学提供课题和佐证

在戴震、程瑶田时代，无论是转语理论还是转语实践，都处于草创阶段，理论还不够完备，实践也不够成熟，因而程瑶田觉得转语“不可为典要”，即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法则。这一方面反映了程瑶田系联“果裸”词族时思路还不够清晰，可以说尚处于混沌状态；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音韵学还不能完全解释这些转语的音理。这就向音韵学提出了挑战：必须对这些转语的音理深入研究，探明这些音义相通的词的音转轨迹。

《果裸转语记》写成之后近二百年来，由于一代又一代音韵学家的不懈努力，音韵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能够对于其中的音转现象加以解释了。

这里，我们将《果裸转语记》涉及的几个主要的音韵问题提出，结合音韵学界的研究情况加以讨论。

(1) k-l-与p-l-

声母形式k-l-起源于原始人类对圆形物体滚落响声的摹拟，已如前所论；p-l-可能同样起源于摹拟物体折断、劈裂、掉落的响声。《尔雅·释诂下》：“毗刘，暴乐也。”郝懿行义疏：“‘毗刘暴乐’盖古方俗之语，不论其字，唯取其声。今登莱间人凡果实及木叶堕落谓之‘毗刘杷拉’，‘杷拉’亦即‘暴乐’之声转。”[74，页235]这就犹如“今语模仿一物体滚的声音为gululu或kululu，……有时也用bululu或pululu来模仿”[6，页427]。正因为如此，k-l-和p-l-两种语音形式常常可以互换。例如，潘尊行指出：“吾人于土蜂之变言‘果蠃’为‘蒲卢’，已见k-l-与b-l-两语核之相当矣。同例，蜗牛谓之‘蜗蠃’（《说文》），又谓之‘蚹蠃’（《尔雅·释鱼》），亦曰‘仆累’（《管子·地员》）；矛谓之‘屈卢’（《史记·仲尼弟子端木赐列传》），又谓之‘勃卢’（《越绝书》）。吾人得因之以推知蛣谓之‘魁陆’（《尔雅·释鱼》郭注），蚌谓之‘蛤梨’（《淮南·道应》高注），蜃谓之‘蒲卢’，

原亦为一语之变。且知《尔雅》中一物二名而互为训，如《释草》'莞，苻离'，莞之言'芄兰'，并指其叠生；《释木》'瘣木，苻娄'，瘣之言'块垒'，并状其拥肿，亦此两语核之变。"[75，页45，46]

(2) k-l-、p-l-与t-

汉藏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结果表明，k-1-、p-1-的早期形式为复辅音*k1-、*pl-，它们后来又演变出舌尖塞音t-，即*kl>t-*、pl->t-等[76，页106]。

例如，蛋的名称，有"丸"(*gwan)，《说文》说是"圜倾侧而转者"，《山海经》"丹山之阳有凤之丸"，指"卵"(*lwan)。《说文》"卵又作"卝"(*kwan)，段注曰："《系部》'绾'下去：'读如鸡卵'，盖古卵'读如'管'也。"又曰："《内则》'濡鱼卵酱'，郑曰'卵读为鲲'鲲，鱼子也，或作'挟'。韦注《国语》亦云。"这样，*klwan>kwan，*klwan>lwan，*klwan>tan，也许就恰当地解释了"丸"、"卵"、"蛋"的语音来源。此外，联绵语"混沦"、混沌"、"囫囵"并取浑圆无缺之意[214，页210]。又如，张永言先生指出：南宋范成大《秋雷叹》诗自注引吴谚："秋孛辘，损万斛。""孛辘"(b'luk)义为雷，与藏语' brug(Balti方言为blug)音义相符，二者当是同源。《尔雅·释天》："焚轮谓之颓。"曹魏孙炎《注》训为"回风"，而近人闻一多非之，认为"焚轮"即"丰隆"，"颓"即"霆"，义并为雷。今按："焚轮谓之颓"，辞例同于《释器》"不律(pliwət)谓之笔(piwət)"。"焚轮"和"颓"是所谓一语之转，声母为b'l->d'-，韵部为"文""微"对转；它们兼具"雷"与"回风"二训，正如藏语' brug 兼有thunder与whilwind二义，《尔雅》孙炎旧诂和闻氏新解可以并存不悖[78，页24]。

明白了*kl->t-、*pl->t-这一语音演变规律，我们就可以解释这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了。《说文·木部》："椆，木也。从'木'，'周'声，读若'丩'。"桂馥义证："'读若丩'者，《释木》：'料者

聊。'毅谓'丩、枓、槶、聊'声相近。"正符合这一演变规律。

(3) l-与r-

李方桂说："可以推测喻母四等很近r或者l。又因为他常跟舌尖塞音谐声，所以也可以说很近d-。我们可以……暂时以r来代表他，如'弋' *rək，'余' *rag等。到了中古时代 *r-就变成 *ji-了，参考古缅甸语的r-变成近代j-的例子。喻母四等还有跟唇音或舌根音互谐的例子，如'聿'(参看'笔')'盐'(参看'监')等，这类的字可以拟作 *brj-或 *grj-。"[2，页13、14]r-、l-(来母)在充作音节中间的流音时，常常可以互换。例如，黄承吉曾指出："古者'旒'、'流'、'留'之音皆如'由'，诸书可以互见，是'留'声之'溜'，即'由'声之'舳'矣。而读'溜'声之'六'即是'陆'，则是'坴'声之'睦'、'鯥'，亦即'由'声之'舳'矣。且如'舳'与'柚'皆'由'声之字，而口读不同、去入亦别者，乃口舌之参差所成，统以声则殊不足辨。故'鯥'、'舳'犹若难喻，而'溜'、'柚'则更易明。然则'鯥、舳'正可通矣。"[79，页233、234]又如，《说文·瓜部》："㼌，本不胜末，微弱也。从二瓜。读若'庾'。"以主切，喻母四等。席世昌读记："《汉书》作'蓏'"，是以"㼌、蓏"为一字。徐灏注笺："果蓏，本作'㼌'，取瓜多意也。因用为微弱义，又增艹作'蓏'。"[80，页3205]又《说文·艹部》："蓏，在木曰果，在地曰蓏，从艹，从㼌。"《说文系传》作"从艹，㼌声"。郎果切，来母。徐灏注笺："'㼌、蓏'实一字相承，增'艹'非会意也。'㼌'当读同'蓏'。《唐韵》'以主切'者，声之转也。"[80，页236]可见"果蓏"(k-l-)亦可读为"果㼌"(k-r-)。《史记·货殖传》"果隋蠃蛤"，《汉书·地理志》作"果蓏蠃蛤"，张守节《史记正义》："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摇'之语"，是"果㼌"之语唐时尚存于楚、越方言中，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只是张守节不懂其即为"果㼌"之方音，误写作"裹摇"，并曲解为"摇叠包裹"，本已失之千里，却反斥"班固不晓'裹摇'之方言，

修太史公书，乃云‘果蓏’，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其实，正是张氏“甚矣其谬也！”[81，页167]再如，《尔雅·释虫》：“蜉蝣，渠略。”陆德明释文：“蝣，郭音‘由’；本又作‘蛥’，谢音‘流’。”《方言》卷十一：“蜉蛥，秦晋之间谓之‘蟝蟹’。”郭璞音义：“‘蜉流、浮由’二音。”钱绎笺疏：“蜉蛥之言‘浮游’也。……《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传》云：‘……浮游者，渠略也，朝生暮死。’‘浮游与‘蜉蛥’同，‘渠略’与‘蟝蟹’亦同。《曹风·蜉蝣》篇：‘蜉蝣之羽’，毛传：‘蜉蝣，渠略也，朝生暮死。’‘蝣’与‘蛥’亦同。”[82，页644]“蝣、游”，喻母四等：‘蛥’，来母。“蜉蝣（浮游）”（p-r-）又可以说作“蜉蛥”（p-l-），此r-、l-通转之又一证。

(4) ＊kl-(＊pl-)＞t-与s-

s-类声母的来源问题比较复杂。音韵学界对此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除了传统的“通转”说外，近几年的主要观点有“演变”说和“前缀”说。

① 演变说。国外学者梅祖麟、罗杰瑞先生认为，s-由＊Cl型复辅音声母变来，其演变过程为＊Cl＞ts＞s[83]；国内学者杨春霖先生认为：“‘精、清、从、心’从‘端、透、定’变来”[84，页118]；李瑾先生认为舌尖擦音（s类齿音）由舌根塞音（g类牙音）和舌根擦音（h类喉音）发展而来[85]。

② 前缀（词头）说。国外学者李方桂、张琨、包拟古等通过汉藏语的比较，认为s-类声母来自上古复辅音的s-前缀（词头）[2][86][87]。国内学者潘悟云、舒志武等亦推阐此说[88][89]。

s-类声母与塞音、边音存在着密切关系，这一点，音韵学界的认识还是较为一致的；困难只在于如何弄清它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语源学的研究迫切要求其姊妹学科——音韵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加快步伐，探明其中的奥秘，以满足语源学及其他学科研究的需要。

《果裸转语记》研究的实例，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语源学不仅要充分利用古音研究的已有成果，并仰赖音韵学的进一步发展，以之作为研究的利器；另一方面，语源学也可以“以大量的义通之词声音演变的轨迹，来证明古代声纽与韵部之间的关系，以为音韵学研究古代汉语音系的佐证。”[90，页118]

（三）语源学与文字学

由于汉字的意音文字特点，形、音、义三者的互相纠缠，就使得语源和字源、语源学与文字学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语源学有助于文字学

在文字学研究中，“有时一个字的基本字义可以通过考察它的‘语族’(word family)来决定。……考察它的语族，找到它的核心意义，然后用这意义去验证”[91，页78、79]。例如：

“四”字，金文中已有，林义光以为“即‘喙’之古文”，丁山以为象口舌之形，商承祚先生谓“象张口出气形”[14，页7841-7843]。蒋云从先生则不仅从字形，也从语源角度探讨“四”字的形、音、义，指出：

> “四”者“自”之异文，“四”与“自”皆鼻之初文也。“自”象其全，“四”作四形，金文或为㕗为𦈢，特著鼻孔之形，斯为异耳。“自”孳乳为“息”。……“四”孳乳为“呬”为“𣸣”，《说文》：“呬，东夷谓息为呬。”……又孳乳为“泗”。《诗·陈风·泽陂》：“涕泗滂沱。”毛传：“自目曰涕，自鼻为泗。”此“泗”为鼻液，会意。……“呬”又为“㗻”者，《后汉书·

张衡传·〈思玄赋〉》："呬河林之蓁蓁兮，伟关雎之戒女。"李贤注："呬，《尔雅》曰：'息也。'……"《文选》作"㣶"。旧注曰："㣶，息也。……"……夫鼻气为"呬"、为"㣶"、为"息"，鼻液为"泗"，欲谓"四"非鼻义，谓"四"之与"自"、"㣶"之与"息"不为一字之异形，将不可得矣。若夫"自、四、鼻"三文韵部既同，"自、四"发声复相近，则又音之相通者也。[92，页133、134]

这里，列出了字族"四、泗、呬、㣶"及同族词"自、息"，再参照金文的"四"形，则"'四'者'自'之异文，'四'与'自'皆鼻之初文"的结论自然水到渠成，使人豁然顿悟。可见，研究文字，不仅要从字形着眼，有时也要从语音、语源的角度，观察字形在字族和词族中的地位，系统研究，往往可以另辟蹊径，豁然开朗。

2．文字学有助于语源学

文字形义既明，再进而探求该字所表示的词的语源，也就有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文字形体的分析，常常可以成为进而探求语源的契机。

徐中舒先生在一篇论述古文字考释的文章中说：

狗，甲骨文作𢀖𢀖，金文作苟(大保簋)、苟(盂鼎)，从"苟"之"敬"作敬(师酉簋)、敬(余义钟)。(引者按：王组智学长见告，原选字形有误。引者即据徐中舒主编之《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重新选定字形)。甲骨文及早期金文，只以两笔勾勒狗的两耳上耸、前后肢距地有所伺察之形。甲骨文用为地名，读"狗"读"敬"，还不能肯定。金文则分化为"敬"的专用字。狗为人守夜，又随猎人追

捕猛兽，经常要作儆戒警惕的准备，有时还要发生惊恐，“敬”就是从这些意义引申出来的。原始的“狗”字用笔太简，师酉簋增“口、攴”两个偏旁。“口”象狗颈上所系铃形，“攴”象持杖牧畜之形，从“口”从“攴”就说明狗是家畜。在文字行用中，“犬”作为狗的专名，“敬”就可以分化为恭敬之“敬”而不至于与“犬”混淆了。作为狗的原始象形字，其形音义在文字中，就保存在“狗”的形声字中了。……“犬、苟”的读音都是其叫号的吠声。“犬、句、苟”古韵“幽”部，“敬”“耕”部，“狗、敬”虽同象狗形，但语源在殷周之际，就早已不同了。

〔93，页133〕

这里，先从甲骨文、金文的形体上分析，说明“敬、狗”二字字形有关；再从语音上分析，说明“敬”的读音与“犬、狗”相近，从而探明“敬”的语源来自“狗”，而“‘犬、狗’的读音都是其叫号的吠声”(吾乡方言说，“狗‘kang kang’叫”)。如果不是从字形分析入手，“敬”的语源也就无从探求了。可见，文字学也是汉语语源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部分。

（四）语源学与语法学

语源学和语法学也存在着一些瓜葛，这主要表现在同族词的构词形态变化上。关于这一点，周祖谟先生曾经专文论述。他说：

古人一字每有数音，或声韵有别，或音调有殊。……至若音调有殊者，则多为一义之转变引伸，因语词之虚实动静，及含义广狭之有不同，而分作两读。或平或去，

以免混淆。即如物体自有精粗美恶，人心亦有爱憎去取，物之精者美者，谓之“好”，音“呼皓切”；粗者劣者，谓之“恶”，音“乌各切”。而心有所喜所爱，则谓之“好”，音“呼号切”；所憎所恶，则谓之“恶”，音“乌故切”。夫物之美恶与人之好恶义虽相关，但以其词类不同，用于文句之地位亦不同，故古人区分为两词两音，一读上，一读去，斯即以四声别义之例也。……综合言之，汉语语词声音之变转，约有四端：(a) 声调变读，(b) 变调兼变声母，(c) 变调兼变韵母，(d) 调值不变仅变声韵。此但就字形不变而言，推而广之，凡由同一语根孳生之语词，虽形有增变，义有转移，而音则每借声调之变换以区分之。追溯其始，盖古人一字兼备数用，尔后增益偏旁，分别之字乃多。或变其声韵，或变其字调，卒然观之，似别为一字，实即由一意义相关之语词而来。如“内”之与“入”，“位”之与“立”，“姓”之与“生”，“威”之与“畏”，“鉴”之与“监”，“教”之与“学”、“俨”之与“严”，“俱”之与“具”，“潮”之与“朝”(朝夕之“朝”即古“朝汐”字。)，皆其类也。学者执此义以推寻文字语词日益蕃衍之要徼，自当得其鰓理。……夫以声别义之事，乃汉语之特色，与文法、训诂、音韵，皆息息相关。
[94，页81、119]

这里揭示了一条重要规律：汉语同族词的孳衍分化，其书面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字形增变者，另一种是字形相同者；而“借四声变换以区分字义者，亦即中国语词孳乳方式之一端矣。”“汉语古代书音以四声区分词性及词义，颇似印欧语言中构词上之形态变化。”[94、页112、113]这是我们研究汉语同族词时应该注意及

之的。

对同族词作语法上的分析，可以深化我们对同族词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利于同族词的系联工作。俞敏先生对"入(动词)、内(名词)、纳(动词)"，"入(动词)、汭(名词)"，"入(动词)、枘(名词)"，"立(动词)、位(名词)"，"卅(数词)、世(名词)"，"盍(动词)、盖(名词)"、"合(动词)、会(名词兼动词)"，"泣(动词)、泪(名词)"，"接(动词)、际(名词)"，"给(动词)、气(既)(名词)"，"执(动词)、贽(名词)"，"集(动词)、萃(名词)、最(名词)"等同族词的系联与分析[95，页32—43]，堪称这方面的范例。我们再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甲骨文中的"'凵'象坎陷之形，乃'坎'之初文。"(杨树达语)。古汉语名动相因，"坎"字除名词用法外，还有动词用法，掘地为坎或是掘地而埋物其中都可以叫"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杜注："掘地为坎以埋盟之余血，加盟书其上。"《周礼·秋官·司盟》郑玄注："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歃用牲"，《昭公六年》有"坎用牲"之语，"歃、坎"音近通用。"臽、歃、陷"与"坎"意义相近，字音也极其接近，"臽(歃、陷)"应该就是从"坎"分化出来的词[96，页163]。"臽"(歃、陷)为动词，而"坎"今用为名词。

(五)语源学与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是"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语言的学科。……社会语言学家希望解释为什么在语言或方言中永远存在着差异，力图在共时的语言阶段的差异中寻找演变的过程，在社会原因中寻找演变的方向。"[97，页1578]

程瑶田说："夫简策之陈言，固有存人口中之所亡者也。而其在人口中者，虽经数千百年，有非兵燹所能劫、易姓改物所能变，则其能存简策中之所亡者，亦固不少。"[98]正是基于这一可贵的认识，他在《果裸转语记》中，联系当时社会的方言，通释"果裸"一词的演变，体现了"在社会原因中寻找演变的方向"的精神：

> 山西人以米粉杂面入水和之，散碎成块（中杂以菜及油）蒸食之，谓之"谷垒"。吾徽谚语：切鱼肉成块，不羼菜切者谓之"谷仑块"，余谓即"囫囵"也。车有毂有轮，合言之曰"毂轮"；"轮"又转为"辘"，今皆谓之"车毂辘"。自有"毂辘"之名，凡块然者皆得谓之矣。西北人呼拳曰"毂辘"，呼人侏儒者亦曰"毂辘"；吾徽呼物终葵首者通曰"毂辘"。[1，页12]

这种存于"老妪稚子"口中的"鄙谚俚语"，自古及今，都大量存在。它与语源的研究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1．社会语言学的材料有时可以成为解决语源问题的钥匙

油脂、脂肪之"脂"，其名称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单从文献上难以求证，但可以从社会上找到答案。吾乡称动物脂肪烧炼过后的油渣为"油脂腊子"，而摹拟炼油时的声音为"吱啦吱啦"。这就启示我们："脂"极有可能是因烧炼时的"吱吱"响声而得名。"脂"的得名之由一旦获得正确的解决，"旨"（味美）的语源也就迎刃而解了。可见，"正是方言的材料往往可以提供正确词源的钥匙。"[61，页61、62]

2．语源知识也有助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深入

属于社会语言学的方言调查、描写工作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何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使人们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语源的研究就是其发展方向之一。如曾光平先生的《方言词寻根觅亲》中的一个例子：

> 清早长沙话说黑早，乍听会觉得说法奇怪，其实说得很明白。……清早的清是青，是黑的意思。即天还黑的时候。黑布到今天福州人、陕西商县人还都说青布。青丝是黑色的丝，也用来形容头发。那么长沙人说黑早不是说得更明白吗？不但清早的清是黑的意思，连早也是黑的意思。皂荚因壳是黑的而叫皂荚。皂是早用笔划屈折为手段而造的字。后用油脂代替皂荚，所以叫肥皂。[99，页73]

二、语源学与社会科学

语源学具有各种社会科学意义，这在上节中已讨论过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来讨论另一个方面：语源学必须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密切结合。

索绪尔指出："语言学和其他科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它们有时从它借用资料，有时向它提供资料。其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很清楚的。"[11，页26]因此，要做各种语言或方言的语源研究工作，必须广泛地援引历史学的、人类学的、民族学以及其他毗邻科学的材料做印证。真正的科学的语源研究必须以广泛的、全面的现实为支柱。语源学不仅是词的科学，同时也是词所表现的现实的科学。所以，真正严肃的语源研究者应该具有各种各样有关历史、

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等的知识。在语源学的领域内，语源学家特别需要跟相邻的社会科学的代表们协作[43，页103、104]。

（一）语源学与历史学

1．历史研究对于确定同族词产生的时代具有指导意义

语源的研究，必然要系联同族词。同族词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于这些产生于不同历史时代的同族词，是简单地堆积到一起了事呢，还是按其产生时代的先后次第划分出堆积的层次，清理出其发生、发展的源流呢？当然以后者为好。而要划分层次、清理源流，就离不开历史学的原始社会发展史分期研究。

例如，语音相近、语源意义相同的同族词"果裸"、"果蠃"、"锅镳"，前为植物类，次为动物类，后为器物类。这些名称是同时产生的，还是有先有后？如果有先有后，孰先孰后？这单靠语源学本身是难以确定的。但历史学的原始社会发展史分期研究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依据。有关学者为我们列出了颇为详细的原始社会发展史分期表[100]。根据原始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判定：采集时代在前，则瓜果之类的植物名称最先产生，因为"这时候人类生活在他们原始的环境内，依靠水果和坚果为生。音节分明的语言即开始于这一期"[101，页9]；渔猎时代次之，则鸟兽等动物名称大致产生于此期，因为"枪矛和梭镖的迅速推广，使得狩猎对象由少数几种大型动物扩展到多种动物，甚至鸟类"[102，页95]；还有土蜂"蜾蠃"的得名，似应在采集时代与狩猎时代交替、人类由吃植物到吃肉的过渡时期；陶器、铜铁时代在后，则"锅镳"等器物名称的产生相当晚。这些次第，

虽然也免不了有些错综、例外，不可绝对化，但我们既然有原始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作依据，大部分同族词的相对时代先后层次基本上还是可以得到确认的。

2. 历史研究能够为证实已有的语源结论提供材料

我国不仅有浩瀚而悠久的历史文献，而且有丰富而地域宽广的地下考古材料。这些都能为语源研究提供大量的依据。

《释名·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对刘熙的"碑，被也"这条声训，我们应当怎么看？王先谦疏证补："毕沅曰：《礼·大丧记》云：'凡封，用綍去碑负引。'郑注云：'封，《周礼》作"窆"。窆，下棺也。……又树碑于圹之前后，以绋绕碑间之鹿卢，挽棺而下之。……'皮锡瑞曰：《礼·檀弓》：'公室视丰碑。'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繂绕。天子六繂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103，页319]历史文献证明，刘熙的这条声训是有依据的，但因缺乏实物证据，今人仍然不甚了了。近年，陕西秦公一号大墓中发掘出了斜埋在椁坑两侧的硕大圆木，"首次发现了这两通我国最早、最大的木'碑'，为研究我国早期葬礼提供了重要依据。当时，就是靠两侧'碑'上系绳，前后以人背纤，众人协力，统一步调，把巨大的灵柩徐徐下降到椁室里的，史书称作'四绋(即绳)二碑'。后人有的在这种用作下葬工具的木碑上刻写墓主的姓名、祭文，并逐渐演变成今日所见的石质墓志、墓碑。"[104]出土文物也证实了刘熙的这条声训。

3. 历史研究可以启发人们作出新的语源见解

中华民族之“华”，其得名之由为何?《书·武成》：“华夏蛮貊。”孔安国(伪)传：“冕服采章曰‘华’。”《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谓‘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这是以前的解释。但是，地下考古发掘的实物却给我们提供了更早的研究材料。在华山周围的庙底沟、泉护村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植物花纹图案彩陶盆。在植物花纹中，构图比较复杂、序列完整的有两种：第一种，类似由蔷薇科(玫瑰花和月季花)的花冠、花苞、叶、茎蔓结合成图；第二种，类似由菊科的合瓣花冠构成的盘状花序。尤其是第一种，传布较广，差不多到达所有仰韶文化直接影响所及的地方。仰韶文化大约同传说的神农氏时代相当，仰韶文化诸特征因素中传布最广的是属于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类型遗存的分布中心是在华山附近，这正和传说华族发生及其最初形成阶段的活动和分布情形相像。所以，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是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105，页163、188]

“华”，金文作𠌶、𠌶，象形，左右两折者为花瓣，上出者为花蕊，中通者为茎与根，两短横为花萼、花托。至小篆讹变为𠌶，《说文·𠌶部》：“𠌶，草木华也。”况于切。又加艹作“蕐”，《说文·𠌶部》：“蕐，荣也。”户瓜切。今简化为“华”。“华”之本义为花。《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华之得名，盖由其花蕾的圆形骨朵。《礼记·郊特牲》：“天子树瓜华”，注：“华，果蓏也”，可证，今谓之“花骨朵”、“蓓蕾”是也。因花蕾是要绽开的，引申而有剖开义。《尔雅·释木》：“瓜曰华之。”《礼记·曲礼上》：“为国君(削瓜)者华之”，注：“华，中裂之，不四

析也。”疏：“华谓半破也。”开放之花，光彩艳丽，《素问·解精微论》：“华色者其容也。”故引申为光华、华美之义。由华之开舒四布引申而有盛大义。《方言》卷一：“华、荂，晟也，齐楚之间或谓之‘华’，或谓之‘荂’。”钱绎笺疏：“‘晟’即‘盛’之异文。卷十：‘晟，多也。’卷十二：‘焜、晔，晟也。’卷十三：‘蕴，晟也。’《广雅》并作‘盛’。《后汉书·崔骃传》注引：‘晟，多也’，《众经音义》凡四引‘焜，晟也’，‘晟’并作‘盛’。是‘晟’与‘盛’同。”[82，页95]由蓓蕾义至绽裂义，再至华美义、盛大义，其引申之迹，昭然可见。孔安国、孔颖达所释“华美、盛大”义，为“华”之后起引申义；仰韶文化遗存的花纹表明：华族之“华”，得名于花，为初始本义。其后夏朝立国，始以“盛大”义之“夏”为号，华族之“华”的得名之由已为人遗忘。但我们联系考古学、文字学、语义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还是可以得出比较近是的语源结论的。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材料一方面可以用来解释语言现象，另一方面又可以反过来，从语言材料中得到进一步的阐明。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语言学家在利用历史材料正确地阐释语言现象时，反过来也可以给历史学家提供丰富的补充材料，以阐明某些重要的历史与文化问题。”[61，页25]

（二）语源学与文化学

索绪尔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11，页43]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孕育了不同的民族，产生了数千种语言，形成了各呈异彩的文化。正如美国学者怀特所说：“文化一经产生，便别具风格。从人类历史的最早时代起，

各地方群体已通过不同的语言、服饰、风俗和信仰而相互区别开来。”[9，页1]

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存在着差异，它们对于事物观察的角度就不会完全一致，为事物的命名也就不可能全都相同，因为“每个客观事物都具有多方面的特征或标志，如一定的形状、颜色、声音、气味等，人们在给它命名的时候只能选择其中的某一个特征或标志作为依据，而这种选择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任意的。”[106，页9]客观事物特征或标志的多样性，以及各个民族对于这些特征或标志注意角度的差异性，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同一事物获得名称的依据可能有所不同，各种语言中表达同一概念的词可能具有不同的语源意义。对此，张永言先生举了几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

> 例如蚯蚓这种动物：汉语“蚯蚓”得名于它的行动特点（据俞敏先生说：“蚯蚓”得名于“曲伸”，见所著《释‘蚯蚓”名义兼辨‘朐’‘忍’二字形声》。《国学季刊》第7卷第1号，1950年，第28—30页。）；……德语Regenwurm和英语方言 rainworm 得名于它出现时的天气；英语earthworm和方言wudworm、法语 ver de terre、俄语 ЗеМЛ ЯНоИ ЧеРВЬ 得名于它的生活环境。又如蜘蛛这种昆虫：汉语“蜘蛛”得名于它的形状（据刘师培说，“蜘蛛”即“蝃”，得名于形短。见所著《〈尔雅〉虫名今释》，载《刘申叔先生遗书》第十二册，第20—21页。），而德语Spinne(<spinner纺绩)、英语spider和方言spinner、日语kumo(<kumu编织)则得名于它的行为特点。再如鸭这种家禽：汉语“鸭”得名于它的鸣声，而英语duck(<古英语ducan潜水)则得名于它的习性。[106，

页9]

这些差异，即使在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里，“或者在同一语言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大量地存在，更不要说不同民族的语言了。明白了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差异，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的语言中会有不同的名称了。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o)认为，不同民族表明同一事物的名词之不同，不只源于那个民族的约定俗成和人为作用，而且源于那个民族的不同本性和那些事物在那些民族中的每个民族那里产生的印象[107，页18]。这有助于我们认识语源的民族特性。

即使是对同一事物的同一特征或标志的选择，又与各个民族甚至各地区人的发音能力、听觉、心理、习惯等等诸因素无不有关。同一种声音，在各个民族或各个地区的人听来也会有所不同，摹拟的结果可能更是五花八门。举个极简单的例子：同是摹拟狗叫的象声词，汉语为wangwang，而英语却是bowwowbowwow，简直是大相迳庭。索绪尔就曾用“法语的ouaoua和德语的wauwau(狗吠声)”的不同拟声，来说明“它们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就是任意的，因为它们只是某些声音的近似的、而且有一半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模仿。”[11，页105]赵元任也曾这样说：“同是一件事，在不同的语言它有不同的声音，甚至于平常所谓的象声字，总觉着这个字应该像真声音了，其实啊，象声字并不象声。比方北京话说：‘哗喇喇一声、房子塌了’；广州话就说：‘啉[lam]一声，间屋啉阻落黎咯’；英文说：‘with a crash! the house collapsed! ’这‘crash’跟‘哗喇喇”不太像，跟‘[lam]’完全不同，可是每个人都觉得他说的那声音像真声音极了。还有一种虫儿，一种秋天的蝉。夏天的蝉呐，他叫起来是‘知——’接接连连的叫的。秋天的小一点儿的一种蝉是一句一句的叫的。在我们家乡江苏

常州话里头啊，管这个虫儿叫‘杨息哩’，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虫儿叫的声音是‘杨息哩，杨息哩’这么叫的。我们觉得这个名词像得很。可是在河北（我不知道这是保定话还是北京话，我小的时候儿听了人家学的），他们管这个虫儿叫‘夫地夫凉儿’，为什么呐?因为你听！他们不是在那儿‘夫地，夫凉儿，夫地，夫凉儿’那么叫吗？在每处人他们都觉得象声字都像那个东西，可是‘杨息哩’跟‘夫地夫凉儿’差那么远。所以语言跟对象的关系，甚至于在象声字，也是完全是任意的。”[108，页40、41]其实，所有这些只是反映了各民族或各地区的人们对音素选择的任意性这一现象而已。

另一方面，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又有某些一致的地方。当不同的民族在事物的特征这方面的选择相同或接近的时候，不同的语言在语源上就可能有某些巧合之处。伍铁平先生对此以丰富的例证作了大量的比较工作。例如：

> 俄国的ВОСТОК从词源角度来看，可以分析为前缀ВОС—和词根ТОК，ТОК的本义是“移动”，在ПОТОК(急流)、ТечеНие（流，潮流）（и是与К交替的结果，О//е也发生了交替）等词中都有这个词根。ВОС-这个前缀有“升起”“上升”的意思，因此，ВОСТОК的本义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汉语的“东”据许慎的解释与“动”同源，这与古人以为日出东方，开始移动有关（实际上是地球运动造成的假象）。“东”字则从“日在木中”构成（见《说文解字》）。……英、法语的orient(东方)来自拉丁语，其词根本义也是“升起”。[109，页6]

我们再看一项有趣的统计资料：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乔治·彼得·默克多在《世界人种学资料》中收集了1072个称谓双亲的

词，其中称呼“母亲”的词531个，称呼“父亲”的词541个。表示“母亲”的词中有55%而表示“父亲”的词中有15%是包含m、n、ng这三类辅音。这就证实了美国的刘易斯1951年在《幼儿言语》一书中提出的论断：“称呼母亲的词通常用带m的词，称呼父亲的词用带p、b、t或d的词。”这说明，“许多历史上非亲属的语言中，双亲称谓词在结构上惊人地相似”[110，页32、33]；“世界上许多相距遥远的地方都选用pa和ma同一声音类型的词来称呼父母亲，我们无法假设这一现象纯属偶然。”[111，页110]（参见第二章第一节中的“自然的发音”部分。）

各种不同语言中这些相互吻合的例子，可以为我们的语源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因此，伍铁平先生认为：“词源研究中所涉及的历史、文化、民俗、语义等多方面的内容完全可以进行跨语系的比较”[123，页23]，提倡进行不同系属语言的语源对比研究，建立“比较词源学”。笔者认为，为了区别于历史比较语源学，似以称“对比语源学”为宜。“我们相信，开展这门新学科的研究将有助于研究人类的文化及其发展的历史”[109，页8]。

（三）语源学与思维科学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12，页525]语源的研究可以为发现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研究提供证据；反过来，人类思维发展过程的研究，也是深化语源研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十八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认为，原始民族都用形象鲜明的突出的个别具体事例来代表同类事物。这种从个别来认识一般的方法所根据的是关于人心特征的一条规律：“每逢人们对远的未知的事物不能形成观念时，他们就根据近的习见的事物去对它们进行判断。”例如：“儿童的本性使得他们根据从最初认识到的男人、

女人和事物所得到的观念和名称，去了解和称呼一切和这些最初认识到的有些类似或关系的其他男人、女人和事物”。“原始人仿佛是些人类的儿童，由于还不会形成关于事物的通过理解的类概念，就有一种自然的需要，……这就是形成想象性的类概念或普遍性相（一般），把它作为一种范型或理想的肖像，以后遇到和它相类似的一切个别事物，就把它们统摄到它（想象性的类概念）里面去。”〔113，页342、343〕这种由此及彼、以已知推未知的认识规律，不仅体现在初期为具体事物的命名上，也表现在后期为抽象事物的命名方面。

钱钟书先生注意到，循环观念对于人类文化及其心理的作用极为深远。他引用了中外许多文籍加以论说：《老子·四〇章》：“反者，道之动。”“反”有两义，一为正反之反，违反也；二为往反（返）之反，回反（返）也（“回”亦有逆与还两义，常作“还”用）。《老子》之“反”融贯两义，即正、反而合，观“逝而远，远而反”可知。“远而反”者，犹“各复归其根”，“其事好还”，亦犹《易·复》“反复其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不远复”。黑格尔曰辨证法可象以圆形，端末衔接，其往亦即其环；曰思维运行如圆之旋。亦如但丁诗所谓“转浊成灵，自身回旋。”《礼记·乐记》：“乐盈而反，以反为文”；《史记·春申君列传》黄歇上书：“臣闻物至必反”，又《货殖列传》：“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文子·自然》：“天道默默，……轮转无端。……惟道无胜，……轮转无穷”；《鹖冠子·环流》：“物极必反，命曰环流”；《列子·天瑞》：“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又《仲尼》：“故物不至者则不反”；《庄子·则阳》：“得其环中以随成。……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又《寓言》：“始卒若环，莫得其伦”；《荀子·王制》：“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吕氏春秋·大乐》：“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又《圆道》：“圆周复杂，无所稽留”，又

《博志》："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淮南子·原道训》："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钧旋毂转，周而复匝"，又《主术训》："智欲圆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诸节之"复"字、"反"字皆兼示"回复"与"反复"、"回反(返)"与"违反"，即老子语意；"轮转"、"环流"又如黑格尔之以圆形拟状也。[114，页444-448]这就提示我们："回、归、反、复、循、环"以及"旬"等表示抽象概念的词，可能来源于表示具体的圆转之物的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史密斯(M·Brewster·Smith)就认为，圆圈以及具象——轮子是最富于哲学意味的原型象征，由于圆圈中的开端和结尾是同一的，形式简单而且完整，因此被认为是最完美的形象；轮子有辐条而且还会转动，轮子的辐条被认为是太阳光线的象征，生命之源来自中心，因此被看作是创造力的象征。又因为轮子旋转时其轴心是固定的，转圈运动是完全规则的，因此人们把这种特征象征为真理，即是寻找人的经验和活动的稳定秩序。人类最初的语言就是由这些具有鲜明形象的原型性象征组成的，人类的思维和自我就是有赖于丰富多彩的隐喻和象征开始发展的。这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思维心理发展过程。[115]这对于我们将"回、归、还、反、复"等词作为表示圆转圆全义的词的发展引申，将它们系联组合在一个词族中，具有指导意义(参见第二章第四节"词族的形成")。

三、语源学与自然科学

美国语言学家雅可布逊指出："人们常说，语言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桥梁。"[60，页102]

语源学是专门研究名物来源的。所谓名物，早期的狭义说法一般是指草木鸟兽虫鱼等自然界的生物的名称。它不但是语言学

的问题，而且是生物学的问题。《毛诗》被称作“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的教科书。古代在没有成熟的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民俗学、建筑学……之前，便已有了与这些科学有关的事物，名物问题也就与古代天文、地理、民俗、建筑、生物等科学的专门知识相联系。一切科学与文化都包含在语言之中。因此，早期的训诂学就其涉足的内容来说，确实是包罗万象的。〔90，页85、86〕语源学就是要研究这些“包罗万象”的事物的得名之由。即如《果裸转语记》所探索的名物，就包括植物、动物、器物、人体、地形、食品、建筑……哪一种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语源学实际上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科学自然成为语源学研究所涉及的对象。既然如此，要探求自然事物的得名之由，就不能不了解这些自然事物，熟悉所要研究的事物的各种特征或标志。如果对这些方面不甚了了，要探求其名称的来源也就无从谈起。正如格里姆所说：“词源研究中客观物体方面的知识极为有益。”因而他“总是极力‘从词转向事物’”进行研究。〔61，页23〕阿巴耶夫也指出：“只有当词源研究不仅是词的科学，而且是词后面所隐藏的现实的科学时，词源学才能臻于完善。”〔61，页25〕

例如，程瑶田以为细腰蜂“蜾蠃”得名于“果裸”，就是基于他对这种昆虫的细致观察的。《诗·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毛亨传：“蜾蠃，蒲卢也。”陆玑以之为土蜂，曰：“似蜂而小腰。”〔116，页59〕《尔雅·释虫》同毛传，郭璞注：“即细腰蜂也，俗呼为‘蠮螉’。”《说文·虫部》：“蠣，蠣蠃、蒲卢，细腰土蜂也。天地之性，细要，纯雄无子。”《本草纲目》罗列众说，于其形态也只云“腰甚细”〔117，页2232〕。为何细腰之蜾蠃与浑圆之果裸得名之由会相关？历代文献记载除“细腰”一语外，皆语焉不详。程瑶田经过多次实验观察，发现：“又有一种在壁柱及窗棂

诸阿处，揵土作突起圆房，即俗呼为'螟蛉窠'者，其蜂首腹分两段，如小胡卢；中分处几有欲断之势，盖所谓'细腰'是也。头脑及喙亦如小胡卢。"〔98〕原来，细腰蜂正因其腰细，"几有欲断之势"，首、腹两段才愈加显得粗圆，很像两个小葫芦，即王国维所说"其腹亦下垂如果蓏"之形；它的窝是用泥土等筑成的，呈圆壳状。这些就是细腰蜂名为"蜾蠃"之故。因此，程瑶田不无感慨地说："文人学士不知者，以其所习闻者简策之陈言而已。"若不是实地观察而只从古代文献中找答案，恐怕永远也不会明白"蜾蠃"的得名之由。

对于自然界的事物，仅仅一般了解是不够的，还必须熟悉其多方面的特征或标志，才能真正理解古人据以命名之意。一物不知，即有可能误解，弄得"牛头不对马嘴"。例如，王国维对"荚蕭蘆"和"蝃蝀"的名物解释，恐怕就是闹错了。他说：

异类之同名，其关系尤显于偶名。如《释草》："果裸之实栝楼。"《释虫》："果蠃，蒲卢。"案果裸、果蠃者，圆而下垂之意，即《易·杂卦传》之"果蓏"。凡在树之果与在地之蓏，其实无不圆而垂者。故物之圆而下垂者，皆以"果蓏"名之。"栝楼"亦"果裸"之转语。蜂之细腰者，其腹亦下垂如果蓏，故谓之"果蠃"矣。又《释草》："荚，蕭蘆。"案：蕭蘆，长意。郭璞说蕭蘆云："其叶似蒲而细"，是长叶之草。又《释天》之"蝃蝀"，其字从"虫"，本是虫名。沈方伯说以《庄子》"蝍蛆甘带"之带。虹形如带，故以蝃蝀"名之。是"蝃蝀"、"蕭蘆"，亦语之转矣。又《释草》："荚，芦萉。"《释虫》："蜚，蠦蜚。"案：芦萉、蠦蜚，乃"栝娄，蒲卢"之倒语，亦圆意也。芦萉根大而圆，蜚形亦椭圆如芦萉，故谓之"蠦蜚"。后世谓之

"负盘"，亦以此矣。〔118，页222、223〕

今按："萧蕫"又名"长苞香蒲"，是蒲草之一种，夏时抽穗开花，花穗为圆柱形，活象蜡烛，俗称"蒲棒"。采摘下来，晒干后可用以熏蚊子；秋天长老后，可捋采其雌花穗上的白绒毛，用来絮枕头，名为"蒲绒枕头"。"葵、萧蕫"之得名，盖因其圆柱形花穗，即高诱注《淮南子·审时篇》所谓"穗，果棵也"之意，而不是因其叶长。《说文·艹部》："蕫，鼎蕫也。从'艹'，'童'声，杜林曰：藕根。"藕根也是圆柱形，与长苞香蒲的圆柱形花穗相类，故二物可以同名。否则，香蒲叶狭长若带，藕荷叶圆大如盖，二物极不相似，岂可共用一名？蝃蝀即虹，其形为弧形或曰拱形、半圆形之彩带。在几何学上，弧形（拱形、曲形、半圆形）为圆形之一部分〔19，页66〕。蝃蝀之得名，与其说是因其形长如带，倒不如说是因其带形隆屈。于省吾《释虹》："虹与古玉璜形亦相似。《太平御览·十四·天部》引《搜神记》：'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孔子齐（斋）戒，向北斗星而拜，告备于天。乃有赤气如虹，自上而下，化为玉璜。'此虽事属演义，然而推知古来有璜似虹形之观念。《说文》：'璜，半璧也。'按半璧正象虹形。"〔119，页5、6〕璧是中间有孔的平圆形玉，半壁之璜正是拱曲的玉。"璜"guang、"虹"gong、"弓"kiwəng之得名，同是因其形拱曲。这样，"葵，萧蕫"，与"蝃蝀（虹）"才有了共通之处。否则，一因其形圆，一因其形长，其得名之由就不一致。至于杨树达根据字形探求其语源（字源），以为"蝀即以见于东方为义"、"虹之受名盖以其形横而长也"、"虹形如带，故谓之蝃"〔120，页28、29〕，恐怕是上了字形的当。以王国维、杨树达两位学术大师造诣之精、享名之盛，而犹不免粗疏如此，足以说明察名辨物之难，而训诂、语源之学者又不可不精于此。如果对自然界之事物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就有可能误解古人命名立意的原旨，而作出种种错误的解释来。

通过以上几个主要方面的讨论，我们对语源学与多种学科的关系，已可窥见其一斑。美国的王士元教授说得好："人们近几年逐渐了解到，语言这个东西实在太复杂了，单从语言学这个狭窄的角度来研究，收获总是有限的。所以，现在已经很少还有语言学家单独自己进行研究的了，大多数语言学家都在设法和别的学科取得联系。把语言学和别的学科之间的关系打通，看来是对语言学家的一个基本要求。考古学里有语言学，哲学里有语言学，物理学、心理学等等也都是如此。因为谁都要用语言，所以很多学科都对语言有兴趣，同时也可以对语言学做出贡献。就像建筑房屋一样，地基挖得越宽、越深，楼房就能盖得越大、越高。我们当前的责任，就在于把语言学和别的学科联系在一起，把它打通。如果打通了，我们的基础就会变得更加广阔，我们语言学的前途就会更加光明了。"〔121，页162〕

第二章

语源学原理

第一节　语根的起源

“语言必有根。语根者，最初表示概念之音，为语言形式之基础。”〔124，页168〕这“最初表示概念之音”，自然有其所起之源，也就是有其产生的原因。正如章太炎所说：“语言者不冯(凭)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125，页40〕就是说，语言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世上本来就有的，更不是神授的，总之，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章氏的这句话，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因为，按照唯物辩证法原理，任何现象都有其产生的原因，无原因的结果和无结果的原因都是不存在的。事物名称的出现，作为一种现象，不可能没有原因。黄侃就曾说：“凡有语义，必有语根。言不空生，名不虚作，所谓‘名自正’也。《左传》言名有五，是则制名皆必有故。语言缘起，岂漫然无所由来？无由来即无此物也。”〔32，页59〕否定这一点，就将陷入神秘主义。人作为一种有理性的动物，无论干什么，总是有一定的

道理的。人类的语言也不例外，最初的词也就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来源、一定的根据〔126，页41〕。“根据辨证法的观点，任何完善的东西总有一个从不完善演变为完善的过程。有声语言也必然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初级到完善（也许是从手势到超音段交际手段再到有声语言）的演变过程。”〔127，页11〕语言中的语根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因为它们的历史久远，大多湮没无闻，我们又研究得很不够，尚未充分认识它们罢了。一旦所有原始词的理据全部或大部分被发现，语言起源的奥秘就将被彻底地揭开〔128，页26〕。

那么，语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一、自然的发音

早在宋元之际，戴侗就发现：“‘哇、呕、哕、喀、咯’，各象其声。”〔129〕但他只是指出了这一语言现象，而未能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探讨。

1746年，法国哲学家龚迪雅克（Condillac）在所著《人类认识起源论》第二编中提出：人类最初由于情感冲动而发出各种叫声，其后这些叫声变成指称各种事物的声音，结果就成了词。人类起初能够发出的声音是有限的，其后一代一代的增加，词汇也逐渐丰富，经过许多年代才能成为真正的语言，“例如有一个人因为需要一样东西得不到而感到痛苦，就不能自制地发出叫声来；他为要得到这样东西而作出许多努力，如摇动自己的胳臂或身体的其他部分。……他们继续发出新的声音，并且反复多次，伴以某种可以指出他们所需要的对象的手势，这样他们就习惯于给事物以名称了。”〔130，页87〕

世界人类学、语言学的研究结果，证实了龚迪雅克的论断，

表明确有一些词是从人类的自然发音中产生的。世界各种语言中十分相像的父母亲的称呼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个例子。汉语中“母、父”这两个词的声母分别是M和P，这在世界语言中带有普遍性。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都“在儿语的基础上用相似的词称呼父母亲”的奇妙现象呢？美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可布逊解释说：

婴儿的吃奶动作经常伴随一种轻微的“呣呣”鼻音，这是双唇贴在母亲的乳房上……嘴里饱含奶汁时所能发出的唯一声音。往后，哺乳时发出的这种声音，就成了一见到食物就出现的一种预感信号，最后则变成想吃东西的一种表示，或者更进一步用来表示不满或表示等待食物和喂奶人等得不耐烦或其它任何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当嘴里没有食物时，“呣呣”鼻音可能跟随一个张开口腔(的元音)，特别是双唇的音，或任何一个元音。俄语中的感叹词(‘ar)及其对应的动词词根XaT——同食物有关系，便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材料。

由于母亲是抚育者，因此婴儿的愿望大多是向她提出的，于是逐渐就把感叹词转而用来表示母亲了。〔110，页33、34〕

我国的学者对此继续作了探讨。他们认为，婴儿发出的音节起初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后来，父母将婴儿的发音用来指称婴儿最感兴趣的、最早或最经常接触的人或物。比如说，“mama”本来并不指称妈妈，婴儿开始会发音时最容易发出这个音；听到mama这个音，妈妈便会走到孩子那边去看小宝宝。这种情况重复数次后，婴儿逐渐懂得，只要发出“mama”这个音，他所需要的人就会来到身边。〔132，页3〕作为哺育者的母亲自然而然

地把这种带鼻音的声音当作对自己的召唤，从而作出反应。这在母亲称谓词的形成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而对婴儿来说，要求食物也就是召唤母亲[131，页20]。于是，大人逐渐用“mama”来表示“妈妈”，并将这一意思传授给婴儿。就这样，“mama”作为“妈妈”的意思在语言中便固定了下来。[132，页4]

“妈妈”称呼的由来是这样，那么，关于“爸爸”的称呼呢？雅可布逊接着写道：

> 然而，也有些研究者，比如利奥波德坚持说，这种由m音感叹词转为母亲称谓词的现象往往出现较晚，而表示父亲的称谓词“papa”，倒作为完全明确的指称词首先出现了。比如，在利奥波德女儿的话语中，起先，“mama”这个形式只是一个感叹词，“它没有意义，不是‘papa’（爸爸）的语义上的对应词。”表示爸爸意义的“papa”却要到一岁零三个月才学会。
>
> 格利戈里曾仔细地描述过，在幼儿学语期间，出现过这样的情况：“papa”用来指在场的父亲或母亲，“mama”则表示要求满足某种需要，或者要求不在场的喂奶的人（并不一定是母亲）快来。“埃德蒙嘴里喊着[mama:am:am]叫唤当时不在场的妈妈，但是当他见到妈妈回来时，他叫的却是[papa]。……当埃德蒙见到我在给他准备奶油面包时，他又叫[mama]，而不是[papa]”。同样，斯莫琴斯基的孩子在一岁半时，当向父亲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是向他叫：[mama ma-ma ma:ma:ma]。[110，页34]

为了验证这一问题，笔者于假期在家期间，对自己的儿子杰克进

行了观察。1988年暑假时，他才三、四个月，当我抱了他一会，然后将他放进小躺车里时，他发出meimeimei的声音来，大概是表示不愿躺下，还要求大人抱。寒假时，他已八、九个月。这时他发的儿语，以papa为多，而mama则很少。为此，他的妈妈常常要求他，"叫'妈妈'"，可是杰克叫出的仍是papa，这使他的妈妈很失望(后来她在一封信中说杰克"整天叫'爸爸'，还是不会叫'妈妈'。")。有时，我在用双手将他一上一下地举高时，一边数着"一、二、三……"，儿子"哈哈"地笑着，当听到数"八"时，他也会发出"pa"的音来。1989年暑假时，杰克已十三、四个月了。既会叫"妈妈"，又会叫"爸爸"，开始时分不清，后来有一段时间分得很清，并不乱叫；再后来却叫颠倒了，管我叫"妈妈"，而对他妈妈却叫"爸爸"；到开学时，他又管我和他妈妈都叫"妈妈"，却不叫"爸爸"了。直到他十七、八个月时，才分得清清楚楚，而不再叫混了。伍铁平先生也发现，他的儿子"七个月学会叫'妈妈'，八个月学会叫'爸爸'，但忘了'妈妈'。"[133，页125]可见这种现象并非偶然。

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再参考国内外的有关文献，笔者认为，婴儿最容易发的元音是[a]；最易发的辅音是唇音，因为"儿童首先学会a和唇音的对立，这是因为发a时口张开的程度最大，而发唇音时口张开的程度最小，这一最简单、最大限度的对立是儿童最先学会这些音的根本原因。"[134，页81]但有发音方法的区别：发塞音即成pa，发鼻音即成ma。发pa发ma，游移不定，只是随口而发。儿童心理研究者就曾用汉语拼音记录了四至八个月婴儿的发音："a-ba-ba-ba-ma"、"a-ba-ba-ba-m-a-ba-ba-ba-ba"[135，页58]，pa与ma交替而发。意义也无定指，只是表示某种要求或根本就没有意义，只是玩得高兴时的一种儿语。恩格斯说："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从

原始社会发展史来看，人类社会早期经历了二百多万年的原始群时代和三万多年的母系氏族社会，“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136]，因而婴儿无论是叫mama还是papa，经常应答的恐怕还是哺育他们的母亲。只是到了约公元前四、五千年以后的父系家族社会时代，人们才能确认自己的父亲。这时，婴儿无论是叫mama还是papa，他们的父母都有可能应答，因而papa mama是没有分别的，“在契努克语（北美印第安人的一种语言）中，mama指的是‘爸爸’；而有些斯拉夫语中，baba指的是‘妈妈’，这可以在俄语方言баба（村妇，女人）中找到遗留的痕迹。”[132，页6]“在婴儿语言方面，一切人种都处于同一起点。但是为什么mama在一个地方被用来称呼母亲，在别的地方被用来称呼父亲，而在另一个地方又被用来称呼叔叔和伯伯呢？…… 这种现象说明了儿语词汇的随意性。”[111，页111]其后，人类思维日趋精密，需要区分双亲而不致混淆，于是，婴儿发papa时，父亲应答；发mama时，母亲应答。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再经过“约定俗成”，大家都是这么做，于是，mama（妈妈）和papa（爸爸）终于有了分工，形成了固定的称谓。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儿语是语言词汇丰富的一大来源，而且，语言中众多的表示‘爸爸’、‘妈妈’的词的一致性不是偶然的。”[131，页5]可以说，婴儿的自然发音“papa”、“mama”就是“爸爸”、“妈妈”等词所由产生的语根。

二、动情的感叹

原始人在采集、渔猎等劳动中，免不了有喜怒哀乐之情要宣泄，发之为声，以为表达；或者为了协调共同的动作，也要通过声音来交流感情。《吕氏春秋·淫辞》：“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

后亦应之。"高诱注："'舆謣'或作'邪謣'。前人倡，后人和，举重劝力之歌声也。"《淮南子·道应》作"前呼'邪许'，后亦应之。"近人张维思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

> 语言学者拿以尔谓原始时代之字根，系指人类工作之意义，此种推测，人皆称之为"拿以尔学说"。诚然，人在工作时，最易于无意中有声于喉间，一则借以引起他人之注意，一则借以形成共同工作之情绪。……个人工作时，或以歌，或以呐喊，借以引起他人之回声。女子在深林中采果时，发音甚锐，若长啸然，盖所以壮其胆、助其兴也。……原始人类亦同于此，当游猎觅食时，到处呐喊，以招伴侣。久之，同一性质之运动，遂有同一性质之声音，采拾时有一特种之声音，狩猎时另有一特种之声音。为日既久，声音与工作遂构成互相联系之观念，闻其音，而知其事。……人在同一工作过程中，发同一之声音；在另一相同之工作中，又发另一相同之声音，于是工作与声音，形成相联系的观念，而此种种不同之工作与声音，各形成为各个相连结之不同观念，久之公认此声音为此工作之特音，彼声音为彼工作之特音；于是事各有名而物各有号矣。然则语音为劳动过程中之产物，谁曰不宜！[137，页2、3]

汉语中"吁"、"芋"等词的产生，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文·艹部》："芋，大叶实根骇人，故谓之'芋'也。从艹，'于'声。"丁福保按："慧琳《音义》五十八卷一页引作：'大叶实根惊人者也，故谓之芋。蜀多此物，可食。其本(系'大'之误)者谓之蹲鸱。'"徐锴系传："'芋'犹言'吁'也。'吁'，惊词，故曰

'骇人'，谓之'芋'。芋状如蹲鸱，故骇人。"段玉裁注："《口部》曰：'吁，惊也。'《毛传》曰：'讦，大也。'凡'于'声字多训'大'。芋之为物，叶大根实，二者皆堪骇人，故谓之'芋'。"桂馥义证："'大叶……'云云者，本书：'于，於也。''吁，惊语也。'……芋骇人，即'吁'意。《广雅》：'芋，大也。'《诗》：'君子攸芋'，《传》云：'芋，大也。'……'讦谟定命，《传》云：'讦，大也。''川泽讦讦'，《传》云：'讦讦，大也。'《方言》：'芋，大也；讦，大也。'《注》云：'芋犹讦也。'《一切经音义·四·声类》：'大叶著根之菜，见之惊人，故曰芋。'"[80，页253]《广雅·释草》："蕖，芋也。"王念孙疏证引《说文》及徐锴《系传》证之，曰："则芋之为名，即是惊异其大小。"[138，页323]

如果说，许慎等人断言"芋"得名于感叹词"吁"还只是出于猜测的话，我们再看一个类似的具体事例。

世界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个尚处于旧石器时代生产水平的原始部落——菲律宾棉兰老岛的塔桑代人。他们没有金属，甚至没有磨制的石器，只使用树枝作为劳动工具。有人描述了当地土人——比兰根和巴拉彦挖掘薯芋的劳动场面：

> 三人又攀上山坡，寻找"比京"(biking，即野生薯芋)。挥动砍刀，嗖嗖几下，就削成了二根尖尖的掘棒；然后，男人们便提着挖土的掘棒，在山坡上巡行，找寻带心形叶子的薯藤。
>
> 比兰根花了半小时功夫，找到了一棵结着茁壮块根的薯蔓。他和巴拉彦轮流挖掘，干得很快，把薯芋从土中挖了出来。巴拉彦一边挖，一边唱着一支"比京"之歌，表达寻到食物的感激之情，并向植物致谢。[139，页15]

诗歌自然是晚于语言而产生的。现代原始部落的人在挖掘薯芋时尚且如此喜悦、感激，并以歌声表达感情；生活在百万年前、生产工具更为落后的原始人在挖掘薯芋时又是如何欣喜若狂，感叹之声脱口而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若将以上的材料与考古学家对原始人类生活状况的描述对照起来看，我们眼前立刻会浮现出一幅活生生的画面：

一群原始人正在采集食物。其中大多数是妇女，也有较大的孩子。大人们经常习惯地弯下腰来捡拾，可是孩子们一遇到树上有野果，就飞快地爬到树上去摘取。有的人手中还拿着一个带尖的骨棒或木棒，遇到地下有可食的植物块根，就马上去挖。〔140，页68〕

有一个人眼特别尖，一下子就发现了绿草丛中有一棵叶子硕大的植物，惊喜地叫了一声："吁！"另一个人听见了，也连忙跑了过去。两人用木棒使劲挖呀，挖呀，终于，一大嘟噜块根露了出来。两个人看着这丰硕的块根，不禁喜形于色，连叫："吁！吁！"

这样的情况一再重演，久而久之，"吁"的感叹声逐渐固定下来，"芋"的名称由此产生了。

我们再看一个产生较晚的例子，是杨树达的《释"许"》：

"许"从"午"声，"午"即"杵"之象形字。字从"言"从"午"，谓舂者送杵之声也。(《说文》)《七篇上·臼部》云："舂，捣粟也。从'廾'持杵以临臼，从'杵'省"。"按"舂"字从"午"，此"午"为古文"杵"之证，许君云"从'杵'省"，非也。《礼记·曲礼上篇》云："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按此文以"相"与"歌"对文，知"相"与"歌"义近，故郑注曰："'相'谓送杵声"，是也。《荀子》有《成相篇》，其文皆有韵之歌辞，正所谓"相"也。《史记·商君传》云："五羖大夫之卒也，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

杵"：此古人舂粟送杵作声之证也。《淮南子·道应篇》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此"许"为劝力歌声之证也。举大木者当劝力，举杵舂粟者亦当劝力矣。即实言之，举杵劝力有声，"许"字之本义也；《淮南》言"举大木"，乃举杵之类推耳。舂者手持物，而口有声，故"许"字从"言"从"午"。口有言而身应之，故"许"之引申义为"听"。〔141，页23〕

今按：查《农政全书》之杵臼图，知古时舂粟乃两人相对进行，每人手持一杵，一对一下地举起捣下。原始社会的舂粟工作，方式及工具更为原始。为了协调动作，减轻疲乏，更需要发出声音以助力。农村筑堤、奠基时打夯(吾乡方言呼为"打老硪")，四至八人共举一夯，一人领唱，其余皆应之以"嗨哟嗨呀！""许"之古音xia，即近于"嗨"，乃用力时口发之声。今人以大锤砸石头，口中仍然呼"嗨"，"夯"可能即由此得音。

其实，人类的感叹，并不局限于其劳动过程之中，日常生活中也应大量存在，我们只是举其典型者为例而已。至于其他的感叹词，请看黄侃所举的例子：

凡语言或文字中之感叹词，此皆表情感之音。细求之，每声每韵中，无不具者。以韵而言，"阿、哀、乌、讴、号、唉"，此为至简单之韵母，古今不甚殊。此类之言，……要皆矢口而得，不烦思索。以声而言，则喉，牙、舌、齿、唇中，亦皆有表情之音。喉音，则"……呼、台、赫"之类是也；舌音，则"都、咄……"之类是也；齿音，则"嗟、咨、些、哉"之类是也；唇音，则"弗、否……"之类是也。是故五音之起，皆以表情，推

其起源，此种声音，大氐与笑叹呻吟歌呼之音不相远。〔30，页95〕

三、音响的摹拟

成书于公元一百年的《说文解字》，已经涉及到了摹声造词的问题。例如《鬯部》："爵，礼器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段玉裁改"象爵者"之"爵"为"雀"，注曰："'节节足足'如是。……爵形即雀形也。"就是说，雀是因其"节节足足"的叫声而得名，即"其名自叫"〔142〕。

清代学者张行孚在研读《说文解字》时，从中发现了更多的此类例子：

古人造字之始，即以字形象物之形，即以字音象物之声。如："牛"字象牛之形，而"牛"字音即与牛鸣相似；……"豕"字象豕之形，而"豕"字音即与豕鸣相似；……"木"字象木之形，而"木"字音即与击木相似；"石"字象石之形，而"石"字音即与击石相似；"竹"字象竹之形，而"竹"字音即与击竹相似；"金"字象金之形，"金"字音即与金声相似。至于"马"字、"犬"字、"燕"字亦象形之字，而字音不甚与物声相似者，则字音展转读别尔。若夫形声、会意之字，虽字形不象物形，而字音亦有象物之声者。如："鸡"从"隹"、"奚"声，而"鸡"字音则与鸡鸣相似；"雒"字从"隹"、"昔"声，而"鹊"字音则与鹊鸣相似；"雀"字从"小、隹"会意，而"雀"字音则与雀鸣相似。其余"鹘鸼"、"秸鞠"、"鸮鹅"、"学鸠"、"鸲鹆"等字，大氐其字之音，即象其鸣之声。此等字音，真天地之元

音。[143，页325]

今按：关于"木"的得名，张维思的解释正好可以拿来做为注脚："譬之伐木，其声音常为'许(xu)'，远者闻之，即知其音为伐木者之音。我国古读'木'为muk，未必非由xu音转变而成者——先变x为m，继又去语尾k遂成mu"[137，页3]。又，"金"的上古音为kiəm，至今在日语中仍读为kin，正像在金属上刻划的声音。《说文·金部》："鏗，金声也。从金，轻声。"桂馥义证："本书：'殸……读若鏗鏘之鏗。'……《乐记》：'钟声鏗鏗以立号。'《汉书·礼乐志》：'但能记其鏗鏘鼓舞。'《注》云：'鏗鏘，金石之声也。'"[80，页6316]"金、殸、鏗、鏘"同为金属被刻划或敲击时所发的声响。笔者颇疑"kang刚、钢，qiang强，kieng劲，kyen坚、khen紧、khei锴"等[176，页341、342]的音义可能皆由此而来，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比金属更为坚实、紧密的物质了，古人可能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又，汉语"鸡"的上古音为kie，所谓"鸡鸣喈喈"[144]即是对其鸣声的逼真摹拟。而英语中，公鸡叫cock，古挪威词为kokr；母鸡叫hen，其印欧语根为kan，显然都是拟声词[128，页27]。此外，雄鸡的名称，约鲁巴语为koklo，伊博语为okoko，芬兰语为kukko等，都是来自对其叫声的拟声。雄鸡的报晓声还被用来表示一天中的一段时间——黎明，例如马来语的kukuk[111，页100]。

清季以后，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种摹声造词的现象。章太炎说：

诸言语皆有根，先征之有形之物则可睹矣。何以言"雀"？谓其音"即足"也；何以言"鹊"？谓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雅"？谓其音"亚亚"也；何以言"雁"？谓其音

"岸岸"也；何以言"鸮鹅"？谓其音"加我"也；何以言"鹘鸼"？谓其音"磔格钩辀"也。此皆以音为表者也。……以音为表，惟鸟为众。……故物名必有由起。[125，页40]

今按："雅"，今通写作"鸦"，"鸦鸣'呱呱'，即名为'鸦'，俗呼老呱'"[145，页51](今写作"老鸹")，"鸦"可能是"呱→啊→呀"的变音。英语的"乌鸦"是crow，其古英语是crawe，印欧语根为ger-[128，页27]。梵语"鸦"的名称是kaka，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一种类似的鸟名是kankan[111，页99]。互相对比，何其相似乃尔！

如果说，章太炎的阐述尚嫌粗疏的话，则刘师培的发挥可谓淋漓尽致了：

古代造字，虑字音展转失其真读也，乃以字音象物音。例如："火"之字音为"呼果切"，即象风火相薄之声；"水"字之音为"式轨切"，即象急湍相激之声(盖水音为"澌澌"，"水"字之音象之。今江南"水"读若"矢)。"雹"从"包"声，"瀑"从"暴"声，"霰"从"散"声，亦犹是也。……惟物音不克自宣，斯以击物之音相拟，如："钟"从"童"声，"柝"从"斥"声，"板"从"反"声是也。若"滴"字之音，征以檐溜下注之音；"湫"字之音，征以水流之音，亦字音曲象物音者也。夫字音既象物音，字音恒易而物音弗移，则今音异古音者，验以物音可以知验其迁变矣。[146，页20]

至名物得名之原，复有二故：一拟其音，一表其能。"草"字之音象履草之声……《释草》："萧，荻。"《注》训为"蒿"，盖风吹蒿叶，其音"萧萧"，故锡以"萧"名。《释木》：

“檴，落。”《疏》训为“樗”，盖樗叶经霜，其音近“檴”，故锡以“檴”名。又如榈木可为乐器，又名“荣”，“荣”、“榈”声近，实则象木鸣之音也；“栵，栭”，子如细栗（郭注）（引者按：郭璞注作“栗”，以下据以改正）故“栵”、“栗”双声，实则象果裂之音也。若《释木》所云“枫，欇欇”、“梢、梢擢”，一则象木叶摇落之音，一则象枝柯摩戛之音。此皆彰彰可考者也。

动物（按：此处似脱一“亦”字）然。《释虫》云：“䗚，茅蜩。”又云：“蜓蚞，螇螰。”《注》云：“即蝭蟧也。”陆玑《诗草木虫鱼疏》云：“青、徐亦谓蝻为‘蜙螰’。”案：蝉鸣之声近“遮”，故今淮南人谓蝉为“遮留”，“䗚”即“遮”字之转音（“螰”字“留”字之转）。蝉之小者，其鸣声近“都留”，故淮南人即以“都留”呼之，“蚴蟧”即“都留”之转音，其证一。《释虫》又云：“鼃，蟆。”《注》云：“蛙属。”《说文》云：“黾，虾蟆也。”盖“蛙”字之音近于蛙鸣，“虾蟆”为“黾”字切语，黾音近“蛙”，皆象蛙鸣之音也。又蛙鸣之音近于“阁阁”，故蛙亦名“蝈”。《周礼》：“蝈氏掌除蛙黾。”郑注云：“齐鲁之间谓黾为‘蝈’。”《急就篇》颜注云：“黾一名‘蝼蝈’，色青，小形而长股。”“蝈”亦作“蜮”。《周礼·叙官》“蝈氏”，郑司农注云：“‘蝈’当为‘蜮’。蜮，虾蟆也。”（《夏小正》云：“四月鸣蜮”，亦即蛙也。）盖因蛙鸣之音“阁阁”，“阁”、“国”一声之转，故名蛙为“蝈”。“蜮”即“蝈”字之古文，其证二。《释鸟》云：“燕燕，鳦。”《说文》云：“正元鸟也。或作‘鳦’。”又云：“齐鲁谓之‘鳦’，取其名自呼。”郭注《尔雅》云：“《诗》云：‘燕燕于飞’。一名‘玄鸟’，齐人呼‘鳦’。”盖燕鸣之音，在“燕、鳦”之间，即《说文》所谓“取其鸣自呼”也。《庄子·山木篇》云：

"鸟莫智于鷾鸸。""鷾"或作"意"，"意"、"乙"一声之转，亦象燕鸣之音也("鸸"即"而"字，语助词)。其证三。推之蟋蟀鸣壁，其音"唧唧"，近于"蟋"字之音，又"唧"类于轧布，遂有"促织"之名。莎鸡振羽，其音"梭梭"，近于"莎"字之音(《尔雅》:"螒，天鸡。"郭注云："一曰'莎鸡'，又曰'樗鸡'。"又《疏》引李巡注云："一名酸鸡。"案："樗鸡"、"酸鸡"皆"莎鸡"一音之转)。又类于治纱，遂有"纺纱"之号(俗语呼为"纺纱婆"，以其音"索索"，近于纺纱也)。……盖同一物名，音同字异；其命名之初，本无定音，特象物音以定物名。如：……"鹅"字之音近于鹅鸣(《尔雅》云："舒雁，鹅。"郭注云："今鹅雀亦谓之'鹅'。"《左传疏》引贾服注云:"鹅以声音为鸣也。")……"鹰"字之音近于鹰鸣(若《释鸟》云："行扈[引者按：《尔雅·释鸟》作"鳸"]'唶唶'，宵扈'啧啧'"，均象扈鸣之音)，……"猫"字之音近于猫鸣，皆其证也。子思子有言："事自鸣也，声自呼也"，其此之谓乎？此即所谓以物名象物音者也。[63，页3、4]

如此挥洒自如，刘氏后来犹觉"前篇所举义有未尽，更即其义而广之"[63，页1]。我们只看其中的一个例子：

一象物声，如鳲鸠名"鴶鵴"(《尔雅》)，亦名"布谷"(郭注)。案：此即今唤雨之鸠也，其鸣声近于"卜姑"(扬州人呼为"白果果")，古人象其声以立名，名曰"布谷"；由"布谷"之音转为"搏谷"(《月令》"鹰化为鸠"注)、"拨谷"(《本草拾遗》)、"击谷"(《方言》)、"获谷"(《方言注》)，又转为"郭公"(《本草拾遗》)、"勃姑"、"步姑"(《六书

故》)。而“鹄鹕”、“秸鞠”(《说文》)、“秸鹕”(《诗毛传》)、“结诰”(《方言》)，又皆“布谷”之异文，是“鹄鹕”之名由鸟声而起，而鹄鹕之异名均由“鹄鹕”之音递转，此物名之象其声音也。[63，页2]

今按：布谷鸟又名“杜鹃”、“杜宇”、“子规”，英语为cuckoo，法语为coucou，德语为kuckuck，俄语为kykyшka，西班牙语为cucu，意大利语是 cuculo，匈牙利语是kakuk。各种语言的叫法大同小异，可见都是摹拟其叫声而命名的。吾乡称之为“麦黄gaigou”，“麦黄”为其出现的时节，“gaigou”是对其叫声的摹拟。笔者幼时在乡下，有一年发大水，本村一位小青年见有两只布谷鸟鸣叫着从头顶飞过，就说：“它在叫‘各顾各！各顾各！’”此则与“布谷”、“获谷”一样，是拟声兼表义了。不过，这个“义”只是摹拟者主观类比而人为加进去的罢了。

潘尊行将“所模仿的声音”分为六类。我们先看前五类例子：

模仿语(一)。圆转的声音。

今语模仿一物体滚的声音为gululu或kululu，初民……模仿了做称号。因此圆形物如“果蓏”、“蜗蠃”、“栝蒌”、“颗颅”，近圆形的如“傀儡”、“佝偻”、“昆仑”、“丘垅”，一部分圆形的如“蜣螂”、“螺蠃”，甚至鸟啭得很圆的如“过蠃”，穗旋得很圆如“果裸”，都用这笼统的称号。

有时也用bululu或pululululu来模仿，这就是《尔雅》的“毗刘暴乐”、木叶滚下来的声音。因此螺蠃又叫“蒲卢”，丘垅又叫“培嵝”。

有时又用dululu或 tululu 来模仿，这就是孩儿们玩的陀螺(亦称“地雷公”)在地上转的声音。因此颗颅又叫“顸颅”、“髑髅”。

有时或但用lululu……来模仿，……许(慎)所说的“刻木录录”，即此lulu的模仿。凡滚的声音，一一可听的，有次序的，所以为“历历”、“累累”；不就停止的，所以为“实实”。余如“丽尔”、“离娄”、“谜谈”、“流离”等双声连语，都属于这一语的变易。……

模仿语(二)。冲撞的声音。

今语模仿冲撞的声音，大概为dingdung, tingtung，或作短音为didu, titu，这就是“停僮”、“丁东”、“町疃”等语根；有时重言ding，或dung，或tung，这就是“亭亭”、“童童”(并指车盖)、“丁丁”(伐木声，古当读舌音如字)、“冬冬”(《诗》“击鼓其‘镗’”)等连语的语根。撞钟、撞脚，我们都说“撞”，斧的下砍，作态亦相仿佛的，那么发音当然亦相近了，这是它们所以同一语根的缘故。而且这些动作的结果，是趋向于坚定一面的，所以有“丁”“实”的引申义。

模仿语(三)。碰或爆裂的声音。

我们所到像biba或pipa那样的模拟声，固然知道是模仿击着的结果，但是柴炭或气泡的爆裂，发音亦很相仿佛的，所以我把他们并为一系。平面击着的模仿，就是《尔雅》“甹夆掣曳”的“甹夆”，在水为“澎湃”，在石为“磅礴”，在草为“蓬勃”、在兽为“屏逢”。我们有时亦重音bing或bung，ping或pung，这就是所谓“蓬蓬”，……因为相碰是很挤的缘故。爆裂和分散的意思是相应的，所以“卜”、“暴”、“半”、“片”、“分”等声当另为一组。碰与撞的分别，只在乎击着所在的广狭不同罢了。

模仿语(四)。切磋的声音。

我们模仿锯木的声音，总说kikukiku，或是tsikash-

ika；形容一个人饶舌不休，亦就用“叽咕”的名称去模仿他，这就是所谓“鉏鋙”、“枝梧”。余如“举岳”(“作龜”)、“枳椇”、“蝍蛆”、“蒺藜”、“趑趄”并其同语，由鉏鋙为错互义，由枝梧为不安义。

模仿语(五)。琐细的声音。

微风吹动了枝叶，或叶子落下来，或小虫在草当中跳动，这些声音，都是很小的，因此这一类的模拟声必得用嘶音如sisu、tsisu、shishu等；因此有“须众”、“蚣蝑”、“蟏蛸”、“蟋蟀”等名。又如鸟飞“鹔鷞”(“鹔鹴”当即因此而得名)，……以及“胥疏”……等词亦无非同样声音的模仿。[6，页426－429]

今按：其中的“卜”字在甲骨卜辞中出现得极多。对于其得音的由来，“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还专门进行了试验研究：

“卜”字之音，《广韵》：“卜，博木切。”今读或作ㄆㄨ(P' U)，或作ㄅㄨㄛ(puo)，其音同于“爆破”。余谓不惟“卜”之形取象于兆，其音亦象灼龟而爆裂之声也。《吴中卜法·占龟》一条有云：“既灼之后，其龟板炸然有声，是云‘龟语’。”某日，余欲一闻所谓“龟语”者，乃凿新购之龟板而灼之。灼之既墨，将见兆矣，而爆然之声，乃发于所灼之中。亟覆版视之，坼文纵横必具，而“卜”字之形亦遂与爆然之声同时出现。始信《卜法》所载为不谬，并悟及“卜”字之音，从可知“卜”之读ㄅㄨㄛ为商代古音之仅存者矣。[147，页108]

后来，齐佩瑢又在潘文论述的基础上，归纳出“动作之名也有模仿

自然界之音而成者”。今仅录其与上举诸例不同者如下：

圆转之音——曰“滚”，曰“骨碌”，曰“碌碌”，曰“轹戾”……

冲撞之音——曰“顶”，曰“钉”，曰“打”，曰“考”，曰“敲”，曰“击”，曰“逢”，曰“碰”，曰“舂”，曰“冲”，曰“抨”，曰“拍”……

爆裂之音——曰“爆”，曰“判”……

切磋之音——曰“斯”，曰“嘶”，曰“撕”，曰“切”，曰“错”，曰“磋”，曰“锯”，曰“磨”……

碎细之音——曰“散”，曰“洒”，曰“碎”，曰“抖擞”，曰“瑟缩”，曰“筛”，曰“数”……〔145，页52〕

够了，无须再举什么例证，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出，拟声造词现象在语言中是大量存在的。正如苏联学者贾克什·哈山诺夫所说：“为我们语言奠定基础的最早时期的先辈们对某一个事物和现象的名称，决不是随便脱口而出的。语言一开始就是取之于自然界。请看dur—dur(隆隆)……等拟声词。我认为，人们最初就是利用这些声音(拟声)确定和称呼各种事物和现象的。”〔148，页25〕这些摹拟的声音，是语言中语根的最重要的来源。

四、形态的模仿

潘尊行所说的第六类“模仿语”是“作态的声音”。请看他举的第二个例子：

愈细微的东西，愈是没有什么声音，竟至无从模仿

的。……又如“鱼”的得名，亦模仿这作态的声音而成的。当我们作u音的时候，不是和鱼口上见的作势一个样儿吗？气経经过喉的阻碍，捺了出来，就为ng u音，因此呼“鱼”。什么“喁喁然皆争归义”、“天下喁喁”的话，正是人们仰望时的语词，只为作势的相似，才模仿了用到鱼身上去……〔6，页429〕

今按：鱼类与原始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鱼。”考古工作者发现：“仰韶文化的人们都是在靠近河流的地方居住，所以捕鱼是很方便的。捕鱼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用网捕，有的用骨头制成单排或双排倒刺的鱼叉，把叉头缚在木棒上，刺杀较大的鱼；也有用骨制鱼钩来钓鱼的。在西安半坡就曾发现带着倒刺的骨制鱼钩，和现在使用的钢鱼钩形状很相似。”〔149，页81、82〕洪荒时代，地广人稀，河湖纵横，“在鱼产比较多的地方，棒打、手捞也是可能的。兴安岭地区有‘棒打獐子瓢捞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谚语，也应是远古人们渔猎生活的写照。”〔150，页98〕鱼口上现的形态，很容易观察到。水中的鱼儿常常仰头向上，圆圆的嘴巴一张一合，十分逗人喜爱。原始人模仿鱼口上现的形态，再发出声音来，即为ng u，用以指称鱼，也是情理中的事。关于上古“鱼”部的音值，任铭善指出：“比较为大家公认的意见是：‘鱼、虞、模’诸韵的主要元音古读开口的〔o〕或〔a〕，……但这个古音测定，从材料方面看，严格的说来，可靠的上限只能到东汉，不能用以说明上古音。”〔151，页61〕史存直先生拟其音为 u、y〔152，页92〕，正与潘尊行的论述相合。

董为光先生也注意到这种摹状成词的现象。他说：

有这样一组表示语音含糊、絮絮不清的异声联绵词：

逗譳：*tug nug　　　譇拏：*tjag njag

諈諉：*tjwa njwyod　詀諵：*tjam nəm

现代方言习见的是非叠韵式："嘟囔"、"嘟哝"、异声格式t—n—，猜测是来源于口舌摹状。〔77，页171〕

这尽管是一种猜测，但却不无道理。摹状者虽然听不清说小话者的话音，却可以看见他的嘴巴一鼓一鼓的样子，于是模仿这种嘴巴动作，而发出t-n-的音来。多么形象的模仿！

这种在模仿动作形态时发出的声音，是语言中语根的又一来源。

《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古者原始人之立地面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造语根以成语言。"你看，上面所提到的语根，不正可以概括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两大类吗！

人类自然的喊叫、感叹，是近取诸身的取象来源。黄侃曾说："太古人类本无语言，最初不过以呼号感叹之声表其喜怒哀乐之情，由是而达于物。……然则感叹之间固为言语真正根源，而亦即文字远溯之祖，故名词由是生焉，动词由是生焉。"〔32，页194、95〕杨树达说："此种发声，《庄子》所谓'人籁'也，发于自然，不假思索。此为言语最初之一时期，名曰'发声时期'。"〔153，页2〕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154，

页511〕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在人们劳动和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半本能的声音、呼喊、感叹，是语言的最初的、最古老的基础。"〔155，页193〕

人类对自然界的音响、形态进行摹拟、模仿，是远取诸物的取象来源。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孩提的时候就有摹拟的本能。人所以异于禽兽，就因为善于摹拟，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拟得来的。"〔156，页4〕个体发生学（ontogeny）的研究也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证明："儿童学语音还有一个特点：有些音他们是先在拟声中学会(如用r模仿马达声，用s模拟哨声)，然后才将这种能力运用于学习语音系统。"〔134，页77〕

近取诸身的呼号、感叹，和远取诸物的摹拟、模仿，是原始语根的两大来源。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即指出："经调查，现在已知的所有语言中都包含有直接来自自然和直接可以理解的那种人类发出的声音，这就是感叹的声音或具有模仿特征的声音。这些声音的意义……是直接取自于声音世界而转入意义世界的。人们将这些表意的声音看作是一切语言的基本成份，其中某些至今仍然明显地、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原始状态，所有语言中的大量的词汇都是由这些表意的声音在漫长的适应性变化和变异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111，页74、75〕我国学者郭绍虞也指出："语言之起，本于拟声与感声，拟声是摹写外界客观的声音，感声是表达内情主观的声音。汉语感声词既是以表达声情为主，汉语的拟声词尤其长于摹状声貌。"〔157，页441〕王德春先生也说："语言是由非语言的摹声、感叹、喊叫等声音信号发展来的，发音器官所发的声音是劳动中传递信息的最方便有效的信号"。〔158，页19〕有了以上诸多强有力的例证，谁还能说这种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吗？不，这恰恰是唯物主义！关于语根乃至语言的起源问题，现在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第二节　同族词的孳乳

同族词首先是由根词孳乳衍生出来的，而根词又是从语根直接产生出来的。例如，原始人摹拟果实掉落滚动的声音——*kl-，这是语根；将它固定下来作为果实的名称——“果裸”，这就是根词。在上一节里，我们讨论“语根的起源”，就是通过根词来追溯语根的。从发生次序来说，语根是第一代，而根词是第二代；至于同族词，则是第三代、第四代……一直延续下去。

根词一旦产生，也就为语言词汇的丰富奠定了基础。那些由语根生发而来的根词，有的具有极强的直接或间接的孳乳衍生能力，它的音义形式为后来同族词的孳衍提供了现成的条件。既然有了语根和根词，有了现成的语源意义和物质外壳可供借鉴，人类就充分地利用它，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不断地扩展开去，施之于相关的或相似的事物。由根词孳乳出第一代同族词，再由第一代孳乳出第二代、第三代……同族词，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同族词也就源源不断地孳生出来。

一、类比孳乳

一个根词一经产生，就成为音义的结合体：语音形式是它的物质外壳，所指事物是它的意义指向。人们即利用这个现成的物质外壳，来它个“旧瓶装新酒”，转而表示别的事物。而新旧事物（从人们为事物命名的先后次序而言）之间过渡的桥梁，则是它们之间特征或标志的相似性。就是说，这个新命名的事物所具有的特征或标志，与已命名的事物的特征或标志特别相似，人们就以

这两个事物之间特别相像的那个特征或标志为契机，进行联想、类比，由此及彼地将已有的语音形式套用到另一事物之上，从而造出新词来。

例如，“果裸”一词产生之后，人们发现，这些树木的果实，尽管大小有别、颜色各异，味道也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形体都是圆形的。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又不断地发现，地上爬的、天上飞的，乃至人们自己的身体上，都有一些物体是圆形的。怎么为这些事物命名呢?既然已经有了＊kl-的语音形式，它所表示的事物与这些事物之间又都有着相同的特征——圆形，于是，人们就以此为线索，将现成的语音形式＊kl-(>k-l-)一一使用到这些事物身上——瓜是圆的，就叫“瓜蓏”、“栝楼(苦蒌)”、“葫芦”；蝼蛄的头、尾是圆的，就叫“蛞蝼”；细腰蜂的头、尾是圆的，就叫“蜾蠃”；小鸟是圆的，就叫“果臝”；头骨是圆的，就叫“骷髅”；眼珠是圆的，就叫“眗瞜”；气管是圆的，就叫“喉咙”；后来造出了圆形的锅，就叫“锅瓥”；又造出了车轮，也是圆形的，就叫“毂轮”……“由‘苦蒌’而稍变之，曰‘科斗’、曰‘活东’、曰‘颗冻’、曰‘款冬’，所属不同，而形皆有似者。由‘科斗’出者，有‘系缀’，丝之结也，今俗以为‘纥达’；系缀作纸，则曰‘赫蹄’，犹今高丽茧纸耳。‘系缀’声变，俗语有‘胍肐’，大腹之貌；有‘骨朵’，或以目花之未舒，或以目器之圆者，北人今犹呼科斗为‘虾蟆骨朵’也。此类肖形之音，但据形，而更不分辨其所属。《荀子》云：‘物有同状而异所者，予之一名’，即此理也。”[30，页95、96]

命名时的这种由此及彼、比况类推的现象，在世界其他语言中也可以发现。在克拉马特一带的印地安语言中，有“L——加在动词和名词前的前缀，形容或指明圆形或橙形、圆柱形、平圆形或球形的物体或轮状物；也指容积大的东西；此外，还指用这种

形状的物体完成的行动；或者指身体、臂膀、手或其他部分的圆形或半圆形的波状运动。因而这个前缀常常与云、天体、地表面的圆形斜坡、圆形或球形水果、石头和房屋（房屋通常呈圆形）连用。它还用于畜群、围场、社交聚会（因为集会通常都围成圆圈），等等。”[159，页146]

值得注意的是，事物间形状特征的相像，并不是要求绝对的像，而只是一种近似的、大致的相像。就拿物体的圆形特征来说，既有滚圆、浑圆之圆，也有长圆、椭圆之圆；既有球形的圆，也有圆柱形的圆；既有立体圆，也有平面圆；既有完整的圆，也有部分的圆；有的可以说是圆形，而有的根本算不上圆，只是一个块状、一个立体形而已。但在思维和语言都还处于混沌状态的原始人来看，这些事物都大同小异，因而在命名时就可以求同存异。比如，弯曲的形状，仅仅是圆形的一个部分，充其量也只是半圆而已，但古人却因为这一点，将曲形（拱形、弧形）与圆形同等看待。在训诂学上，“圆”、“圜”与“曲”常常可以连用，如《礼记·礼运》“山出器车”，孔颖达疏引《礼纬·斗威仪注》云：“山车，自然之车，垂钩不揉治而自圆曲。”[160，页1427]《说文·木部》“栾”字段玉裁注：“借为圜曲之称，如钟角曰‘栾’，屋曲曰‘栾’是。”[161，页258]因此，古人就用表示圆转之义的语音形式来称呼屈曲之物，如：王瓜名为“瓝瓠”，山名为“岣嵝”、“昆仑”，水边地名“句廉”，高地名“蟹螺”，房屋建筑则名“蘧庐”、“穹庐”、“囷鹿”、“柧棱”，天名“穹隆”，人曲背则名“佝偻”，今称为“罗锅”……另外，形状未必圆的块状物，也可以用本来表示圆形物的语音形式来称呼，如土块曰“坷垃”，石块曰“磈磊”，食物曰“谷仑”、“河漏”、“卷娄”，木偶人曰“傀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用表示圆形物的语音形式指称块状物的现象，在亲属语言中也存在。例如，台语的lu:k义为圆，“骰子虽不圆，但它是

一个小立方体，所以可用lu:k称之。"[162，页183、184]

人们为什么会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一切近似的形状都看成圆形，而不是别的形状呢？美国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为我们解开了这一人类认识之谜。他在《艺术与视知觉——视觉艺术心理学》一书的《原始圆圈形象》一节中指出："视觉对圆形形状的优先把握，也是依照同一个原则（简化）进行的。一个以中心为对称的圆形，它不突出任何一个方向，可以说是一种最简单的视觉式样。我们知道，当刺激物比较模糊时，视觉总是自动地把它看成是一个圆形。此外，圆形的完美性还能特别引起人的注意。例如，各种动物（包括人）的圆形的眼珠，几乎是自然界中最引人注目的对象。……查拉特·罗戈斯所作的试验还证明：儿童从一堆形状不同的物体中总是愿意挑出圆形形状，即使首先要求他们应该挑出棱形的物体，他们仍然要不自觉地把圆形的挑选出来。这说明，知觉对简单的圆形是多么偏爱！"[163，页235]又在《区别律》一节中说："按照区别律，当某一知觉特征还没有被区别开来的时候，就会以最简单的式样被描绘出来，而在绘画中可以找到的最简单的形状便是圆。因此，在整个发展过程的这个还不能区别各种形状的阶段上，圆并不代表圆形性，它可能代表一切形状的总体，而不代表任何一种个别形状。我们看到，在成年人的思维和艺术表现活动中，也有与此相类似的地方。举例说，当他不了解某一事物的真实形状，或是某一形状与他的目的关系不大的时候，他就干脆用斑点、圆圈或球形来代替这些事物。……在古人所作的那些有关地球和宇宙的论述中，也总是把地球和宇宙描写成球形、圆面形或环形。这些描写其实并不是基于观察而作，而是由于人们在描绘那些不可知的形状或空间关系的时候，总是尽量以一种最简单的形状和关系去描写它们。"[163，页240]

古人对于自然界的事物，观察的目光十分敏锐，选取事物特征的角度相当新颖，为事物命名的方法也非常巧妙。有些事物命名的用意，即使是思维高度发达的现代人，也未必就能准确无误地理解；有时必须变换一下角度，仔细思索一番，才能恍然大悟，真正体会到古人命名立意的良苦用心。比如"喉咙"，如果只从外部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而原始人在狩猎时代分解兽体时，可能就已经知道它是一个圆管、圆洞。再如"螮蝀、虹"，既可以把它看成一条长带子，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半圆形，显然后者的观察角度才与古人的命名之意相符。又比如，"蒌、萧蘱"，如果在抽穗前观察它，只能得出"狭长如带"的结论，因为这时只能看到它那狭长的叶子；而如果是在抽穗后观察它，就会对它的蜡烛状花穗产生强烈印象。"葭芦、芦苇"的得名也可能是因为它有一个密生白毛的大花穗，用植物学的术语说，就是"圆锥花序"；而且，它的茎杆横断面也是圆形的。

同族词的类比孳乳，还表现在古人"制器象物"上。"古人不徒为器也，而皆有所取象，故曰'制器尚象'。"[164]就是有意模仿自然物体之形象来制造器物。例如，古人模仿葫芦的形象而造出了壶，模仿鸟雀的形象造出了爵。《说文·鬯部》："爵，礼器也。'𦥑'象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雀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依段注本)段玉裁注："爵形即雀形也。程氏瑶田《通艺录》曰：'前有流，喙也、腦与项也，胡也；后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口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耸翅将飞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尔鼎立者，其足也。'"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今观卜辞诸'爵'字，象爵之首，有冠毛、有目、有味。因冠毛以为柱，因目以为耳，因味以为足，厥形维肖。……许君谓'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今证以卜辞，其字确象爵(雀)形。知许君所云为古先遗说，不见于诸经注，幸尚存于

《说文解字》中。许君网罗放佚之功诚巨矣。"[80，页2175]《周礼·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考古发掘证实了文献记载的"鸡彝"、"鸟彝"。"如果我们看看山东龙山文化中常见的红陶鬶，不用解释，就会想到，这件陶器活像一只伸颈昂首、矗立将鸣的红色雄鸡。其实不独鬶如此，夏文化中常见的封口盉又何尝不像一只黑色或灰色的雄鸡！原来它们可能都是由共同的祖型——大汶口文化的鸡彝发展而来的。早在大汶口文化的中（第五）期，鸡彝的雏形就已出现了。其特征是：球形腹，小头正对腹的中心，圆流，鸭咀形三实足，后有一鋬。猛一看，好像是一只刚出蛋壳的雏鸡。"[165，页149]1987年在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中发掘出一件鸟尊，器身为一昂首挺立的鸟。鸟脑后有冠，双目圆睁，尖喙，两足直立，足有蹼。[166，页69-71]这已充分说明，古人制器造物，确是有所取象的。《说文·隹部》："雀，依人小鸟也。从'小、隹'，读与'爵'同。"段玉裁注："今俗云'麻雀'者是也，其色褐，其鸣'节节足足'。礼器象之曰'爵'矣。"《孟子·离娄上》："为从驱爵者，鹯也"，"爵"即"雀"。这些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足以说明：爵是古人取象于雀形而制之器，爵即得名于雀，"爵"是由"雀"孳乳而来的同族词。

二、分化孳乳

原始词刚刚产生时，还是囫囵含混的，可以说是一种"模糊语言"。例如"果裸"，开始时就是统指那些滚圆的树木果实，而并非哪一种果实的专名。其后，人们的思维日渐精密，语言也日渐清晰，于是从"果裸"这一总名中逐渐分化出各种具体的果名来。下面以两种常见的水果——"桃"、"橘"的得名为例，加以说明。

先说"桃"的得名。《说文·木部》："桃，果也。从'木'、'兆'声。"

从“兆”得声之字有三种类型：1.硗k‘ieu，溪母，k类；2.姚洮……喻母四等，r类；3.挑眺，透母；跳逃，定母，t类。这一谐声系统向我们暗示：它们有可能是同一原始语音分化演变的结果，其演变轨迹为*kr->t-。这是内部证据。再看亲属语言中“桃”的说法，标敏瑶语为klau[20，页36]，错那门巴语为kle、gle[21，页166]。包拟古先生据此构拟出原始苗瑶语“桃”的语音形式为*glau[88，页25]。这是外部证据。内外两方面的证据都表明，现在我们所说的“桃”，来源于*kr-的音变；而*kr-的语音形式，正与“果蓏（𤓰）”的早期语音形式kl/r-相符（参见第一章第四节中的“语源学与音韵学”部分及下节中“古今的变易”部分）可见，“桃”的名称即来自“果裸”，只是由于语音变化太大，已经不易觉察罢了。

再说“橘”的得名。《说文·木部》：“橘，果，出江南。从‘木’，‘矞’声。”“居聿切”，见母，k类；而其声符“矞riwet”，《广韵》“余律切”，喻母四等，r类。因此，“橘”的早期语音形式可拟为*kr-。后来由于复辅音声母逐渐分离而成k-r-的联绵词形式，如同“果裸（蓏）”的联绵形式由*kl/r-的早期复辅音形式分离而来一样。今在橘属植物中，有一种叫做“枸橼”，也叫“香橼”。《玉篇·木部》：“橼，枸橼，出交趾。《埤苍》云：‘果名，似橘’。”杨孚《交州异物志》：“枸橼实如橘，大如饭筥，皮有香，味不美。”我国植物工作者在云南、广东等地发现了枸橼的野生种。而且，“柑桔种类中最初自东方向西方欧洲传播者为枸橼，它在欧洲的栽培起源约在纪元前三世纪，古代欧洲的枸橼为柑桔类的代表，彼柑桔属之所以名为Citrus者，即自枸橼的英名Citron转化而来。”[167，页407]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枸橼似乎是柑橘类的原始品种，而其名称的语音形式k-r-也较多地保留了原始名称的语音特征。由“果蓏”k-l/r-分化出“枸橼”k-r-，这只是分化孳乳的第

一步。其后，由于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以枸橼为原生种逐渐培育出了味道甜美的橘、柚新品种。《书·禹贡》："厥包橘柚锡贡。"孔安国（伪）传："小曰橘，大曰柚。"甘甜味美的橘、柚可以作贡品，所以见诸较早的文献；而"味辛酸"[117，页1797]的原生种枸橼却反而不登大雅之堂，真可谓"得鱼而忘筌、数典而忘祖"了。由"枸橼"k-r-再分化出"橘"k-、"柚"r-，这是分化孳乳的第二步。将它们分化孳乳的全过程标示出来，就是

*kr-→果蓏k-r-→枸橼k-r-<橘k- / 柚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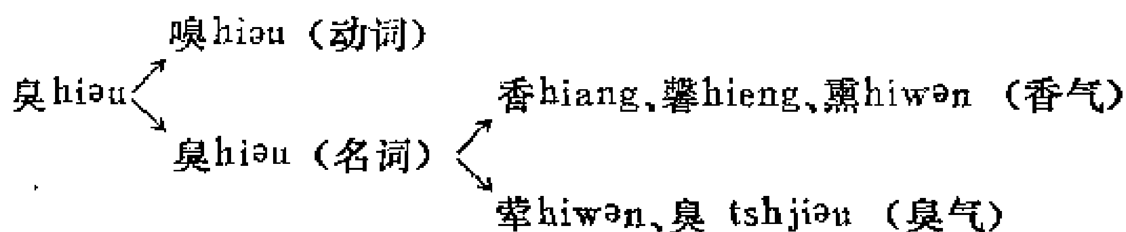
这里，"果蓏"是原始词，"枸橼"由"果蓏"分化孳乳而来，"橘"、"柚"又都由"枸橼"分化孳乳而来。此外，与"橘"同声系的尚有"椵"kea、"柑"，与k声系相交替的有P声系的"椴"piwat、"泡（苞、脬、抛），与r声系的"柚"相交替的有l声系的"栾"，由*kr->t-演变而来的有t声系的"条"、"橙"等。限于篇幅，此处论证从略。总之，它们层层孳乳，不断分化演变，才成为今天不同的果名。

今天的一些果名，如"杏"、"梨"、"李"、"棠"……，大都可能来源于"果裸"，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变化巨大，这些名称已经面目全非了，非经过一番艰苦的探索，就难以得见其原始的面目。当然，同族词的分化孳乳，并不限于果实的名称；其他事物"异名而同所"者，大都与此相似，很有一番探索的必要。

同族词分化孳乳的结果，既有名词，也有动词；既有词义相近相关者，也有词义相对相反者。我们看一个这方面的例子：

"臭"，似得名于抽动鼻子呼吸气息的声音。《说文·欠部》："歙，缩鼻也。""歙"hiəp、"臭"hiəu，二字上古音声母及主要元音俱同，可证。"臭"字已见于甲骨文，"从'自'（鼻）从'犬'，会臭觉灵敏之意，或会以鼻臭味之意。"[168，页181]本来就兼有

嗅的动作和气味这两重意义。后来，这两个意义分化，人们于气味义专用“臭”字表示，而于嗅的动作义另造“齅”或“嗅”字表示。《玉篇·鼻部》：“齅，《说文》：‘以鼻就臭也。’亦作‘嗅’。”《庄子·人间世》：“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这次分化使名词、动词分开了。就名词而言，起初也是笼统的概念。《书·盘庚中》：“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孔颖达疏：“臭是气之别名。古者香气、秽气皆名为臭。《易》云：‘其臭如兰’，谓香气为臭也；《晋语》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彻于外’，谓秽气为臭也。”气味很复杂，粗分可以分为香、臭两大类，于是又孳乳出“香hiang、馨hieng、熏hiwən”和“荤hiwən”两大类同族词，“臭”也变音为thiəu（*khrjiag>tshjəu[2，页92]），专表恶气。《正字通》：“臭，对‘香’而言则为恶气。”这次分化，使香义、臭义这两大类相对相反的名词分开了。这两次分化孳乳的全过程如下图：



令人惊奇的是，外语中也有与此极为相似的情况，如英语smell：

1、to smell a flower。闻一闻花。

2、a smell。气味。

3、The flowers smell sweet。花散发香气。

4、This egg smells。这只蛋发臭了。

这虽然只是一种共时现象，但可以判定：它也是由于长期的历时分化演变而形成的。这种类似的分化演变情况，在俄语等语言中也存在着[109，页7；169，页122]。这正反映了人类思维由粗疏至精密、由模糊至清晰，语言的词汇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

杂的共同的发展趋势。

三、转 变 孳 乳

区别词性，是古汉语构词的一种重要手段。就实词来说，名词与动词，动词与形容词，名词与形容词之间，常常互相转变。词性的转变，往往引起语音和字形也跟着变化。这除了有其他因素以外，主要的是古人为了有所区别而有意为之。词性转变的结果，就是词性有别的同族词的孳乳。王力将其分为“转音的滋生词”、“同音不同调的滋生词”和“同音不同字的滋生词”三种[170，页46-56]。我们将这种因词性有所转变，为了区别词性而孳乳成词的现象称为“转变孳乳”。

关于不同词性的同族词的转变孳乳，蒋云从先生有几个例子足资说明。先看由动词孳乳出形容词、名词之例：

> “解”的本义是解牛，扩大为剖解；转移而为分解、分开的意思，包括将纠缠附着的东西分开(解衣，解结)，将纠缠的人事分开（排难解纷，其事乃解），将限制的东西放开（解禁、解严）等，再转移则为懈怠，孳乳为“懈”，等等，“懈”与解牛的本义已经是不大看得出有什么关系了。就分开一义而言，马不再驾车，车马分开叫“解”，转移为休止。《周礼·天官·序官》“掌舍”郑玄注：“舍，行所解止之处。”王引之说：“解犹休也，息也，止也。……《吴子·治兵篇》曰：‘马疲人倦，而不解舍。’……《汉书·郊祀志》曰：‘奉尊之役，休而复来；缮治共张，无解已时。’……《淮南·原道篇》曰：‘解车休马。’”“舍”既为休止之处，“解”也可以由休止之义转移为休止之处，

而孳乳为“廨”，《晋书·范宁传》“营起廨舍。”从解牛到廨舍，就更不容易看出其间的联系了。[171，页95、96]

“解”kek可能来源于对割解物体时响声的摹拟。动词“解”经过意义的转移，先孳乳出形容词“懈”，再孳乳出名词“廨”来。其间孳乳衍生的血缘关系，隐约可辨。

再看名词孳乳为动词的例子：

《汉将王陵变》：“邈其夫人灵在金牌之上。”……“邈”字原来应该作“貌”。“貌”的本义是容貌，转成动词，作图写容貌解，读作入声，杜诗的“曾貌先帝照夜白”、“画工如山貌不同”、“貌得山僧及童子”都是这样的。而唐人诗文的传本里却有“貌”、“邈”通用的例子，如韩愈《楸树诗》“不得画工来貌取”，《考异》就说：“‘貌’或作‘邈’。”这是“邈”和“貌”通用的证据。韩诗“貌取”虽然通写作“邈”，但仍读入声；变文的“邈”则已读作平声。从“貌”读到平声的“邈”，才有后起的从“手”、“苗”声的形声字“描”字的出现。……汤显祖《牡丹亭·写真出·山桃犯曲》：“有一个曾同笑，待想象生描著，再消详邈入其中妙。”“描”、“邈”异形同义。[172，页145—147]

“貌”始为名词，至唐代转为动词后，名动共形；其后借用“邈”字来表示动词，并变入声为平声，以示区别；再后，就造出了专用为动词的“描”字。从名词“貌”到动词“描”，中间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描”是“貌”的孳乳词无疑。

四、抽象孳乳

从具体到抽象，是人类认识的共同规律。这一点，在同族词的孳乳过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比如，人们从"果裸"、"瓜蓏"、"栝楼"、"葫芦"、"骷髅"……这一系列具体的事物身上，概括出一个抽象的概念："浑沦（囫囵）"、"浑沌（混沌、浑敦）"，因为圆转的东西都是浑然一体的。这一来，就把所有圆形、块状、立体形等具体事物的共同特征高度概括了。下面再举两个例子，看一看表示抽象概念的词是如何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孳生出来的。

数目，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抽象的数词是从具体的事物中产生的。心理人类学者推测，二进法的构思过程是以人类双手作承托物的；五进法是一只手的五指作构思基础；六进法则用五指和一拳头为构词根据；十进法是把十指举起运算；十二进法可说是两拳再加十指。此外，有些学者以为三进和四进也是以自然界中的三角形和四边形的'角'作构思基础的。总之一切构词心理过程都是以物质形象为依归的。我们从世界上至今还处于生产水平较低的民族社会中可以找到一些旁证事例。"[173，页333]汉语计数采用十进法。汉族的先民发现，十个数里，可以半分次数最多的是八。算算看：八半分为四，四再半分为二，二再半分为一，一再分下去就是半，总共可分四次；而其他的数，比八大的，十可以半分二次，九只可半分一次（当时恐怕还没有"小数"）；比八小的数就更不用说了。"八"成了半分次数最多的典型数目，这一特点，被古人敏锐地发现并牢牢地抓住，把它当作为之造词的契机。《说文·八部》："八，别也。"段玉裁注："此以双声叠韵说其义。今江浙俗语以物与人谓之'八'，与人则分别矣。"林义光也说：

"'八'、'分'双声对转。"[80，页191，492]可见，"八"pet这个词音义来源于"分piwən、别piat、判puan、半puan"这一类词。这一结论还可以得到文字学的支持。总之，"八"这个词的孳乳过程，"体现了朴素的一分为二的哲理"[174，页48]。

虚词，大概是语言中最为抽象的词了。这里就探讨一下古今极为常见的虚词"而"的音义来源吧。

人体外部的器官，多是两两成对的，如眼、鼻孔、手、足等；而最为典型的成对器官，就是耳朵了。有则谜语描写它："左一片，右一片，隔着大山不见面"，即极力突出其数为二的特征。推而广之，男人耳下的颊毛也是分布在脸上两侧的，所以称为"而"。《说文·而部》："而，颊毛也，象毛之形。《周礼》曰：'作其鳞之而。'""耳"、"而"的共同特征是其数为二，由此概括出"二"的概念，孳乳出数词"二"来。张舜微先生曾为此做了一条声训："耳，贰也，谓左右各一，如副贰也。"[175，页462]正指明了"耳"和"二(贰)"的关系。但从人类的认识规律来看，应是古人"近取诸身"，取象于"耳"而造出"二"。由"耳"、"而"孳乳出"二"，这是抽象孳乳的第一步。两人在一起，其数为"二"，于是就可以称对方为"而"，"而"者，"二"也，由此孳乳出第二人称代词，字又写作"尔"。这是抽象孳乳的第二步。用一个事物为另一个事物打比方，本体和喻体加起来就是"二"，所以二者之间可以用"而"作比喻词。《诗·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发如虿。""而"、"如"并用，二者有变易关系，后多用"如"作比喻词。这是抽象孳乳的第三步。两个相连的事物或现象并提，无论它们之间是顺接的并列关系、递进关系、因果关系、条件关系、假设关系，还是逆接的转折关系，总是两两相对的关系，其数仍不离"二"，于是中间可用"而"连接，从而孳乳出连词"niə"来，只是一直没有造出相应的专用字，仍借用表示颊毛的"而"字，用例甚多，不

烦胪举。这是抽象孳乳的第四步。从耳朵的“耳”niə、颊毛之“而”niə，到代词“而”（“尔”niei）、比喻词“如”nia（“而”niə）、连词之niə（“而”），其抽象程度层层递升，而其间一脉相连，不绝如缕，其中的关键环节就是数词“二”nei。找到了这个环节，整个孳乳过程就连接起来了；丢失了这个环节，整个链条也就中断了，因而造成“绝缘”的现象，这就是杨树达所说的“此种条贯尘翳数千年，不曾显见于吾辈之前”。语源的研究，就是要拂去历史的灰尘，找到这种中断、绝缘的地方，并把它们连结、接通起来。

五、特指孳乳

人们把从普遍现象中归纳出的一般概念，反过来再施用于个别的事物，用已有的抽象的词来特别指称一件具体的事物，因而孳乳出意义比较具体、单一的同族词来，这就是特指孳乳。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要数从数词孳乳出来的几个同族词了。王力的《同源字典》对此罗列甚详，今略举其中的几例：

《说文》：“驂，驾三马也。”……《左传·桓公三年》：“驂挂而止。”《疏》：“初驾马者以二马夹辕而已。又驾一马，以两服为驂，故谓之‘驂’；又驾一马，乃谓之‘驷’。故《说文》云：‘驂，驾三马也。’‘驷，一乘也。’两服为主，以渐参之两旁二马，遂名为‘驂’。故总举一乘则谓之‘驷’，指其马则谓之‘驂’。《诗》称‘两驂如舞’，二马皆称‘驂’。”

《广韵》：“参，参星，所今切。”《诗·唐风·绸缪》：“三星在户。”《传》：“三星，参也。”[176，页618、619]

《说文》：“驷，一乘也。”徐锴曰：“四马也。”《玉篇》：“驷，四马一乘也。”[176，页475、476]

《广韵》：“伍，行伍。”《管子·小匡》：“五人为伍。”《周礼·天

官·宫正》:"会其什伍而教之道义。"《注》:"五人为伍。"《左传·桓公五年》:"先偏后伍。"《注》:"五人为伍。"[176，页136]

《礼记·祭义》:"军旅什伍。"《疏》:"五人为伍，十人为什。"《周礼·天官·宫正》:"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引者按：原书作"道义"[160，页656]。)《注》:"五人为伍，二五为什。"《周书·大聚》:"十夫为什。"《管子·立政》:"十家为什。"《文选·沈约〈谢灵运传论〉》:"纷披风什。"《注》:"诗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176，页593]

数词，本来是泛用于一切事物的数目的。而在上述诸例中，各个数词却都用于特指的事物，从而产生了与数目相关的名词。这种特指的孳乳，是词义缩小后产生的现象。遗憾的是，《同源字典》对这些"同源字"仅仅作了共时的平面系联，而并未指出其历时的源流关系。当然，特指孳乳现象并不限于数词。例如蒋云从先生所指出的:"盖'浑敦'者，'鹘突'也；……'梼杌'者，'钝愚'也；'饕餮'者，'贪馋"也。假令有凶兽，固为依德立名矣。"[92，页9]这些名称，都是同族词特指孳乳的结果。这种孳乳，常常与"抽象孳乳"相结合，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具体——抽象——再具体——再抽象"的发展过程。

六、关联孳乳

一个事物已有了名称，与这个事物密切相关的其他事物也可以因此而得名。例如：

《说文·玉部》:"珥，瑱也。从'玉、耳'，'耳'亦声。"填塞耳朵的珠玉叫"珥"。《史记·李斯列传》:"宛珠之簪，傅玑之珥。"司马贞索隐:"珥者，瑱也。"《列子·周穆王》:"施芳泽，正蛾眉，设垂珥。"张湛注:"珥，瑱也，冕上垂玉以塞耳。"《后汉书·和熹邓

皇后记》："簪珥光采。"李贤注："珥，瑱也，以玉充耳。"以后，又演变为耳环，犹今天所说的"耳坠子"。《集韵·止韵》："珥，耳珰。"《续汉书·舆服志下》："珥，耳珰垂珠也。"无论是塞耳的珠玉，还是垂挂在耳朵上的耳环，都与耳朵密切相关，所以从"耳"孳乳出"珥"。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关联孳乳"。

第三节　词形的变易

明代的陈第曾明确指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177]用这段话来说明同族词的词形变易，也是十分恰当的。

变易，是词的形式的变化、改易，它反映的是同词异形的现象。词的形式包括语音形式和文字(书写)形式。无论是语音变还是字形变，都没有分化出新义，因此也不派生出新词。语音形式和文字形式虽然增多了，但表示、记录的词还是那一个。所以，从实质上来看，变易反映的是同词而不是同源现象[178，页254]。但词形的变易又是汉语同族词孳乳的伴生现象，二者密切相关、互相纠缠。因此，把这两种貌合神离的现象放在一起研究，遂成为汉语语源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古今变易

语言中的一些基本词汇，几经沧桑，数度嬗变，但却万变不离其宗，新形式与旧形式之间仍保留着某些或明或暗的联系。我们试通过"果裸"的演变过程，看看这些古今变易的来龙去脉。

《说文·木部》："果，木实也。""古火切"。《周礼·春官·龟

人》："东龟曰果属。"郑玄注："杜子春读'果'为'裸'。"《逸周书·王会》："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王念孙杂志："予谓'果'疑即'裸'字。《周官·龟人》'东龟曰果属'，《释文》：'果，鲁火反。''鲁火'正切'裸'字，是'果'与'裸'同音，故祖裼裸裎之'裸'亦通作'果'。"[81，页25] 这是"果"字"见"母、"来"母两读例。再看谐声系统，"裸、羸"从"果"得声而读"来"母。有异读和谐声这两方面的证据，再参照亲属语言中"果实"一词的说法（已见第一章第二节"语源学的性质"部分），我们可以断定，"果"的早期读法是＊kl-。其后，复声母＊kl-逐渐分离，中间加入元音而成双音节k-l-，用汉字写，就成为联绵词"果裸"；音变为k-d-，汉字写成"果堕"（《易·说卦》："为果裸。"陆德明释文："'果蓏'京本作'果堕'之字。"）。后来，联绵词"果裸"、"果堕"再进一步分化，即成为三个独立的单音节k-、l-、d-。"果"字保留了k-音（《说文·木部》："果，木实也。"桂馥义征："《尔雅》：'果不熟曰荒。'郭云：'果，木子也。'《曲礼》：'赐果于君前。'注云：'木实曰果。'"），"橡"字保留了l-音（《说文·木部》："橡，木实也。"桂馥义证："《系传》：'橡即果之一名。'……《玉篇》作'㮚'，云：'木实。又鲁果切，木名，实有皮无壳。'"），"实"则保留了d-音（《周书》："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蓏实。"《礼记·祭统》："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郑玄注："'草木之实'，菱、芡、榛、栗之属。"《格物粗谈·树木》："银杏雌雄合种，则结实。"《尔雅·释草》："果裸之实栝楼。"《春秋·僖公三十三年》："陨霜不杀草，李、梅实。"）。k-、l-、d-正好构成＊kl->d-的音变过程，说明它们都是从＊kl-分化演变而来，其声母一分为三，其韵母也因造词时变换元音或后来演变而不同（"果"为"歌"部，"橡[㮚]"为"微"部，又"歌"部，"歌、微"旁转；"实"为"质"部，"歌、质"、"微、质"均旁对转），文字形式也各

不相同。

不惟果实的总名如此，即使是在一个具体的果名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古今之变的影子。例 ，《尔雅·释木》："櫠，椵。"郭璞注："柚属也。子大如盂，皮厚二三寸，食之少味。"《本草纲目·卷三十·果部二》："柚……最大者谓之'香栾'，《尔雅》谓之'櫠'，音'废'。"[117，页1794]吾乡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三十二·果类》："柚，……《尔雅》：'櫠，椵'。……此即闽中所谓'泡子'，味极酢，亦有可食者，多以为盘供，与红囊柚一类二种。"[179，页746]则称"櫠"为"泡子"。在此之前，已有写作"泡"者。宋代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三》"橘"条引《虞衡志》："泡花，南人名柚花。"[180，页898]字又作"苞"。王沄《闽游记略》："柚大如斗，土人谓之'苞'。"又作"脬"。清范寅《越谚》："香脬，如香圆而大，装盘供之，隔岁不坏，味酸。"今又写作'抛"。《辞海·木部》："柚，……又名'文旦'、'栾'、'抛'。"[97，页1286]"櫠"、"泡"、"苞"、"脬"、"抛"，同一名称，五易其形。这一古今变易，历时两千多年。

古今变易的"文字、词义之间也存在着内部联系。找到这种联系，则胡、越成一家；看不见这种联系，则对面隔山河。"[181，页298]例如，"奰"biet，见于《诗·大雅·荡》："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毛亨传："不醉而怒曰'奰'。"孔颖达疏："'奰'者，怒而自作气之貌，故为怒也。"王力在《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一文中拿了这个词做例子说："如果说某一个字在现代文章里是死了，这自然是很武断的说法；如果说它在现代口语里是死了，这可以由事实来证明；只要看一般民众口语里没有它，已经可说是死去；若连文人的谈话里也没有它，更是死亡的铁证了。古语的死亡，有死字和死义的分别。死字如：'奰，怒也，现代只说'生气'，不说'奰'。……死字和死义不同之点，就是死字是整个字死了，而死义

只是字的某一种意义死了。"[182，页313、314]张维思则反驳说：“尝与灌县于定夫谈及此字，余问：‘王力谓此字为已死灭之文字，究已死否？’于氏立对曰：‘未！’曰：‘今别作“愤”耳。’因悟及‘贲然来思’之‘贲’，《释文》作‘被义反’，急应曰：‘是，是。’于氏之敏颖不可及。字本从三‘目’三‘大’，省作一‘大’。‘大’者，人也，三人皆怒目，犹众人皆怒目也。周厉无道，倍克在位，国人皆怒视，其积愤深矣。‘愤’，《说文》训‘懑’，《离骚》注‘凭’云‘满’也，其转语耳。‘懑’、‘大’义近。"[137，页12]“《诗经》上偶尔用一个当时和‘愤’字音义并同的字，后人但用‘愤’，不用‘奰’，而‘奰’之音义未常死灭。只可说这个字形死了，不可说这个语音死了。就因为这点守旧的好尚，致令新音生而旧音不死，并且别造新字以当此新音。"[183，页13]蒋云从先生亦曰：“今言发怒曰‘发脾气’。……此‘脾气’字本为‘奰’，《说文》篆作‘𡙡’，作‘奰’者从省也。《说文》曰：‘壮大也。……一曰：迫也。读若《易》“虙羲氏”。《诗》传曰：“不醉而怒谓之奰。”’段氏注曰：‘张衡、左思赋皆用“奰屃”字，而讹作“赑屃”，俗书之不正如此。……’又曰：‘《大雅·荡》曰“内奰于中国。”毛传曰：“不醉而怒谓之奰。”于壮义迫义皆近。’段氏之说如此，皆是也。……《广韵·六至韵》，‘𡙡、奰’平秘切，直云‘怒也’，是矣。《文选·张衡〈西京赋〉》：‘巨灵赑屃，高掌远蹠。’薛综注：‘赑屃，作力之貌也。’又左思《吴都赋》：‘巨鳌赑屃，首冠灵山。’刘逵注：‘用力壮貌。’此段氏所谓‘张衡，左思赋皆用“𡙡屃”字’者也。‘赑’即‘𡙡’之形讹耳。其训为‘作力之貌’，正与怒张义相成。刘逵云‘用力壮貌’，又与《说文》‘壮大’之训相合。《广韵·六至韵》，‘奰’训为‘怒’；又‘𤻚’：‘匹备切，气满。’观此二文，知‘脾气’连言有自来矣。”[92，页79、80]

将古往今来这些有着变易关系而形式有所不同的词加以搜集

整理，穷本溯源，历叙演变，清理出其嬗变的先后源流关系，按照蒋云从先生的说法，就是“会通”，这也应是语源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会通，基本上是一种综合，即综合语词和语词、字和字之间内容（意思）和形式上的本质特点。就内容来说是词义和一定语言环境中的表达功能，就形式来说主要是作为语词的‘物质外壳’的语音，从语词中抽出这两方面的相同或相牵连的质素来加以综合，我们就能够看到语义的内部联系。不过，综合和分析常常是分不开的，要综合，尤其在材料纷繁的时候，需要有所分析。”[181，页301]例如蒋云从先生的释“馨”：

《说文》：“䊵，声也。从‘只’，‘甹’声。读若‘馨’。”段氏曰：“谓语声也。晋宋人多用‘馨’字，若‘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何物老媪，生此宁馨儿？’是也。‘馨’行而‘䊵’废矣。隋唐后则又无‘馨’语，此古今之变也。”今案：段氏以“䊵、馨”为古今语，是也；谓隋唐后无“馨”语则非。无论唐时尚有“宁馨”，刘禹锡《送日本僧智藏诗》：“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至宋人沿用未绝，其在他文，犹有遗佚可征。张文成《游仙窟》云：“阿娜腰支细细许，𥈭䁶眼子长长馨。”陆畅《云安公主出降杂咏·坐障》诗云：“白玉为竿丁字成，黄金乡带短长轻。”“轻”字《全唐诗》注云：“一作‘馨’。”唐范摅《云溪友议》卷四作“碧玉为竿丁字成，鸳鸯乡带短长馨。”“轻”字无义，作“馨”是也。此并唐人以“馨”作助声之词也，六朝又或以“形”为“馨”，以音近通用也。梁殷芸《小说》云：“……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形语？’”“尔形”即“尔馨”也。但唐人虽犹有“馨”语，而用之者盖稀，于是“生”字起而代之，若“太憨生”、“太

瘦生”、“可怜生” 之类是也。唐人小说称隋炀帝使虞世南作诗嘲袁宝儿曰：“肩垂辫袖太憨生。”则隋、唐之间其为“馨”与“生”嬗变之交乎？又案：王安石《次韵吴季野题岳上人灯心亭》诗：“空亭五月尚寒生。”杨万里《舟过安仁》诗：“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夏至雨霁与陈履常暮行溪上》诗：“夕凉恰恰好溪行，暮色催人底急生？”又《端午独酌》诗：“团黍明朝便无味，菖蒲今日么生香。”则“生”字不惟配双字，亦配单字，其用颇广也。〔92，页42—43〕

从这些材料，我们可给“馨”理出个“古今之变”的谱系来：

鞕→馨→生

（形）

这岂不是有溯源沿流之乐吗？〔181，页300〕

谨按：“馨hieng(轻kieng、形geang)、生seng”这类助声之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还可以找到其遗存。豫剧《朝阳沟》唱词：“棉花白(那个)白生生，萝卜青(那个)青凌凌凌凌……”“白生生”在豫北方言中还可以说成“白不生生”。或形又有变。例如形容不体面的词“寒碜(尘、伧)〔254，页430〕，形容重量小的词“轻省”〔页924〕等等。“碜(尘、伧)”、“省”等助声之词就是“生”的进一步演变。这样，我们就可在“馨”的“‘古今之变’的谱系图上再标上它们，成为：

鞕→馨→生→碜、省

（形）　（尘、伧）

二、方俗变易

北齐时的颜之推曾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184〕即使是同一事物的同一名称，在不同的地方，语音也会有差异；形诸文字，也会有所不同。例如"火"，可够简单了吧，但在西汉时已有了很大的地域的差异。《方言》卷十："煤，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焜'，火也。"钱绎笺疏："《玉篇》云：'楚人呼火为煤。'《广韵》音'贿'，云：'南人呼火也。'引僖二十五年《左氏传》：'魏侯燬。'李贤注《后汉书》引《韩诗》与《说文》同。今本作'燬'，毛传：'燬，火也。'《释言》同，李巡云：'燬，一名火。'孙炎云：'方言有轻重，故谓火为燬也。'郭氏云：'燬，齐人语。'《诗释文》云：'燬，音毁，齐人谓火为燬。'郭璞又音'货'，字书作'焜'，音'毁'。《说文》同，一音'火尾反'，是'燬'即'焜'之异文，故《方言》'齐曰焜'，《尔雅》郭注作'燬'也。"〔82，页559〕当然，这种差异，也不能排除历史的原因，因为每一种方言都已有悠久的历史了；也可能是当初各地的人们对火燃烧时"呼呼"声响的模拟本来就有差别的缘故。吾乡方言就说："火着得'轰轰'响。"

从语音方面来看，方言既有差别较小者，也有差别较大者。上面所举的"火、煤、焜(燬)"例就是语音差别较小者。在《方言》中还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如卷九："车釭，齐燕海岱之间谓之'锅'，或谓之'锟'；自关而西谓之'釭'，盛膏者乃谓之'锅'。"钱绎笺疏："'釭、锅、锟'皆一声之转。季弟侗曰：'今人通谓以铜铁裹物曰"锅"，俗作"箍"字；又以布帛缘衣曰"锟"，读若"衮"，皆即车釭称"锅、锟"之义也。'"〔82，页526〕又卷十："㘓哰，謰謱，拿也。东齐周晋之鄙曰'㘓哰'。'㘓哰'亦通语也。南楚曰'謰謱'。""㘓哰"lanlau，"謰謱"lian lau，语音差别很小，钱绎笺疏

引《广雅》"嘲哰，谑謱也"条王念孙疏证云："此双声相近者也。"而其字形差别较大。其义为话多，等于今天所说的"罗里罗嗦"。

语音差别较大者，《方言》中的例子更多。卷第十一："蛥蚗，齐谓之'螇螰'，楚谓之'蟪蛄'，或谓之'蛉蛄'；秦谓之'蛥蚗'；自关而东谓之'虭蟧'，或谓之'蝭蟧'……"又："蛄诸谓之'杜格'。蝼螲谓之'蝼蛄'，或谓之'蟓蛉'；南楚谓之杜狗，或谓之'蛞蝼'。"等等。这些联绵式的昆虫名称，其语音不仅韵母不同，声母也有别，但用《果裸转语记》中的音转规律还是能够解释的。

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方言变异现象，就是同一事物的名称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联绵词与单音词的差异。如《方言》卷十三："䈝，……赵魏之郊谓之'笒䈝'。"郭璞注："盛饼筥也。"钱绎笺疏："《众经音义》卷十五云："'筥'又作'䈝'，同。'力与、纪与'二反。……'筥'与'䈝'同。"〔82，页798、799〕对于"䈝"lia与"笒䈝"kialia 的语音关系，传统的解释方法是"合音、析音（缓言、急言）"。我们试用这种方法分析一下：

kia lia笒䈝→k(ia l)ia→kia笒

lia䈝→lia kia䈝笒

"笒䈝"合音的结果是"笒"却不是"䈝"，"䈝"析音的结果是lia kia而不是kia lia（笒䈝），"䈝"与"笒䈝"无论是合音还是析音，结果并不相符。遇到这种尴尬的问题，除了复辅音的理论以外，我们目前还没有更为完满的解释方法。请看，与"䈝"相当的字是"筥"，"力与"、"纪与"二切，k－、l－两读："筥"今音读k－而其声符却是l－"吕"，这就说明，"筥、䈝"（还有"笒"）的早期语音形式应是 *kl－。这样，它们之间的语音演变关系就迎刃而解了：

*klia→kia lia(笒䈝) ↗kia(䈝、筥) ↘lia(䈝)

这种由于复辅音声母在不同的方言地域而有不同演变结果的现象，邢公畹先生注意到了。他指出："一个带复辅音声母的原始语词派生到不同的方言里，有的以第一辅音为声母，有的以第二辅音为声母。"〔185，页255〕这一重要规律的发现，为我们解释许多方言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

《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说文·聿部》："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历来的解释是：急读为"笔"，缓读为"不律"。但还有一个"聿"呢？就无法解释了。今按，俞敏先生认为"不律"与藏语bris同源〔186，页90；187，页45〕，则"笔"的原始声母当为＊pl/r－，后来这一复辅音声母逐渐分离，第一声母带上元音，即成为 piwə liwət， 写出汉字就是"不律"。这一说法，直到东汉许慎时还保留在南方的吴方言中；而远在北方的燕方言中，失l留p，即为"弗"；处于中间地带的楚方言，则失p留r，即为"聿"。"聿"为"律"之声符，r即相当于l，"在晋南临猗、万荣一带方言读'律'为'聿'音"〔205，页45〕。其演变过程是：

＊pliwət→piwə liwət不律 ↗piwət弗、piət笔 ↘l/riwət聿

类似的例子还有《尔雅·释草》："蒹，薕。"邢昺疏："蒹一名'薕'。郭云：'似萑而细，高数尺。江东呼为薕、荻。'《诗·秦风》云：'蒹葭苍苍。'陆机云：'蒹，水草也，坚实，牛食令牛肥强。青徐人谓之'蒹'，兖州、辽东通语也。"今按："薕"从"廉"得声，而"廉"又从"兼"得声，这就给我们透出一点信息："蒹、薕"原本一音，为＊kliam，后来逐渐分化为kiamliam，再后来在南方的江东方言中失k留l，即为"薕"liam；而在北方的青徐、兖州、辽东方言中失l留k，即为"蒹"kiam〔76，页107〕；"荻" 可能是＊kl－>d－的演变结果。由此看来，"蒹、薕、荻"这一同物异名现象

本是同一名称的语音分道扬镳的结果，是历史音变在地域方言中的折射。

三、构 词 变 易

词的构成变化，是词法中比较常用的手段。构词的变化，总要引起词的形态变化。

古汉语词的构词变化，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

（一） 缓急变易

缓急就是前人所说的“缓读、急读”，“徐言、疾言”，“析音、合音”。“盖言有疾徐，气有缓急。何休注《公羊》已有‘长言、短言’之别，长言则一字可申为二字，短言则二字缩为一音。郑樵所谓‘慢声为二、急言为一’是也。”〔188，页13〕

先看“缓言”例：

《诗·王风·中谷有蓷》：“中谷有蓷，暵其干矣。”《尔雅·释草》：“萑，蓷。”郭璞注：“今茺蔚也。”“蓷”已见于《诗经》时代，“茺蔚”见于晋代。二者的语音关系是：

t‘uəi(蓷)→t‘iung iwəi(茺蔚)

为了显示出时间距离，“蓷”标的是上古音韵母，“茺蔚”标的是中古音韵母。我们可以看出，将“蓷”的韵母拉长，即可得出“茺蔚”两个音节来。“蔚”为“影”母，而“影”母又是零声母。

《汉书·地理志》：“丹杨郡，故鄣郡，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杨’。”从中可以看出，“丹杨”一名晚于“鄣”。“杨”为“喻”母三等字，汉代可能已经变成了零声母。“鄣”与“丹阳”的语音演变关系是：

tiang(鄣)→tan jiang(丹杨)

将"鄣"的韵母拉长，即成为"丹杨"两个音节。

再看"急言"例：

《广雅·释言》："诸、旃，之也。"王念孙疏证："皆一声之转也。'诸'者，'之於'之合声，故'诸'训为'之'，又训为'於'；'旃'者，'之焉'之合声，故'旃'训为'之'，又训为'焉'。《<唐风·采苓>笺》云：'旃'之言'焉'也。"〔138，页139〕"於、焉"均为"影"母字，即零声母字。它们的语音演变关系是：

tiəia(之於)→tia(诸)

tiə ian(之焉)→tian(旃)

《义府续貂》"细腰、小腰"条："固棺之具谓之'细腰'，或曰'小要'，急读则成'箫'，即今插箫、箫钉之'箫'也。"〔92，页2〕其语音演变关系为：

siei iau（细腰）↘
　　　　　　　　→siəu(箫)
siau iau（小腰）↗

因为"於"、"焉"、"腰"都是"影"母即零声母字，当它们和前面的字快读的时候，很容易合成一个音节。

（二） 羸缩变易

"羸缩"就是"一个字(词)加上一个与之为双声或迭韵的字为头或尾而变成双音词，拿去头尾，依然成词。"〔171，页93〕这就是现代语法学上常说的"附加法"，即在词根上加词缀的方法。

先看加词头(前缀)的例子：

"吴"为国名，在"吴"前面可以加上词头"攻、工、句"等，即成为"攻吴"、"工吴"、"勾吴"等形式。《左传·宣公八年》："盟吴越而还。"孔颖达正义："大伯仲雍让其弟季历而去之荆蛮，自号

'句吴'。'句'或为'工'，夷言发声也。"《汉书·地理志下》："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颜师古注："'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所谓"发声"，实际上就是所加的词头。至于"工(攻)"与"句"的不同，冯蒸君指出："由于连音变读而引起的古人对汉语音节切分上的差别，笔之于书则为'攻吴'与'句吴'之异。"[189，页106]

加词尾(后缀)的情况在古汉语中比较常见。常用的表示状态的词尾有"然"、"如"、"若"等。我们只看一个例子：

"喟"，《说文·口部》："大息也。"《楚辞·离骚》："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王逸注："喟，叹也。"又刘向《九叹·愍命》："行唫累欷，声喟喟兮。"是"喟"之音义来源于叹息之声[190，页5]。动词"喟"又可以加上词尾"然"、"尔"、"焉"等。《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何晏注："喟然，叹声也。"又《先进》："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词尾均为"然"。《史记·仲尼弟子传》作"孔子喟尔叹曰：……"词尾变作"尔"。《吕氏春秋·慎势》："简公喟焉太息曰：……"词尾又作"焉"。这种变易的结果，是改变了词性，"喟"本为动词，在句中作谓语；加词尾后则变成副词，在句中只能充当状语了。

还有在词根上既可加词头又能加词尾的情况。请看下面的例子：

《荀子·王制》："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杨倞注："须，须臾也。"又《劝学》："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须"与"须臾"并用。"臾"为词尾，字后来又作"摇"。《汉书·礼乐志·〈郊祀歌·惟泰元〉》："盛牲实俎进闻膏，神奄留，临须摇。"颜师古注引晋灼曰："须摇，须臾也。"《骈雅·释训下》："须摇，俄顷也。"这是加词尾。《礼记·中庸》："道也者，

不可须臾离也。"又《乐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须臾"和"斯须"并用，"斯"为词头。《孟子·告子上》："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文选·李少卿<与苏武诗>》之一："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这是加词头。"斯须"就是片刻、少时之义，"则'须"就是一会儿。前头加上双声的'斯"变成'斯须'，或后头加上叠韵的'臾'变成'须臾'，意义都一样。"[171，页94]

现代话里还有一种在联绵词中插进一个语词的现象，如："今俗谓办事粗疏不细心，颟顸糊涂的人为'马大哈"。马大哈即'马哈'，是'马虎'的一声之转。'大'字语词，不为义。"[191，页91]就是一种有趣的增音成词现象。此外，像"白不生生"、"黑不溜秋"的"不"，也是一种只起衬音作用而没有实际意义的语词。

（三） 重叠变易

古代汉语中，为了增强语言效果，常常重复同一音节，如"皎"可以重叠为"皎皎"等。这种重叠，语音和字形都相同，因而传统称为"重言"。还有一种双声形式而韵有不同，字形也有别的"联绵词"，似乎也是一种重叠的变异。

《尔雅·释虫》："蜩，……螗蜩。"郭璞注："《夏小正传》曰：'螗蜩者，……俗呼为胡蝉。江南谓之螗蛦。'""蜩"的声式为d-，"螗蜩"、"螗蛦"的声式都是d－d－，"螗蜩" dangdiəu、"螗蛦" dangdie极有可能是"蜩"的重叠形式，只是韵母发生了变化而已。为了准确起见，姑称之为"叠声式"，即声母重叠的形式。

如果将这种叠声式的变异现象放进语音分化演变的系统中来考察，我们对这种变异现象的认识就会更加明确。

《尔雅·释草》："钩，藈姑。"郭璞注："钩瓠也。一名'王瓜'，实如瓟瓜，正赤，味苦。"郝懿行义疏："《广雅》云：'藈菇，瓠瓠，

王瓜也。'《释文》：'䕮菇，本作 䕮 姑。'……'钩'、'䕮'、'姑'俱声相转。古读'瓜'如'姑'，是'姑'即'瓜'也。'钩瓠'亦叠韵字。”[74，页1020、1021]今按：“瓠瓠”当得名于“瓜蓏”，其声式为k－l－，其后因语音分化而失l留k，即为瓠“(钩)”ko，重叠则为“䕮姑”kiweika，声同而韵变。其语音演变的全过程是：

＊klo－→ko　lo瓠瓠　→ko瓠(钩)→kiweika䕮姑

“瓠(钩)”与“瓠瓠”、“䕮姑”的关系，过去解者均以合音、析音解之，但同为合音、析音，为什么其结果却一为k－l－、一为 k－k－？这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以上的各种变易现象，主要属于词的语音形式的范围。下面讨论一下词的书写形式的变易现象。

四、书 写 变 易

书写的变易，是指文字形体即字形的变易。

文字形体的不同，可以追溯到造字之初。“甲骨文是中国原始的古文字，造字之初，人非一人，各绘各的形，各会各的意，因而普遍产生了一字多形的现象。”[93，页215] 而且，“文字的形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字由于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一笔一画，全凭记忆，全凭师弟传授，因此写出的形状就各不相同。”[192，页2]“战国时期是汉字形体发展史上空 前 混乱的一个阶段。从以往出土和传世的古文字资料看，这一时期 '文字异形' 的现象相当严重，商周以来传统古文字固有的各 种 字形变化现象多半都被沿袭下来并有不少新的发展，另外文字的地域性特点也因春秋以来长期的列国分立而渐趋形成。”[193，页9]战国以后，异体字、假借字、累增字、俗文字、讹误字等也屡见不鲜。这些都是词的书写形式的变易。王力《同源字论》中的第三个部分

“从词义方面分析同源字”，其中列举的有些情况实际上就属于这类变易现象：

(一) 实同一词。

1.《说文》分为两个以上的字，实同一词。例如：

佼：姣

2.《说文》已收的字和未收的字实同一词。例如：

荼：茶

……

(二) 同义词。

完全同义。

熙：熹　姣：娇[176，页20－23]

今按：王力这里所说的“实同一词”和“同义词”，实际上本来就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即书写的变异。

有些词的书写形式的变异，纷繁复杂，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例如，“逶迤，一作‘委蛇’、‘蜲蛇、逶蛇、委佗、遗蛇、委它、倭迟、倭夷、威夷、威迟、郁夷、祎隋、逶迆、袆它、倭他、委移、归邪、陭琦、委陀、逶徙、委维、委徙、靡匜、逶迤、委也、蚴蜷、蝛虵、踒跐、逶迱、委迆，各异其连呼，声义则一也。”[194，页167]其实可能还不止这些，符定一就说：“‘委蛇’八十三形，音同而义相近。”[195，页26]足见其书写形式之变化多端了。

同一个词的不同书写形式，有时能够透露出一点有关语源的信息，成为我们探求该词语源的一个线索。请看下面的一个例子：

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三十一章中，甲本作“战胜”，乙本作

"单胜"。徐中舒先生说："'单'，即'战'字，甲文作[illegible]、[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这是在叉上缚以石斧等利器，作为战斗武器。这个字在战国晚期变为'戰'，'戈'字是后加的。"[192，页4]程德祺同志根据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指出："战"字所从之"单"，应是石块或加工而成的石球。"单"字本作[illegible]，∞象石球，∨象缚连双石的绳索，"单"的确原是一种狩猎武器，是原始民族使用的飞石索。飞石索是系有绳索的石球，狩猎时旋甩绳索，将石球抛飞出去，以击中或缠住野兽。"单"为"弹"之本字；"战"之从"单"，就因为"单"也是一种重要的战斗武器[196，页243—250]。"战"的语源，就因为异文"单"字字形而使人们找到了索解的线索。当然，这与"单"是"战"的声符也不无关系。

词的书写形式的变易也常常会给后人的理解带来一些麻烦，甚至造成种种误解，非经过一番艰苦的考证，即不能正确理解古书的原意。钱剑夫先生对于《诗》"中田有庐"的"庐"字的考证，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复杂程度：

《诗·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郑玄笺："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于畔上种瓜，瓜成又入其税天子；剥削淹渍以为菹，贵四时之异物。"本之于《韩诗》，训"庐"为庐舍之"庐"。郭沫若考证"庐"为"芦"字的假借，《说文》云："芦，芦菔也"，便是如今的萝卜。"庐"、"卢"两字，古书每多通用，则"中田有庐"即"中田有卢"，亦即此"庐"字乃与"卢"通，自属毫无问题。问题只在："卢"于此处究是何物。考司马相如《子虚赋》："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蘠雕胡，莲藕觚卢。"张晏注："觚卢，庵鲁也。"郭璞注："菰，蒋也；芦，苇也。"颜师古注："书不为'菰芦'字，郭说非也。但不知'觚芦'是何草耳。"王先谦补注："张注'觚卢'，官本作'觚芦'，颜注'觚芦'当作'觚卢'，官本不误。上文'葭'及'芦'，此不得复

出，郛说非也。'瓠卢'即'瓠觚'。'瓠卢'、'瓠瓠'、'扈鲁'并一声之转。《尔雅》'瓠栖瓣'，《释文》：'舍人本"瓠"又作"觚"。'此'觚'、'瓠'通假之证。"案："觚庐"当从张晏说，王辨甚确。惟"觚卢"又为何物，则仍未甚明晓。考《诗·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毛传："壶，瓠也。"郑玄亦谓"瓜瓠之属。"《尔雅·释草》："瓠栖瓣。"郝懿行义疏："瓠曰'瓠瓠'，或作'壶卢'，亦作'瓠瓠'"，说尤明白。则《子虚赋》所言之"觚卢"，实即"壶卢"，亦即今言"葫芦"，自无疑义。而"瓠瓠"当又为正字。《汉书》、《文选》作"觚卢"，《史记》作"菰卢"，则此自为假借字。"瓠瓠"之"瓠"可作"匏"、作"瓢"、作"觚"、作"菰"、作"菰"、作"壶"、作"扈"，俗又作"胡"、作"葫"；故"瓠瓠"之"瓠"亦可作"瓠"、作"卢"、作"鲁"，俗又作"芦"。皆所谓声转，或为假借。〔197，页462、463〕

经过这样一番细针密缕的考证，因书写变易而造成的一桩云遮雾障、扑朔迷离的千古疑案，终于真相大白了。

同族词的各种变易形式，虽然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在系联同族词、组合词族时，应该全盘考虑，统筹兼顾，穷其变化，观其会通，将同一个词的古今、方俗、构词、书写等变易的各种形式尽可能网罗。如果只单纯系联、组合其中的一种形式，如单音词形式，那就有失偏颇了。

第四节　词族的形成

由一个语根发端的同族词，不断地孳乳、再孳乳，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词群；这些词群，意义有所引申生发，语音互相对应关

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词族。这就好像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家族，由父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尽也”〔198〕；虽子孙众多，亲疏有别，但辈分有序，支派分明。所以戴侗说：“声之相通也，犹祖宗众姓之相生也，其形不必同，其气类一也。虽有不同焉者，其寡已矣。”〔129〕但是，由于年代久远，缺少标记，以致于有的天各一方，互不相识，这就要靠家谱来确认其亲戚关系了。语源、词族的研究，也就像修家谱一样，要把一个词族中的那些失散多年、散居各处的家族成员——同族词贯串系联起来，并理清它们的血缘关系，分清它们的辈份，再层层上溯找出它们最初的老祖宗——语根，这也就等于修撰出一份“词族谱”来。

可惜的是，这种完整的词族谱，由于具体研究工作的困难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至今仍是一种理想。《果裸转语记》虽然差强人意，却又散失了大半，今所存之“稿本或为其四篇中之一篇”〔199，页3〕，已非全璧，人们无从得见其全貌，实为憾事(这将在另书《汉语语源学史》中详加说明)。因此，迄今为止，我们还难以找出一份现成的较为完整的词族谱来。好在前人和时贤已对“果裸”词族中的部分词群先后有所系联，并探明了一些意义层次之间引申生发的关系，现在需要以这些比较明显的意义层次之间的联系为线索，将虽散见于各处但属于同一词族的各个词群进行统一的组合排列，使“果裸”词族显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用以揭示词族的形成过程。笔者即不揣浅陋，作一下这方面的尝试。为简明流畅起见，对采用的原文略作一些必要的删省调整。语音方面，则限制在前所论证的《果裸转语记》的音转范围之内；但因限于体例和篇幅，不再另外进行论证，故原有的“一声之转”等说法一仍其旧。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将“果裸”词族的语根构拟为＊k

1-，这一词族即可称为“＊k1-词族”，为了通俗起见，也可以称作“‘骨碌’词族”。

“骨碌”词族简谱

一、圆形义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

骨碌——滚转曰“骨碌”，因而圆形之物都缘此孳乳。语根似乎原于模仿圆转物的声音，因而以为圆状物之名及形容之词。

果裸——瓜瓠曰“果蓏”。栝楼曰“果裸”。细腰蜂名“蜾蠃”、又名“蒲卢”。蚌蛤之属亦名“蒲卢”，紫螺曰“茈螺”，蜗牛曰“蜗蠃”；而“蜣螂”、螳螂”等名也都取圆形之意。木实曰“果”，包袱曰“裹”，头曰“颗颅”、“顼颅”、“髑髅”。“葫芦”亦瓜蓏之类，瓜曰“瓠”，茶具曰“壶”，火具曰“炉”，苇曰“芦”，瓢曰“蠡”，鞋曰“履”，杯落又名“豆筥”。

科斗——科斗亦作“蝌蚪”，《本草》说“蝌蚪状如河豚，头圆，青黑色，始出有尾无足。”盖“科斗”之得名因其头圆故也。今科斗音转为“骨突”，所以京中呼为“虾蟆骨突儿”。

活东——亦“科斗”之转音。字或作“颗东”等。“颗”字有圆意，圆物每以“颗”计。活东亦为“活师”(《山海经》)，“师”音盖读如“堆”，活师犹“骨堆”、“骨垛”、“骨突”也。

骨突——“科斗”之转音。《诗》云“彻彼桑土”，“土”一作“杜”，《方言》：“荄杜，根也。”今谓树根曰“树骨突”。楚人谓乳曰“谷”，今曰“奶头骨突儿”。此外凡圆形之物如蒜头，花苞……等无一不可叫“骨突儿”。骨突亦作“骨都”，都有聚集团止之意。

骨朵——即“骨突”之异写。兵器之于棍棒端以铁或坚木为首

如锤者曰“骨朵锤”，《宋史·仪卫志》云：“执骨朵充禁卫。”宋祁《笔记》说：“国朝骨朵子，值卫士之亲近者。余尝修日历，曾究其义，关中人以腹大者为‘胍肚’（音‘孤都’），俗因谓杖头大者亦为‘胍肚’，后误为‘骨朵’（平声）。”花曰“朵”。骨朵亦名“锤”，字亦作“槌”，作“椎”。《方言》：“椎，齐谓之‘终葵’。”

疙瘩——亦“科斗”之音转，字从“疒”旁，如“酒刺疙瘩”、“鸡皮疙瘩”之类，然圆形之物亦称之，如“咸菜疙瘩”、“疙瘩汤”等。石土顽结则写作“圪塔”等。语转为“疙疸”，清人顶戴俗曰“琉璃疙疸”，屎蜣螂推车俗呼为“滚疙疸”，“疸”亦作“蛋”，与“卵、团、胆”等音义都相近。“卵”音转为“瘤”，《释名》：“疣，丘也。”“疣、丘、球”亦圆状物之名。山西有种面食似北京之活络而粗短，俗名“疙豆”，豆、痘、头、首，也都是圆状物，疑“疙豆”即“科斗”音之仅存者。

蓓蕾——花苞含葩未放之名也，亦取圆形之意。瓶形椭圆，故亦名“瓿瓿”。〔145，页31、32〕

二、块 状 义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

块垒——“骨堆”音转为“块垒”，堆积曰“垒”，垒亦曰“赘”。土聚曰“块”，石貌曰“磈磊”，积石曰“磊磊、累累”，病肿曰“瘰疬”，胸中不平曰“磈磊”，阮籍云：“胸中隗磊，须以酒浇之”。晋冀之交食物中有以菜块拦面蒸之者曰“块垒”，因其为块状也。木偶像人而圆小，故曰“傀儡”，或名“窟礧子”。〔145，页32〕

程瑶田《果裸转语记》：

虀碎杂苲之谓之“骨董羹”。山西人以米粉杂面入水和之，散碎成块（中杂以菜及油）蒸食之，谓之“谷垒”。吾徽谚语，切鱼

肉成厚块，不巤叶切者谓之‘谷仑块’，余谓即“阙囵”也。自有“毂辘”之名，凡块然者皆得谓之矣。东方朔曰：“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窭数。”杨恽曰：“鼠不容穴，衔窭数也。”余读庄周书：“卷娄者，舜也。蚁慕羊肉，羊肉膻也。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所谓‘卷娄’者也。”余谓东方生所谓寄生之在盆下者，彼注言“有饮食气”，此言“有膻行”，义足互明。“窭数”、“卷娄”，盖声语之转。以《汉书》证庄周书，而“卷娄”之义可定矣。然则“窭数”、“卷娄”，盖块然物，语亦“佝偻”之转。〔1，页3-13〕

三、屈 短 义

圆形、块状之物，其体必短。故引申出“屈短”义。

《方言》卷十三：“黜，短也。”郭璞注：“蹶黜，短小貌。”钱绎笺疏：

《广雅》：“黜，短也。”曹宪“竹律”、“征劣”二音，《玉篇》：“叕，知劣切；黜，同上。”云：“吴人呼短物也。”又：“炪，短也。”《广韵·六术》：“黜，吴人呼短。侧律切。”又：“炪，短貌。”《庄子·秋水篇》：“遥而不闷，掇而不跂。”郭象注：“掇，犹短也。”《淮南·人间训》：“圣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叕。”高诱注：“叕，短也。”《说文》：“窭，短面也。”《众经音义》卷四、卷二十二并引《声类》云：“惙，短气貌。”《广韵》：“顡，头短也。”并字异而义同。王氏怀祖云：“‘黜’与‘侏儒’语之转也。故短谓之‘侏儒’，又谓之‘黜’；梁上短柱谓之‘棳’，又谓之‘黜’，又谓之‘侏儒’，又谓之‘棳儒’。蜘蛛谓之‘蝃’，又谓之‘蝃蝥’，又谓之‘棳儒’。《尔雅》。‘梁上楹谓之‘棁’。’《释文》：‘棳本又作棁。’《杂记》：‘山节藻棁。’郑注：‘棁，侏儒柱也。’《释名》云：‘棳儒，梁上短柱也。’‘棳儒’犹‘侏儒’，短，故以名之也。《方言》：‘蜘蛛，蝃蝥

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蛛蝥；自关而东、赵魏之郊谓之'蜘蛛'，或谓之'蠋蝓'。'蠋蝓'者，侏儒语之转也。注云：'今江东呼蝃蝥，音棳。'《玉篇》云：'蝃，蜘蛛也。'盖凡物形之短者，其命名相似，故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也。"注云"蹶黜，短小貌"者，"蹶"亦短也。《汉书·王莽传》："莽为人侈口蹷頞。"颜师古注："蹷，短也。""蹷"与"蹶"同。《列子·黄帝篇》："吾处身也，若厥株驹。"张湛引崔譔《庄子注》云："厥柱驹，断树也。"《尔雅》："橛谓之杙。"《注》云："橛也。"又，"橛谓之闑。"《注》云："门阃也。"《玉藻正义》云："闑谓门之中央所竖短木也。"《说文》："蟨，鼠也。一曰，西方有兽，前足短，与蛩蛩巨虚比其名谓之'蟨'。"《淮南·道应训》："北方有兽，其名曰'蹶'，鼠前而兔后，趋则顿，走则颠。"高诱注云："鼠前足短，后足长，故谓之'蹶'。"又《尔雅》："鵽，鸠。"《注》云："鵽大如鸽，似雌雉，鼠脚，无后指，俗名'突厥雉'。"又："鸟、鼠同穴，其鸟鵌，其鼠为鼵。"《注》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义并与"蹶"同。又《说文》："屈，无尾也。"《玉篇》："屈，短尾也。"高诱注《淮南·原道训》云："'屈'读'秋鸡无尾，屈'之'屈'。"《众经音义》卷十二引《广雅》："屈，短也。"《史记·天官书》："白虹屈短。"《集解》引韦曜《汉书注》云："短而直也。"《韩非子·说林篇》云："鸟有舟舟者，重首而屈尾。"《尔雅》……又云："䖔，无前足。"前卷四云："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无缘之衣谓之'统裾'。"《广韵》："统裾，短衣也。"《说文》："崛　山短高也。"《集韵》引《埤苍》云："屈，短尾犬也。"义并与"黜"同。合言之则曰"蹶黜"。《广韵·十七薛》云："倔黜，短貌。""倔"与"蹶"声相近。转言之则曰"孑孑"(按："孑孑"应作'孑孒'，下同)〔82，页773—774〕。

《广雅·释诂下》："孑孒，短也。"王念孙疏证：

"孑孒"者，《说文》："孑，无右臂也。孒，无左臂也。"皆短

之义也。短与小同意，故井中小虫亦谓之“孑孓”。《释虫》篇云，“孑孓，蜎也。”《尔雅》：“蜎，蠉。”《注》云：“井中小蛣蟩，赤虫，一名‘孑孓’。“孑孓”与“蛣蟩”，声义并同。“孑”之言孑然小也。《释名》云：“盾狭而短者曰‘孑盾’。孑，小称也。”“孓”之言“蹶”也。……“蹶”与“黜”声相近，合之则为“蹶黜”，转之则为“孑孓”，故短貌谓之“蹶黜”。兽前足短谓之“蹶”，头短谓之“顈”，无左右谓之“孑孓”，其义并相通也。〔138，页69〕

四、圜全义

由具体的圆形、块状等短粗立体物概括为抽象的圜全义。《说文·口部》：“圆，圜全也。”

蔡凤圻《混沌》：

圆，古字作“圜”。《说文》：“圜，天体也，全也，周也。”又为“团圞”，或省作“团”，亦作“专”。《说文》：“团圞，圆也。”《周礼·地官·大司徒》：“其民专而长。”注：“专，圆也，徒丸反。”又为“颛颛”，音似“团团”。贾捐之《弃珠崖议》：“颛颛独居一海之中。”注：“圆貌。”又为“鲲”。《尔雅》：“鲲，鱼子。”鱼子形圆。又为“卵”，音略似“圞”，古作“圆”。《山海经》：“丹山之阴，有凤之圆。”《纬略》：“圆，古‘卵’字。”又为“丸”，音似“完”。《正韵》：“弹丸也。凡物圆转者，皆曰‘丸’。”

又为“完”。《说文》：“完，全也。”《论语》：“苟完矣。”又为“元”，“完”从“元”声，“完、元”古音似。又为“全”，“完”之为“全”，犹“还”之亦读“旋”也。《说文》：“全，完也。”《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之事，天子用全。”又为“麲”，音同“魂”。《广韵》：“麲，不破麦也。”又为“鹘沦”，完也。今字作“囫囵”。朱鼎

《文集》："非如今人，鹘沦侊侗，无分别也。"[200，页40—45]

五、浑沌义

圜全之物，浑然一体，不分不破，形状之浑沌者也。于是，又由圜全义引申为更抽象的浑沌、混同义。

蔡凤圻《混沌》：

《广韵》："混沌，阴阳未分。"《鹖冠子·泰鸿》："两仪未分，其气混沌。"又："无钩无绳，混沌不分。"又《世兵》："混沌错份。"《淮南子·要略》"混沌万物。"《文选·曹植<七启>》："太极之初，混沌未分。"混沌，未分晓之谓，字亦作"浑沌"。《太玄经·驯首》："阴气大顺，浑沌无端，莫见其根。"变为"浑沦"。《列子·天瑞》："气形质而未离，故曰浑沦。"字又作"混成"，"成"从"丁"声，从"丁"得声之字有"亭"，与"沌"双声，故"成、沌"古音近似。老子《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亦作"棍成"，"混"之变为"棍"，犹"混"为"昆"也。杨雄《甘泉赋》："纷蒙笼以棍成。"又为"虹洞"，《后汉书·马融传》："虹洞天地，闭无端涯。"《文选·枚乘<七发>》："虹洞兮苍天。"字亦作"鸿洞"、"鸿同"、"洪同"。《淮南子·精神》："鸿濛鸿洞。"又《天文》："天地鸿洞。"又《原道》："靡滥震荡，与天地鸿洞。"《太平御览》引作"鸿同"。《文子·道原》："水为道也，无私无心，与天地洪同。"又为"和同"，"和、鸿"双声。按，和同一致，亦不分之意。《礼·月令》："天地合同。"《汉书·吾丘寿王传》："六合和同。"又为"混同"，亦为"混通"。《汉书·地理志》："此混同天下，壹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后汉书·后纪论》："贤愚优劣，混同一贯。"《晋书·陶璜传》："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韩非子·亡征》："外内混同。"又为"会同"，"会、混"双声。亦为"含同"。《书·禹贡》："四海

会同。"《盐铁论·险固》："王者，博爱远施，外内合同。"[200，页39、40]

六、糊 涂 义

混沌未分晓之义，再次经过抽象引申，即为人心糊涂不明之义。

蔡凤圻《混沌》：

心不明为"惛"，"惛"亦"混沌"之合音，亦重言之。《正韵》："惛，心不明也。"《管子·四时》："五漫混，六惛惛。"又为"混混"。《太玄经·玄莹》："散天下之混混者。"又为"惑惑"，字亦作"或或"。《汉书·贾谊传》："众人惑惑，好恶积亿。"《史记》作"或或"。又为"童昏"。"混同"之颠倒。字变作"僮昏"、"僮惛"、"重昏"。其后为"冬烘"，盖即"童昏"之转音也。《周礼·秋官·司刺》："三赦曰蠢愚。"郑注："生而痴騃童昏者。"《国语·晋语》："僮昏不可使谋。"《广雅·释诂》："僮惛，痴也。"《楚辞·九章·涉江》："固将重昏而终身。"又为"糊涂"，即浑沌也，韵转。读入声为"鹘突"。《宋史·吕端传》："太宗欲相端，或曰：'端为人糊涂。'"唐孟郊诗："何处鹘突梦，归思寄仰眠。"

未分晓之意，于人则为心不了，故不才子亦曰"浑沌"。《史记·五帝记》："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按今语所谓"混蛋"，即此"浑沌"也。字亦作"浑敦"、"倱伅"。《左传·文公十八年》："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谓之'浑敦'。"《广韵》："倱伅，四凶之一，《春秋》作'混沌'。"又为"驩兜"，"浑沌"之变音也。《史记·五帝纪正义》："浑沌，即驩兜也。"又"昆仑"之合音为"鲧"，鲧亦浑沌之义。《书·尧典》："于鲧哉。"《释文》："禹父也。"[200，页41、42]

七、旋 转 义

《淮南子·原道》："员者常转。""员"即"圆"字。物体之浑圆圜全、囫囵浑沌者，极易转动，故引申为旋转义。

《方言》卷十二："逭遭，转也。"郭璞音义："'逭'音'换'，亦音'管'；'遭'，阳六反。"钱绎笺疏：

《广雅》："逭遭，转也。"《玉篇》、《广韵》并同。《楚辞·天问》云："斡维焉系？"王逸注："斡，转也。""斡"一作"筦"。《汉书·贾谊传》云："斡弃周鼎。"如淳注："斡，转也。"《匡谬正俗》云："斡，《声类》及《字林》并音'管'。"《淮南·时则训》云："员而不垸。"高诱注："垸，转也。""逭、斡、垸"声义并同。[82，页657]

八、运 行 义

物体由于自身的旋转而运动、行走。由此，旋转义又引申为运行义。

《方言》卷十二："逭遭，转也；逭遭，步也。"郭璞注："转相训耳。"钱绎笺疏："《广雅》：'步、转、逭遭，行也。'《玉篇》：'逭，步也。……遭，行也。'《广韵》：'逭，步也。遭，步也。'《说文》：'逭，逃也。'……《缁衣篇》引《太甲》：'自不可以逭。'郑注：'逭，逃也。'义亦相近也。"[82，页657]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

毂轮——车轮曰"毂轮"，车名"辘毂"，即"骨碌"之倒，犹言"滚戾辘轹"也。车的异名虽多，然总不离乎"骨碌"之音。车又名"辇"，碓磨曰"碾"，压路车曰"辗"，追人曰"赶"，"辇、赶"并"毂"音之转。汲水桔槔曰"辘轳"；兵器缁车曰"轳辘"。石滚用以

平田或压禾者曰"磟碡"、"碌碡"，俗音如"流周"、"滚扭"。玩具圆转不息者曰"陀螺"，又名"地雷公"。因而劳转忙碌谓之"碌碌"，凡庸谓之"录录"，他如"滚离"、"离离"、"历历"、"累累"、"屡屡"、"罗缕"、"淋漓"、"淋漉"、"滴沥"……等都是圆转不绝之意。[145，页32、33]

九、回 还 义

《玉篇·口部》："圆，周也。"言圆可循环至原处也。《方言笺疏》："旋转与周匝同义"[82，页768]，因而由物体的旋转运行义，引申为回还义。

蔡凤圻《混沌》：

"规"，音由"昆"变。《玉篇》："规，正圆之器也。"引申为动词，为"还"，《礼·玉藻》："周还中规，折还中矩。"又为"归"，音如"规"。《广韵》："归，还也。"又为"回"，音由"还"、"归"变，徐锴曰："浑天之气，天地相承，天周地外，阴阳五行回转其中也。"[200，页45—46]

蒋云从先生《义府续貂》：

古乐府《东门行》本辞："出东门，不顾归。""顾"一作"愿"。案："顾归"是也。晋乐所奏一篇亦作"顾归"。《古诗十九首》："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顾归"、"顾返"皆两字为一词，其义则同为还返。《吕氏春秋·观表篇》："顾返，过而弗辞。"《战国策·赵策三》："顾反，至坐前。"梁刘遵《度关山》云："行人思顾返，道别且徘徊。"斯其确证。盖"顾"字亦有返义。《穆天子传》卷三，天子答西王母之谣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郭璞注："顾，还也。"陶潜《咏荆轲》诗："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犹言"何时还"也。又王粲《七哀》云：

“行者不顾反，出门与家辞。”曹植《吁嗟篇》：“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故归”即“顾归”，言转蓬沉渊，而惊飙接之，冀得复归中田也。《公羊传·桓公十一年》：“而忽可故反。”“故反”即“顾返”，犹“故归”即“顾归”也。敦煌《云谣集杂曲子·凤归云》词：“待公卿回故日。”“故”借为“顾”也。[92，页2、3]

十、范　围　义

《广韵·上平·删韵》：“圜，圜围。”由圆转回环义又引申为范围义，言其边周还也。

蔡凤圻《混沌》：

“围”，音由“回”变。《春秋提要注》：“环其城邑曰围。”《易·系传》：“范围天地而不过。”

引申为设篱以为范围，为“藩”，亦为“樊”，音似“反”。《易·大壮》：“羝羊触藩。”《尔雅·释言》：“樊，藩也。”又为“篱”。《正韵》：“藩，篱也。”又为“槛”，音略似“还”。《说文》：“槛，栊也。”又为“栊”。《说文》：“栊，槛也。”《广韵》：“养兽所。”

又引申为凡筑物为范围以种植草木，养畜禽兽，储藏物品，居住人民之所，为“闲”，音亦由“还”来。《说文》：“闲，阑也。”又为“阑”，音似“圈”。《广韵》：“阑，牢也。”又为“牢”，音由“阑”转。《说文》：“牢，闲，养牛马圈也。”又为“圈”，音似“卷”。《玉篇》：“圈，牢也。”又为“园”，音似“圆”。《说文》：“园，所以树果也。”《初学记》：“有藩曰园。”又为“苑”，音似“园”。《说文》：“苑，所以养禽兽也。”又为“囿”，音由“苑”变。《说文》：“囿”，苑有垣也。”又为“国”，古文口，与围之古文同。《说文》：“国，邦也。”言范围之内所以居人也。又为“圂”，音似“混”。《说文》：“象豕在口中也。”又为“囤”，音如“沌”。《玉篇》：“囤，小廪也。”又为“廪”，音略似“轮”。《玉篇》：“廪，

仓廪也。”又为“圌”，音略似“缠”。《说文》：“判竹圆以盛谷也。”[200，页47、48]

十一、拘律义

在一定的范围内加以限制，即由范围义引申为拘束、规律义。《说文解字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

牛马圈则曰“厩牢”，或曰“栏牢(《墨子》)；囚所则曰“牢狱”，语转为“囹圄”(《月令》)，字亦作“囹圉”(《史记》)，又转作“岸狱”(《诗》)。遮栏曰“干阑”(《北史》)，“钩栏”(《水经注》)，“勾栏”(《广韵》)，俗谓院落篱藩曰“格栏”，宋元俗语谓教坊曰“勾阑”。以言动作，则曰“拘留”(《汉书》)，“稽留”(《淮南》)，“拘挛”(《后汉书》)。

方圆准绳曰“规矩”。以言动作则为“执拘”、“挛拘”，语转作“鸠聚”、“遒聚”。语转为“规律”(《方言》)，又转为“规率”。[145，页29]

十二、卷束义

《集韵·先韵》：“圜，绕也。”《广雅疏证·释诂三上》：“围与束同义。”[138，页86]卷束缠绕也是圆转回还的一种形式，故由回转义引申为卷束、缠绕义。

蔡凤圻《混沌》：

由回转之义引申者，为“卷”，“转、卷”叠韵，声同“昆”。又为“拳”，音如“卷”。《玉篇》：“屈手也。”言握手成圆形也。又为“缠”，音略如“转”。《说文》：“缠，绕也。”《广韵》：“束也。”又为“缭”，《说文》：“缭，缠也。”又为“绕”，韵如“缭”，声转。《说文》：“绕，缠也。”

又引申为束，为“稇”，音似“昆”。《说文》：“稇，束也。”又为

“绎”，音亦如“昆”，亦为“橐”。《集韵》：“绎，大束。”又：“橐，大束。”又为“稇”，音如“混”。《集韵》：“稇，束草也。”又为“纯”，音同“屯”。《诗·召南》：“白茅纯束。”[200，页46、47]

十三、纠 结 义

纠结与卷束义相成，因卷束的结果就是纠结。

郭豫才《语源》：

《说文》：“丩，相纠缭也。一曰：瓜瓠结丩起。象形。”按：瓜瓠之藤缘物纠缦为本义，后复转注为凡相纠缭义。孳乳为“茾”，草之相丩者。孳乳为“疝”，腹中急也，即今俗语谓绞肠痧也。孳乳为“纠”，绳三合也。《后汉·张衡传》：“螣蛇蜿而自纠。”注：“缠结也。”变易为㔶，经缪杀也。按：以二绳缪死。《广雅·释诂四》：“㔶，绞也。”变易为“樛”，缚杀也。《广雅·释诂二》：“樛，束也。”孳乳为“缪”。《汉书》：“即自缪死。”多与㔶“、樛”互通。因“樛、缪”二字，语原有二，一为纠结义，二为杀义。纠结为其本来语原；后用纠结以杀人，故复孳乳为杀义。变易为“蟉”。《鲁灵光殿赋》：“腾蛇蟉虯而绕榱。”注：“曲貌。”曲与纠结义近。变易为“胶”，黏也，按亦有纠结义。变易为“交”。《说文》：“交胫也，象其纠绕形。”孳乳为“迒”，会也。有交错义。孳乳为“筊”，竹索也。字亦以“茭”为之。孳乳为“绞”，缢也。[201，页27、28]

十四、勾 曲 义

《广雅·释诂一下》：“结，曲也。”又《释诂四上》：“结，诎也。”王念孙疏证：“结之言诘屈也。”盖卷绕纠结之物，其形诘屈，因此概括出勾曲义。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

草木钩萌曰"权与"、"灌渝"……

伛偻——《通俗文》曰"曲脊谓之伛偻"，伛偻犹"曲律"也。字亦作"傴旅"（《汉书》）、"偊偻"（《文选》）。而背驼之病则书作"佝瘘"（《庄子》），"伛偻"（《淮南》），可见其为一词之异写。劳苦则背驼，故曰"劬劳"（《诗经》），亦作"拘录"（《荀子》）、"劬禄"（《淮南》）。以言动作则曰"拘搂"（《尔雅注》），语转作"捜牢"（《后汉书》）、"搜略"（《方言》）。以言物名则为"籧篨"（《月令》）、"筥篨"（《淮南》），"籧、筥"一声之转。木之柔曲者名"杞柳"，或作"柜柳"（《后汉书》）、"榉柳"；柳之性状均有枓聊之意，故可以为杯圈。寇宗奭《本草衍义》说："榉木，今人呼为'榉柳'，……嫩枝取以缘栲栳箕唇。"《诗》"中有樛木"。《尔雅》谓"下勾曰枓"……

考老——"考、老"转注，二字义同音转，盖因老翁背驼而得名。语转作"耇老"（《国语》）、"耆老"（《孟子》）、"黎老"（《书经》）。物名则为"栲栳"，元曲《渔樵记》量米器具有"栲栳"，《玉镜台》等曲中又有"栲栳圈银交椅"之名。〔145，页28、29〕

十五、穹隆义

拱曲向上或向外者，谓之"穹隆"，言隆起也。《史记·司马相如传〈上林赋〉》："穹隆云挠。"司马贞索隐："服虔云：'水急旋回如云屈曲也。'"可见这是勾曲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由勾曲义引申为穹隆义。

《广雅·释器》："枸篓、隆屈、籧笼，軬也。"王念孙疏证：

此谓蓬弓也。"枸篓"者，盖中高而四下之貌。山颠谓之"岣嵝"，曲脊谓之"佝瘘"，高田谓之"瓯窭"，义与"枸娄"并相近。倒言之则曰"偻句"。昭二十五年《左传》："臧会窃其宝龟偻句。"

龟背中高，故有斯称矣。“枸篓”，或但谓之“篓”，《玉篇》：“篓，车弓也。”《汉书·季布传》：“置广柳车中。”李奇注云：“广柳，大隆穹也。”“柳”与“篓”通。“隆屈”，犹“偻句”也。张衡《西京赋》云：“终南太一，隆崛崔崒。”是其义也。《释名》谓车弓为“隆强”，云：“隆强，言体隆而强也。”（引者按：《释名》此下又云：“或曰：车弓似弓曲也。”毕沅曰：“此《考工记》所谓‘盖弓’也。《记》曰：‘参分弓而揉其一。’揉则曲，曲则其体穹隆，故曰‘隆强。’”苏舆曰：“‘隆强’即‘隆屈’。”[103，页370]）“强”亦“屈”也，犹《汉书》言“屈强’矣。“䉶笼”，《说文》作“穹隆”，倒言之则曰“隆穹”，故李奇《汉书注》云：“广柳，大隆穹也。”司马相如《大人赋》云：“诎折隆穷，蠼以连卷”，是其义也。或但谓之“䉶”，《玉篇》：“䉶，姑篓也。”“姑篓”即“枸篓”之转。《考工记》谓之弓”，弓亦穹也，故《释名》云：“弓，穹也，张之穹隆然也。”[138，页242]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

骨堆——“骨朵”音转为“骨堆”，《楚辞》书作“魁堆”。俗谓蹲距曰“骨堆”，或曰“骨就”，连语曰“堆堆”。今谓呆坐曰“骨都都的坐”。语转为“敦”，为“蹲”，木制坐垫而高曰“骨垫”。骨堆单言曰“堆”，禾堆土堆曰“垛”。[145，页31，32]

十六、坑　洞　义

向下或向内凹曲，即成坑窍。穹隆与坑圎，是事物自身的方位或人的观察角度相对、相反的两种屈曲表现形式，故“穹”既有隆起义和高义，又有孔义和深义。《正字通·穴部》：“穹，孔也。”也可以将坑洞义看作是穹隆义的相反引申。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

坑阆——单言曰、“坑濂”，复语则为“濂寊”（《方言》）、“康寊”（《说文》）、“阆阆”（扬赋）。语转作“洼寥”（宋玉赋），亦作“巧老”，马融《长笛赋》：“窪窌巧老，港洞坑谷。”“巧老”犹“考老”也。语转作“角落”，亦作“硿落”（《图书集成》）、“阁落”（《元曲选》）。

推广言之，物之空甲曰“壳”，洞穴曰“窝”，曰“坎”、曰“科”、曰“窍”、曰“坑”、曰“孔”、曰“窟窿”，都是圆曲之意。[145，页28、29]

蒋云从先生《义府续貂》：

《说文》：“凶，恶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今谓此为“凵”之繁体。“凵”，口犯切，乃“坎”之初文也。交画象以薪樵覆其上，即陷阱。蹈之则陷，故得凶险义。夫坎陷之与凶险，义既相引，韵复相通，故云“凶”即“坎”之繁体，而并声与义转为凶险字也。许云：“交陷”，以“陷”释“凶”，其亦暗合声训之例乎？

《说文·臼部》：“臽，小阱也。从人在臼上。”“臽”即“凵”，文有繁简，当为人在中耳。“凵”与“臽”，一则象形，一则表业，其语源一也。至“陷”为“臽”之累增字，又无待言者也。[92，页133]

十七、空　疏　义

物之有孔洞者，其中空虚；孔洞多则稀疏。由此而引申出空疏之义。

《方言》卷十三：“濂，空也。”郭璞注：“濂寊，空貌。‘濂’或作‘歉’，虚字也。”钱绎笺疏：

“濂、空”声之转也。《释诂》：“濂，虚也。”……《广韵》引作“歉”，云：“本亦作‘寊’。”《说文》：“濂，水虚也。歉，饥虚也。康，屋康寊也。寊，康也。糠，谷皮也。或省作‘康’。”谷皮去

米则康，亦空也。《小雅·宾之初筵》："酌彼康爵。"郑笺："康，虚也。"襄二十四年《谷梁传》云："四谷不升曰康。"范宁注："康，虚也。"《广雅》作"歑"。《淮南·天文训》："十二岁而一康。"《韩诗外传》作"荒"，"荒"亦"漮"也。郭氏《尔雅音义》云："漮，本或作'荒'"。《泰·九二》"包荒"，郑读为"康"。《急就篇》："辎轺辕轴舆轮康。""康"，颜师古本作"轑"，注云："轑者舆中空处，所用载物也。"司马相如《长门赋》云："委参差以槺梁。"李善注云："委积参差以承虚梁。"盖字异义同。[82，页757]

蒋云从先生《义府续貂》：

《释名·释山》："小石曰'砾'，砾，料也。小石相枝柱，其间料料然出气也。"又《释采帛》："纺粗丝织之曰'疏'，疏，寥也，寥寥然也。"《玉篇零卷》："练，所间反。《释名》：'纺组丝织曰'练'，练，料也，料料然疏也。'"《玉篇》之"练"即今《释名》之"疏"。料料，犹"秝秝"也。《玉篇》："秝，郎的切，稀疏秝秝然。""秝秝"亦云"适历"。《周礼·地官·遂师》："及窆抱磨"，郑玄注："玄谓'磨'者，适历，执綍者多也。"贾公彦疏："谓天子千人，分布于六綍之上。谓之'适历'者，分布稀疏，得所名也。"《说文》："秝，稀疏适也。"王念孙、江声、段玉裁、王筠辈皆于"适"下补"秝"字。"秝秝、适秝、料料"，谓中有空隙也。

又案："料"之言"寮"也。《广雅·释诂》三下："寮，空也。"王氏《疏证》："《说文》：'寮，穿也。'《众经音义》卷一引《仓颉》篇云：'寮，小空也。'张衡《西京赋》云：'交绮豁以疏寮。'《玉篇》：'蓼，草木茎叶疏也。'《广韵》：'镣，有孔炉也。'义并相近。""砾、料、寮"古音同在"宵"部。[92，页120、121]

十八、晓 灵 义

俞樾说："凡物空者无不明"［202，页136］。杨树达也说："物通者必明"［203，页14］，因以物之明状人目之明，心之明及事之明，遂引申为聪慧晓灵义。

杨树达《释"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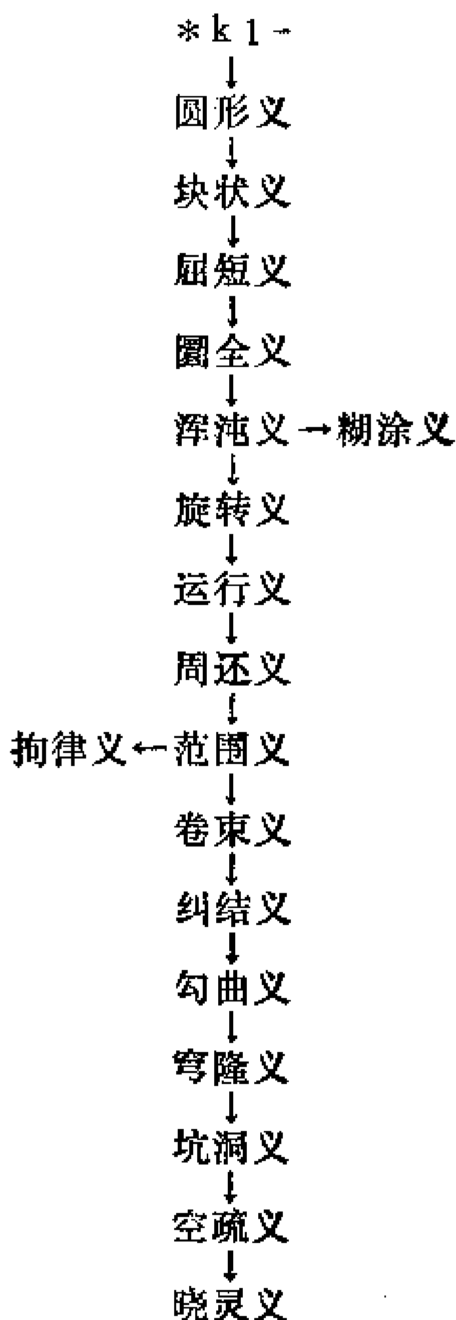
穿谓之"寮"，小窗谓之"寮"，推衍用于人，则慧谓之"憭"；楯间子谓之"棂"，车轖间横木谓之"軨"，推衍及于人，则精明谓之"灵"，意晓解谓之"聆"；语源同，故其所孳乳之字义亦同矣。"囱"也，"寮"也，"棂"也，皆具体之物也；"憭"也，"灵"也，皆抽象之事也。由此可知抽象之义，往往从具体之物来也。［203，页15］

蒋云从先生《义府续貂》：

《淮南子·说山篇》："不通于学者，若迷惑，告之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高诱注："聆聆，犹'了了'，言迷解也。"又《修务篇》："南见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晓泠，钝闵条达。"高诱注："晓，明。泠，犹'了'也。"《文子·精诚篇》作"精神晓灵，屯闵条达。"《后汉书·冯衍传〈显志赋〉》："阐至言而晓领兮。"案："晓泠"、"晓灵"、"晓领"本作"晓聆"，作"泠、灵、领"者，同音通用也。"聆"者，听之聪察。《论衡·自纪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即其义也。［92，页67］

俞氏《古书疑义举例》卷七："'娄空'，古语也。《说文·女部》：'娄'，空也。'凡物空者无不明，故以人言则曰'离娄'，以屋言则曰'丽廔'，'离'与'丽'皆'娄'字之双声也。《论语·先进篇》：'回也其庶乎，屡空。'此言颜子之心通达无滞，若窗牖之

"骨碌"词族中已初步系联组合出的这十八个词群，其引申孳衍的轨迹，或已经被证明，或不言而自明。如果将其引申生发的轨迹简化为一个示意图，看起来就更清爽显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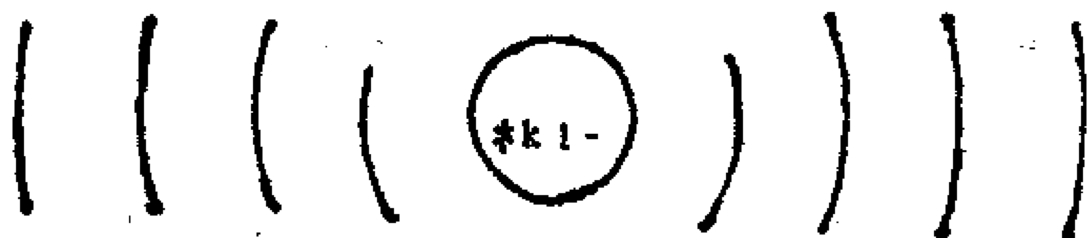
削去冗繁，留下主干，我们从这个图形看到的是，词族的发展，就像一条流动不息的泉水，"一源而派生众流……其中经流较远的，中间还有迂回曲折，或渟潴成湖，或激跃成湍"[20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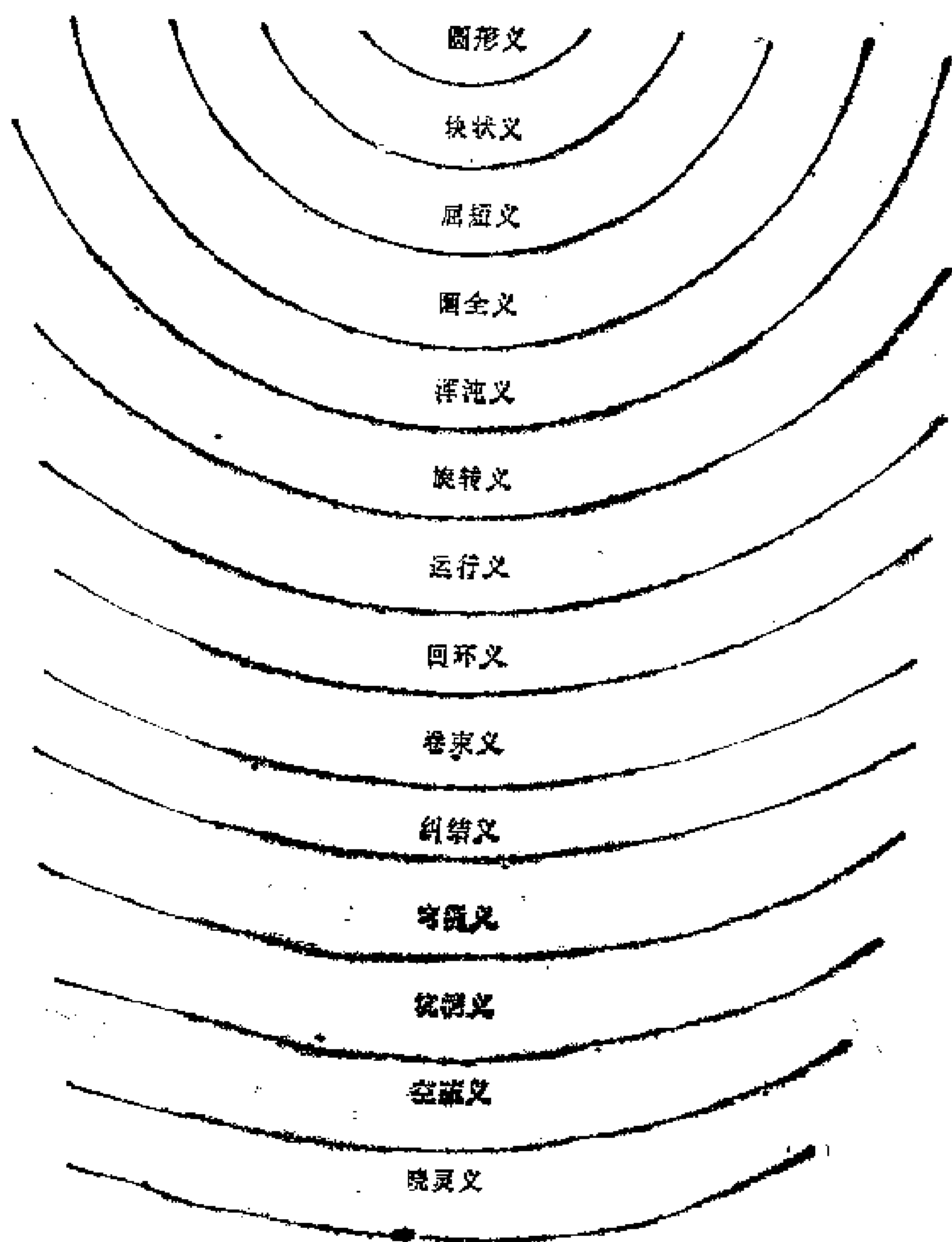
337]，每一个词群就是其中的一个湖泊或一段湍流，每一个同族词就是其中的一滴水或一朵浪花；又象一棵蓬勃生长的大树，枝杈纵横，高入云霄，每一个词群就是树上的一截树干或一枝树杈，而每一个同族词就是枝上的一片叶子、一朵花或一颗果实。

当然，这个词族的谱系简图也可以这样画：（见下页）

从这个示意图，我们看到的是：词族象一个巨大的雪球，从球核开始，越滚越大，层层包裹；又象是在平静的湖水中扔进了一块石子，荡起的涟漪，圈儿由小到大，层层向外扩展，即所谓"一石激起千重浪"。

无论我们把词族的谱系画成什么图形，也不管我们怎样观察它，总而言之，词族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从一个语根开始，不断地孳乳、变易，从少到多，形成一个又一个词群；又不断地引申生发，从小到大，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词族的。黄侃说得好："《吕氏春秋》云：'物自名也，类自召也。'盖万物得名，各有其故，虽由约定俗成，要非适然偶会。推求其故，即求语根之谓也。……形、声、义三者莫不由简趋繁，此势之必至也。然繁由简出，则简可统繁；简既滋繁，则繁必归简。于至繁之字义，求至简之语根，文字语言训诂之语根胥在是矣。"[32，页197]





圆形义
块状义
屈短义
圆全义
浑沌义
旋转义
运行义
回环义
卷束义
纠结义
晓灵义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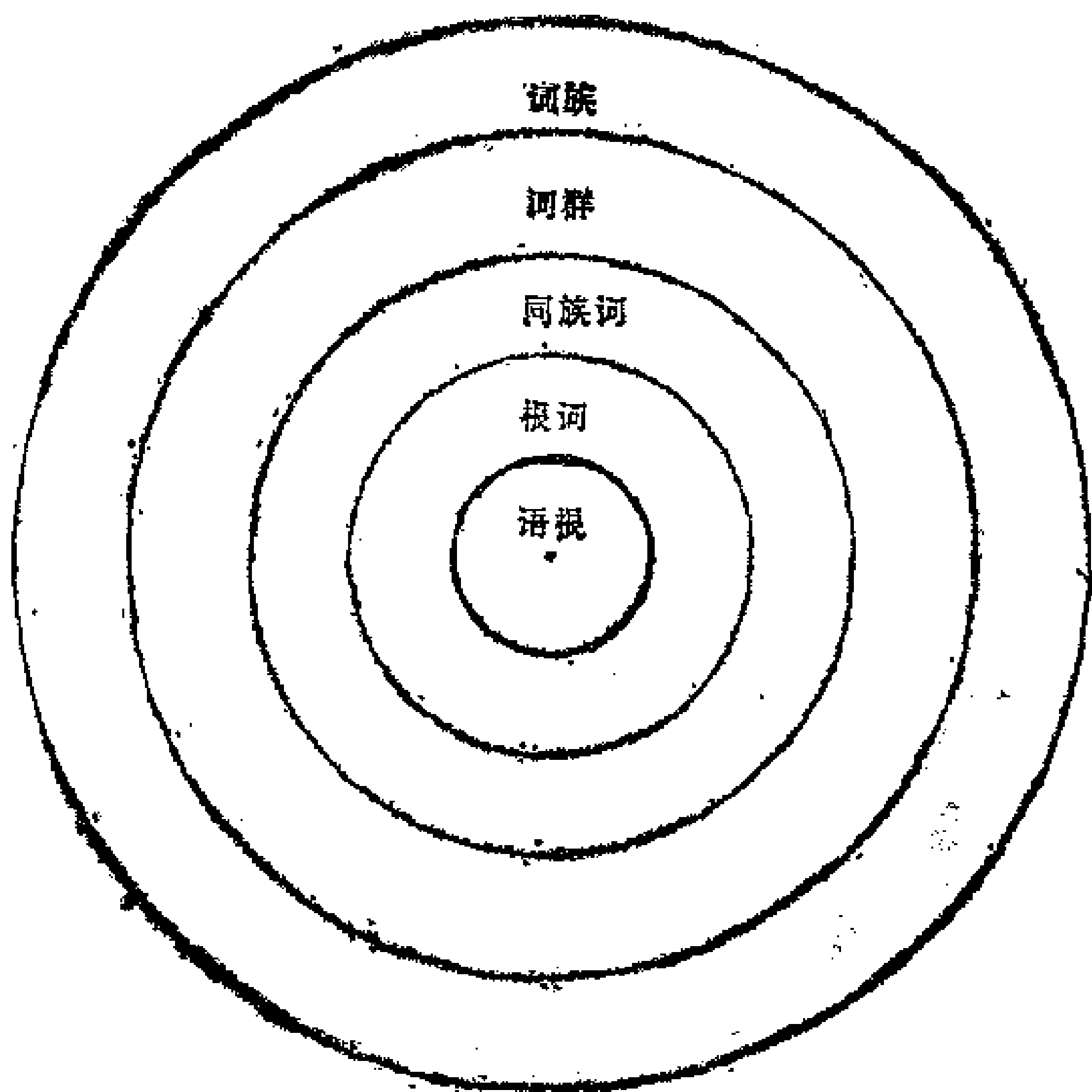
词族的结构关系

在有了一个略具大体的词族轮廓以后，我们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对词族的结构层次、内部关系等，作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这里尝试借助于现代科学研究中的“系统方法”，把词族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有机的整体，既从整体出发，高屋建瓴，统观全局；又从部分入手，将词族系统加以分解，划分出若干层次，找出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内部联系性。

第一节 词族的结构层次

一个词族，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例如“骨碌”词族，就是由从语根 *kl- 引伸生发出来的一系列同族词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组成的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按照其引伸生发的先后顺序，可以划分为圆形义、块状义、圆全义等若干部分；每一部分对于整个词族系统来说，是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我们将它称之为“词群”。再往下分，每一个词群，又是由若干个同族词组成的；这每

一个同族词，又是词群子系统中的更小的子系统，即亚子系统。经过这样的划分，词族系统也就呈现出自小而大的三个层次：同族词、词群和词族。而语根，则是这一系统的核心部分；根词，又是紧靠核心的近缘部分。它们的结构层次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我们就按照语根→根词→同族词→词群→词族这一引伸生发的总轨迹，对词族系统的各个部分和层次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语　　根

语根是词族赖以孳生的根本、蕃衍的源头，是整个词族系统的总语源。没有了它，什么根词、同族词、词群、词族，全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语根大多产生于语言的萌芽时期，在后来成熟语言的词汇系统中只占着很小的比例。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这些感叹、摹声之类，与动物的叫唤又有什么区别？岂不是将人的语言与动物的噭叫等同起来了吗？而且，这些语根数量有限，人类最初的语言未免过于简单了吧？对此，国内外的学者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

中国学者骆鸿凯说：

> 盖太初语言以一意一象为纲，若意象相符，则寄以同一之音，故声类韵部同者义为近。庄子曰："其与鷇音有以异乎？"夫太初之人，发音之简，殆无以异于鷇。虽人之发声转变甚易，或区为清浊，或别其洪细，不若禽兽之音限于声器，如鲠在喉。然在太古之世，则未有以大别，故其义近者，必为同声同韵之字(引者按：应为"词")，双声叠韵之成立即由于此。是故治小学者当知人音与鷇音相同之理。古音根源之简，既如上述，若夫训诂之繁，似难括之部类。但试思人类原型观念本极简单，则训诂之根原宜亦有限。[206，页147、148]

国外的研究成果同样说明了最初语根的原始性：

杰斯帕森教授曾这样写道："有一点要时刻铭记在心。尽管我们现在将思想交流视为言语的主要对象，但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有史以来一贯如此”。语言发声“在开初如同鸟儿的歌唱、动物的吼叫、婴儿的啼哭与低哼一样，是出于感叹而非交流的目的——也就是说，它们发自从未想到同类的个体的内在需要。”[207，页20]

考古资料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说明人类及其近亲类人猿具有共同的祖先。……语言的开端（我们可以把这一进化发展阶段叫语前阶段）很有可能早已在人科动物中间产生。但在人科动物中，真正语言的发展可能是在很久以后，即在他们同时获得真正文化的时候。即使如此，我们仍需记住早期人科动物的语言和文化是非常原始的，原始到这样的程度，要是我们今天听到他们讲话，他们的语言使人听起来与其说像人类的语言，毋宁说像动物的叫唤。[208，页16]

几百万年以前，我们祖先的叫声系统和现代黑猩猩的叫声系统或许没有太大差别——即都在某一事件发生后立即发出有一定意义的叫声。[209，页84、85]

这可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既然我们无法否认人是从动物发展而来的，为什么就不能承认人类的语言也是从动物的喊叫发展而来的呢？

那么，从最早的语根萌发时期到现在，要经过多少时间？这只要看一下人类语言史也就清楚了，“人类学家根据近二十年来的研究，认为……语言萌芽于二、三百万年前，半语言起源于一百万年前，成熟的语言是原始人进入最后二、三十万年的事情。”[210，页96]就是说，最古老的语根至少已有二、三百万年的历史了。

二、根　　词

根词是从语根直接生发出来的词。如果说语根是一颗种子的话，根词就是那最初冲破种皮萌发而出的嫩芽儿。不过，有的语根很像是红薯或土豆的块根种，从它上面萌发的芽儿——根词往往不止一个。例如，由儿语mama、papa这类语根生发出来的根词，除了表示父母的称谓词以外，还有表示食物的名词，甚至有表示吃的动词。吴玉璋同志对这一现象作了详细的探讨：

婴儿感兴趣的不仅是妈妈或爸爸，还有妈妈(或"奶妈")的乳房或乳汁，这也是婴儿最早、最经常接触的事物。因此，许多语言中的mama还表示"乳房"或"乳汁"。英语的mamma，西班牙语的mama，德语的Mamma和法语的mamalle均为乳房之义。这些词……最终都来源于拉丁语的mama(乳房)。在汉语的一些方言中，"妈妈"可以指乳汁。《人民日报》1982年2月28日曾报导过一种有催乳作用的食品，叫"妈妈多"，这里的"妈妈"就是方言词，指"乳汁"，……papa也一样。英语的pap，拉丁语的papilla，瑞典语的patte，立陶宛语的papas，意大利语的poppa(后一例为音变的结果)，均表示"乳房"“或乳头"。

妈妈如果没有乳汁，则会给婴儿吃一些有营养的流质食物(如牛奶、羊奶等)或糊状食物，这种食物在不少情况下也是用papa或mama来表示，英语的pap，拉丁语的papa或pappa，西班牙语papa的复数形式，意大利语的pappa(后两例源于拉丁语pappa)，丹麦语的mad，

以及叙利亚阿拉伯儿语中的mamma，均表示“婴儿的糊状或流质食物”、“食物”等。摩洛哥阿拉伯儿语的baba或pappa则表示“面包”。

许多表示婴儿吮吸乳汁或流质食物动作的词也来源于儿语。这些词中有的扩大了词义，有的词义已经转移。拉丁语的papare表示“吃”，原义为“吮吸”。丹麦语的patte意为“吮吸”。拉丁语的manducare（咀嚼）以及来源于此的法语的manger（吃），都是由ma(m)发展而来的，与此相关的是许多语言中的长m音或ma，原来表示的是儿童吃奶或其它东西时所发出的满足和美滋滋的声音。

……我们可以用韦奇伍德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由最简单的发音ma和pa所构成的词，被用来指称婴儿最感兴趣的对象——妈妈、爸爸、妈妈的乳房，以及手拿或吮吸食物时的动作。”[132，页4、5]

今按：吾乡方言中即称乳房为“妈头子”，称乳汁为“妈子”，而绝不称“奶”（“奶”只用来指称祖母）。民谚曰：“十个鱼，八个虾，大姑娘也能吃出妈。”这里的“妈”即指“奶水”。儿语本来就只是囫囵含混的“模糊”语言，“奶水、吃、妈妈（爸爸）”等种种概念全部囊括其中了。儿童语言研究表明：“儿童学语经历几个阶段，最初是独词句阶段，如用独词句‘妈妈’可以表示‘妈妈到这儿来’，‘这是妈妈’、‘我想吃’等许多意义”[211，页68]。“由于缺乏足够的语言素材，同一种声音被用来表示截然不同的概念，这种现象说明了儿语词汇的随意性。儿童们发出的数十种声音系列，如ba、na、y、de、pa和ma等，几乎是随意地被用来表达数十种儿童的概念。”[111，页111]因此，从这一语根生发出多个根词，也就不奇怪了。

这里涉及到“独词句”问题。苏联心理学家鲁利亚在《语言和意识》(莫斯科，1979年)中指出：“在原始历史的第一阶段，语言是单纯由声音或‘词’组成的……在某种场合词表示物体，但是同一个词在另外一种场合，当伴随一定语调时，却可能表示整个判断、整个单词句。……在分析儿童言语的发展时可以比较明显地观察到这一过程。”所谓“独词句”，伍铁平先生解释说：“即用一个词，甚至一个词素表达一个或几个想法(如用‘果’表示‘要水果’、‘这是水果’、‘给我水果’、‘想吃水果’或‘我要水果’等。”[211，页27、28]在人类语言的初始阶段，要以为数不多的根词满足交际需要，就必须使根词“一身兼数职”，才能以少胜多。

三、同　族　词

同族词是词族中单个的词。

这里称“同族词”而不称“同源词”，是因为“同源词(cognate words)……原是比较语言学的术语，用来指一语言中某语词在形式上和意义上与另一语言的类似语词之间具有亲属关系。如英语mother，拉丁语mater(语源上之亲属)等。”[213，页1]既然如此，“同源词”这一名称适用于历史比较语源学也就顺理成章了。而王力拿来称汉语中“词与词之间的亲属关系”[28，页538]。这样一来，“同源词”这一名称“实际上涉及到两个相关而有别的‘同源’概念。一是同一语言的若干语词来源的共同性，二是更早时间层次上，亲属语言间语词的发生学关系的一致性。”[214，页205]为了有所区别而不致混淆，本文在历史语源学的场合使用“同族词”的名称，例如汉语中属于同一词族的词；而在历史比较语源学的场合则使用“同源词”的名称，例如汉藏语系各亲属语言间有共同语源关系的词。

此外，尚有“同源字”这一名称，本书也不拟使用，是因为这一名称混淆了“‘词’和‘字’的概念，就会在实践上产生若干难于解释的麻烦，或自陷于矛盾。”[171，页85]就曾有在大学里专门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师对笔者说：“什么叫‘同源字’？什么叫‘通假字’？老师讲不清楚，学生也糊里糊涂。”由此可见，讲词汇问题却标以“字”，使得“‘声近义同’的‘字’究竟是字还是词这类麻烦问题会因‘字’、‘词’不分而更容易混淆”[171，页85]。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词族中的根词、同族词与语根的关系，并不是等距离的，而是有亲有疏、有远有近的。例如，直接由语根 * kl－生发的根词“果裸”和由此孳乳的同族词“栝楼”，其音义来自“骨碌”声响的迹象十分明显；继而孳乳的“蛞蝼”、“蜾蠃”、“果赢”，其语源意义就已经所剩无几，以致于现代一般人已经难以觉察其音义来源了；由此再孳衍出的“穹隆”、“昆仑”、“佝偻”，再孳乳出的“角落”、“窟窿”、“簾筤”，其语源意义已消失殆尽，与语根的关系已十分疏远了，恐怕连一些有训诂修养的人也可能不肯轻易认可它们与“骨碌”的关系吧。对于这种现象，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可以用来说明：

我曾用“树”来说明……。一棵树就其靠下部分来说似乎是强理据性的；它必须有一个树干，而且这个树干必须是近于垂直的。靠下的树枝会有较高的任意性：其数目尽管可推想为有限的，却决非预先固定的，每条树枝的朝向以及与树干的交角也不是固定的。然而这些方面仍然受相互关系的制约，因为较大的树枝由于自身的重量和满载枝叶的其它树枝的重量，它们必须在共同的支点上平衡所受的压力。然而当我们的注意力向上移动时，理据性所起的作用在减少，而任意性所起的作用则

逐渐增加，顶端的枝杈再也不能危及树的稳定，也不能改变其特有的形态了。它们的多样性和不重要性使它们从最初的制约中解脱，而它们的一般分布或者可解释为一个也已被写入细胞基因中的方案的、逐步递减的复制序列，或解释为统计波动的结果。树结构起初是可理解的，它经过抽枝生叶达到某种停滞状态或逻辑中性。因而它能不违背自己最初本性地经受多种多样偶然事件的作用，这些偶然事件终因发生过晚未及阻止一位细心的研究者对其加以识别，并将其归入某一种属。[215，页180、181]

原来，在词族这棵大树上，越靠近树根——语根的地方，同族词的理据性就越强；而越是临近末梢的地方，其理据性就越弱。但是，只要我们细心地、深入地加以研究，还是能够找到它们的理据性，并将它们归入相应的词族里去的。同族词是这样，由同族词组成的词群也是这样。

四、词　　群

词群是词族中属于同一个意义层次的同族词的群体。它是介于词族和同族词之间的一个中间层次，是同族词向词族过渡的桥梁。

词群的组成或划分，其容量的大小，除了词群内部同族词的音义联系外，也和人们的认识程度、研究需要有很大的关系。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语音和意义宽严的标准以及分析方便的程度，来确定词群的组成或划分。因此，词群的大小，可以因人而异，甚至相差悬殊。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就目前人们已经系联的结果来看，词群的大小是可以有所增损的，即一个较大的词群可以再分解为几个较小的词群，而几个较小的词群也可再次系联为一个较大的词群。我们从王力的《同源字典》中挑出几例，解剖麻雀，以资说明。为了节省篇幅与印刷方便，其中“大量地引用古人的训诂”部分及一些音标略有删省：

宵韵·帮母

pio飙(猋)㶾票：phio飘旚漂(帮滂旁纽，叠韵)

pio飙：bio飘“扶摇”(帮并旁纽，叠韵)

phio飘嘌慓：phio翲翲嫖僄趮剽(滂母双声叠韵)

这些字都和风或飞有关系。“风”与“飞”在意义上也有某种联系；古人以为飞是凭借风力。

《尔雅·释天》：“扶摇谓之猋。”孙注：“回风从下上曰猋。”《礼记·月令》：“猋风暴雨总至。”注：“回风为猋。”释文：“猋，本又作飙。”字又作“飙”。《说文》：“飙，扶摇风也。”《初学记》卷一“风”引作“疾风也”。

《说文》：“㶾，旌旗飞扬貌。”段注：“扶摇风曰飙，义略相近。”

《说文》：“票，火飞也。”段注：“引申为轻锐之称。”《汉书·霍去病传》：“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飘摇。”师古曰：“票姚，劲疾之貌也。”

《尔雅·释天》：“回风为飘。”《汉书·蒯通传》：“飘至风起。”师古曰：“飘读曰飙(猋)，谓疾风，音必遥反。”

《说文》：“旚，旌旗旚繇也。”段注：“旚，今字作飘。”按，“㶾、旚”音近义同。

《诗·郑风·萚兮》："风其漂女。"传："漂，犹吹也。"

《汉书·贾谊传》："风缥缥其高逝兮。"师古曰："缥缥，轻举貌。"《史记·贾谊传》作"漂漂"。

《庄子·逍遥游》："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释文："司马云：'上行风谓之扶摇。'《尔雅》云：'扶摇谓之飙。'郭璞云：'暴风从下上也。'"按，"扶摇"的合音应即是"飘"。

《广韵》："飃，飃飅，风吹貌。"

《广韵》："嘌，疾吹之貌。"《集韵》："嘌，车行疾无节也。"《诗·桧风·匪风》："匪车嘌兮。"

《广雅》："慓，急也。"

《广韵》："鷅，鸟飞。"《集韵》："鷅鷅，鸟飞轻貌。"

《广韵》："翲，高飞。"

《说文》："嫖，轻也。"《广韵》："嫖，身轻便貌。"

《说文》："僄，轻也。"按，"嫖、僄"实同一词。

《说文》："䙳，轻行也。"

《广韵》："剽，轻也。"《汉书·地理志下》："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师古曰："剽，急也，轻也。"〔176，页223、224〕

今按：这个词群，大概在《同源字典》中算是最大的一个了。其意义涉及"风"、"飞"、"疾"、"轻"四个意义层次，若再细分，即可分为四个较小的词群：

1　风义：飙(猋)、飘、扶摇、飃、漂；

2　飞义：鰾、票、幖、鷅、翲；

3　疾义：嘌、慓、剽；

4　轻义：缥、嫖、僄、䙳、剽。

这四个较小的词群，语音相近，语义相关。将这分属于四个

相关意义层次的“同源字”合为一个词群，是完全应该的。可惜，像这样分出几个意义层次的较大的词群，在《同源字典》中找不出几个来。

既然一个较大的词群可以分解为几个较小的词群，那么，几个较小的词群是否可以合并为一个较大的词群呢？请看《同源字典》：

1．之部·帮母

piuə不：piuə否（叠韵）

piuə不：piuət弗（之物通转）

“不”字，《广韵》读“甫鸠、甫九、甫救”三切。又读“方勿”切。其读上声时，与“否”同音；其读入声时，与“弗”同音。“不”“否”“弗”三字实同一源。［176，页102］

3．鱼部、明母

miua无：miua毋（同音）

miua无：miuang亡罔（鱼阳对转）

miua无：mak莫（鱼铎对转）

miua无：miai靡（鱼歌通转）

miai靡：miat蔑（歌月对转）

miat蔑：muat末（月部叠韵）

miat蔑：miuət未勿（月物旁转）

这些都是明母字，都有否定的意思。［176，页178］

17．微部、帮母

piuəi非匪：miuəi微（帮明旁纽，叠韵）［176，页407］

今按：这三个同为否定义的词群，能否合而为一？这不能由我们

来说，还是由王先生自己来说吧：

> 让我们先从否定词说起。在杨树达先生的《高等国文法》里，列举了十六个否定词，如果按上古语音来说，它们都是唇音字。其中十一个是“明”母字，五个是“帮”母字：
>
> （1）属“明母”的
>
> 莫mak　　末muat
>
> 蔑miat　　靡mia
>
> 曼miwan　　罔miwang
>
> 无，毋，亡miwa　　勿miwət
>
> 未miwəi
>
> （2）属“帮”母的
>
> 不piwə　　弗piwət
>
> 否piwə　　非piwəi
>
> 匪piwəi
>
> 这绝对不会是偶合的。我们还可以仔细分析：用于禁止语的，一般只用“明”母字，如“勿”“毋”“无”；用于否定叙述和否定判断的，一般只用“帮”母字，如“不”“弗”“非”“匪”。[28，页542]

今按：既然已说“这绝对不会是偶合的”，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我们也就不能不相信：这三个较小的词群完全可以合并为一个较大的词群。（又：“亡”应与“罔”并列）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同源字典》，那个表示“风、飞、疾、轻”等义的大词群下面，隔了一个其他意义的词群，还有一个较小的词群：

滂母

phio剽：phio勡（同音）

《广韵》："剽，强取也。"《集韵》："剽，劫也。"

《说文》："勡，劫也。"《广韵》："勡，劫也。"按，在强取的意义上，"剽、勡"实同一词。[176，页225]

今按：强取、抢劫的特点是抢了就跑，速度极快，可见此义为轻疾义之引申，故"剽"有"轻疾"、"强取"二义。《同源字典》都已收入，却又分为两个互不关联的词群，可谓失之眉睫了。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词群是可大可小、可分可合的。

五、词　族

词族是同出一源的所有同族词的总和。

这里要说明的是：词族并不是同族词的杂乱无章的、偶然的堆积，而是一个严整有序的由各个词群组成的有机整体。就是说，同族词只有在经过系联归类为词群以后，才有资格充当词族的直接要素。这就好像是一个世族，与其说是由一个个的世族成员所组成的，倒不如说是由一个个血统支派所构成的一样，因为一个个的成员首先组成的是血统支派，血统支派才构成了世族。

既然词族是以词群为直接构成要素的，那么，要组合词族，除了要系联出足够的词群外，还必须找出词群与词群之间的内部联系性，梳理出它们之间彼此的派衍关系，将有关的词群放到适当的位置上。

例如，穹隆义、坑洞义的词群，如果就事论事，孤立地来看它们，那它们就只是两个孤立的词群，显得十分突兀。而一旦看出了它们的圆曲特点，又了解圆和曲在几何学上的关系，马上就

可以明白它们来自圆转诸义，这样，一大串音义相关的词群立刻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串连起来。这种始则迷雾重重，终则豁然开朗的情况，很像傅斯年所说的那种境界：

> 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则登时变成活的。即如《史记·殷本纪》的世系本是死的，及至《山海经》的王亥，《天问》的恒和季，不特是死的，并且如鬼，如无殷虚文字之出土和海宁王（国维）君之发明，则敢用这些材料的，是没有清楚头脑的人。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则《史记》、《山海经》、《天问》及其联类的此一般材料，登时变活了。又如现在古玩铺的及外国博物院的中国真东西，不为不多，此时还是死的，一经科学的发掘，便可因几点确定了之后，而变成活的。[216，页350]

甲骨文字还是有形可识的具体事物，而词群之间的联系性却是无形的抽象的东西，但一节既通、数节皆活的现象却是类似的。因此，寻找词群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就成为词族组合的关键所在。

美国十九世纪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摩尔根在谈到氏族时说："由于历时久远，一个氏族的成员已不可能将他们的世系追溯到始祖，因此，氏族内的各家族就只有从一个较晚近的共同祖先身上找到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追溯到始祖这一点证明世系之悠远，但并非证明这些家族不出自一个遥远的祖先。因为，本氏族人都出生于本世族之内，而且，每一个人都能通过一系列公认的本氏族成员而追溯其世系，这两件事实即足以证明氏

族所有的成员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当文字记录尚未出现之时，沿世系上推的世代，为数是有限的。在同一个氏族中，有极少数的家族可能找不出一个共同的祖先，但是，不能由此便认为它们不是从氏族内某代遥远的祖先所传下的后裔。……'一个家族的亲等就像泉有分流、树有分枝一样；虽然分流分枝远近不同，但却出于同原同干。'（《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101，页290、291、411]摩尔根的论断，已为民族学、原始社会历史学者所公认。语源、词族的情况，也和氏族、世系的情况相类似。但就其研究的途径来看，人们对每个氏族、世系的史前繁衍情况，目前可以说是束手无策；而对于史前时期的语源情况，却可以用历史比较等方法加以构拟、追溯。因此，尽管由于问题本身的困难和研究的不足，许多语源、词族繁衍流转的情况至今仍是一个个谜团，但凭借多种学科研究的不断进展，经过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不懈努力，这些谜团将会越来越多地被揭开。

第二节　词族的内部关系

词族系统是义、音、形结合的有机整体。在词族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即词族与词群、词群与词群、词群与同族词、同族词与同族词之间，都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各种关系。下面分别从意义关系、语音关系、词形关系、字形关系、亲缘关系这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意义关系

人们的思维过程，是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的阶段进行的，

这个过程，又是沿着横的(空间)和纵的(时间)两个方向层层展开的。因此，作为反映客观现实的概念的存在形式——词汇系统，也就存在着横向和纵向这两种联系形式。这种横向和纵向的联系，在词族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联系的纽带，是词的语源意义。因此，这里所说的意义，就是指词的语源意义，而不是词汇意义。

（一）横向联系

横向联系是同族词与同族词、词群与词群之间在空间上呈现的共时的、平行的联系，其主要表现是意义的扩展。横向联系的同族词之间或词群之间在语源意义方面处于大致同一的历史平面上。这种联系，又存在着两种形式：类同联系与对偶联系。

1. 类同联系

类同联系是从事物的统一性中求联系。

例如，“圆”这个概念，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圆形或接近圆形的事物中概括出来的：树果、鸟卵的球形圆，瓜瓠的球形或椭圆形、圆柱形的圆，禾穗的圆锥形或圆柱形圆；块状的立体圆，环形的平面圆；穹隆突起的圆，坑洞凹陷的圆；浑然一体的圆，断续相连的圆；囫囵圜全的整体圆，佝偻弯曲的部分圆；实心的圆，空心的圆；静止的圆、旋转的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千差万别，却大同小异，它们都有一个或相同、或近似，或明显、或隐蔽的特征——圆。

对于同族词之间或词群之间(主要是事物的名称之间)存在的这种类同联系，清代以来的训诂学家们时有发现。王念孙、王引之首开其端，其《广雅疏证》等书屡有论及：

“鞫”之言“钩”也、“拘”也。……绚所以拘持屦头，鞫所以拘持鸟兽，二者不同而同为拘持之义，故其训同也。凡物之异类而同名者，其命名之意皆相近。《尔雅》：“斛谓之缸”，谓田器也，而郑注《少牢下篇》以此释“挑匕”，云：“挑谓之歃，有浅斗，状如饭锹。”盖挑匕所以插取食，锹所以插取土，二者不同，而同为插取之义，故其训亦同也。[138，页224]

《尔雅》所释，或虫与鸟同名：“密肌，系英”、“螒，天鸡”是也；或木与虫同名：“诸虑，山櫐”、“诸虑，奚相”是也；或草与虫同名：“莪萝”之与“蛾罗”、“蚍衃”之与“蚍蜉”、“果裸”之与“果蠃”、“芦菔”之与“蛴螬”是也。凡此者，或同声同字，或字小异而声不异，盖物之同名者往往有之。[217，页1099]

与王念孙“相与商榷古义者四十余年”[218，页15]的程瑶田，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写出了《果裸转语记》。其开头和结尾部分说：

声随形命，字依声立。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物不相类也，而名或不得不类；形不相似，而天下之人皆得以是声形之，亦遂靡或弗似也。姑以所云“果裸”者推广言之……

凡上所记，以形求之，盖有物焉而不方，以意逆之则变动而不居，抑或恒居其所也。见似而名，随声义在，愚夫愚妇之所与知，虽圣人莫或易焉者也。[1，页1—14]

其后，章太炎著《文始》，也是出于这种认识。其《叙例·略例丙》说：

物有同状而异所者，予之一名：易与蝎、雁与鴈鹅是也；有异状而同所者，予之一名："钜"与"黔"（钜即今金钢石，黔即炱煤，物质本同，故"黔青"由"钜"而转，见本条）、鼠与翟是也。庶物露生，各异其本；文言孳乳，或为同原。若蓝名本蒽，鼋名依黾，种族自别，形态相从，则其语由此移彼，无间于飞潜动植也。[219，页 3]

他的论点十分明确，但论据却颇为费解。好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有类似的大量例证，可以移花接木，以为佐证：

语言之始，义相同者多从一声而变，义相近者多从一声而变，义相反者多从一声而变。相同之例举如前矣，相近者亦以一声转变。若谷不熟为"饥"，音变则蔬不熟为"馑"；地气发天不应为"雾"，音变则天气下地不应为"雺"；人之阳气为"性"，音变则人之阴气为"情"；……"娣"从"弟"声，音变则为"侄"；红似绛，音亦如"绛"；栾似栏，音亦如"栏"；鴈似雁，音亦如"雁"；雅似乌，音亦如"乌"；闾似驴，音亦如"驴"；江、汉、河、淮、沇四渎之水相似，以双声呼之；吴、华、恒、衡、岱五岳之山相似，以双声呼之，是其则也，[220，页 49、50]

这些论述足以说明，同族词之间和词群之间在意义上的类同联系，

是语源研究的认识基础。

2．对偶联系

对偶联系是从对立的两极中建立联系。正如黄侃所说："古字义相反者多同声：'天、地'，'男、女'，'生、死'，'阴、阳'，'玄、黄'，'鳏、寡'，'古、今'，'多、少'，'好、恶'，'文、武'，'明、晦'之类皆是。'作、祖'，始也；而'殂'训死；'落'，始也，而'落'训死；'一'，数之始也，而'殪'训死；'胎'，生之始也，而'殆'训危。故知死生相反，而循环无穷。古人常言，已明其义矣。"[221，页57]

关于黄侃所举的"作、祖、殂"之例，陆宗达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

> 《墨子》："自前曰'且'，自后曰'已'。"则"且"为反映事情未实现前的语词。从"且"声的字有"祖"。《尔雅·释诂》："祖，始也。"则引申为开始义。另一方面，"且"字、"祖"字也反映了"终了"的意义。如从"且"得声的"殂"字，《说文·歺部》："殂，往死也。"《虞书》曰：'勋乃殂'。"又"殂"的古文……《说文》谓"从歺，从作"，而"作"也训始，如《诗经·采薇》："薇亦作止。"毛传："作，始也。""作"又引申训创造。如《世本》有《作》篇，记的就是各种工具的创造。由此看来，同是"且"字"作"字或从"且"从"作"得声的字，有的训始，有的训死。[222，页62、63]

这种有对偶联系的同族词，还可以分为两类："相反同根"和"施受同词"。"例如，'天'与'地'，'古'与'今'，'男'与'女'，

'始'与'终'，等等，都是两两居于对立面的词，而这些对立的词又都是双声，可见是由同一语源派生的。这在语源学上称为'相反同根'。又如，'受'与'授'，'教'与'效'，'问'与'闻'，'买'与'卖'等等，这些彼此联结、互相依赖的对立的词，也是以声音为纽带的，在训诂学上称为'施受同词'。"[222，页62]

对于这种有对偶联系的同族词的音义关系，张世禄先生作了分析(为使印刷方便，音标略有改动)：

> 例如"明"、"盲"，它们同是在上古音的"阳部"、"明纽"的音，而意义恰恰相反；又如"腹"和"背"，它们都是上古音的"帮纽"的音，一个是在"沃部"("幽部"的入声)，一个是在"之部"，韵部也相近，而意义却恰恰相对。他如"夫"和"妇"[p(b)——g]；"聪"和"聋"[ts(l)——g]；"消"和"息"(s——g(k)]；"教"和"学"[k(ɣ)——g(k)]；"跛"和"垫"[t(d)——(k)p]；"天"和"地"[t(d)——n(d)]；"本"和"末"[p(m)——n(t)]；"题"和"蹄"[d——g]；"顶"和"底"[t——ng(g)]等等。它们相互之间在声音形式上起首辅音及收尾辅音都相类相近，或为双声，或为迭韵，但在意义上，又各自相对相反。[223，页532、533]

无独有偶，这种"反义同源"的现象，在世界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对以上提及的"天"和"地"、"顶"和"底"、"男"和"女"、"生"和"死"、"始"和"终"等同族词反义同源的现象，伍铁平先生广征博引了拉丁语、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等语言中的大量例证，从类型学(语言普遍现象学)的角度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语言的模糊性。"[224，页23]国

外的学者也不乏注意及此者，例如，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就曾引用语言学家卡尔·阿贝尔的话论证道：

> 我们的概念是通过比较而形成的。“要是永远只有光明，我们就不能区别光明和黑暗，因而也既不会有光明的概念，也不会用‘光明’这个词……”十分清楚的是，在地球这个星球上一切都是相对存在的。任何事物都只有在同其他事物的相对关系中，才具有其独立性。“……人只有从对照矛盾双方的过程中，才获得了最古老的、最简单的概念，他只是逐渐地才学会区别对偶的两方，不用专门比较，便能想到对立的一个方面。”阿贝尔认为，只有在“最古老的词根”上，才能观察到对偶的双重意义。“原来具有双重含义的词汇，后来分解成单一含义的词汇，两个意思对立的词中的每一个，都带有原来词根的变音(变化了的音)。例如早在(埃及)象形文字中，ken(弱强)就变成了ken(强)和kan(弱)。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脑越来越熟悉地将那些只有在对照中才成立的概念，分解成相互独立的两个部分，代表每个部分的音符也应运而生。”阿贝尔认为，从埃及语很容易就得到的原始词汇的对偶意义的证据，同样可以从闪米特语及印欧语系中找到。[225，页55、56]例如拉丁语中至今仍使用“altns”(“高”和“深”)和“sacer”(“神圣”和“可耻”)这样的词。[226，页32]

可见，同族词之间或词群之间存在的对偶联系的现象，反映了人类思维的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从对立到统一，从否定到肯定，相反相成，两极相通，从而形成了词族系统内部的构成法则

之一——对立的统一。

（二）纵向联系

纵向联系是同族词和词群在时间上按照其语源意义的引申生发的先后顺序而建立的联系，主要表现为意义的递进、深化。

例如，孔洞因其形圆曲而得名，故由圆曲义递进引申为坑洞义，其名为"孔、窿long"、"窟窿"；物体因有孔洞而空疏，故又由孔洞义递进引申为空疏义，曰"廉（濂）崀"、"料料"；物体空疏通畅则透光，故又由空疏义递进引申为光亮义，言"光、炯、亮、朗、阳"；又因人之聪明伶俐与物之通畅光亮相似，故又由光亮义抽象递进为晓灵义，曰"晓灵、娄娄"……层层递进，层层深入。

又如，严学窘、尉迟治平二先生证明，"有"的语义，同"大、覆"诸义有关。其论证过程如下：1、"有"义：除后代习用的"有"字外，典籍里还有其他写法：或＊rwjək，《广雅·释诂》："或，有也。"《尚书·洪范》"无有作好"，《吕氏春秋·贵公》引作"无或作好"，高诱注："或，有也。"字或作"域"，《说文解字·十二下·戈部》："域，'或'或从土"；《诗·玄鸟》："正域彼四方"，毛亨传："域，有也。"云＊rwjən，《广雅·释诂》："云，有也。"字或作"员"，《广雅·释诂》："员，有也。"《尚书·秦誓》："若弗云来"，孔颖达疏："员即'云'也。""有"，"之"部字，"或"，"职"部字，"云"，"谆"部字，三者仅韵尾不同。而"之"部和"职"部又是相配的阴声韵和入声韵，所以"有"同"或"的关系比同"云"的关系更近：《诗·灵台》"王在灵囿"，毛亨传："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国语·楚语》"王在灵囿"，韦昭注："囿，域也。"而《说文解字·六下·□部》："囿，苑有垣也。从'囗'，'有'声。"《太平御览·一百九十六·天中记·十五》引《风俗通义》："囿者，畜鱼鳖之处也，囿犹'有'

也。”一以“域”释“囿”，一以“有”释“囿”，而皆注疏之声训。《说文解字·七上·有部》：“䞥，有文章也。从‘有’，‘或’声”，《说文系传·十三》：“臣锴按：《论语》‘郁郁乎文哉’本作此‘䞥’，假借‘郁’字，……又假借‘彧’字。”此皆可证入声韵之“有”，假“或”为之；而舌尖鼻韵尾之“有”，则假“云”为之。2，大义。《周易·杂卦》：“大有，众也”，有与大其意相成。《尔雅·释诂》：“幠，庬，大也”，又“幠，庬，有也。”“幠、庬”既训大，又训有，故“有”字有“大”义。“大”义为“有”义之引申。“云”亦有“大”义。《广雅·释诂》：“云，远也。”《说文解字·十下·大部》：“奆，大也。从‘大’，‘云’声。”则增义符“大”以显其意。《广雅·释诂》：“员，众也。”“或”亦有“大”义。《大戴礼记·公冠》：“遵并大道份或”，卢辩注：“‘份或’当为‘份彧’声。”实“或”当为“彧”之本字。《诗·信南山》“黍稷彧彧”，毛亨传：“彧彧，茂盛貌。”《广韵》“䵻”字引《字林》云：“大力貌。”从“大”之意同“奆”。3，覆义。《诗·皇矣》“奄有四方”，郑笺孔疏俱释以“覆有天下”，则“覆”义又为“大”义之引申。《说文解字·七下·巾部》：“幠，覆也。”《尔雅·释言》：“荒，奄也。”《说文解字·十下·大部》：“奄，覆也，大有余也。”“幠、荒”既训“有”，又训“覆”，亦可证“有”字有“覆”义。〔227，页24—28〕今按，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诂一上》：“大则无所不覆，无所不有。故‘大’谓之‘幠’，亦谓之‘奄’；‘覆’谓之‘奄’，亦谓之‘幠’；‘有’谓之‘幠’，亦谓之‘抚’，亦谓之‘奄’；‘矜怜’谓之‘抚掩’，义并相因也。”〔138，页5〕似为上文之所本。“幠”有“大“义，有“覆”义，有“有”义；“奄”亦有“大”义，有“覆”义，有“有”义；“抚掩”连语，则有“矜怜”义，“矜怜”也就是“爱”之意。然则“大”、“覆”、“有”、“爱”义并相通。怀抱抚养谓之“覆育”，以手加覆谓之“抚摸”，皆为爱惜之意，故“抚”训“抚慰”，“怃”训“爱抚”。〔228，页132〕由此看来，爱义为覆义之引申。又《广雅·释

诂》："右，比也"，盖谓亲比也。《论语·颜渊》"以友辅仁"，何晏集解："孔(安国)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辅成己之仁。'"《释文》："有相切磋，本作'友'。"《左传·昭公六年》"人亦于女何有"，杜预注："言人不能爱女。"《左传·昭公二十年》"是不有寡君也"，杜预注："有，相亲有也。"相亲有之"有"即"友"。《说文解字·十二下·女部》："婧，耦也。从'女'，'有'声。读若'佑'。侑，'婧'或从'人'。"《广雅·释诂》："侑，偶也。亦可为证。"云"亦有"友"义。《诗·正月》"洽比其邻，昏姻孔云"郑玄笺："云犹'有'也，言尹氏富与兄弟相亲友，为朋党也。"《释文》："孔云，本又作'员'，音同。……郑(玄)：'友也。'"〔227，页27〕友爱、亲比之人常互相帮助，故又引申为助义。《左传·庄公十八年》"命之宥"，杜预注："宥，助也。"《周易·系辞上》"可与佑神"，孔颖达疏："佑，助也。"《释文》："与佑，音'又'。助也。荀(爽)作'侑'。"如果将从"有"义到"助"义这一步步递进、层层引申的过程加以图示，就是：

"有"义→"大"义→"覆"义→"爱(友)"义→"助"义

这种引申生发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其"孰先孰后，何始何终"的顺序，大致可以判断出来，因此，这种纵向发展是一种历史性的发展。这种纵向联系，是同族词不断孳乳繁衍、词群不断引申生发的重要途径。

比起横向联系来，纵向联系更为隐蔽、复杂，因而研究起来也就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我们应该结合语义学、思维科学的研究，勇于探索这种引申生发、孳乳繁衍的轨迹，使这一方面的研究不断有所突破，薄弱环节得以加强，从而满足系联词群、组合词族的需要。

词族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横向和纵向的联系，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两种形式的意义联系互相交叉，环环相扣，构成

了一张严整有序的词族系统的网络。

二、语音关系

语音是语言内部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语音关系是词族系统内部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当同族词孳乳派生时，有的完全承袭了旧词的语音形式，有的则通过变换辅音或元音等语音曲折方式以示区别。“分化完成以后，由于语音环境的影响，方言的影响，使用中的讹传等等原因，两词自身还可能各自发生音变，这是从有直接派生关系的同源词来说的。还有些同源词是间接派生的，它们之间可能经过多次音变，这种音变的轨迹越长，同源词之间的语音差异就越大，纽或韵距离远些是并不奇怪的。”〔18，页376〕

正是由于古今语音的种种复杂变化，使得同一词族中的同族词和词群按照语音关系的近与远而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语出一源而语音形式相同(或相近)的，如‘句、钩、枸、軥、笱、拘、佝’等，它们既属于同一语源，在语音的使用上又属于同一派系；另一类是虽然语出一源，但语音形式却相差很远，如‘句’与‘卷’、‘葩’与‘䊀’等，它们虽分别属于同一语源，但在语音的使用和演变上分道扬镳，不属同一派系了。前者，我们把它叫做‘同源同派’词；后者，我们把它叫做‘同源异派’词。这‘同源异派’词只具备‘义通’的特点，却不具备‘声近’的特点。只有‘同源同派’词才具备‘声近义通’的特点。”〔229，页85〕

由于对同族词之间语音关系的这种复杂情况认识的不同，近现代的训诂、语源研究者们对语音关系的宽与严各自掌握的幅度也就很不一致：“有人认为纽(声母)和韵部要同时严格掌握，所谓音近，只能是纽为近双声、韵不能超过直接的旁对转(即主要

元音相近，韵尾的辅音发音部位相同）；也有人认为纽可不计、韵却要严；还有人认为纽与韵有一从严即可，同纽或近双声音，韵可不计，同韵或对转韵者，声可随意。”〔18，页375、376〕诸说纷如聚讼，迄无定谳。这种大相迳庭的认识和处理方法，甚至在同一个人的不同著作里也可以见到。下面，我们即对“同源同派”与“同源异派”的语音关系特点及其有关问题加以讨论。

（一）同源同派

“同源同派”是指同出一源而语音关系相同相近的语源现象。王力的《同源字典》所系联的“同源字”，大多属于这种情况。我们从中找出两组，分别作为韵部和声母情况的代表，按照其声韵配合关系列出图表，以观察同源同派的“同源字”之间的语音关系（为使印刷方便，删去一些僻见字，下同）。

先看韵部情况：

侵部·影母

əm暗：om晻（侵谈旁转）

　　əm暗：eəm黯：iəm阴　　荫窨（叠韵）

　　iəm阴：iən隐　（侵文通转）〔176，页602〕

其声韵配合关系如下表：（见下页表一）

这组“同源字”共涉及声母一个：“影”，韵部三个：“侵、谈、文”；三个韵部的关系是“旁转”和“通转”，符合王力所定的韵转条例。

再看声母情况：

韵＼声	影 ○	1
侵 əm	暗黯阴荫窨	1
谈 am	晻	2
文 ən	隐	3

阳部·定母

diang长：tiang长（定端旁纽，叠韵）

diang长：thiang畅（定透旁纽，叠韵）〔176，页357〕

其声韵配合关系如下表：

声＼韵	阳 ang	1
定 d	长（长短）	1
端 t	长（生长）	2
透 th	畅	3

这组"同源字"有韵部一个："阳"部，声母三个："定、端、透"；三个声母之间的关系都是"旁纽"，符合王力所定的声转条例。

《同源字典》中的这两组"同源字"，其语音关系与王力的主张

是一致的。其《同源字论》说："同源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读音相同或相近，而且必须以先秦古音为依据，……同类同直行者为对转，……同类同横行者为旁转。例如……耕阳旁转〔eng：ang〕 省〔sieng〕：相〔siang〕……旁转而后对转者为旁对转。……不同类而同行者为通转。……在同源字中，叠韵最为常见，其次是对转。至于旁转、旁对转、通转，都比较少见。……同纽者为双声。……同类同直行，或舌齿同直行者为准双声。同类同横行者为旁纽。例如：……帮并旁纽〔p：b〕 背〔puək〕：负〔biuə〕……同类不同横行者为准旁纽。……喉与牙，舌与齿为邻纽。……鼻音与鼻音，鼻音与边音，也算邻纽。……在同源字中，双声最多，其次是旁纽。其余各种类型都比较少见。值得反复强调的是，同源字必须是同音或音近的字。这就是说，必须韵部、声母都相同或相近。如果只有韵部相同，而声母相差很远，如'共giong'、'同dong'；或者只有声母相同，而韵部相差很远，如'当tang'、'对tuət'，我们就只能认为是同义词，不能认为是同源字。至于凭今音来定双声叠韵，因而定出同源字，例如以'偃''嬴'为同源，不知'偃'字古属喉音影母，"嬴"字古属舌音喻母，声母相差很远；"偃"字古属元部，'嬴'字古属耕部，韵部也距离很远，那就更错误了。"〔230，页12、20〕可见他对语音关系标准是掌握得比较严格的。时隔三年，王力又进一步缩小了"音韵相通的范围"，他在《同源字典的性质及其意义》中指出："为了编写一部谨严的《同源字典》，我必须严格地坚持两个原则：（一）同源字必须是双声兼叠韵的；……远在三十年代，我就写文章反对双声叠韵的滥用。我说如果只讲双声，不讲叠韵，则'红'可以为'黄'；如果只讲叠韵，不讲双声，则'旦'可以为'晚'。今天我这个观点不变。我认为同源字必须是双声兼叠韵。有时候是完全同音。……有时候是同音不同调。……有时候是等呼不同。……双声应该包括邻纽。

例如：卑pie，帮母，……婢bie，并母，……叠韵也应该包括邻韵。例如：杖diang，古定母，阳部；梃dyeng，耕部，……也应该包括对转。……从上面的例子看来，这些同源字既双声，又叠韵，所以是可靠的。”[231，页178、179]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前文的“旁转”相当于后文的“邻韵”，前文的“旁纽”相当于后文的“邻纽”；前文的“双声”、“叠韵”还保留在后文中，但范围有所不同；前文的“对转”也保留了下来；而前文的“旁对转”、“通转”、“准双声”、“准旁纽”、“喉与牙、舌与齿邻纽”、“鼻音与鼻音、鼻音与边音邻纽”等“比较少见”的通转条例都已被撤掉。这说明，王力对“同源字”的语音标准掌握得越发严格了。因此，他在此所列举的几组“同源字”，如“卑、婢”，“杖、梃”之类，无疑是“同源同派”的标本。无怪乎王力敢于宣称，“这样严格要求，就能做到有凭有据，信而有证，不同于主观臆断。这样做，会不会有所遗漏呢？可能的。但是，我们宁缺毋滥，以保持字典的科学性。”[231，页179、180]

（二）同源异派

“同源异派”，是指同出一源而分流数派，语音关系后来相差较远或很远的语源现象。语音关系的变化、疏远，有的主要表现在声母方面，有的主要表现在韵母方面，有的同时表现在声母和韵母两方面，因而出现了韵近声远、声近韵远或声韵俱远等复杂情况。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曾作《古韵同部之字义多相近说》，提出，“其有属于‘阳、侵、东’三部者，又以善大高明为义，则同部之字义恒相符。”[232，页21]后来，刘赜仿而效之，作《古声同纽之字义多相近说》，先举“泥”纽（赅“娘、日”两组）字，次举“明”纽（赅“微”组）字作为例证[233，页368]。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王力

《汉语史稿》下册第五十七节中的“同源词”部分，“提出一个‘词族’的问题”，“仍以‘明’母字为例。有一系列的‘明’母字表示黑暗或有关黑暗的概念。……再以‘影’母字为例。有一系列的‘影’母字是表示黑暗和忧郁的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概念的。……再以‘日’母为例。有一系列的‘日’母字是表示柔弱、软弱的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概念的。……再以‘阳’部字为例。有一系列‘阳’部字表示光明、昌盛、广大、长远、刚强等等的概念。”[28，页543—545]为了观察其语音关系，我们从中取出“影”母的一组和“阳”部的一组，分别作为韵部和声纽的代表，解剖麻雀，观察它们的声韵配合关系。

“影”母的一组反映了韵部的情况：（表见下页）

这个“词族”共有二十个词、二十二个字，涉及了十五个韵部。我们再将这十五个韵部放入《同源字论》所列的“韵表”[230， 页13]中，看一看它们的分布情况：（表见第175页）

这样看来，这个“影”母“词族”所涉及的韵部有的远相隔绝，按照王力所定的韵转条例，无论是“对转”、“旁转”、“旁对转”还是“通转”，怎么转也难以转得圆通。

“阳”部“词族”则反映了声母的情况：（表见第176页）

本“词族”共二十四个字，涉及十三个声母。我们再将这十三个声母放入《同源字论》的“纽表”[230，页18]中去，观察它们的分布情况：（表见第177页）

可以看出，有些声母同样相隔甚远，按照王力所定声母关系条例，无论是“双声”、“准双声”、“旁纽”、“准旁纽”还是“邻纽”，怎么解释也难以解释得圆满。

我们再以《汉语史稿》中的“影”母二十二个字为线索，分别将《同源字典》中有关的“同源字”串联起来，进一步观察其语音关系。

声 韵	影○	1
侵 əm	阴 暗 荫	1
阳 ang	影	2
质 et	曀 抑	3
脂 ei	翳	4
幽 əu	幽 黝 忧	5
觉 əuk	奥	6
宵 au	杳	7
文 en	隐	8
屋 ok	屋 幄	9
真 ən	烟	10
微 əi	哀	11
元 an	怨 冤	12
鱼 a	於	13
缉 əp	邑	14
物 ət	鬱	15

侵部·影母

（“暗黯阴荫窨隐”一组已录，见前“同源同派”部分）

甲类			鱼 a		宵 au	幽 u
				屋 ok		觉 uk
			阳 ang			
乙类	微 əi	脂 ei				
	物 ət	质 et				
	文 ən	真 en	元 an			
丙类	缉 əp					
	侵 əm					

阳部·见母

kyang景：yang影(见影邻纽，叠韵)

kyang景：kyang镜(叠韵)

kyang镜：keam监(鉴)(阳谈通转)

kuang光：khuang旷(见溪旁纽，叠韵)

huang煌：huang晃(匣母双声，叠韵)[176，页344]

质部·影母

yet噎：yet翳(同音)[176，页467]

物部·影母

iuət蔚：iuət鬱(叠韵)

iuək或郁：iuət鬱(职物通转)

iuət鬱：iuən蕴韫(物文对转)

iuən蕴：iuan菀(文元旁转)

iuan菀：uat荟(元月对转)[176，页448]

ət曀：yet翳(物质旁转)

韵 声	阳 ang	1
喻 j	阳 扬 洋	1
见 k	光 刚 京 广	2
明 m	明 猛	3
来 l	朗 亮	4
帮 p	炳	5
匣 h	旺 王 皇 永	6
端 t	章 张	7
穿 thj	昌	8
群 g	强	9
庄 tzh	壮	10
定 d	长	11
溪 kh	旷	12
影○	泱	13

yet翳：uat荟(质月旁转)

ət薆：iən隐(物文对转)[176，页449]

iuət鬱：uən温：iuən煴(物文对转)

iuək郁：iuət鬱(职物通转)

iuək郁：iuk燠(职觉旁转)[176，页450]

喉		影○						
牙		见 k	溪 kh	群 g				匣 h
舌	舌头	端 t		定 d		来 l		
	舌面		穿thj			喻 j		
齿	正齿	庄 tzh						
	齿头							
唇		帮 p			明 m			

宵部·影母

（按：为使印刷方便，宵部拟音据《汉语史稿》改写。）

yau窔：yau杳（叠韵）

iau窔：uk奥（宵觉旁对转）

yu幽：yu窈黝（幽部叠韵）

yu幽：uk奥（幽觉对转）〔176，页202、203〕

屋部·影母

ok屋：eok幄（叠韵）〔176，页293〕

幽部·影母

iu忧：yu怮（叠韵）〔176，页227〕

元部·影母

iuan怨：iuan冤（怨）（叠韵）〔176，页545〕

鱼部·影母

iua纡：iua迂（同音）

iua纡迂（同音）：iuai委逶（鱼歌通转）

iuai委逶：iuan冤宛蜿婉琬（歌元对转）

iuan宛：uan腕（元部叠韵）〔176，页122〕

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了：如果仅从上面任取一组"同源字"来看，它们的语音是相同或相近的；但将意义有关的若干组"同源字"对比来看，各组之间的语音关系就不那么近了。就是说，当把一个"词族"进行条块分割以后，再从肢解下来的一组"同源字"来看时，它们是同源同派的；而将各组"同源字"组合为一个"词族"以后，再从这个整体来看时，它们却是同源异派的。原来如此！

如果说，《汉语史稿》出版在前而《同源字典》在后，因而应以后者为准的话（《汉语史稿》修订本出版于1980年，《同源字典》出版于1982年，但《同源字典序》中说："从1974年8月到1978年8月……写成了这部书。"），那么，我们就只看《同源字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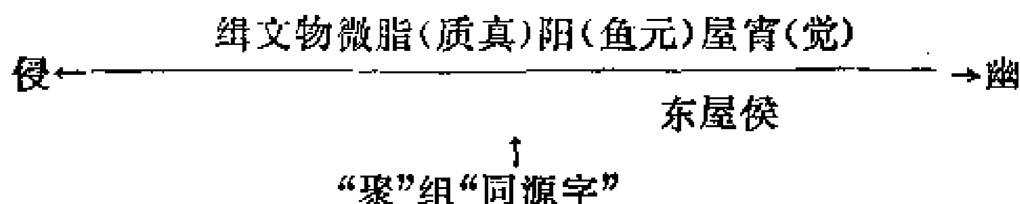
dzio聚：dzio冣（叠韵）
dzio聚：dziu遒（侯幽旁转）
dzio聚：tsok凑辏簇（从清旁纽，侯屋对转）
dzio聚：dzok族（侯屋对转）
dzio聚：so薮（从心旁纽，叠韵）
dzio聚：dzong丛（侯东对转）
dzong丛：dzhiuəm崇（从床准双声，东侵通转）[176，页197]

这组"同源字"的韵部在《同源字典》之韵表中的分布情况是：（表见下页）

将这组"同源字"的韵部分布情况与前面"影"母"词族"的韵部分布情况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的起点和终点都在韵表右下角的"侵"部和右上角的"幽"部。如果将它们的韵部通转情况简化为一条轴线，就可以观察得更清楚了：

甲					侯 o	幽 u
					屋 ok	
类					东 ong	
乙						
类						
丙						
类	侵 əm					

"影"母字"词族"



既然韵表两端距离最远的两个韵部可以通过中间环节而相通相转，那么，整个韵表中所有的韵部岂不是全都可以通过中介点而相通相转了吗？如果随意找出其中的一段来看，比如韵表左侧的"侵、缉、文、物、微"部，自然是同源同派；而从整个链条来看，"侵、缉、文、物、微"部与"幽"部，岂不是同源异派？而一旦接通了它们之间的"脂、阳、屋、宵"部等中间环节，"异派"而又同源的真象岂不是大白于天下了吗？可见，同源异派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比起音近义通、同源同派的现象来，音远义通、同源异派的语源现象更为普遍。李方桂说得好："古音部分极不相同之字，可以从同一语根演化出来，此中别有条例，我们现在毫未得其门径而已。"[234，页177]不说语言已有数十万年乃至

上百万年的历史，其史前时期的演变轨迹已成为历史之谜，就说文字产生以来的这几千年的短暂时间吧，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记音符号又不发达，因此，音韵研究所能获得的资料未能完备，分部与审音工作也未能尽善，很多音变的规律还不能全部为我们所掌握。另一方面，对一个具体的词来说，语音演变的情况极为复杂，而它们演变的历史轨迹，又往往被汉字所掩盖，难以探求，常常只能推测可能的路线而无法考察出每一时期的已然状况。所以，死守韵部和声类，就会对许多现象无法解释。段玉裁死守他的古韵十七部，对《说文》某些字的声音讲不通，只好说‘未详’，有时还凭主观臆测妄改原书。王念孙作《广雅疏证》，运用以音求义、以义证音的方法，所以成就较大。……对这种声音问题上的变例，完全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是不妥当的，唯一的办法是掌握较多的材料，重视分析与核证，然后再作结论。”〔90，页102、103、123〕

（三）声韵关系

在一个汉字的音节中，开头的音为声母，其后的音为韵母；声母与韵母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音节。但是，声母和韵母在语源现象中各自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前人和时贤多有注意及此者。

宋、元之间的戴侗，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为韵书者，不以声为纲，而凿者每以韵训字，故其义多忒。”[129]

清代的戴震，在《转语二十章序》中说：“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谱之，其为声之大限五，小限各四，于是互相参伍，而声之用盖备矣。……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更就方音言，吾郡

歙邑读若'摄'(失叶切)，唐张参《五经文字》、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已然。'歙'之正音读如'翕'，'翕'与'歙'，声之位同者也。用是听五方之音及少儿学语未清者，其展转讹溷，必各如其位。斯足证声之节限位次，自然而成，不假人意厝设也。"[235，页106、107]因此，在《声类表》中，"戴震另辟蹊径，虽仿等韵图而为音变服务，以供训诂家在训释古词时查对声母转化的参考，不要再笼统地说：声同、声近、声转，或一声之转，必须有个根据。所以他称《声类表》，不说'声韵表'。因为训诂主要在抓声母。"[73，页66]

程瑶田作《果裸转语记》，一开始即申明其旨："双声叠韵不可为典要，而唯变所适也。声随形命，字依声立，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形不相似，而天下之人皆得以是声形之。"[1，页1]初言"双声叠韵"，后皆言"声"而不提"韵"。文中又云"转声"、"一声之转"，而绝无"韵转"之言。

王念孙早年研究古韵，在为《广雅疏证》作资料长编时就会自然地以古韵为原则，其所作数种雅书分韵(《尔雅分韵》、《方言、广雅、小尔雅分韵》等)及按韵部排列同义词的《雅诂表》都是如此。可是，从《广雅疏证》系联的同族词可以看出，声母相同相近的同族词的数量远远超过韵部相同相近的同族词。王念孙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舍弃古韵排列法而改用声母编排法著《释大》。[236，页35]

其后，黄承吉在《字诂义府合按》中多次阐明："音虽异而皆统系于一声，是故声之为大。即如以上三条.'敦、墩、顿、……堆、对'，'饧、洋'，'信，申'，一而已矣。为古学者，正不必拘拘辨其音读，惟当以声主之。举此则余可见也。"[79，页10]"夫韵书者，后人之所造，古人非是用韵，乃是循声。……后世就而揣之，则分其迹为某部、某部之韵字，而其实声也。明其所

统是声，则亦不必定指某字为古读如某。盖声音一定，音读则随各方口舌之周流回转，而并无一定。惟后世则又不得不执定某字为某音读，以归于一定。……即韵书'支、齐、鱼、模'等一切部分之析目，抑亦皆可不施，施之反足为声通之窒碍。顾(炎武)氏守其部目，段(玉裁)氏去其部目，而皆未尽声音之道者，以但知主韵而不知主声也。……德成而上者，声之纲；艺成而下者，韵之目。"[79，页55、56]"盖凡字有定声而无定音，声出于天地之自然故有定，音出于各方之庞杂故无定。其字音'缅'、音'屈'，一也。即音'丘'、音'区'、音'句'、音'曲'，亦一也。若沾沾于音读之是执，则声义愈不明，而文字无由解。"[79，页183]按：其中"声""音"并提时，"音"指韵母。

陈澧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说："《尔雅》训诂同一条者其字多双声。……凡同在一条内而双声者，本同一意，意之所发而声随之，故其出音同，惟音之末不同耳。音末不同者，盖以时有不同、地有不同故也。其音之出则仍不改，故成双声也。"[237]按：他所说的"出音"、"音之出"即指声母，"音之末"、"音末"指韵母。

王国维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声母的重要性。他曾问业于嘉兴沈子培方伯曰："近儒皆言'古韵明，而后诂训明'，然古人转注多取双声。段王诸君自定古韵部目，然其言诂训也，往往舍其所谓韵而用双声；其以叠韵说诂训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则与其谓古韵明而后诂训明，毋宁谓古双声明而后诂训明欤?"沈子培回答说："岂直如君言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王国维受沈子培的启发，"及思为《尔雅声类》以观其义之通，然部分(引者按：指以韵部分之)之法辄不得其衷，盖但以喉、舌、牙、齿、唇五音分之，则合于《尔雅》之义例；而同义之字声音之关系若不甚显，若以字母分之，则声音之关系显

矣。"[238，页1、2]他还引用沈子培的话说："双声或同韵或不同韵。古字之互相假借转注者，有同声而不同韵者矣，未有同韵而不同声者也。"[239，页204]

钱玄同指出："窃谓古今言语之转变由于双声者多，由于叠韵者少；不同韵之字以同声组之故而得通转之者，往往有之。"[240，页23]

今人刘盼遂作《说文声谱》，"以字之同声者，义多一贯，兹编之作，重在循声推义。"其"自序"列举了转注、假借、形声偏旁、连语、韵脚、音训、读若这七个方面的例证以后说："综上七科以观，知夫双声者诚足以探文字之原泉，窥史皇之制作，核化声之蝉嫣，斩络籀之镵牙，其为功顾不重哉。而古今学士罕有专帙，条理终始，遂致群伤隙曲，难批窾窍。茂堂说《诗》，有难合之韵；允倩定声，起假借之失，皆于双声之学有所未尝故也。"[241，页216—220]

高亨也说："有事物而后有语言，有语言而后有文字。相同相似相属相关之事物，古今异谓，方俗殊称，遂出现多名。然语之相滋生转变，有自然之系统，大都双声相转者多，叠韵相转者少。"[243，页309]

朱星则从音理上作了解释："王国维也肯定训诂以声音为主，而声音尤以双声为重。这正符合语音学原理，因为元音、母音、韵母固不可缺，而辅音、子音、声母，更不可缺。没有前者就不能发音；但缺少后者就不能辨字，而成语言。清人因此而发明音变规律。而韵书本为诗歌词曲乐府而作，所以韵书中声母不被重视。但在字书反切中，切上字特别重要。总的说，双声叠韵不可或缺。"[73，页69]

今按，朱星分析了半天"声音尤以双声为重"的道理，末了却又来了一句"双声叠韵不可或缺"的总结式的话，而文中再也没有

对叠韵如何重要加以分析。他大概是觉得只讲双声不讲叠韵有失偏颇，故说了那句话以取得平衡。有人在评述戴震、王念孙的上述观点或作法时，也喜欢来这么一手，但谁也没有对此具体加以证明，只是虚晃一枪而已。看似公允、面面俱到，实则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面对以上所列那些论述几乎众口一词、作法几乎不谋而合的大量材料，我们不禁要问，声母和韵母在古代语言中发音辨词的作用为什么会如此不均衡呢？现代人类学、语言学等科学研究的成果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例如，我们知道有所谓单元音语言，这些语言中只有一个元音，如维什拉姆语、亚兰达语、阿巴札语。语言学家很感兴趣的各种卡巴尔达语也只有一个元音/a/(可以发得或短或长)和一个介乎/a/、/e/和/i/之间的/æ/，但是卡尔巴达语的辅音却特别丰富，多达70—80个。该语言中一个或两个元音同70—80个辅音可以组成140—160个不同的音节，这些音节可以看成是独立的音位。因此，各种卡巴尔达语中虽然元音贫乏，但它们的语音体系仍相当丰富。英国语言学家M·斯瓦德什想要在广泛比较世界上各种现代语言的基础上复原人类起源时代原始母语的面貌。他在研究之后提出了一个假说：这个母语里只能有一个元音和十一个辅音/p/、/t/、/tθ/、/k/、/kv/、/h/、/m/、/n/、/ŋ/、/v/、/j/。”[243，页53、54]假说需要证实，而上古汉语(由此可以推测原始汉语)中声母的作用重于韵母的现象，正好提供了这种证据。由此我们可以根据原始社会发展史和现代语音学原理来推断：在据今大约四万五千年的尼人(我国的马坝人、丁村人)所处的古人(前期智人)时期，分节语已得到相当的发展，氏族语言(清晰有声语言)已经萌芽。在这时的原始语言中，声母已经比较发达，而韵母却很少而且含混不清。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音器官的不断完善，人们发元音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于是，一方面需要承袭旧有的语音模式，另一方面又要有所区别而不致混淆，就主要在元音的变换、韵母的清晰化方面挖掘潜力：口腔的开合、舌位的高低、嘴唇的圆扁，都会使韵母有所不同。另外，时间的推移、方言区域的扩大，都能使处于音末的韵母轻易的发生变易。”郭振生同志用美国语言学家关于“元音往往比辅音有更重大的社会意义”的调查结果来说明我国清代人所谓的“一声之转”：因为汉语中作声母的都是辅音(零声母除外)，韵母一般都包含元音，而元音往往比较活跃，辅音则相对地比较稳定，所以“一声之转”就是声母相同或相近，而韵母不同。例如“狐疑”原是“嫌疑”，由“嫌”变成“狐”，二字声母未变，仍是匣母，韵母却变了，“嫌”属添韵，“狐”属鱼韵。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汉语音节结构中虽然除零声母外的声母都是辅音，但是韵尾也有辅音充当的，为什么不以它们为主来转变呢？这是因为在汉语音节结构中，开头的辅音具有制约性，它制约着整个音节的发展，再加上韵腹元音逐渐变化，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影响到韵尾，所以作韵尾的辅音较易变化或失落，不能以它作为声转中的轴心。如上举“嫌”转为“狐”例，是韵尾[m]的失落。此外，音转也有音随地变的因素。[244．页64、65]尽管声母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且变化的幅度更大，以致其研究的难度也就更大，但其变化的灵活性、普遍性却远远比不上韵母。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声母在词族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胜于韵母的不平衡现象。高本汉就发现，“从西藏语上所得的经验指示着我们，这种语言的演化有很多的‘元音变换’，因之在同一语根之内容有极多变异的韵素。我也要判定中国语里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现象。”[91，页107]随着今后古声母研究的不断进展，原始声母逐渐被揭露出来，声母在词族中的统率作用会渐趋明显。例如，＊kl－>t、＊pl－>t这条声母演变规律的发现，可以为我们解释这方面的不少语源现象，象

本书第二章中组合的"'骨碌'词族'"等(参看本节之五"亲缘关系"中"语音规则的对应"部分)。

三、词 形 关 系

词形指词的外部表现形式。

例如，我们在第二章"词形的变易"一节中讨论过的"瓠瓡"、"瓠(钩)"、"暌姑"这几个词形，看似不同，实则有着一脉相承的演变关系：

　　　　　　　　　　→ko瓠(钩)→kiweika暌姑
* klo→kolo瓠瓡—|
　　　　　　　　　　→(lo瓡)

这里共有四个词，可分为三种形式：1. 单音式：* klo、ko瓠(钩)；2. 联绵式：瓠瓡；3. 叠声式(旧归入联绵词)：暌姑。此外，许多单音节词还可以十分灵活地搭配使用，从而产生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双音节合成词，如"瓜"是单音词，它既可以与同源的单音词"瓠"组成双音合成词"瓜瓠"等，又可以和不同源的单音词"木"组成双音合成词"木瓜"等。这反映了词汇日渐丰富的发展趋势。下面就对单音式、联绵式、叠声式、合成式这四种形式的同族词之间的关系逐一加以讨论。

(一) 单音式同族词

单音词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单辅音声母和复辅音声母的纠缠问题。

上古汉语中是否存在过复辅音声母，尽管尚存在某些争议，但汉字谐声现象的研究和亲属语言的比较，向人们展示了越来越多的事实，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因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

的信服，甚至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人，也转而承认了这一现象，并用来解决语源研究中的此类问题。比如，梅祖麟先生就指出：

> 王力先生《同源字典》(1982)253页认为“墨”“黑”是同源词。注音是“xək黑，mək墨”，文中又说“按，‘黑’的古音可能是mxək，故与‘墨’mək同源”。王先生的说法值得商榷。第一，他在《汉语语音史》(1985)20页说：“董同和提出，上古应该有个声母(m)([m]的清音)，这是从谐声偏旁推测出来的。例如‘悔’从每声，‘墨’从黑声，‘昏’从民声等。高本汉对于这一类字的声母则定为[xm]。上文说过，谐声偏旁不足为上古声母的确证，所以我们不采用董说或高说。”在《同源字典》又说“黑”的古音可能是mxək，似乎是部分采用了高说。但是整本书mx只有“黑”字一音。我们不懂为什么要写mx，不写xm；也不知道mx到底是怎么样的声母，汉藏语系中哪个语言有这么样的复声母。第二，《广韵》“威，许劣切，灭也”，“灭，亡列切，尽也绝也”，“威”和“灭”是同源词，中古声母和“墨”“黑”一样，也是“明晓”两母，《同源字典》不载，还是需要解释。这书18—20页用双声、旁纽、邻纽的观念来分析同源词中声母的关系。如果说“墨”“黑”(和“灭”“威”)上古声母是m－：x－，显然既不是双声，又不是旁纽，也不是邻纽。如果说是m－：mx－，又违背王先生不信谐声偏旁，不信上古音有复声母的原则。[245，页180]

对于这一问题，齐冲天先生讲了有关的一件事：

一九七九年的春夏，我以整整半年的时间为我的导师王力先生查证《同源字典》，……王先生有一个原则：同源字双声为训时，韵母也应该差得不远；同理，叠韵为训时声母也应该差得不远。可是，在"职"部，"晓"母之下有一条说，"黑"与"墨"同源，两字"职"部叠韵，声母则"黑"为"晓"母，"墨"为明母，差距就很大了。我问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王先生说："我就此一例。墨有黑的意思，是无可怀疑的。"王先生平时对复辅音问题，持十分慎重的态度，既不轻易反对，也不轻易赞同。这里却空前地拟了一个复辅音，说："'黑'的古音可能是mxək，故与'墨'mək同源。"更重要的是，到了"微部·明母"之下，王先生又说，"墨"与"黴……煤"同源，均为"明"母双声。这样，"墨"字不就出现了两个语源吗？[246，页35]

不仅编纂语源词典绕不开这类尴尬问题，即使处理一些个别问题也够棘手的了。唐兰《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有这么一条：

简九〇　"卵一笥。"

"卵"写作"丱"，即《诗经·甫田》"总角丱兮"的"丱"（音"惯"），和《周礼·丱人》的"丱"（音"矿"）。唐张参《五经文字》说："丱，《说文》以为'卵'字。"唐玄度《九经字样·杂辨部》列"丱、卵"二字，注："上《说文》，下隶变。"可见唐代的《说文》还把"丱"作为"卵"，今本《说文》作为"磺"字的古文，是不知谁人按照《周礼》改错了的。"卵"读如"惯"（当然不是西方语言学家所推测的古代中

国语有复辅音），所谓“总角丱兮”，是把头发总成两个犄角。又读如“矿”，所以借作“矿”字。但是清代学者中有些人对张参等所说，还认为不足据；此简写作“丱”，出土竹笥木牌有“卵笥”写法也相同，出土遗物内又确有鸡卵一笥（图版二二〇），可为铁证。这个问题是到最后的定论了。[247，页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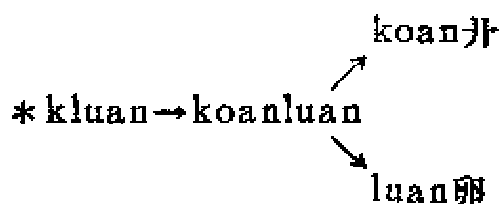
唐兰是最早也是最坚决地反对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学者之一，这里又说“丱、卵”的语音关系“当然不是……复辅音”，那么应该是什么？他又不肯说。是声母通转吗？牙音、舌音相隔太远；是“合音、析音”吗？又没有相应的联绵形式。在各种可能的途径都走不通之后，我们来看亲属语言中“蛋（卵）”的说法：

瑶语：klau（标敏）[20，页135]

独龙语：kalwm（独龙河方言）khalwm（怒江方言）[248，页213]

错那门巴语：khA?lum、khalum[21，页165]

我们已经证明，k-l-的早期形式是＊kl-，因此可以断定，“丱、卵”的语音演变关系是：



以上两件事例的本身，已充分说明复辅音声母的研究同语源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如严学宭先生所说：“构拟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除单辅音外，还必须建立复辅音声母结构的体系。……这只有等待我们从事汉藏语系比较和汉语语源研究有了基础以后，才可能有合理的解决。……须知有了复辅音声母的构拟，

不仅可以解释谐声系统的种种异常谐声现象，还可以说明古汉语中的音变，特别是许多稀奇古怪的又音以及形体、训读等的许多疑难问题，而且便于寻找汉藏语系的同源词，组成对应关系，建立原始型。”[249，页124]

现在我们已可以看出，单音节词存在着复辅音声母分化前后的两种情况：首先，在复辅音声母分化前，它们读复辅音声母，但仍是一个音节，所以是单音词；其次，在复辅音声母分化后，它们只有单辅音声母，就成为现在所读的单音节词了。但是，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不能如实反映读音的变化情况，这就出现了同一个汉字在其复辅音声母分化前后的不同读音问题。例如，同是一个“卝”字，在复辅音声母分化前读为＊kluan，而在其分化后就只能读一个声母，要么读koan，要么读luan，这就是唐兰所说的“‘卵’读如‘惯’”的情况。

由早期的复辅音声母到后期的单辅音声母，又出现了两种分化情况：一种是完全的分化，即由一个复辅音的词分化为两个单辅音声母的词，这两个单音词的声母合起来，正相当于那个复辅音声母，如＊kluan＞koan卝、luan卵。另一种是不完全的分化，即由一个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词只分化出一个单辅音声母的词，这个单辅音声母有时是复辅音声母的第一辅音，如＊klo＞ko瓠lo瓡＞ko瓠(钩)，只见“瓠(钩)”单用(《尔雅·释草》：“钩，𦬊姑。”《集韵·侯韵》：“瓠，王瓜也。”)，却不见“瓡”可单用(但从相应的联绵词“瓠瓡”及相似的“壶卢[葫芦]”之“卢”可单用的情况来看，“瓡”似乎也曾是可以单用的)；有时取第二辅音作声母。至于在由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词向单辅音声母单音词分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联绵词这一过渡形式的问题，我们在下面进行讨论。

（二）联绵式同族词

这是以联绵格式为表现形式的词。《果裸转语记》所系联的，主要就是这种同族词。

联绵词大多来源于早期复辅音声母单音词的分化，有的并且还可以再继续分化为单辅音声母的单音词。我们在前面屡次提及的“＊klua>kua lua果裸>kua果、liei欙（檁lua）”，“＊pliwt>piwliwt 不律>piw t笔（弗）、riw t聿”，“＊klo>kolo瓠瓡>ko瓠”、“＊klia>kia liau卢（筌籐）>kia篆（篷）、lia籐”等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样看来，联绵词是由早期的复辅音声母单音词向后期的单辅音声母单音词分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因此，联绵词与相应的单音词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表现形式。

为了深入观察联绵式同族词的特点，我们再看一组表示尖锐突出、参差交错义的联绵式同族词：

1．ts-ng-式

崔（嶵）嵬、岑崟、岑嵒（岩）、岑嶅、岑峩、岒（岔）嶮、岨峿、岝峉（岝崿）、岝崿、崒兀（屼）、峻嶇（峗）、嵯峨、嵲嵲、嵯岈、嵳岩、嵯峨（䙊䙊）、嶍岩、嵾崟、嶕嶢、嶒嶸、峚岳、齟（齰）齬、鉏鋙、齹齴（齴，研计切）、杈枒、鎈鑱、捷业、作鄂（嗧）、巉岩、鉏牙、崇牙、鉏御、锄鋙、簪遇、蟟齵、齱齖、齰岈、齇齖、齾齾、

2．ng-ts-式：

屹崒、嵦崒、嵬崔、嶢崢、嶢嶕、嶢嶭、齵（隅）差、隅眥（眦）、隅积、偶睉、牙槎（杈权）

以上两种格式的同族词，其基本意义为山峰的尖锐高峻、牙齿的参差交错、树枝的分杈斜挺、人事的旁出邪曲，它们之间有着引申派衍的关系。其语音形式特点有三：

第一，声母相同相近，韵母变动不居。

ts-ng-式词群的三十多个联绵式同族词，第一字的声母分别是ts(精、庄)、tsh(清、初)、dz(从、床)、s(心)，都是齿音；第二字的声母都是ng(疑)。再看韵母。第一字的韵部分别是“微、侵、歌、鱼、铎、物、叶、谈、宵、脂、月、质、元、屋、幽、侯、觉、文、锡”，共十九部；第二字的韵部分别是“物、缉、元、觉、歌、支、侵、铎、叶、微、之、侯、质、鱼、月”，共十五部。可见，它们的声母比较单纯，而韵部却比较复杂。

联绵式同族词的这种声母格式相对稳定而韵母变动不居的情况，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董为光先生指出：“联绵词两个韵母成分元音的高低，韵尾的异同，都不影响到表义。……从实际口语看，而不仅从书面文字看，异声联绵词声母格式之间的韵母成分有时是可以‘忽略’的。……众多的韵母形式显示着新的发展，一致的声母格式体现着历史的联系。”[77，页163、164]

针对联绵词的这一显著特点，许多有识之士在系联联绵式同族词时，就特别注意将声组作为系联的线索。王念孙的《叠韵转语》，王国维的《联绵字谱》，都是这样做的。殷焕先先生还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 我们如果立一个“叠韵之部”来安排联绵字，那么，联绵字的音义演变的情况，就会受到韵部的隔阂，而不能显示出来了。……汉语语音的转变，声组较为固定些。侧重比较固定的声组来分类，隔阂的流弊就可以大大减少。……所以，侧重声组来分类，还可以显示语言转变

的性质，也很便于对联绵字的声音意义的研究。至于声纽有互相转的，也大体转而不出其类。其大类可分为四：一，喉牙音一类(如：影……见……)；二，舌音为一类(如：端……知……照……泥……，来)；三，齿为一类(如：精……庄……)；四、唇为一类(如：帮……非……)。凡是古今音变而声纽因而不同的，还可以根据古读为之系联。这样办，同一语源的联绵字就不会被声纽不同所隔阂；这样办，同一语源的联绵字往往会聚在一起，观察它们之间的声音意义上的联系，也就了如指掌，省力多了。[250，页137、138]

在前人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青年学者冯蒸还把“搜集到的二十组较可靠的同源联绵词的语根及例词(各举二例)”列出了表格[251，页32]。现从中择取十六组转录如下，并将“语根”改为“声式”：(表见下页)

第二，前后音节倒换，词义仍然不变。

例如，《说文·厂部》：“厰，崟也。一曰地名。”王筠句读：“当作‘厰也。’‘厰崟’当读作‘严吟’，而又作‘崟厰’。《五音集韵》：‘厰，山崖状也。’(地名)义与上义不异也。桂氏曰：‘僖二十三年《谷梁传》“岩险之下”，馥谓即“厰崟”。’”段氏曰：‘盖《公羊传》崤之“嵚岩”是也。“嵚”盖即“厰”字。’筠案：二传本一事，‘岩险’、‘嵚岩’相颠倒，仍是一义，且皆是形容崤地之险，因目之为地名耳。”[252，页1271]

董为光先生认为，“音节倒换在异声格式的发展过程中是一种后起现象，它大大丰富了异声联绵词的语音形式。依据出现频率，也许我们能够把一些异声联绵词的互倒变体分为‘常式’和‘变式’。但在理论上似不能说‘常式’一定是最早的格式。最早的格式

编号	声　式	例　　词	编号	声　式	例　　词
1	p—s—	扶疏，婆娑	2	k—m—	沟瞀，谷雾
3	p—l—	部娄，佝偻	4	h—t—	荒唐，胡涂
5	b—h—	盘桓，彷徨	6	ʔ—r	逶迤，蜿蜒
7	b—r—	辟易，撇曳	8	ʔ—n	阿那，旖旎
9	m—d—	望洋，沐秃	10	dj—ng	崔嵬，岑崟
11	m—t'—	脉蜴，眠娗	12	tr—tr—	踌躇，蜘蛛
13	m—n—	蒙戎，尨茸	14	l—d—	龙肿，潦倒
15	k—l—	果裸，轱辘	16	l—b—	狼狈，刺癶

应在对词族进行综合分析之后，甚至是在进行亲属语比较研究之后确认。如表示圆转屈曲的g—l—和l—g—两式(混沦：*gwan ljwan，轮菌：*ljwən gjwən)词族研究表明前式居多，……按照类型学，亲属语复辅音声母的l成分以居于第二位为常。对应词瑶语屏边话'圆' klun，壮语武鸣话'卷' klian。这就证明l-g-式是后起的。"[77，页167]据此，我们在对ts-ng-式和ng-ts式的出现频率和词群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可以断定ts-ng-式为早出的格式，而ng-ts-式是后起的变式。但这种推断，还有待于在进行亲属语比较研究之后才能确认。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调查材料。

第三，可以独用一字，成为单音形式。

刘师培曾指出："《诗》'渐渐之石，维其卒矣'，笺云，'卒者，崔嵬也，谓山巅之末也。''卒'即《尔雅》之'崒，崔嵬'，即《尔雅》

之'嵯峨'，又即《甘泉赋》之'㠑嶉'……。譊长言之则曰'嵯峨、崔嵬、㠑嶉，而短言之则曰'崒'，以'崒'字为本字也。"[253，页16，17]

"崒(卒)"是第一字独用例。还有联绵词前后两字都可以独用的例子。《管子·宙合》："山陵岑岩，渊泉闳流。"《史记·司马相如传<子虚赋>》："其山……岑岩参差，日月亏蔽，交错纠纷，上干青云。"是"岑岩"为联绵词。《尔雅·释山》："山小而高，岑。"《方言》卷十二："岑，高也。"《孟子·告子下》："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此为"岑"字独用例；《广韵·衔韵》："岩，险也。"《孟子·尽心上》："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此为"岩"字独用例。联绵形式"岑岩"与单音形式"岑"、"岩"意义一样，都是形容高峻突出之状。这愈益证明：在系联同族词时，不应将相应的联绵形式与单音形式的同族词割裂开来。

(三)叠声式同族词

我们看同样是表示尖锐高峻、参差交错义的几个词群：

1．完全重叠：

(1) ts-ts-式：

崔崔、峻峻、崒崒、崱崱、嶄嶄、嶟嶟、巉巉

(2) ng-ng-式：

岌岌、峨峨、岳岳、嵒嵒、嵬嵬、巍巍、嶢嶢、嵘嵘、岩岩、嶷嶷、崖崖(露齿貌)、龂龂、(齴齴)

这种重叠，是相同的重叠。我们称此为"完全重叠"。

2．变易重叠：

(1) ts-ts-式：

崇崒、嶕崒、嶄崒、嶄崱、嵾嵯(嵾嵳、嵾差)、参差、嶜岑、

擢嶤

（2）ng–ng–式：

岌峨、岌嶷、岌嶷、嵔巍、嵬峨（巍峨）、嵬崿、嵬嶷、嵬岌、嶷岌、嶷峩（峩）、嶷岌、岊峿

从变易重叠的形式来看，ng–ng–式的一组词，前后两字形体不同、韵母不同，而声母却相同，都是疑母字；ts–ts–式的一组词，不仅文字形体和韵母不同，声母也略有不同，但又不出大类，都是齿音声母。根据语言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看，这种形式极有可能是由完全重叠的形式演变而来的，就是说，它们起初本来是完全重叠的，后来由于古今的和方言的这纵横两方面的变异，它们的语音发生了变化；再由于文人书写习惯的不同，笔之于书，就出现了这种声母相近、意义相同、形体有别的叠声式同族词。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变异重叠”。

叠声式同族词，与相应的单音式同族词和联绵式同族词之间，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崒崒、崇崒”与“崒”和“崒屼、屹崒”的关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前面所说的“瓁姑”与“瓠（钩）和“瓠瓡”的关系也是这样。这是我们在系联同族词的时候应该注意的。

（四）合成式同族词

单音词与单音词的复合，即成为合成词。不过，原来的单音词一旦复合为合成词，就只能称为“词素”而不再称“词”了。

例如，单音词“峻”，既可以放在其他词之前组成“峻隘”、“峻岭”等合成词，也可以放在其他词之后组成“险峻”、“高峻”、“峭峻”等合成词。这种搭配组合的灵活性，使得汉语的词汇更为丰富多样。这种构词方法，已成为现代汉语形成新词的主要手段。

按照构成的方式，“合成词可分为两类。a)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词根合成的，如‘朋友、庆祝、火车、立正、照相机、人行道’。b)由词根加词缀构成的，如‘桌子、瘦子、花儿、木头、甜头、阿姨’。前一类也叫复合词，后一类也叫派生词。”[254，页444]由“词根”加词缀构成的“派生词”与单音词的联系自不待言，因为词缀只是一种构词成分，并无实际意义；而“词根”也就等于单音词。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所谓“词根”是指构词法上的“词的主要部分”，与我们所说的“语根”并不是一个概念。这种所谓“派生词”，实际上只是词的构词的变易。下面要讨论的，是“词根”与“词根”构成的合成词与单音词的关系。

1．由同源的单音词(词素)重新组合的合成词(词组)

李瑾先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说：有些“同源的字(词)分化之后，又重新组合成同义并列结构的双音词，如‘能耐、乞丐、华夏、虚丘、存在、比并、逼迫……卿相、循环’等等。”他并且“以‘旬’与‘循环’等的音义发展关系为例，用以揭示一些同源的同义词分化之后又重新组合为同义并列结构的复合词(组)这一形态在汉语中并非偶然现象。”[85，页58]

这类合成式同族词，本来就是以单音的同族词作为词素构成的，二者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这种可分可合的合成式同族词，还可以找到很多，如变换辅音声母的“贪婪、依违、命令”等，变换元音的“肯綮、协合”等，变换辅音韵尾的“丰富、禁忌、莅临”等，变换元音及辅音声母的“问讯、教诲”等，变换元音及辅音韵尾的“下降、坎坷、生产”等，变换辅音声母及辅音韵尾的“等待、翕闭、配合”等等[255，页87—91]。

2．由非同源的单音词(词素)组成的合成词(词组)

建国以来的一些著作中所说的"词族",即指此类合成词而言。例如1979年版的修订本《辞海·增补本》这样解释说：

> 词族，由同一词根产生的词群。如汉语的"陶器"、"铜器"、"玉器"、"瓷器"、"铁器"、"木器"、"漆器"、"电器"等，为同一词族。在不同词族里包含词的数目多少不等。同族词在词义上有一定联系。[256，页117]

这种所谓"词族"和"同族词"，实际上是共时的构词现象，而不是历时的语源现象。张永言先生指出："这一类词的内部形式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语义学上的内部形式的分析和构词法上的词素的分析是重合的。"[106，页10]要分析这类词的内部形式，必须从构成这些词的词素(单音词)分别入手，各个词素(单音词)的语源意义既明，整个合成词的内部形式自然也就清楚了。不过，这种分析并不属于严格意义的语源学的研究范围。

四、字 形 关 系

同族词与字形的关系，恐怕是汉语词族内部诸种关系中最为复杂的一种了。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我们先从对同族词与字形的纠缠情况进行具体考察入手，然后在考察的基础上深入进行分析。

(一) 字形关系的复杂性

字形关系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初文与语根、同族词与同谐声字、字族与词族的错综关系上。

1．初文与语根

“初文”一名，出于章太炎的《文始》。其“叙例”曰：“于是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219，页2]

“语根的探求本为一种归纳的公式，系构拟的而非确知的，换言之，探求语根是以语言(音义)为主，而不以字形为主。”[145，页108]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初文与语根之间纠结交错的关系，也就可以“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地加以分析认识了：

(1) 个别初文记录了语根

原始人类见到那些相对来说形体较大的物体时，往往发出一声惊叹：“ɣiwa！”这种对大的赞叹，自然包含了“大”的意义。到了甲骨文时代，人们造出了相应的“于”字。台湾李孝定先生解释说：

> 《说文》：“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契文不从“丂、一”，其字形何以作“于”，无义可说。……“于”即“吁”之古文也，许言‘象气之舒亏’，即其义意。王筠《说文释例》云：“吾意‘于’当为‘吁’之古文，《诗》皆连言之。‘于嗟麟兮’，《传》以为叹词；‘于嗟驺虞’，《传》以为美之；‘于嗟阔兮’，《传》以‘吁嗟’释之。此三诗盖皆用本义，非省借也。”其说极确。[257，页1638]

可见，“于”字是记录语根ɣiwa的初文。

但是，像这样初文记录了语根的情况，并不多见。更多的情况则是初文并非语根，或语根没有初文。

(2) 多数初文不是语根

“父”字是初文，甲骨文中已有。罗振玉、郭沫若分别解释说：

《说文解字》:"父，矩也。从'又'举杖。"许释"丨"为杖，然古文，金文皆从丨，疑象持炬形。[257，页898]

"父"字甲文作"𠂤"，金文作"𠂤"，乃"斧"之初字。石器时代，男子持石斧(丨即石斧之象形)以事操作，故孳乳为父母之父(古文父母意犹男女，今人称雌雄牝牡为"公母"，即其遗意)。[257，页897]

今按：全世界各民族的父母称谓几乎都是来自儿语，汉语也不例外。儿语papa即是"父(爸爸)"的语根，而"父"的称谓只是直接由语根papa生发出来的根词，不再是语根了，二者之间已有了一些距离。无论"父"字的字形是手持木杖、火炬还是石斧，或是别的什么东西，都已经远离儿语papa这一语根不下十万八千里了。

我们看汉字中的初文，往往十有八九不是语根。就拿时代较早的甲骨文来说吧，其中使用得最多、几乎每一片刻辞都能见到的是"天干"、"地支"字，即"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等等[258，页16]。而天干、地支的概念，恐怕比数目的概念还要出现得晚。数目"一、二、三、四……"虽有初文，但是其在语言词汇中已是晚辈了，天干、地支恐怕连重孙辈还算不上呢!

(3) 许多语根没有初文

物体掉落滚动时的声音，是自然界中时常发生的，口语中也应该早就有了对这种声音的摹拟，但相应的汉字却迟迟未能产生。现在所知道的，最早见于明代许仲琳的长篇小说《封神演义》第四十八回："怎见得好风：骨碌碌如同虎吼，滑喇喇猛兽咆哮。"但这还不是直接描写物体滚落的声音的。直到清代曹雪芹的长篇小说《红楼梦》，才有了直接的描写文字。第八十七回："坐到三更以后，听得房上咕碌碌一片响声，……忽听房上两个猫儿一递

一声嘶叫。”这里的“唷碌碌”（一本作“骨 碌 碌”）字形就不是初文了。

2. 同谐声字与同族词

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有的初文被用来作为声符，“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由此而增衍了一批同谐一声的形声字。这一过程，即许慎所说的“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259，页314]

比如，由初文“于”孳乳的同谐声字，从沈兼士主编的《广韵声系》中可查得为112个[260，页939—944]；去除误从“于”声的“华”及从“华”之字共10个，仍有102个。其中有“大”义的“于”声字又有多少呢？我们看王念孙的《释大》：

> **卷六下**
>
> “于”，於也，气之舒也。故大谓之“迂”，长谓之“迂”，远谓之“迂”；自足貌谓之“于”，妄言谓之“谔”，舞号谓之“雩”，管三十六簧谓之“竽”。“于、爰、远”声之转，故曰谓之“爰”，亦谓之“于”，於谓之“于”，……缓谓之“迂”；……“宇”，屋边也，……故大谓之“宇”，……四方上下谓之“宇”，国四垂谓之“宇”，车盖四垂谓之“宇”；……“芋”，大也，故长谓之“芋”，嵉嵥谓之“雩”。[261，页4、5]
>
> **卷七下**
>
> “讦”，大也，故惊语谓之“吁”，张口鸣谓之“讦”，张目谓之“盱”，元气谓之“旴”。……诈谓之“讶”，……痛……亦谓之“忬”。[261，页4]

卷二下

"夸"，大也，故大言谓之"讶"，好谓之"姱"。[261，页4]

其中有"大"义的同谐声字共有13个：迂、謣、雩、竽、宇、芋、訏、吁、盱、杅、夸、誇、姱，只占了从"于"谐声字总数的12.6%。也就是说，另有87.4%的从"于"谐声字并不表示"大"义，尽管其初文（主谐字）记录了惊叹其大的语根。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同谐声字记录的，并不全是同族词。

那么，与"大"义有关的同族词，是否就只用这13个从"于"谐声的字来记录呢？我们再来看《释大》。因原有的各卷代表字似不够典型，且多冷僻字，所以我们从中重新挑出一些字为代表，分卷列表如下：（表见下页）

这些代表字，已达102个（原为174个），每个代表字又统率了一些谐声字或同义字（词）。尽管有些字所记录的词可能别有来源（参见第四章第一节），应该剔除出去，但至少已经说明：同族词并不仅限于同谐一声的字。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二个结论。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同谐声字与同族词，二者各自孳乳的次序是否一致呢？我们看同谐"于"声的两个字：

"雩"字，甲骨文中已出现，并已用作专名。

"芋"字，甲骨文、金文皆无此字，最早的字形为战国文字（此为裘锡圭先生见告）。

二字的产生时代相比较，"雩"字比"芋"字早了一千多年。

再看这两个字所记录的词的语源。

"芋"，来源于原始人类采集薯芋时惊叹其大之声（参见第二章第一节中"动情的感叹"部分）；

卷 一（见）	上	冈亢皋筒监觉佳介京乔坚
	下	公广昆褒千郭傀会缧嬰
卷 二（溪）	上	康凯衾丘契
	下	宽酷廓魁恢夸穹虚奎
卷 三（群）	上	强健乾奇祇祁
	下	渠巨夔
卷 四（疑）	上	眼岸敖艾牙垠言牛业
	下	吴元
卷 五（影）	上	阿央殷奄俺懿
	下	汪郁
卷 六（喻）	上	易寅衍艳亦夷
	下	王云员于伟胃容庸豫
卷 七（晓）	上	呵叫号
	下	奂霍兄畜挥翙徽
卷 八（匣）		宏夏洪伙皇汇贤胡后扈华昊

“雩”的语源，蒋云从先生考证说：

按《说文》：“雩，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亏’(按古‘于’字)声。䨒，‘雩’或从‘羽’，雩，舞羽也。”《礼记·月令》：“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注：“雩，吁嗟求

雨之祭也。"段氏注《说文》"雩"曰："以祈甘雨，故字从'雨'。以于嗟而求，故从'亏'。"《说文》："吁，惊也。从'口''亏'声。"王筠《说文句读》曰："'于'乃古字，'吁'则累增字也。《诗》'于嗟麟兮'之类是本文，非借字。《吕刑》：'王曰吁'，马本作'于'。许君说'于'曰：'於也。'即是吁义，故'吁'不在口部。"王念孙《释大》："舞号谓之雩。《尔雅·释训》：'舞号，雩也。'郭注：'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请雨。'《周礼·女巫》：'旱暵则舞雩，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礼记·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郑注：'雩之言吁嗟也。'孔疏引《春秋考异邮》云：'雩，呼嗟哭泣。'"据上面所引，则"雩"的语源似应为"亏"，也就是吁嗟呼喊的"吁"。[262，页475]

今按：《尔雅·释训》："舞号，雩也。"郝懿行义疏："'雩'者，《说文》云：'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或从羽作𩁹。雩，羽舞也。''羽舞'者，(《周礼》)《舞师》云：'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郑众注：'皇舞，蒙羽舞'，是许（慎）所本。此雩有舞之证。'号'者，《说文》云，'呼也。'《月令》云，'大雩帝。'郑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公羊·桓五年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然则'雩'之言'吁'，此雩有号之证。故《释文》引孙炎云：'雩之祭，有舞有号'。是矣。"(笔者颇疑甲骨文时代的人们在为求雨祭造字时，有人造出从"羽"、"亏"声的"𩁹"字，又有人造出从"雨"、"亏"声的"雩"字。只是后来人们多用"雩"作为专名用字，于是在现存的甲骨卜辞中于求雨祭义皆用"𩁹"字来表示了。)求雨活动，是农业已相当发达、粮食已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的农耕时代才开始出现的事。从人类早期的采集时代，到发达的农耕时代，其间经历了一百多万年。也就是说，"芋"这个词的产生，

可能比"零"这个词早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

文字的孳乳次序与词汇的孳乳次序之间，阴差阳错，前者并不能如实反映后者。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三个结论。

3．字族与词族

关于"字族"、"词族"，周祖谟先生分别作了解说：

> 字族 "族"是族类的意思。汉字在历史发展中的增衍繁多主要是形声字，同从一个声符的字可以有很多，其中有的只起表音的作用，有的不仅表音，还兼表义。表音兼表义的，可以归在一起，称之为"字族"（只起表音作用的不在其内）。[263，页552]
>
> 词族 "词族"跟"字族"的意义不完全一样，二者有两种分别：一种是，"字族"是从一个个汉字就其声符既相同，字义又相近说的，"词族"是从声音相通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同源词来说的，包括单音词和双音词，二者范畴不同。另一种分别是，"字族"从文字论，"词族"从语词论。说"字族"就是要从形体的谐声系统区分，说"词族"就不为形体所限。这两个名词是有区别的。[263，页43]

今按：字族与词族的概念、范畴、性质，这里都区分得十分清楚，二者的界限已经彻底划开。但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其联系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1）字族处于词族之中

例如，前面所说的"于"之字族，就处于"大"义词族之中。可见，词族与字族的关系，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2）一个词族包含若干个字族

从《释大》来看，“大”之词族包含了“冈”之字族、“亢”之字族、“京”之字族、“乔”之字族、“羽”之字族、“于”之字族、“敖”之字族、“央”之字族、“云”之字族、“肅”之字族、“可”之字族、“亡”之字族、“无”之字族……可见，一个词族可以包含多个字族。

（二）字形关系复杂性的成因

初文与语根、同谐声字与同族词、字族与词族之间这种犬牙交错、纠结缠绕的复杂关系，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

1．造词与造字时间的脱节

语言的历史，人们一般认为已有几十万年甚至一二百万年的历史。而文字的产生则要晚得多了，一般的甲骨文，也只有三千年的历史；即使将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甲骨契刻符号算作文字的雏形，充其量也不过八千来年[264]。经过这几十万年至一百多万年的沧海桑田，相当一部分原始语根已掩藏于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同族词的孳乳顺序已被打乱，词族内部的层次已遭埋没。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当初人类每创造出一个词，即造出一个相应的文字来记录，语言的产生与文字的产生同步进行的话，情况就会好得多。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创造文字需要人类有更高的智力和更好的条件。语言的产生时间与文字的产生时间既然已经脱节，也就不能指望二者能够取得一致了。因为人类无论是造词，还是造字，都是为了满足表达和交际的需要，需要什么，就造什么；需要不同，所造的结果也就不同。例如在早期采集时代，人们最需要的是可以饱腹充饥的果裸蚌蛤，于是就先为这些事物命名；进入阶级社会后，卜人为了王室的需要而占卜有关年成、

祭祀、征伐等国家大事，于是先造出了与这些内容有关的字来，如“雩”之类即是；而像“芋”之类于原始人类至关重要却与王室大事无关，因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物，无须占卜，自然也就用不着先为它造字了。

2. 造字时情况的复杂

“造字之初，人非一人，各绘各的形，各会各的意，因而普遍产生了一字多形的现象。”[93，页215]文字不仅非一人所造，也非一时一地所造。今天你为这个词先造一字，明天他为这个词又造一字。初期所造的象形、指事、会意字是这样，后期所造的形声字也是这样。古今语音有变，各地方音歧异；此地此人用这个声符表音兼表义，彼地彼人用那个声符单纯表音。人多手杂，时过境迁，造出的形声字也就各呈异彩，不可能整齐划一。与“大”义有关的字可以用“于”表音兼表义，与“大”义无关的字也可以用“于”表音。几千年造字的结果堆积到现在，情况当然复杂了。

3. 文字共性与个性的矛盾

汉字作为文字的一种，也就具备了文字的一般特点，即共性：只是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既是符号，那就可此可彼，词无定字，字无定形。汉字的“假借”现象实际上就是文字共性的具体反映。但是，汉字又有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字尤其是拼音文字的特殊个性：表意兼标音，音与义常常在字形上有所反映。所以段玉裁说：“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161，页809]王筠也说：“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义为本，而音从之，于是乎有形；后人之识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义，而文字之说备。”[265，页 1]若将他们“所见略同”的认识标示出来，可得

如下三个公式：

①形、音、义关系：

音←义→形

②造字：

义→音→形

③识字：

形→音→义

由此看来，汉字的形体是汉语词义和语音的书面表现形式，它是通过视觉形象来表现的；在造字时，字形是终点，是义和音的载体；识字时，字形又成了起点，是审音知义的先导。

文字的共性，使得大部分从“于”之字单纯表音，并无“大”义；汉字的个性，又使得一部分从“于”之字既表音，又兼表“大”义。共性与个性的矛盾，表现如此。段玉裁关于“‘于’有大义，故从‘于’之字多训‘大’者”的发现，只是从汉字的特性出发的。

4．使用时字形的演变

在后世使用文字的过程中，文字形体的演变也使语源与字形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例如，“《说文》：‘𠌶’，草木华也。从𠂹，亏声。荂，或从艹从夸。’(况于切)《说文》：‘华，荣也。从艹、从𠌶。’(户瓜切)……𠌶乃古象形文，上象蓓蕾，下象茎叶，小篆变为‘亏’耳。按字原象形，甲文用为祭名；秦人或加‘艹’为意符，遂有‘华’字；及后‘华’借为光华意，秦汉人乃另造‘荂’，见《方言》；六朝人又另造‘花’字。日久而‘华’字为借意所专，‘荂’字少用，‘花’字遂独行。”[14，页3952]由甲骨文、金文之形，还可以看出其与“骨朵”、“蓓蕾”的语源联系；至小篆讹变为从“于”声的形声字，就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声符“于”声中有义，从而得出其语源为“大”的错误结论来；再到“花”字，其语源意义已荡然无存了。

（三）字形关系复杂性的利弊

字形与语源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字形在语源研究中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1、分析字形有利于寻求语源

由于字形有较强的稳固性，比起词义和语音来发展要慢得多，因而能够保留一些已在词义和语音中不易觉察了的蛛丝马迹，透露出有关该词语源的某些讯息，给我们的研究以某种暗示。抓住它，也就掌握了解破语源密码的线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杨树达的《释镝》：

> 《说文·十四篇上·金部》云："镝，矢锋也。从'金'、'啻'声。"古书明此字之语源者：《释名·释兵》云："镝，敌也，言可以御敌也。"按凡兵器皆可以御敌，岂惟镝乎！成国之说失之皮傅，不足据信明矣。近人徐灏撰《说文段注笺》云："镝之言'适'也，去此适彼也。"按徐氏以"镝"同声类之"適"为训，然去此适彼，矢之全体皆然，何独限于矢锋！亦非其义也。余谓"镝"从"啻"声，"啻"从"帝"声，而"帝"则从"朿"得声，"镝"即受义于"朿"也。《说文·七篇上·朿部》云："朿，木芒也。象形。"矢锋锐利，足以伤害人，与木芒同，故取以为义。"朿、啻"今音虽殊，古音不异，"镝"之从"啻"，犹之从"朿"矣。[266，页17]

这种辗转得声而层层掩盖着语源的复杂情况，只有在对字形进行

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层层剥笋式的剖析之后，才能真相大白。这就足以说明，字形在语源研究中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在讨论词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排斥借助字形来探讨其间的关系”[171，页85]。至于“右文说”，则是利用文字形体系联同族词和探求语源的一种传统方法，参见第四章第三节中的“形沿法”。

2、望文生训也容易误解语源

由于文字作为语言书写符号的一般特点及造字、用字时情况的复杂，有相当一部分词的书写形式并不表义，只是依音记字而已。但汉字的特点却又将一些识字者引向了从字形解释语源的歧途，因而出现了许多望文生训、误解语源的情况。俞敏先生举出了这方面的不少例子，例如：

> 《尔雅·释草》说：“菟奚，颗冻。”郭注说：“款冬也，紫赤华，生水中。”《急就篇》有“款东贝母姜狼牙。”颗冻的音是kwotung。这种花儿学名叫petasites jaoonicus。花骨朵儿是一种长圆儿的小球儿。大概他得名的缘故，就因为这种骨朵儿，正好象虾蟆骨朵儿叫“颗东”一样。……《急就篇》的颜注说：“款东即款冬，亦曰‘款冻’，以其凌寒叩冰而生，故为此名也。”这正是“望文生训”，把“款冬”当打开冬天的门讲了。可是这个讲法儿是错的。第一，款冬花儿实在是春天发芽儿的，并不在冬天。第二，他不能解释虾蟆骨朵儿为什么也叫“颗东”。[267，页63、64]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语言首先是一串声音，文字是用来传写语言的。”[268，页3]因此，有必要“指出传统语言学的一个缺点，即往往不区分词义、造字的理据(字源)、造词的

理据(词源)和词的客观所指。”[269，页19]“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汉语的产生距离今天已有数十万年，而汉字的产生距离今天才不过五六千年。因此，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汉语的情况(这时当然免不了谈到汉字，可是谈到汉字仍然是为了弄清楚汉语的情况)，然后再看汉字是怎样记录汉语的。求其本源，顺流而下，才能势如破竹。”[270，页78、79]而字形关系对于语源研究，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它犹如一个向导，既能够将语源探求者领入正道，也可以将人们引入歧途。就克服消极作用的一面来说，必须“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138，页1]，以免被字形牵住鼻子，将研究引向歧途。就发挥其积极作用的一面来说，“因声求义”，不妨以字形为线索去了解声韵联系；“以义正音”也不妨以字形为契机去理解词义关联。“不限形体”，并非不顾形体，而应该“形体声音，更相扶胥”，全面分析，系统研究。问题的关键，是既要顾及字形联系，又要摆脱字形的束缚，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何准确地把握这两个方面，需顾及时则顾及，须摆脱时则摆脱，倒是一个需要认真谨慎地处理的复杂问题。

五、亲缘关系

恩格斯曾经指出：“要了解‘本族语的材料及形式’，就必须追溯这些材料和形式的形成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一不顾本族语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各种活的和死的亲属语言，那么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译文据伍铁平先生见告改正——引者)[271，页338]

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操汉藏系语言的各民族间有着历

史的亲属关系，汉藏语系的各语言间同样存在着历史的亲缘联系。比如说汉族与藏族、汉语与藏语吧，俞敏先生就曾作过《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的文章，利用历史资料和语言材料，来证明汉藏同源。其文根据《国语·晋语》和《水经注·渭水》篇，考证出姜姓的炎帝跟姬姓的黄帝这两个兄弟部族是从一个母系氏族——有蛴氏派生出来的，发源地都在渭水跟它的支流的源头，兴旺起来以后都往东走，分别顺着黄河南北岸往入海口奔。其中也有留下不走的，姜部族留在西北的就叫"羌"，说"姜"说"羌"，不过是说话带点方音罢了，羌人就是游牧的姜人。姜(羌)跟姬两个部族说的是一种语言的两个方言。到唐朝，羌人组成吐蕃王国，那地方在明朝叫"乌斯藏"、"卫藏"，就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加青海和川西。这个民族就是汉人五千年来的亲骨肉——藏族！藏话跟汉话也有亲缘关系，最奇怪的是跟姜姓独有的方言更象。上古史料可以给比较语言学提供语言亲缘的证据。[187，页45—53]

族名、国名也反映了民族间的亲缘关系。例如，董楚平先生的《吴越文化新探》一书认为："'夏、越'古音十分接近"[272，页39]，可谓真知灼见。但他只从韵部方面迂回论证，未能切中要害。杨向奎先生为之作序，"认为'夏'、'雅'与'越'古音同纽，越之称为'于越'乃齐鲁对'越'字之缓言，更可以说明'越'、'夏'之同属'疑纽'。"[273，页3] 今按："夏"，匣纽鱼韵，古音为 hea [176，页144]；"越"，匣纽月韵，古音为hiuat[176，页487]，二字声母和主要元音相同，只是介音和韵尾有差别，属于"鱼、月"通转。再证以古代文献等其他方面的材料，"夏、越一源"说是能够成立的。这样，越的后裔——壮侗、苗瑶等民族与汉族的亲属关系，以及壮侗、苗瑶语族与汉语的亲缘关系也就可以确立了。

从语言上说，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等语族同属于汉藏语系。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广泛地存在于语音、词汇和语法诸方

面。对这些语言的各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这些亲属语言间发生学关系的一致性，追溯原始语言的语源现象。

对于语源研究来说，亲属语言间在同源词、同源词群、同源词族及语音规则等方面的对应关系尤其值得重视。

（一）同源词的对应

“同源词是不同语言从一开始所共有的词。在这些同源词的基础上，可以建立符合规律的语音对应，并构拟共同的原始语言。”〔274，页41〕

汉藏语系各语言中同源词的对应联系，人们已经发现了不少，前面各章中提到的“水果、桃”、“丸、卵、蛋”、“自、鼻”等词在各亲属语言中颇为一致的语音形式，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些都是实词的对应，虚词也存在着这样的对应关系。请看俞敏先生的《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ji》：

汉语的“其”字儿有几种用法儿，历来没个好讲法儿，有一种就压根儿没人理会过。《切韵》给“其”字儿作的音是“渠之反”，音值是gi。《广韵》又添出一个“居之切”来，音值是ki。西藏话的gji有gji、gi、kji、ji、i五种形式。gser gji(金的)。rin gji(价钱的)。bdag gi(自各儿的)。bod kji(西藏的)。nub kji(西方的)。sems kji(心的)。ka ji i(口儿的)。在先秦的书里“其”字儿还有一种用法儿，跟古汉语的“之”字儿、现在北京话的“的”字儿，客家话的“介”kai、kɛ字儿，广州话的“嘅”kɛ字儿，厦门话的“个”e字儿，苏州话的“格”kə字儿一样。这种例子，过去的语法学者差不多全给忽略了。“朕其弟”(《书经·康诰》)＝“我的兄弟”。“孺子其朋”(《洛诰》)＝“小孩儿的伴儿”。“罔不配天其泽”(《多士》)＝“没不受老天爷的恩的”。“是其生也”(《左传·桓公六年》)＝“这小子的

生日"。"非此其身"(《庄公二十二年》)="不是在这个人的身上"。西藏话的gji字儿的用法儿正跟这五个例子一样，比方ngad kji我的。〔24，页75—79〕

"这些在语音形式和语法意义上都极为对应的汉藏语虚词，是不能用语言间的借用现象来解释的。因为语言的借用绝大多数是实词，尤其是名词，因此这种现象只能归结于同源。"〔275，页27〕

(二)同源词群的对应

在亲属语言中，不仅存在着一个一个的同源词的对应，而且存在着一群一群的同源词的对应，这种成群的同源词，构成了同源词群的对应关系。

例如，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广泛分布着一组"扒拉"联绵语，声母格式是p-l-，语义核心是"分离"，像"扒拉、拨拉"之类。汉语文献里这种词有不少：

仳离：人相别离。(《诗·中谷有蓷》)

披离：离散之貌。(宋玉《风赋》)

拨拉：以手分拨。(《广韵·十二曷》)

敷与：开舒四布。(《汉书·礼乐志》)

敷蕍：花瓣开舒。(《尔雅》郭璞注)

劈历：《方言》郭注："瓥，劈历。"

辟历：《释名·释天》："辟历，辟析也。"疾雷为"霹雳"。

辟易：《史记·项羽本纪》："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汉书》颜师古注："辟易，谓开张而易其本处。"避开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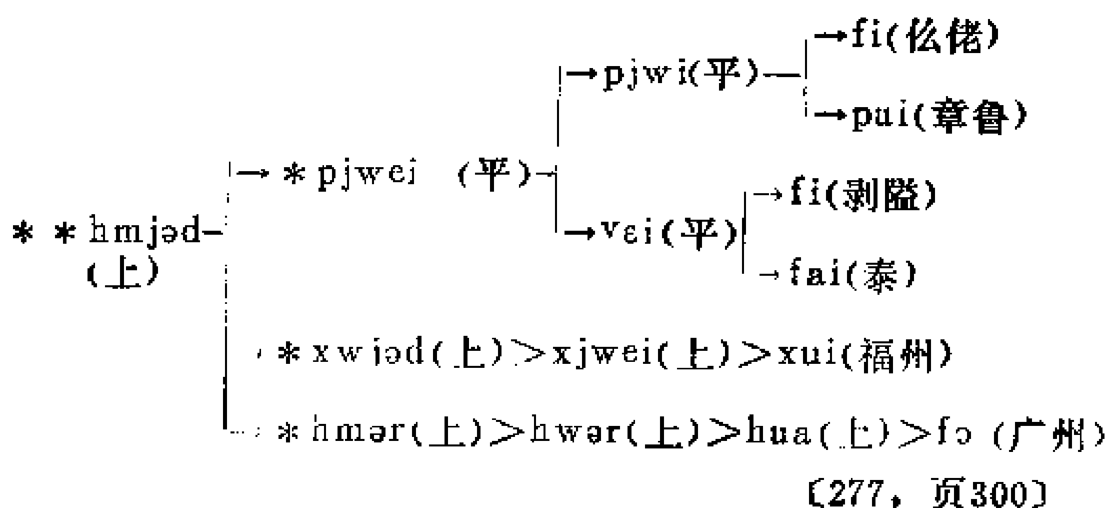
布路：《左传·襄公三年》："皆自朝布路而罢。"四散离去义。

亲属语言有关对应词列举如下：

藏　　文：	nbral—ba	被分开。
	hphro	分散。
缅　　语：	pra	分成几部。
巴 兴 语：	bra	分散。
克 钦 语：	bra	分散。
卡脑里语：	bra	路的分叉，铺展。
曼 罗 语：	bi bra	交叉点。
迪马萨语：	bara—bubra	树的分杈。
彝　　语：	phe	半。
景 颇 语：	bra	分散。
羌　　语：	dapala	解散。
苗　　语：	phlua	分开。
	pha	劈破。
瑶　　语：	phla	扒拉、散开。
	pha	劈破。
壮　　语：	pa	分，破。
	plak	劈。
	plek	裂。
	pja：k	别离。
泰　　语：	pha	分，破。
	plak	边，方面。
	phra：k	别离。
侗　　语：	rha	分，破。
水　　语：	pha	分，破。
	pja：k	劈。〔77，页165、166〕

汉语方面，还有不少同样表示“劈裂、分离”义的同族词可以系联进这一同源词群。请参看第四章第三节中的“构拟法”部分。

“仳离、披离、拨拉、敷与、敷蒍、劈历、辟历（霹雳）、辟易、布路”是一个主要由孳乳的同族词组成的词群，各个同族词的意义同中有异。我们再看一个主要由于词形变异而形成的词群，以及它与亲属语言同源词的对应：“火”这个意义，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就有“火”（呼果切）、“焜”（许伟切）、“燬”（许伟切）、“熚”（卑吉切）、“焊”（缚牟切）、“炥”（普活切）、“炦”（蒲拔切）等与民族语音义有关的同义、近义词。再比较一下某些民族语“火”义的读音：藏语拉萨话me、哈尼midzɑ、拉祜ami、彝语mutu、普米ma、壮语fei、布依语vi、傣语fai、侗语 pui、仫佬语fəi、水语vi、毛难语vi、黎语fei、苗语pitu等。两相对比，知汉语“焜”字可与藏缅、壮侗两个语族“火”的读音对应，“焜”字原始读法应为＊xmwjəd，其复声母之＊m-可与藏缅语的声母m-相当；＊x-在合口＊wj前要变f-，先是重唇p-，后又变轻唇f-，这可与壮侗语的p/f相当。再就是元音相近，韵尾＊d消失，变成i了。因此这组同源词的原始型可拟作＊＊xmwəd，则便于解释后世读音分歧之故。这样有一定的转变规律相对应，似非任意选取或偶然巧合。〔276，页2、3〕其音变程式如下：



〔277，页300〕

（三）同源词族的对应

亲属语言中，同样存在着同源词族的对应关系。

前面曾经提到，在四川，无论是汉族，还是藏族、彝族，都用“骨噜”来形容圆转的事物。看来，“骨碌”（＊kl-）这一语根，广泛地存在于各亲属语言中。如果能仿照汉语中“骨碌”词族的例子，把汉藏语系各语言中的类似词族一一列出，以供比较，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巨大工程。这项工作对于整个汉藏语系语言比较的意义有以下三点：1．在比较词语的选择方面，可以更好地利用汉语丰富的语言资料，将不同时代从不同途径“沉积”在文献中的纷繁复杂的同义语词加以梳理，能够提高研究的价值。从“词族”角度进行一些整理，使我们在选择时多了一层依据。2.在对应词的原始形式的构拟方面，有同族语词互相参证、补充，语词的原始音义形式当较容易追索，所得结论也更接近于真实。如利用相关的联绵词，对于确定比较语词的复辅音声母形式有相当重要的作用。3．在对比较语言的系属作出判断方面，如果汉语与其他亲属语言不仅有着若干基本词的对应，而且有着一些相关词族的对应，特别是当中一些词的音义形式具有自身发展的特点，无法用“借贷”加以解释，那么，人们是会对某些已知事实刮目相看的〔214，页205〕。但是，这既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又要占用大量的篇幅。现在只有把这一问题提出，留待以后再进行探索了。

（四）语音规则的对应

“因为每个语词有其固定的语音形式，所以词汇比较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音韵比较，二者的区分仅是着眼点的不同，前

者着重的是词汇系统，后者着重考察的是语音系统。”〔278，页16〕而词汇比较与音韵比较又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同源的词、词群和词族的比较，可以发现亲属语言间某些语音演变规律的一致性。

1933年，潘尊行的《果裸变语与谐声》一文，通过对“果裸”词族的考察和其他语言的比较，发现：“盖以语核言之，kr——组，pr——组并得与 tr——组相转换”，从而归纳出一条语音演变规则：

GR→DR←BR〔75，页89、90〕

其后，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如闻宥，Sarat(Chandra Das)等先后发现藏语等语言中都有br>d－、b'l>d'－的语音演变现象〔78、页25〕。

1980年，美国的包拟古先生在《原始汉语和汉藏语》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汉藏语的一条语音规则：kl－>t－、pl－>t－〔275，页28〕。其后，张均如先生指出壮侗语的塞擦音也来自原始台语的pl、kl等复辅音声母〔279〕；张世禄、杨剑桥等也论证了汉语中“由舌根音或唇音跟r组成的复辅音声母演变为舌尖塞音，即＊kr－>t－、＊pr－>t－等”的音变〔76，页106、107〕。可见，亲属语言间的语音演变规律是多么惊人地相似！

对应的语音规则的发现，反过来又可以指导词汇的比较研究和同源词的系联工作。“在进行汉藏词汇比较的时候，汉藏语言特殊的语音演变规律是语言学家手中重要的钥匙，一旦找出来某一演变规律，同源词的数量就可增加一批。”〔275，页28〕

六十年代初，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汉语史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有待开展，那就是语源学。清代的训诂学者已经指明，要明训诂必须通音韵，不可以受汉字的拘束，这就已经指出语源学的研究方向。近人曾经有过试探性的论文，但是总的说起来，这项研究还没有放在科学的基础上。现在的条件毫无疑问已经比

清儒所有的条件好得多，古音的研究已经有了些头绪，汉藏语系诸语言的资料也日见增多”〔280，页28〕，明确地指出语源学的两个最主要的条件——音韵学与汉藏比较语言学，它们甚至可以说是汉语语源学的两大支柱。“我们相信在这有利的基础上，汉语的语源学以及相伴俱来的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都会在最近的将来取得长足的发展。”〔280，页28〕

第四章

语源的研究方法

方法是在实践中创造的。语源研究的方法，要从语源研究的实践中去总结。纵观汉语语源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古往今来的研究工作中，曾经使用和正在使用着平面、下沿、上溯和立体等研究方式，据形、据音、据义和综合等具体研究方法。对这些方式、方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研究阶段，有必要一一加以总结、分析和比较，以便于把最前进的一线作为基点而再发展。

第一节　平面式方法

在语根不确定的情况下，不分先后，不辨源流，只是把一个时所的同族词归纳在一起，这种平面系联同族词的方式，可称之为"平面式"。由于系联归纳时依据的线索及侧重的方面不同，平面式又包括据音系联的音系法和据义系联的义系法这样两种具体系联方法。

一、音系法

西汉时的扬雄，在《方言》中初创“转语”、“语之转”等术语，如卷十：“煤，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焜’，火也。”晋代的郭璞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又进一步分出“语转”(语音的变转)、“声转”(声纽的变转)[281]、“语声转”(包括“语转”和“声转”两种情况)等名目，如《方言》卷一：“敦、丰、庞、夼、帳、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庞，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夼’，或曰‘帳’；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郭璞注：“语声转耳。”这是平面地记录、观察方言词与古今语中的同族词这一做法的滥觞。

直到宋元之间的戴侗，始将“一声之转”的术语运用于系联归纳“声近义通”的同族词。如《六书故》卷九“女”字条：

> “吾、卬、我、台、予”，人所以自谓也；“尔、女、而、若”，所以谓人也。皆一声之转。

如果说，戴侗的这种“因声以求义”[129]，根据语音排比系联同族词的作法还只是一种尝试的话，那么，明末的方以智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则要自觉得多了。他明确提出：“以音通古义之原”[194，页61]，“因声知义，知义而得声”[194，页116]，并将这一认识付诸实践，身体力行。请看他的《通雅》卷一：

> 啐、哜、雧、噍、咀、嚼”同声义。“噍”，即入切；

粒食曰“噍”，肉食曰“嚼”；“啐”，子内切，又子律切，小啜也；亦作“啐”；“呩”，在旨切，饮沾唇至齿也；又“啑”，子狎切；亦作“嚁、唼、喢、嚃”，作答切；亦作“咂、嗒”，皆嗽也。吮、嗽从唇，啑、嚃从唇舌。[194，页75、76]

这种方法到了清代，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王念孙作《广雅疏证》，郝懿行作《尔雅义疏》，钱绎作《方言笺疏》，常常左右采获，旁推交通，蔚为风气；却又都免不了限于原书体例，只能随文注释，分散系联，不成体系。只有程瑶田的《果裸转语记》，独树一帜，对同族词加以归纳罗列，使之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系列组合单位。仅在现存的一篇中，作者就罗列了自认为与“果裸”音义相关的二百多个同族词；据此推算，全书四篇，所系联的同族词可多达一千以上。可谓“观其会通，穷其变化，使学者读之，而知绝代异语、别国方言，无非一声之转，则触类旁通，而天下之能事毕矣！”[218，页15]至于为何要以“果裸”一词开场，文末也作了说明：

铭曰：转语胡始？姑妄言之；乃释“果裸”，遂以先之。何先何后，厥终厥初；如携如取，信笔而书。来今往古，四方上下；大夫学士，老妪稚子；典册高文，鄙谚俚语，胡不次焉，兹为遗矩。[1，页14、15]

看来，程氏只是从《尔雅》中随手抓来“果裸”一词，以此开始系联同族词。至于这些同族词“何先何后”的次第，“厥终厥初”的源流，则不予梳理、探究。这正说明他系联同族词的方式，是不分源流、不辨次第的平面式。从扬雄、郭璞到戴侗、方以智，再到程瑶田、

王念孙，都是以语音为主要线索来平面系联同族词的。这种以音为经、以义为纬的方法，是平面式的第一种具体研究方法，可称之为"据音系联法"，简称"音系法"。

现代，由于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巨大影响，随着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能够使用现代标音方法，通过共时描写和内部构拟，重建古音系统，据音系联的"音"，也就由"双声、叠韵"等笼统模糊的概念，变为一套具体精密的周秦古音系统；由宽泛无边的"一音之转"，变为严整清晰的辅音变换、元音屈折等转换法则，传统的据音平面系联同族词的工作，开始走上了更为科学的道路，先后出现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汉语词族》、日本汉学家藤堂明保的《汉字语源辞典》、中国学者王力的《同源字典》（此将在另书《汉语语源学史》中详述）。

音系法是"会音析义"的方法，即以语音为线索，综合音同音近之词，观察它们的意义。因为它"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这就"冲破了字形的蔽翳，从有声语言本身观察词的形式"[282,页157]。所以王力将其誉之为"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282，页157]。

需要指出的是，音系法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一种隐藏着极大的局限性、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方法。

先看音系法的局限性。

王力"反复强调"："同源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语音相同或相近，而且必须以先秦古音为依据，因为同源字的形成，绝大多数是上古时代的事了。"[230，页12]实际上，语言的产生，已有数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的历史。从于史无证的汉语产生及形成的时代，到有文字记载的周秦时代，这一段时间距离，比起从周秦时代到现在这段时间距离来，要长不知多少倍。在那样漫长的时间里，汉语已经历尽沧桑，数度分合，又因缺乏文献资料，

已经难以辨识其原始面目了。语言产生和形成时代出现的同族词，其语音不可能全部永远保持相同相近，免不了要发生一些变化。到了几十万年后的周秦时代，尽管有些同族词还保持着同源同派，而有的早已变成同源异派了。这样，要用晚得多的周秦古音去系联距此数十万年的汉语产生及形成的史前时代的同族词，不免绠短汲深，捉襟见肘。明确地说，音系法只能用已知的"音"去系联那些在周秦时期还较为明显的音近义通的同源同派的同族词，而对于沉积在更深的历史层次、被复杂的音变现象掩盖的义通音不近的同源异派的同族词，就一筹莫展，无能为力了。这虽然是整个语源研究工作的通病，而在以音为主的方法上则似乎尤为突出。"以先秦古音为依据"所系联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还可再次系联的词群而已，远远不能揭示出词族系统的全貌。初步系联音近义通的同源同派的同族词，虽然也是语源研究的必要步骤，但决不是语源研究的终极目的。可见，音系法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再看音系法的缺陷。

齐冲天先生发现：《同源字典》的"职部、晓母"之下有一条说，"黑"与"墨"同源，两字职部叠韵；到了"微部、明母"之下，又说"墨"与"晦……煤"同源，均为明母双声。这样，"墨"字不就出现了两个语源吗？[246，页35]

其实，这还不算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只要翻翻《同源字典》，就可以发现，"头、髑髅、顿颅、首"[176，页406]与"颅、髅"[176，页151]分开，"螳"[176，页355]与"螂"[176，页358]分开，标明"参看"，而"崔、嵯"[176，页406]与"嵬、峨"[176，页395]分开，"参"[176，页615]与"差"[176，411]分开，却连"参看"的字样也没有。这些又该如何理解？难道同一个联绵词的前后两个字，也都不是"同源字"，活该斩头去尾，身首异处？至于单音

的"同源字"，本来可以系联到一起的，却分为数处，例如《汉语史稿》中的几个"词族"，到了《同源字典》中，被肢解成了七零八落的若干组"同源字"。这种支离破碎的情况，在《同源字典》中触目皆是。

不仅音义标准掌握得较严的《同源字典》是这样，就连音义标准掌握得较宽的《汉字语源辞典》也免不了如此。王继如同志即指出：其第166系"果、禾、和、卧、瓦、卫、丸、元、完、原、亘、宛、卷、官"[283，页611—624]和第188系"骨、回、韦、胃、鬼、归、军、旬"[283，页712—723]都有"圆转、包围"之义，韵部是"哥、微"旁转，本可作为一个词族（自然，其中有个别字可能是同音异源，当另作处理），但作者却由于否定旁转而硬分成两族了[284，页122]。

那么，如果再放宽语音标准，采取《果裸转语记》的作法，"双声叠韵不可为典要，而唯变所适也"，对同族词的语音不加限制，情况又怎样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作虽然克服了割裂词群、肢解词族的弊病，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杂乱堆积，没有条理。针对这种情况，朱星指出：

> 有人读了程瑶田的《果裸转语记》，以为这只是把义同、义近而又音相近的复音连绵词材料分为若干组凑在一起就是了，并没有什么规律性可言。我以为此文是札记式的材料，猶须从新加以整理。虽以"果裸"一词开场，但全文混列不少组，"果裸"一组可拟为KL组，"蒲蠃"一组可拟为BL组，"扶苏"一组可拟为BS组，"欂儒"一组可拟为DL组，"科斗"一组可拟为Kt组，"流苏"一组可拟为LS组，"摩娑"一组可拟为MS组。……〔73，页68〕

这样作，虽然仍能从总体上保持词族的完整性，但在具体词目上还是免不了条块分割，比如"果蓏，蒲卢"，本为一名之变，却要分别列入KL组和BL组；"头、颅"，明为"顼颅（髑髅）"之分化〔185，页 255〕，也只有分别列入 t 组和L组。这样一来，又回到《同源字典》等做法的圈子里去了。

至此，平面式音系法的弊病已暴露无遗：若将音义标准掌握得严格一些，词群的规模掌握得小一点吧，就会出现割裂词群、肢解词族的弊端，标准越严、规模越小，就越显得支离破碎，甚至连"不可分训"的联绵词也免不了吃上一刀，落得个身首异处；若将音义标准放宽一些，词群规模搞得大一点吧，就会出现同族词杂乱堆积的现象，标准越宽、规模越大，越是杂乱无章。反正叫你标准宽也不是，严也不是；词群大也不是，小也不是。真是左右为难。

在《同源字典》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标明"某字亦与某字同源，参看某字条"字样的词群。既然认为同源，为何不系于一处?究其原因，正因为作者采用的是音系法，"以音为纲，把同源的字罗列于一个音系的下面，加以解释"〔231，页177〕，而且又是"以韵部为纲，声纽为目"。正是这"纲"、"目"隔开了它们，结果与作者的初衷相违，出现了把"同源字"罗列于两个音系下面的怪现象。既然如此，那也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委曲读者去"参看"了。

二、义 系 法

王念孙到了晚年，欲上追其老师戴震的《转语二十章》、友人程瑶田的《果裸转语记》发凡起例之作，综合《广雅疏证》等材料而作《释大》，"取字之有'大'义者，依所隶之字母汇而释之，并自为之注。存'见、溪、群、疑、影、喻、晓'七母，凡七篇，篇分上

下"〔285，页522〕，另有"匣"母半篇；"牙、喉八母字得此乃备"〔286，页2〕。各卷上、下篇所列同族词代表字，本书已引，见第三章第二节中"字形关系"部分。每个代表字下面，又排列了有关的同族词。如开篇第一字"冈"字下：

冈，山脊也；亢，人颈也：二者皆有大义。故山脊谓之"冈"，亦谓之"岭"；人颈谓之"领"，亦谓之"亢"。强谓之"刚"，大绳谓之"纲"，特牛谓之"犅"，大贝谓之"魧"，大瓮谓之"缸"，其义一也。"冈、颈、劲"声之转，故强谓之"刚"，亦谓之"劲"；领谓之"颈"，亦谓之"亢"。〔261，页1〕

如此归纳排比，洋洋洒洒，有曲尽旁通之妙，只可惜"今存首七篇，视全书不及三分之一。"〔286，页523〕这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谜：《释大》全书应该是什么样子？王国维推测说：

据第四篇"岸"字注云："说见第十八篇'洒'字下"；又第三篇"碁"字注云："物之大者皆以'牛马'称之，说见第二十三篇。"……案唐、宋以来相传字母凡三十六，古音则舌头、舌上、邪齿、正齿，轻唇、重唇，并无差别，故得二十三母。先生此书亦当有二十三篇，则此书自十五篇至第十九篇当释齿音"精、清、从、心、邪"五母之字，自二十篇至二十三篇当释唇音"邦、滂、并、明"四母之字；然则第九至第十四六篇，其释"端、透、定、泥、来、日"六母字无疑也。〔285，页522〕

由此看来，"王君《释大》，博综群书，裒然巨帙，其制以纽类之

洪细，分列其辞，必比合观省，义例方显”〔4，页270〕，即把与“大”义有关的词尽可能地汇集起来，分列于古音二十三字母之下，即得二十三篇。这样，若从部分来看，是据声系联；而从全书来看，则是据义系联。可见，《释大》全书采取的是平面系联的方式，以义为经，以声为纬，平面地系联排列有“大”义的词。这种在全局上主要以词义为线索加以系联的方法，是平面式的第二种具体研究方法，可称之为“据义系联法”，简称“义系法”。

如果说，音系法是会音而析义的话，那么，义系法则是会义而析音。正因为如此，义系法也就克服了音系法的拘于语音和肢解词族两大弊病，能够挖掘到语源沉积的更深层次，扩大系联归纳的范围，增加词族的容量。例如，同训为“大”而声纽都属喉牙的词群，在《同源字典》这类书中，因为囿于韵部、声纽，只能条块分割，分散系联，结果七零八落，远相隔绝；而在《释大》中，它们却可以相邻互见，“不相杂厕”，共处于一个完整的系列组合中。因此，在显示词族的系统性方面，比起音系法来，义系法有着显著的优点。

另一方面，义系法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1．范围不易把握

王念孙在写《释大》以前，已经以九年的时间，完成了《广雅疏证》一书。“有识之学者大抵先借疏证古书之机会以搜集材料；材料具备，然后综合之以成一有系统之学说。王氏《释大》殆即欲综合《广雅疏证》之材料，以说明古代训诂之范畴”〔124，页96〕。因此，关于《释大》的整体构架，我们可以从《广雅疏证》及《释大》残篇中窥见其大略：

《广雅疏证》：

道、天、地、王、皇、丰、恢、博、殷、粗、兄、荒、沛、拓、衍、临、佳、方、夸、汇、凯、般、张、觉、封、佛、大、贤、胡、侈、广、旁、奄、朴、魁、沈、岑镫、甫、哆、敦、芋、万、都，大也。〔疏证〕大则无所不覆，无所不有。……“远”亦“大”也。……“厚”与“大”同义。（卷一上）〔138，页4—6〕（按：为排印方便起见，有些冷僻字据王念孙疏证改为通用字或删除，下同）

仁、或、员、虞、方、云、抚，有也。〔疏证〕“有”与“大”义相近。〔138，页6、7〕

邈、易、勿、离、钊、旷、云、极、辽、遥、迂、迥、超、卓、越、徂、崧、征、篮、高、荒、裔，远也。〔疏证〕凡“远”与“大”同义。〔138，页12〕

抗、于、磔、彀、黄、披、摅，张也。〔疏证〕凡“张”与“大”同义。〔138，页13〕

腆、醇、烈、占、翠、皇、翼、滑、党、贲、肤、熹、秀、甘、珍、旨、甜、蒸、将、英、岂、娥、媛、艳、且，美也。〔疏证〕大亦美也。……“美”从“大”，与“大”同意。〔138，页22、23〕

重、叠、膞、醇、农、渥、陆，厚也。〔疏 证〕凡“厚”与“大”义相近。（卷三下）〔138，页91〕

岑、元、兀、嵬、极、竞、瓶、尚，高也。〔疏证〕凡“高”与“大”义相近。（卷四下）〔138，页126〕

《释大》：

“大”与“善”义相近。（卷一上）〔261，页2〕

“据王氏的研究成果，我们看到，凡与‘大’义相通者，计有‘高’、

'远'、'厚'、'广'、'长'、'壮'、'多'、'有'、'聚'、'覆'、'深'、'张'、'荒'、'成'、'至'、'明'、'赤'、'乐'、'美'、'善'等等，不下二十余义。"〔228，页134〕这些意义，有相同者，有相近者，亦有相通者。其中，直接训释为"大"的各词，是义同；训释为"长、宽、高、深、厚、广、远、多、壮、盛、众"的各词，是义近；而训释为"成、至、明、赤、乐、美、善"的，则是义通。象这样的义通，范围有多大？界限畛域又在哪里？实在不易掌握。

语义的方面是这样，语音方面也是如此。上引"与'大'同义"、"与'大'义相近"的字，在王国维所说的王念孙古声二十三母中分布的情况是(僻见字未列入)：(表见下页)
这些字涉及了几乎全部的古声母，虽说可以"疑于声音，以义正之"，但这些声母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限于当时的条件，王念孙的"这些认识都是感性的，还未上升为理性认识，因为王念孙从未明确论及上古声母问题"〔236，页35〕，无法说明其中的音转轨迹。这就不能不使人觉得，就《释大》前七卷半来看，声母都属喉牙，语音方面尚有联系；而就整体框架来看，语音宽泛无边，不加限制，其立意似乎不是系联同族词，倒象是在汇集同义词了。可见，对义系法来说，语音的范围同样不易把握。

2．容易误系同源

《释大》截取了词汇系统中的一个平面——"大"义，这个平面中的词，极有可能是从多种渠道汇集而来的，就好像湖底沉淀的一个层次，其构成成分并不那么单纯：有河流从远处带来的泥沙，有附近山头滚落下来的石头，有周围岸边崩塌下来的土块，也可能有陷落其中的动物之类，总之，各种成分来源不一。我们看《释大》中的一些词：

牙	见	佳 觉 广 衮 高 甘 元	1
	溪	恢 夸 凯 魁 旷 抗	2
	群	矜 巨 极 乔 竞	3
	疑	虞 娥 兀 嵬	4
喉	影	殷 奄 迂 英 渥	5
	喻	衍 芋 云 遥 裔 翼 艳	6
	晓	兄 荒 逾 熹	7
	匣	王 皇 汇 贤 胡 或 员 越 滑 有 厚 远 蝯	8
舌	端	天 张 敦 都 钊 征 党 珍 旨 蒸	9
	透	拓 太 侈 哆 超 腆	10
	定	道 地 甜 重 叠	11
	泥	浓	12
	来	临 离 辽 烈 陆 厉	13
	日	仁 蓐	14
齿	精	祖 将 臧 尊	15
	清	粗 峭	16
	从	岑	17
	心		18
	邪		19

续表

唇	帮	博方般封崇贲肤	20
	滂	丰沛朴抚披覆	21
	並	佛旁弼	22
	明	万邈	23

“契”有“合”义，“契”、“开”声之转，……又有“开”义。“契”字从“大”。凡物之开者，合之则大；物之合者，开之则大。故“契”有“开、合”之义。（卷二上）

今按：“契”K ‘iat、“割”Kat、“开”K ‘ei、“刻”KəK、“解”KeK，它们似乎得声于以刀割解物体时的声响，“割解”是它们的语源意义，“大”为其引申意义。

“囷”，圜仓也。故大贝谓之“蜠”……（卷二下）

今按：“囷、蜠”因其圆转而得名，应属于“果裸”词族。

“于”，於也，气之舒也。故大谓之“迂”，远谓之“迂”，自足貌谓之“于”，妄言谓之“谔”，辨号谓之“雩”，管三十六簧谓之“竽”（卷六下）。

随便拈出的这几个例子，就已足以说明，有“大”义的词，有的由词义引申而来，有的由同族词孳乳而来，有的则直接来源于惊叹。如果在系联时采用义系法平面系联，不是很容易误将这些来源不一的词系联到一起来了吗？

总的来看，平面式的各种方法，都存在着难以掌握音义范围的问题：若掌握得严格，就容易造成音义标准的限制，会将同一词族系统中不同意义层次的同族词，甚至同一意义层次中语音有差别的同族词、即使是系联者自己认为同源的，也分散置于数处，人为地造成联系的中断、词族的肢解。标准掌握得越严、范围限制得越小，支离现象就越严重。若掌握得宽泛，一则易将那些可以划分出若干不同意义层次的同族词简单地堆积于一处，显得凌乱无序——例如《果裸转语记》；二则易将来源不一的词误系于一处——例如《释大》。标准掌握得越宽、范围放松得越大，杂乱堆积和误系同源的现象也就越严重。因此，平面式只适用于归纳系联那些在意义联系上处于横向联系的同一层次的同族词，而对于那些因为引申等原因出现意义层次差别、处于纵向联系的同族词，就不够适应了。如要对那些既在同一词族系统之中，又处于不同意义层次的同族词或词群的引申次序、源流关系加以清理，那就进入源流式的领域中了。

第二节　沿流式方法

沿流式与平面式不同的是，它从一堆音义相关的同族词中，找出一个源词，建立一个起点，然后顺流而下，条分缕析，层层系联，将同族词按照意义层次梳理成若干有着先后引申次序的词群。根据串联梳理的线索，沿流式又可分为据形沿流的形沿法和据音沿流的音沿法两种。

一、形 沿 法

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一反形声字隶属于形旁部首的作法，把同谐“句”声的“拘、笱、钩”列于“句”字后，同谐“劦”声的“勰、协”列于“劦”字后，开了“把同一声符的字（词）类聚起来以观察意义的做法”[171，页85、86]的先河。

晋初杨泉所著的《物理论》一书，也涉及到形声字的声符兼义问题。可惜其书已佚，我们只能从《艺文类聚·人部》所引的片言只语中窥见一斑：

在金石，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

杨氏认为，这三个字都是从“臤”谐声得义的。这也是根据形声字的声符系联同族词的尝试。

到了宋代，又明确地提出了“右文说”和“字母说”，标志着以声符系联同族词这一方法从实践摸索到理论概括的成熟。“右文说”今见于《梦溪笔谈》卷十四“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的记载，“字母说”则见于王观国《学林》卷五：

> “卢”者，字母也；加“金”则为“鑪”，加“火”则为“炉”，加“瓦”则为“甗”，加“黑”则为“黸”。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则众义该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该之。他皆类此。

“字母”（主谐字）与孳乳字（被谐字）的关系是：

卢——→甗、炉、鑪、黸、

田——→畋、佃

这种系联方式，是首先确定“源”，然后由源及流，自上而下地系联由“源”孳乳的同族词。至于以“字母”为起点，以文字形体为线索，“综合一组同声母字，而抽绎其最大公约数性之意义，以为诸字之共训，即诸语含有一共同之主要概念”[124，页82]的具体研究方法，则是沿流式的第一种方法，可称之为“据形沿流法”，简称为“形沿法”。

形沿法以主谐字的形体及其意义为源，以被谐字的形体和意义为流。有时候，这种表层的字形上的源流关系与深层的语源上的先后次序可以取得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例如：

从甲骨文、金文的“来”字、“麦”字可以看出，“差”字的上部，本来是一个“麦”字的省体，下部从“左”（从“𠂇”从“工”），是通过磨治麦粒的典型事例，来概括代表一般以手搓物的“搓”的概念——

(1) “差”为初文，本义为搓磨、捣治。由此分化出一些后起形声字：

[illegible]：磨麦，捣。　　[illegible]：捣，舂，磨麦。

搓：搓碎，搓摩。　　磋：切磋，治象牙。

[illegible]：刺。

(2) 搓磨、捣治的动作纵横交错，上下交互，参差错落，反复进行，因而产生“参差、交错、异常、杂乱”义：

[illegible]：米谷杂，粗糙。　　蒫：荠实。

[illegible]：枯骨，残骸。　　齹：齿不齐。

皻：皱。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足大。

蹉：跌，蹉跎。　　[illegible]：羽不齐。

嵯：嵯峨，山石参差。　　[illegible]：错。

[illegible]：残田，田不整。　　槎：水中浮木。

瘥：病。　　[illegible]：小疫病。

䢴：狂犬。　　　　　　　　　　　傞：舞不止。

䙑：衣长貌。　　　　　　　　　　𦅂：参差，错综，乱。

𧫚：异言。　　　　　　　　　　　𪅅：长叹。

（3）经过搓磨、整治，物体由无序变为有序，因而引申出“整齐一致、次第、等级”之义：

鲝：臟鱼。　　　　　　　　　　　膳：䈢脯。

艖：小舟，次于大舟。　　　　　　鎈：钱之异名。

羨：束炭。　　　　　　　　　　　篸：炭笼。

（4） 有序之物的上品，给人以鲜洁、精美、明快的感觉，因而引申出“鲜美、明快”之义：

𪍑：麦谷净。　　　　　　　　　　醝：白酒。

鹺：白盐。　　　　　　　　　　　瑳：玉色鲜白。

瘥：病除。　　　　　　　　　　　縒：鲜洁貌。

鬌：发好貌。　　　　　　　　　　暛：明朗。[260，页750、751]

由此可见，在汉语中有许多由同一个声旁组成的形声字，往往是同一个语源发展、派生(旧时的文字学著作或用“孳乳”一语)出来的，它们在音义上往往有一定的内在联系[287，页62—64]。这里，形义的源流关系与音义的源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相重合。所以周大璞先生指出：“有些形声字的声符本是语根。语根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由单义词变为多义词，它的声音没有变，它的意义却孳乳分化了。为了明确表达它所包含的引申义或假借义，于是给它们另造几个字，这些字仍以原有的字为核心，另外加个偏旁，作为义符。”[288，页228]在这种情况下，形沿法不失为语源研究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

但是，如前章所论，由于文字的产生比起语言来不知要晚多少万年，造字又非一时、一地、出于一人之手，这就使得汉字的形义关系极为复杂：既有用同一声符表示同一意义者，又有用同

一声符表示不同意义者，还有用不同声符表示同一意义者。形沿法只适用于这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而对其余两种情况就圆凿方枘，格格不入了。这就使得形沿法的作用大大打了折扣，它只从文字的角度着手，而不是从语言的角度着眼，因而容易产生以下两种弊端：

1. 囿于形体，作茧自缚

章太炎指出："昔王子韶创作'右文'，以为字从某声，便得某义，若'句'部有'钩、笱'……及诸会意、形声相兼之字，信多合者。然以一致相衡，即令形声摄于会意。夫同音之字，非止一二；取义于彼，见形于此者，往往而有。若'农'声之字多训厚大，然'农'无厚大义；'支'声之字多训倾邪，然'支'无倾邪义。盖同韵同纽者，别有所受，非可望形为验。况复旁转、对转，音理多涂；双声驰骤，其流无限。而欲于形内牵之，斯子韶所以为荆舒之徒；张有沾沾，犹能破其疑滞。今者小学大明，岂可随波流荡！"[219，页4]即批评了"右文说"拘牵"右文"、限于形体的弊病。

王力也曾指出："清代语文学家得力于声音之学，对于同源字的研究超越前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可以发现很精确的论断。例如段玉裁在他的《说文解字注》中说：'《小宰》"傅别"，故书作"傅辨"；《朝士》"判书"，故书"判"为'辨'，大郑"辨"读为"别"。古"辨、判、别"三字义同也。'这种地方，是很好的发现。但是段玉裁他们为文字所束缚，不能从语言看问题，他们对于同源字的探讨，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就拿'辨、判、别'这一组同源字来说，还可以加上'分、半、片'，因为'分'的本义是一物分为两半，'片'的本义是判木(《说文》：'片，判木也，从半木')，所以'分、半、判、片、别、辨'六字实同一源。"[230，页39]今按：《说文解字注》重在分别说解一个个汉字的形、音、义，从各个方面(包括同

谐声字)广为求证，并非专为探讨语源或系联同族词，因此在这方面只是点到为止，“宁缺无滥”，免生枝节。从文字学的角度看，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但若专从语源学的角度看，段玉裁一般只在古书异文和同谐声字的圈子里寻找“同源字”，而未能象王念孙《广雅疏证》那样左右采获、触类旁通，虽说未可苛求，却不免令人遗憾。

2．以偏概全，走向极端

《梦溪笔谈》在记载王子韶(字“圣美”)的“右文说”时，就已经使用了全称肯定判断词“皆”：“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这就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至段玉裁时，又形成了“凡……皆(多、必)……”的公式，虽说“段言‘凡’，又言‘多’，不是全称肯定语”[289，页71、72]，但“皆、必”却都是全称肯定语。如果这样推论下去，势必会走向极端。例如，《说文·䖍部》：“䖍，赋事也。从‘䖍’、从‘八’。‘八’，分之也；‘八’亦声。读若‘颁’，一曰读若‘非’。”段玉裁注：“凡从‘非’之字皆有分背之意。”而沈兼士经过排列分析，认为从“非”之字除有“分违”义(如“诽、悲、排、辈”等字)外，尚有：1．“飞扬”义，如“俳”等字；2．“肥”义，如“腓”等字；3．“赤”义，如“菲、绯”等字；4．“交文之编织物”义，如“篚”(器名)等字[124，页136]。而后三种意义都与“非”的字形无关，只是借音造字而已。可见，以形沿流的方法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可一概而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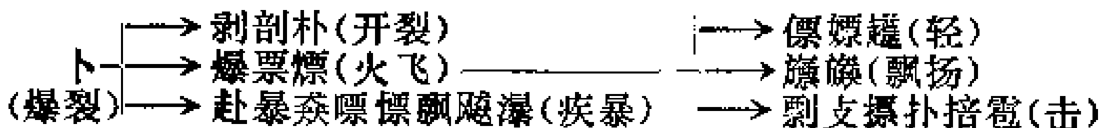
二、音沿法

与形沿法以同谐声字的声符为线索的沿流方法不同的是，音沿法以同族词的语音为线索进行沿流。它是沿流式的第二种具体方法，可称为“据音沿流法”，简称“音沿法”。

音沿法必须先设立一个源头，作为沿流的起点。设源的办法又有两种：以形设源和以音设源。

（一）以形设源

清末章太炎的《文始》，“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三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伉，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比而次之，得五六千名。”[219，页2]就是说，他是以形（“初文、准初文”）设其源，而据音（“比其声均”）沿其流，由“字根”之源往下梳理音义相关的同族词的。如将其中以初文“卜”字为源派生孳衍的一个词群[219，页122]加以整理，可得出一幅“卜”系词群源流图：



这种以字形为源的做法，仍然带着其从中脱胎出来的传统“字源学”的痕迹。“以初文和准初文为系源的起点，未始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18，页375]，“但是，初文，准初文只是文字造形的基础，它可以作为构件而产生新字，因此，即使说它是‘根’，也只

是'形根'，不是'文根'；说它是'源'，也只是'字源'，不是'词源'。而严格地说，产生新形的构件是不能称作'根'或'源'的。"[90，页13]设源既误，沿流就不能不受影响。请看《文始》系联的一些词群：

一、"歌、泰、寒"类

阴声"歌"部甲

皮、柯、破、半、胖、判、胖、泮。"与'八、分、釆、辨'等字亦皆一音之转。"[219，页11、12]

阳声"寒"部丙

番、辩、辟、偏、辨、班、鬊、播。"'釆'与'至'部之'八'相转。"[219，页30、31]

三、"至、真"类

阴声"至"部甲

八、必、分、別、擘、劈。"与'匕'属之'破、判'，'釆'属之'辨'相转。"[219，页60]

因为凡遇初文必以之为源，就把一个词群大卸为三块(尚有也应属于此词群的"片、版"等字另立了一群)。因此，从表面孤立地来看《文始》，似乎"无所不转，无所不通"；而用系统整体的观点来看全书，实则"囿于形体本义，及《廿三部成均图》之假定，似乎尚不能够纵横旁达，以求语文流衍之势。"[145，页55]倒是后来齐佩瑢的《释"卯"》一文[145，页55—58]，才算有点"纵横旁达"的味道。

(二)以音设源

继程瑶田之后，清代的“阮元也是一位主张从声音来求语源的重要学者，他的《研经室集》里的《释心》以下诸篇是运用这个方法的很好的例子。”[171，页89、90]如《释“门》一文说：“凡事物有间可进，进而靡已者，其音皆读若‘门’，或转若‘免’、若‘每’、若‘敏’、若‘孟’，而其义皆同；其字则展转相假，或假之以同部之叠韵，或假之以同纽之双声。”以下则分为三个层次：1．“凡物中有间隙可进者，莫首于门矣”；2．玉中破未有不赤者，故衅为以血涂物之间隙”；3．“若夫进而靡已之义之音，则为‘勉’……”，并分别系联梳理了各个层次的同族词[290，页18、19]。

1941年，蔡凤圻发表《混沌——〈语源〉初稿之一节》的文章，以“混沌”一词开场，逐层下沿：“由(混沌)未分晓引申为不明，不清析，再引申为目不明，视不明，月色不明”，“由‘混沌’引申为‘圆’，圆者浑然一物，不分不破，形状之浑沌者也”，“又引申为平圆者”，“又引申为动词，为‘还’，言圆可循环至原处也”，“又由圆引申为‘转’，言圆者可转也”，“又由未分引申为束，言束之使不分散也”，“又由圆引申为范围”，“又引申为设篱以为范围”，“又引申为范围以种植草木、养畜禽兽、储藏物品、居住人民之所”，“总之混沌不分之意，引申为不明、不舒、不了、不达、圆、转、反复，而事物有如是意义者，皆衍‘混沌’之音。由‘混沌’变出之音，于韵大都‘真、元、东、冬”，于声大都‘匣、见、喻、来、定’，其间偶入他韵或他声，要皆与‘混沌’之音相近，或辗转变易而成者也。”[200，页42—48]文中所串联的同族词，大都已被吸收进我们所组合的“骨碌”词族中了。

这种设源法，是从一堆音义相关的同族词中挑选出一个能起

统率作用的词，以之为“源”，而不论其文字形体是否为初文。这就完全根据语音来确立源词，并下沿其流。它克服了以形设源的条块分割的弊端，能够在较大的范围内左右采获，旁推交通；同时，它也有效地避免了平面式方法的简单堆积同族词的弊病，能够条分缕析，层层爬梳，把同族词梳理成一个相对完整而又井然有序的大词群。

总的来看，沿流式方法所梳理串联的大词群，只是一个相对的单位，它有可能只是由原始语源孳衍出来的一个支派，是整个词族系统的一个部分。例如，“混沌”词群就只是“骨碌”词族的一部分。而所设的“源”，只“相当于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坐标点，而不是标志着历史起源的根词”[18，页375]，并非整个词族系统在语言发生阶段的最初源头(即总源、语根)；何况，这样设“源”，还可能倒源为流、以流为源呢，例如，从“骨碌”词族来看，“圆”应为源而“混沌”应为流，因为从人类认识规律来看，“混沌”的概念比“圆”的概念更为抽象，因而“圆”应先于“混沌”产生。所以，这里的所谓“设源”实际上只是设立一个爬梳的起点，便于从这个起点出发，顺流而下，串联梳理音义相关的各个同族词，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完整而有序的组合群体而已。至于它们真正的源头，则需要通过溯源的工作来推求了。

第三节　溯源式方法

溯源又叫“推源”，就是分别推溯词和词族的语源，其研究的方式与沿流式正好相反，是自下而上、由流溯源，因此称之为“溯源式”。其中推溯词的语源(近源)的方法是音训法，推溯词族

的语源（语根、总源）的方法是构拟法。

一、音 训 法

远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以声音为线索来训释词义、推求事物的得名之由了。王先谦在概括音训的历史时说："'流，求'、'珥，贰'，例启于周公；'乾，健'、'坤，顺'，说畅于孔子；'仁者，人也'、'谊者，宜也'，偏旁依声以起训；'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展转积声以求通。此声教之大凡也。侵寻乎汉世，间见于纬书，韩婴解《诗》，班固辑《论》，率用斯体，宏阐经术；郑、高、张之伦，弥广厥旨；逮刘成国之《释名》出，以声为书，遂为经说之归墟，实亦儒门之奥键。"[103，页 5]刘熙自已在《释名·序》中说：

> 熙以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于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名号雅俗，各方名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

这就说明，《释名》的编撰意图，是要解释"名之于实"的"所以之意"，即探求事物的得名之由。因为其采用的方法是"以声说义"，即选用音同音近的词来说解训释，故后人称这种形式为"音训法"。可以说，音训是汉语语源研究中历史最悠久、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溯源法。因为它简便灵活，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因此在推溯具体事物的得名之由、探求单个语词的音义来源时，它可以大显身手。例如《释名·释宫室》："棳儒，梁上短柱也。棳儒犹侏儒，短，

故以名之也。"来得多么便捷！

不过，音训法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掌握不当，也容易出现两种偏向：

1．主观臆断

正因为音训法简便灵活，不拖泥带水，也就容易"任取一字之音，傅会说明一音近字之义，则事有出于偶合，而理难期于必然，此其法之有未尽善者"[124，页79]。人们所指斥的"猜谜"式语源研究，殆指这种方法而言。既是猜谜，谁也不能保证一定猜得准。这种情况，恐怕在世界各种语言的语源研究中都不例外。例如，"英语的season(季节)这个词，有的语源学家认为是源于法语的saison和后期拉丁语的sation-，等于下种子的时期(seed-time)。这个后期拉丁词又源于拉丁语的serere，sat-，等于'播种'(to sow)。但是查阅古籍，season并不专指播种时期。于是有人又提出它源于拉丁语的statio。意大利的stagione(等于season)就是从这个拉丁词形成的。何去何从，情况如此，请您自择。"可见，"词源学家提出的说法往往也不甚令人心服"[36，页68、69]。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语语源学史上的大量音训材料，我们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恐怕谁也不能因为别人猜得不准就不准人家猜谜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仔细地分析词的音、义特征，从多方面掌握大量而可靠的证据，尽量减少猜谜的主观盲目性，提高音训的准确程度。请看张舜徽先生所作的一条音训：

> 炮，包也，包裹其完体而烧熟之也。上古始有火化，惟知取已杀鸡豚裹烧之，故炮炙之事为多。今俗犹有以黄泥涂鸡豚之外，置火中煨之者，迨泥土干坼，以手破之，则毛与泥俱脱落而肉熟矣。今人称为烧烤，即古炮

炙遗法。[175，页513]

这是以原始社会史和民俗材料证之。此外，民族学和古代文献记载也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苦聪人……把刺猬用泥土包起来，放在火中烤干，这种办法古代称'炮'。《礼记·内则》郑注：'以土涂生物，炮而食之。'"[150，页35]这样，让客观事实说话，无疑提高了音训溯源的可靠程度，穿凿之弊，一扫而空。

在使用音训法推溯词的语源时，证明的材料多多益善。古代的文献记载和训诂材料固然可贵，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也不可轻视，例如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种学科领域的材料，有时甚至还需要亲自实验和观察，例如程瑶田对细腰蜂的观察和董作宾对龟甲所作的实验等(分别见第一章第四节中的"语源学与自然科学"部分和第二章第一节中的"音响的摹拟"部分所引)。掌握的材料越多、越可靠，所作的音训就越可信；反之，只是从语音这一个方面任意牵合，妄拟瞎猜，而拿不出相应的实际材料来证明，那样的音训就十分可疑了。一条音训，往往只相当于一个假设。"大胆假设"，还必须"小心求证"。如果只有假设而无必要的求证，这种假设就有些危险了。程瑶田说得很中肯："音语相转，是考字要义。然必旁举数事证之使确，乃可定其说。不然，何字无音？何音无转？举可比而同之也哉?!"[291，页19]至于从非语言学的目的出发，如汉代今文经学家用音训解释礼制专名，为阐述自己的政治学说而作的"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292]之类滥用音训的作法，则如王力所说，"是唯心主义的"，"是应该批判的"[282，页50、51]。

2．源流不分

“声训作为一种训诂方法，从使用它的人来说，其主观上是要凭借语音手段去探求词的语源。”[293，页106]因此，“所谓‘声训’，就是从声音线索求语源的方法。”[294，页111]但是，从古代的训诂材料来看，不少音训却是“不分源流，流可注源，源可注流”[295，页11]。例如，《说文·卷一下》：“莍，椒樧实，裹如求者。”“椒樧”即今之花椒树，“莍”是今花椒子。《尔雅·释木》：“椒樧丑莍。”郭璞注：“茱萸子聚生成房，今江东亦呼‘椒莍’。”花椒树结实有外壳（“房”），花椒子聚于壳内，此《说文》所说的“裹如求”，以“求”为“莍”的语源。《说文·卷八上》：“裘，皮衣也。古文作‘求’。”古人皮衣多用羊皮（狐裘是极珍贵的），聚毛揉如小丸叫“珍珠毛”，紫羔皮亦作小圆球形。治求必揉毛如丸，而与椒实相似，许慎以为此即“莍”字得名之由来[294，页112]。今按，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果实之名应在语言之先。《尔雅·释木》：“栎，其实梂。”郝懿行义疏：“栎实外有裹橐，形如猬毛，犹类毬子。”“梂”为栎实，“莍”为椒实，这两种果实名称都应该早于“求（裘）、毬（皮丸）”。说“莍”来源于“求”，是以源注流。

只要注意克服其主观性，增强其客观性，并注意词的时代源流，音训这种古老的溯源方法，在推溯单个词的语源方面，还是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可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

音训法属于历史语源学的范畴，其推溯的上限，只能达到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历史，而对于缺乏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的语源现象，则鞭长莫及、无能为力了。要推溯史前时期的语源，就进入历史比较语源学的范畴了。

二、构 拟 法

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被引进了我国，并运用于语源学的研究。通过汉语与汉藏语系亲属语言的比较，可以揭示出它们的语源联系，并构拟出它们在史前时期的共同语源形式来。试看邢公畹先生的《“别离”一词在汉语台语里的对应》一文的“提纲”部分：

汉语“别离”（*bjiat-ljig>bjæt-lie）一词可以跟泰语p'lat—p'la:k“别离”对应。泰语“别离”还可以说作p'rak，李方桂把这个字的原始台语声母构拟为*br—，证以藏语k'a—bral“别离”，bye“分离”的说法，可见李氏的构拟是合理的。对照台语、藏语的复辅音声母br—、pl—等说法，我们有理由设想：汉语“别离”这个词在前上古音时期原是一个字——bliag；后来这个字分化成两个音节——bjiag-liag，到上古音时期，前一音节的-g尾受后随的舌尖音l-的影响发生逆同化，变为-t，同时，后一音节的-ia-异化为-i-，这样就成为上古的bjiat—ljiag。

汉语“别”字的本义是“分解骨肉”，跟泰语的pɔ:k-lɔ:k“剥皮”义近，但这个词有汉语“剥落”（pɔ:k-lak）一词跟它对应。不过泰语pɔ:k-lɔ:k之义重在“剥”，汉语pɔ:k-lak之义重在“落”。看来汉语和台语里的这个词也是一个带复辅音*pr/l-的词的分化形式。藏语bral—brul“叶落，果落”可以为证。[296，页31]（为了印刷方便，原文中的调号已删去。）

今按：汉语中有“毗刘、暴乐”，可以跟藏语 bral-brul“叶落，果落”一词相对应。《尔雅·释诂下》：“毗刘，暴乐也。”郭璞注：“谓树木叶缺落荫疏。‘暴乐’见《诗》。”郝懿行义疏：“通作‘爆烁’。《诗》：‘捋采其刘’，毛传：‘刘，爆烁而希也。’……《释文》：‘爆，本又作“暴”，同音“剥”；烁，本又作“乐”，或作“落”，同音“洛”。’……然则‘爆烁’之为言犹‘剥落’也。……音变为‘仳离’。《诗》：‘有女仳离’，‘仳离’盖分散之义，与‘披离’同。《方言》云：‘披，散也。’是‘披离’犹‘仳离’也。又变为‘辟历’。《释名》云：‘辟历，辟析也，所历皆破析也。’……‘毗刘、暴刘、暴乐’，盖古方俗之语，不论其字，惟取其声。今登莱间人凡果实及木叶堕落谓之‘毗刘 杷拉’，‘杷拉’亦即‘暴乐’之声转。”〔74，页234、235〕诸如此类，其早期声母都应是＊pl-，它来源于先民对于霹雳之声及物体劈裂、折断、掉落之响声的摹拟。

＊pl/r-这一声母形式，在汉藏语系的苗瑶语族、壮侗语族、藏缅语族的各语言中广泛存在，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中的“亲缘联系”部分已详细引证了这些语言中“劈裂、别离”等词的说法。通过汉语和亲属语言中这些词的对应比较，构拟出其在前上古时期（即史前时期）的共同语音形式＊pl/r-，这就使现在看来语音形式相差很远的“别”和“离”、“剥”和“落”等词在前上古音时期原是一个词的原始面貌重现于世人面前。由此，我们就能够对“劈历、霹雳、仳离”等联绵形式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了（pl->p-l-）；根据这一语音演变规律，我们也就有理由将汉语中唇音声母的“剖（掊）、副、腷、劈（AA、薜）”〔176，页117〕，“派、辰、脈（䖙、脉）”〔176，页118〕，“分、半、判（胖）、片、料、泮（頖）、胖、别、辨（辩）”〔176，页523〕及“𠂢、瓣、剥、皮、披”等词群，与舌音声母的“劳、翻、劙（梨）、劚”〔176，页94〕及“裂、落、离、犁”等词群再次系联到一起，组成一个语音形式为＊pl-、语

源意义为"劈裂、分离"的大词群(*pl->p-l->p-、l-)。如果再从此沿流下去，就可以将与此相关的"比、并、方，两、列、连"……系联起来，组合为一个词族。而*pl/r-这个构拟出的原始语音形式，我们把它看作是这个词族在前上古音时期的语根，谁曰不宜？这种通过历史比较而构拟出原始语言之语根的溯源方法，可名之曰"构拟法"，它是溯源式的第二种具体研究方法。

构拟法(这里主要是外部构拟)是利用书面文献和口语资料，通过对各亲属语言或方言的结构要素等已知的语言事实加以比较，找出其语音演变对应规律，从而构拟出它们的史前形式，包括基础语时期的语源形式，推求出未知的语根。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的比较并不是机械的作业；它意味着把一切适宜于说明问题的资料加以对比，但是最后总要得出一种可以列成公式，旨在重建以前形式的拟测；比较的结果总是要重建出各种形式。"〔11，页306〕这就为人们了解因缺乏文献记载而湮没无闻的原始语言形态之理想的实现，开辟了一条大道，给人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强烈印象。难怪美国人类学家S·南达说："比较语言学不失为追踪文化的历史变迁的一种有效途径，通过重现始源语的某些风貌特征，还可以告诉我们有关远古时期操该语言的人们的文化状况。"〔209，页100〕

无庸讳言，构拟法也有其严重的历史局限，"构拟虽力求其合理，但不一定能如实。"〔49，页167〕就是说，构拟出的所谓"原始语言"、"史前形式"，虽可以极为近是，但未必就能与真实的原始情况完全相符，而只是一种假设性的历史推论，以此表明在原始共同基础语中曾有过这么一个形式存在。"始源语无非是根据已有的证据或可能有的证据，尽可能上溯，以有史时期为限或直到史前时期而已。"〔297，页20〕不过随着材料的逐渐丰富和方

法的不断完善，譬如，“如果再证之以殷周文字及古代典籍，……或者可以从中得到‘母语’消息”〔49，页167〕，其构拟的结果与原始语言的真实面貌之间的距离会逐渐缩小，二者的相似值会越来越大。“重建虽然有待于修正，可是要对所研究的语言的全貌，对它所从属的语言类型有所认识，它还是不能缺少的。为了比较容易地描绘许多共时的和历时的一般事实，重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了解这些情况，研究以后时期的历史就容易得多了；没有事先的重建，要解释史前时期以后突如其来的变化就会困难得多。”〔11，307、308〕在别无其他更为可靠的研究手段的情况下，构拟法在指导和帮助语源学研究尤其是历史比较语源学研究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可低估的。从语源研究工作的深化、发展趋势来看，构拟法具有广阔的前景、蓬勃的生机。由于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引进，汉语语源学的研究正面临着一场重大的突破——如同音韵学研究的突破一样。

如果说，平面式系联归纳同族词是共时的研究的话，沿流式的由源下沿串联词群和溯源式的由流上溯语源的研究则属于历时的研究。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结合，就构成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式——立体式。

第四节　立体式方法

在第二章第四节“词族的形成”部分，我们作了这样一个尝试：既分别平面系联了每一个意义层次中的各个同族词，使之组成一个个词群；又逐层下沿，串联了圆形义、块状义、屈短义、圈全义、浑沌义、旋转义、运行义、周还义、卷束义、纠结义、勾曲义、穹隆义、孔洞义、空疏义、光亮义、晓灵义等十几个词群，

划分为十几个一脉相承的意义层次；并构拟了原始语根*kl-，最终组合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骨碌”词族，尽管是粗具轮廓，初具规模。这样，上下左右，全方位综合考察；三个方向，组合成一个立体形式。我们就把这种集上溯、下沿、平系于一身的研究方式，名之为“立体式”。

与以上各种单向的研究方式不同的是，立体式研究把词族系统视为一个具有多层次的、系统的、完整的有机体，从整体出发，去认识和处理词族客体，从全局上把握整个研究过程，调动各种研究手段，平系、沿流、溯源密切结合。这就改变了过去那些就词论词、零敲碎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能够取众法之长、避各法之短，因而也就能取得其他任何一种单纯的研究方式都难以企及的效果。只有从全局着眼、整体出发，才能揭示出一些已经磨灭的词和词群的语源，象“光亮、晓灵”等等，并发现词族系统链条中已经中断的一些中间环节，如圜曲义的诸词群在“骨碌”词族中所起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不是既从全局着眼，又从部分入手，加以系统研究，又怎能知道“穹隆”和“坑阆”原来竟是一对孪生兄弟呢！如果说，用平面式方法系联的词群，“好比北京的糖葫芦，形就像外面的糖，义就像山里红，音就是贯串其中的竹签”〔298，页85〕，那么，用立体式方法组合出的词族，就好比一棵生机勃勃的果树，它根深蒂固，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而其中构拟推溯的主根，则是这棵大树的根柢；沿流串联的词群，则是大树的一个个分枝；平面系联的同族词，则是树上的一串串叶子、花朵或果实。

立体式研究不仅注意分析词族系统在空间上的横向联系，更注意探索它在时间上的纵向发展演化的趋势和规律。“考察传统字源学的材料，可以发现，前人所作的工作大部分是平面的局部系源和一部分不完全推源。”〔18，页373〕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

"同一历史平面上的逻辑先后易得，不同历史平面上的历史先后难求"〔299，页12〕的客观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缺乏先进有效的研究手段。而立体式的研究，在方式上，统括了平系、沿流、溯源，三种方式集于一体；在方法上，既继承了传统方法，形、音、义"三者互相求"、古今形、音、义"六者互相求"〔300〕，又借鉴现代方法，进行亲属语言及方言的比较，构拟其原始形式，新旧方法熔为一炉，从而形成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这就保证了不仅可以进行共时的静态研究，而且能够全面地进行历时的动态研究。例如，通过对"骨碌"词族进行的立体、综合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知道，语根＊kl－是怎样不断地孳乳、繁衍，终于儿孙满堂，形成了一个大词族这种自始至终的过程，对这一词族的历史发展轨迹，也就了如指掌了。如果把用平面式方法系联的词群看作一泓平静的池水，那么，用立体式方法研究出的词族则象流动的泉水，它源远流长，派系纵横，奔流不息。而沿流式串联的大词群，则是其中的一个支派；构拟推溯的语根，则是它的源头。

总之，语源的立体式综合研究，有利于从整体着眼，部分着手，协调各方，系统处理，以达到整体的优化。

需要指出的是，立体式方法有一定的依赖性。从来源上看，它源于平面式、沿流式和溯源式方法，也就需要以这几方面的研究作为先导和基础。例如，我们组合"骨碌"词族，就是在前人平面式系联同族词、沿流式串联词群和溯源式构拟语根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这些基础，立体式组合词族就会增加不小的难度；没有这些研究作为先导，我们也难以创造出立体式研究方法。因此，平面式系联同族词、沿流式串联词群和溯源式构拟语根，都是立体式组合词族的不可缺少的环节。所谓"从部分着手"，实际上就是从这三个环节具体入手。既源于其他方法，又高于其他方法，这就是立体式方法的最大特点。

还要指出的是，我们使用立体式方法组合词族，还只是一种尝试，就是说，这种研究方法刚刚萌芽，还非常稚嫩，还有一个不断成长、完善的长期过程。这就需要语言学界的师长和同仁不断地为这棵嫩芽浇水施肥、除草治虫、修枝打杈。笔者相信，有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丰厚土壤，有现代科学研究的充足水肥，更有语言学界园丁的辛勤劳动，这棵幼苗有希望成长为语源学研究的栋梁之材。

第五节　研究的阶段

语源研究的平面式、沿流式、溯源式和立体式，分别适用于词族系统的不同结构层次。从语源研究的全部工作进程来看，这四种方式，代表了研究工作的四个阶段，正如四道工序，有机地构成了研究工作的完整过程。

一、平 面 系 联

平面系联同族词，是语源研究的第一道工序，是初加工的阶段。这道工序可以把那些处于同一历史平面、同一个意义层次的同族词，平面地系联在一起，组成一个个较小的词群，如《汉语词族》、《汉字语源辞典》和《同源字典》所做的那样。

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微观比较，就是比较音、义关系非常近的同族词，可以做得非常细，有可能建立很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因此，在平面系联阶段，只要求系联那些语音形式和语源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同源同派同族词，音义标准可以掌握得严格一些，同族词的范围自然也就缩小了。

在这一阶段，可以根据周秦古音研究的成果，设计出纽表、韵表，例如《同源字典》中的纽表、韵表；并制定出一些较为严格的语音变换模式，如《同源字典》的“双声、准双声、旁纽、准旁纽、邻纽，叠韵、对转、旁转、旁对转、通转”，严学窘先生《论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一文中的“辅音声母变换、元音变换、辅音韵尾变换、元音伴随辅音声母变换、元音伴随辅音韵尾变换、辅音声母并合辅音韵尾的变换”[255，页 85—92] 等等，以作为系联同族词时参考的语音标准。

从这一道工序的历史和现状来看，虽然高潮迭起，出现了几部像《同源字典》那样的专著，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远未能完全实现本阶段的任务，大量的同族词（尤其是不同词形的同族词包括联绵式同族词）还未能系统地系联起来，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二、沿 流 串 联

沿流式串联词群主要是据音设源，以语音为主、以字形为辅沿流。这是语源研究的第二道工序，是再加工的阶段。在这道工序里，可以把第一道工序平面系联出来的较小的词群，按照语音和语义的转变轨迹再次加以系联，即将若干个音转义通却又可以划分为各个不同的意义层次的词群，按照意义引申生发和派生的顺序，层层串联、梳理，整理成一个个层次分明、井然有序的大词群。

在沿流串联阶段，要将意义相关相通而语音有所转变的同源异派的小词群串联起来，除了依据周秦古音体系，还要利用已经探明的古音间的演变规律。这样，音义变转的标准就要放宽一些，否则就会成为一种束缚。这样词群的规模和容量自然随之增大。

这一阶段属于中观的历史比较，同族词群之间的音义关系虽然不容置疑，但关系较远，会发现相当多的音义转变现象。由于词群之间的音义差距较大，词群的辨认也困难得多了。所以要做相当深入的工作，才能发现语音对应规律和语义转变轨迹，找到词群之间的联系。在这一阶段，虽然也可以使用根据周秦古音制

〔302，页84〕

作的纽表、韵表，但随着语音通转、演变规律的不断发现，还要重新制定相应的语音变换模式，使之能够解释这些义通音不近的词群之间的语音关系。

在根据语音沿流串联词族方面，虽然出现了以《文始》为代表的以形设源的论著，而以音设源沿流串联词群的工作目前正处于高潮将起的波谷期，是个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据闻，刘又辛先生正在编纂《汉语词族谱》〔301，页147〕，我们希望其能早日问世。刘先生近年发表的《释"蓬篨"》一文，就属于据音沿流串联词群类型的文章，大概由此可以窥见《汉语词族谱》之一斑吧。不过，这里的"词族"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词群"，(见256页表)

三、构拟溯源

构拟溯源是语源研究的第三道工序，是深加工的阶段。这道工序可在前两道工序连续系联和串连出的词群基础上，参照亲属语言和各地方言，结合古代典籍和考古发现，分层上溯，对其史前语音形式加以构拟，推溯出其原始语根。

在构拟溯源阶段，不仅就汉语研究汉语，而且要进行汉藏系语言的比较，将内部证据与外部证据结合起来，可以发现一些仅就汉语本身研究而未能发现的史前音变规律。这样，在前两个阶段还较为适用的周秦古音体系，到此已不大适用了，大词群之间的语音标准自然不得不再次放宽。

构拟溯源的工作，方兴未艾，由于国际汉藏语言学家近几十年的努力，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距离完全解开史前时期语言之谜的目的还相当遥远，还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

四、立体组合

立体式组合词族，是语源研究的第四道工序，是精加工的阶段。在这道工序里，可以高屋建瓴，综观整个词族系统，协调各方，对整个词族进行全面的组合和细致的梳理，整理出每个词族的演化谱系，取得更为深刻而可信的结论。

立体组合词族，是宏观的研究。在立体组合词族的阶段，不仅要充分利用古音研究的成果，并仰赖音韵学和比较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以之作为组合词族的利器；另一方面，语源研究也应以大量的义通之词声音演变的轨迹，来证明古代声纽和韵部之间的关系，以为音韵学研究古代音系的佐证，即戴震所言“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音，以义证之”。

以上四个研究阶段的划分，并非针对每个具体的研究者或个别的研究文章而言，而是就今后语言研究工作的大致进程来说的。四个阶段，从易到难，由简至繁，步步上升，层层深化，虽不免时有个别交错现象发生，但其主流殆大略如此。

在明确了语源研究工作的不同阶段之后，我们再来看近代和现代训诂学家们对于同族词之间语音和语义标准的不同见解，就会发现，语音、语义范围宽严的不同标准，实际上适用于语源研究工作的不同阶段。就各个不同的研究阶段来说，很难有一个一成不变的语音和语义标准，任何音义标准也都不可能是万能的。唯一的办法是掌握较多的材料，包括充分的文献和口头语言证据，在大量材料的分析、比较、核证中，探求语音演变和语义引申的轨迹。随着研究的逐级上升和层层深入，某些在靠前的研究阶段看来音近义不通或义通音不近甚至音义关系都有一段距离的同族

词、词群，一旦探明其音变义转的轨迹，在靠后的阶段成为可以再次系联的对象，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自然，也免不了发现一些相反的情况，纠正一些因坐井观天、偏执一隅而误系同源的现象。列宁曾经指出："如果不是从事实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也不如。"〔303〕在语源的研究上，同样需要事实的"全部总和"和事实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

语源学的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富有生机的课题，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们，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艰苦的劳动，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方法，这些古老的和新兴的、继承的和借鉴的方式、方法，互相撞击，爆发出灿烂的火花，熔铸成新的方式和方法——立体式、综合法。这种集平系、沿流和溯源于一体的方式，熔音系法、义系法、形沿法、音沿法、音训法、构拟法为一炉的方法，既留有清晰的时代脚印，又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它们将不断吸收新出现的具体研究方法，不断得到充实、完善和提高。

"科学的生命在于新的探索，语言研究的海洋，广博、深邃、无垠，开拓阃奥，创通条例，需要勇气和智慧，也需要毅力和勤奋，而驰骋的想象力和捕捉新问题的敏感力，自然是不可缺少的。"〔304、页35、36〕在今后的语源研究中，在观点上怎样建立语源学的理论框架，怎样运用语言的变异理论来刷新旧的观点，从宏观到微观，又从微观到渺观；在方法上，使用系统、定量、预测、创造等新的思维方式，运用新的综合方法——即遵行辨证整体性原则，从要素、层次、结构、功能、联系方式、发展趋势和外部环境等进行综合、精确、立体式的考察〔305，页2、3〕，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成绩来，还有待于我们群策群力，努力探索。

引用书文目录

〔1〕（清）程瑶田：《果裸转语记》，载《安徽丛书》第2期，安徽丛书编印处，1934年。
〔2〕（美）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用其上古音声母拟音），商务印书馆，1980年。
〔3〕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用其上古音韵母拟音），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4〕殷孟伦：《〈果裸转语记〉疏证叙说》，载《子云乡人类稿》，齐鲁书社，1985年。
〔5〕张寿林：《三百篇联绵字研究》，载《燕京学报》第13期，1933年。
〔6〕潘尊行：《原始中国语试探》，载《国学季刊》1卷3期，1937年。
〔7〕（英）珍妮·古道尔等：《猿猴社会》，知识出版社，1982年。
〔8〕（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
〔9〕（美）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李昆声：《云南文物古迹》，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

印书馆，1980年。
〔12〕 高明：《古文字的形傍及其形体演变》，载《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
〔13〕 张标：《说文部首与字原》，载《河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
〔14〕 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1974年。
〔15〕 《日本国语大辞典》，小学馆（东京），1965年。
〔16〕 王力：《了一小字典初稿》，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
〔17〕 伍铁平：《论词源学及其意义和研究对象》，载《外语学刊》1986年第4期。
〔18〕 陆宗达、王宁：《浅论传统字源学》，载《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
〔19〕 房建昌：《程瑶田和〈果裸转语记〉》，载《江淮论坛》1983年第5期。
〔20〕 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苗瑶语方言词汇集》，民族出版社，1986年。
〔21〕 陆绍尊：《错那门巴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22〕 田德生等：《土家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23〕 王辅世主编：《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
〔24〕 俞敏：《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ji》，载《燕京学报》第37期，1949年。
〔25〕 杨剑桥：《上古汉语的声调》，载《语文论丛》第2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
〔26〕 （瑞典）高本汉：《汉语词族（类）》，商务印书馆，1937年。
〔27〕 唐超群：《词汇研究二题》，载《语文学刊》1988年第3期。
〔28〕 王力：《汉语史稿》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

〔29〕 杨树达：《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载《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
〔30〕 黄侃：《声韵略说》，载《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年。
〔31〕 章太炎：《国故论衡·小学略说》，载《章氏丛书》第13册，右文社。
〔32〕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3〕 黄侃：《训诂述略》，载《制言》第7期，1935年。
〔34〕 黎锦熙：《汉语释词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7年。
〔35〕 蒋礼鸿：《论辞书的书证及体现词汇源流的问题》，载《怀任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6〕 费致德：《英语常用词小故事》，原子能出版社，1982年。
〔37〕 (美)W·A·卡茨：《参考工作导论——基本参考工具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38〕 伍铁平：《充分发挥汉字在文化学习中的巨大作用》，载《汉字文化》1989年第1、2期(创刊号)。
〔39〕 陆宗达、王宁：《训诂学和现代词语探源》，载《中学语文教学》1985年第8期。
〔40〕 赵中健：《汉语——二十一世纪的第一语言》，载《人文杂志》1989年第1期。
〔41〕 (英)厄尔曼：《语义学》，英国牛津，1981年。
〔42〕 (德)格里姆 (J·Grimn)：《论语言的发展》，转引自(苏)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1年。
〔43〕 岑麒祥：《历史比较语言学讲话》，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44〕 (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

〔45〕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中国科学院，1954年。
〔46〕 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
〔47〕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1941年；《泰族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1946年。
〔48〕 梁钊韬：《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49〕 邢公畹：《汉藏系语言及其民族史前情况试析》，载《语言研究》1984年第2期。
〔50〕 (苏) 阿巴耶夫：《语言史和民族史》，载《民族问题译丛》1957年第12期。
〔51〕 胡昭曦等：《“咽噜”考析》，载《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52〕 朱德熙、裘锡圭：《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考释补正》，载《文史》第10辑，中华书局，1980年。
〔53〕 罗常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开明书店，1945年。
〔54〕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国立北京大学，1950年。
〔55〕 (美)J. R. 赫尔伯特：《词典编纂法》，载《词典研究丛刊》第10期，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
〔56〕 (美)F·普洛格等：《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57〕 (美)J·H·Greenberg：《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载《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2期。
〔58〕 闻一多：《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第1卷，开明书店，1948年。
〔59〕 刘尧汉：《中华葫芦文化》，载《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3期。

〔60〕 转引自伍铁平：《从语言学的领先地位谈到语言学在方法论上对哲学研究的意义》，载《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61〕 (苏)阿巴耶夫：《论词源研究的原则》，载《语言学资料》第10期。
〔62〕 伍铁平：《语言的模糊性和词源学》，载《外语教学》1986年第1期。
〔63〕 刘师培：《物名溯源》、《物名溯源续补》，载《刘申叔先生遗书·左庵外集》卷七。
〔64〕 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
〔65〕 高士其：《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思维的发展史》，载《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66〕 (英) L·R.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
〔67〕 (清)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68〕 《汉语大字典》第2册，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87年。
〔69〕 符定一：《联绵字典》，中华书局，1954年。
〔70〕 《中文大辞典》，(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1967年。
〔71〕 朱起凤：《辞通》，长春古籍书店影印，1982年。
〔72〕 (清)江永：《四声切韵表·凡例》。
〔73〕 朱星：《论转语与词源学》，载《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4期。
〔74〕 (清) 郝懿行：《尔雅义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年。
〔75〕 潘尊行：《果裸变语与谐声》，载《忽与果裸》，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1933年。

〔76〕 张世禄、杨剑桥：《论上古带r复辅音声母》，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77〕 董为光：《汉语"异声联绵词"初探》，载《语言研究》1986年第2期。
〔78〕 张永言：《语源札记三则》，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6期。
〔79〕 (清)黄承吉：《字诂义府合按》，中华书局，1984年。
〔80〕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医学书局，1926年。
〔81〕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1985年。
〔82〕 (清)钱绎：《方言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4年。
〔83〕 (美)梅祖麟、罗杰瑞：《试论几个闽北方言的来母S—声字》，载台湾《清华学报》新9卷第1、2期合刊，1971年。
〔84〕 杨春霖：《试论上古声母的通转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5〕 李瑾：《论"旬"字与"循环"一词的音义关系》，载《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
〔86〕 (美)张琨、张谢蓓蒂：《汉语＊S—鼻音声母》，载《音韵学研究通讯》第7期，中国音韵学研究会，1985年。
〔87〕 (美)包拟古：《汉藏语中带S—的复辅音声母在汉语中的某些反映形式》，载《音韵学研究通讯》第11期，中国音韵学研究会，1987年。
〔88〕 潘悟云：《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载《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89〕 舒志武：《上古汉语S—前缀功能试探》，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6期。
〔90〕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91〕 (日)高岛谦一：《问鼎》，载《古文字研究》第9辑，中华书

局，1984年。
[92] 蒋礼鸿：《义府续貂》（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年。
[93] 徐中舒：《怎样考释古文字》，载《出土文物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94] 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载《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
[95] 俞敏：《论古韵合怗屑没曷五部之通转》，载《燕京学报》第34期，1948年。
[96] 裘锡圭：《甲骨文字考释》，载《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
[97]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98] （清）程瑶田：《通艺录·释虫小记·螟蛉蜾蠃异闻记》，载《安徽丛书》第二期。
[99] 曾光平：《方言词寻根觅亲》，载《古汉语研究》1989年增刊。
[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原始社会发展史综合分期表》，杨堃著《原始社会发展史》附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01]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7年。
[102] （苏）H·A·法莫别尔格：《人类社会溯源》。
[103] （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4年。
[104] 刘炳琦等，《举世瞩目的秦公一号大墓昨日开始揭椁》，载《光明日报》1986年5月3日第1版。
[105]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载《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106] 张永言：《关于词的"内部形式"》，载《语言研究》1981年

第1期(创刊号)。
[107] (希) 伊壁鸠鲁:《分析后篇》,转引自(意)贝尼季托·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108] (美)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
[109] 伍铁平:《比较词源初探》,载《福建外语》1984年第1期(创刊号)。
[110] (美) 罗曼·雅可布逊:《为什么叫"妈妈"和"爸爸"》,载《语言学动态》1978年第4期。
[111] (英) 泰勒:《原始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2] (德)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113] (意) 维柯:《要素》,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114] 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
[115] 沈毅:《史密斯的文化人类学述评》,载《浙江学刊》1988年第5期。
[116] (吴)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载《丛书集成初编》第134册。
[117] (明) 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
[118] 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载《观堂集林》第5卷,中华书局,1959年。
[119] 于省吾:《释虹》,载《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
[120] 杨树达:《释"蝀"》、《释"虹"》,载《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
[121] (美) 王士元:《学术报告》,载《语言学论丛》第11辑,商务印书馆,1983年。

[122] 周祖瑶：《中国汉语容县方言复合辅音的特点》，载《广西师院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
[123] 伍铁平：《比较词源再探——为〈外国语文教学〉公开发行而作》，载《外国语文教学》1985年第1、2期。
[124] 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载《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125] 章太炎：《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载《章氏丛书》第13册，右文社。
[126] 孙力平：《应当如何理解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论语言符号是任意性和理据性的统一》，载《江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1期。
[127] 伍铁平：《思想和语言孰先孰后?》，载《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128] 王葆仁：《试论形象思维对语言发展的贡献》，载《思维科学》1988年第1期。
[129] (宋) 戴侗：《六书故》。
[130] 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958年。
[131] 计伟强、施建基：《为什么约定俗成的结果正好是这样?——浅谈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有一定的缘由》，载《争鸣》1982年第3期。
[132] 吴玉璋：《语言中的"爸爸"和"妈妈"——语言的普遍现象研究之一》，载《外语学刊》1988年第6期。
[133] 伍铁平：《直接教学法和自觉——实践教学法重探》，载《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134] (美) 雅可布逊：《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转引自伍铁平：《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135] 吴天敏、许政援：《初生到三岁儿童言语发展记录的初步分析》，载《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教育心理论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
[136] 《吕氏春秋·恃君览》。
[137] 张维思：《语源蠡测》，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5卷，1945年。
[138]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1984年。
[139] K·麦克利什：《棉兰老岛的塔桑代人——石器时代的穴居人》，载《当代原始部落漫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40] 贾兰坡：《北京人》，载《中国历史的童年》，中华书局，1982年。
[141] 杨树达：《释"许"》，载《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
[142] 《山海经·北山经》。
[143] （清）张行孚：《说文发疑》，载《说文解字诂林·前编》。
[144] 《诗·郑风·风雨》。
[145]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年。
[146] 刘师培：《原字音篇》，载《左庵集》卷四。
[147] 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载《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史语所专刊之一），1930年。
[148] （苏）贾克什·哈山诺夫：《根词，词的起源》，载《语言与翻译》1986年第2期。
[149] 安志敏：《仰韶文化》，载《中国历史的童年》，中华书局，1982年。
[150] 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

[151] 任铭善：《汉语语音史要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2] 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年。
[153]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20年。
[15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155] 佘继林：《原始社会简史》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2年。
[156] (希)亚里士多德：《诗学》，载《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2期。
[157] 郭绍虞：《语法修辞新探》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
[158] 王德春：《语言学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
[159]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
[160]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161]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成都古籍书店影印。
[162] 邢公畹：《汉语“子”、“儿”和台语助词luk试释》，载《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
[163]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视觉艺术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64] (宋)郑樵：《通志》。
[165]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会：《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载《文物》1989年第9期。
[167] 吴耕民：《中国温带果树分类学》，农业出版社，1984年。
[168]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1988年。

〔169〕 杨隽：《俄语历史构词中语义的对立与同一》，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
〔170〕 王力：《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载《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
〔171〕 蒋礼鸿：《谈〈同源字论〉后记》，载《怀任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72〕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四次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73〕 潘雄：《从认知人类学角度看黎族的数字和时间观念》，载《人类学研究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
〔174〕 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载《语文战线》1983年第5期。
〔175〕 张舜徽：《演释名》，载《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年。
〔176〕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
〔177〕 (明)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
〔178〕 陆宗达、王宁：《传统字源学初探》，载《语言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82年。
〔179〕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华书局，1963年。
〔180〕 (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农业出版社，1982年。
〔181〕 蒋礼鸿：《辞书三议——为撰写〈汉语大词典〉贡末议》，载《怀任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82〕 王力：《古汉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原载《国文月刊》第4期，1941年。见《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
〔183〕 张维思：《中国语言的词类》，载《学思》第3卷第6期，1943年。
〔184〕 《颜氏家训·音辞》。
〔185〕 邢公畹：《原始汉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演替系列》，载《语言

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
[186] 俞敏：《释甥》，载《燕京学报》第36期，1949年。
[187] 俞敏：《汉藏两族人和话探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1期。
[188] 孙德宣：《联绵字浅说》，载《辅仁学志》第11卷1、2期合刊，1942年。
[189] 冯蒸：《“攻吴”与“句吴”释音》，载《古汉语研究论文集》(三)，北京出版社，1984年。
[190] 胡朴安：《中国言语之原始及其变迁》，载《国学论衡》第5期(上)，1935年。
[191] 吴庆锋：《“麻胡”讨源》，载《山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3期。
[192] 徐中舒：《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载《古文字研究》第15辑，中华书局，1986年。
[193] 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古文字研究》第15辑。
[194] (明)方以智：《通雅》，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5] 符定一：《联绵字典·凡例》，中华书局，1954年。
[196] 程德祺：《释单》，载《原始社会初探》，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197] 钱剑夫：《〈诗〉“中田有庐”解新探》，载《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98] 《列子·汤问》。
[199] 洪汝闿：《〈果裸转语记〉校记》，载《安徽丛书》第2期。
[200] 蔡凤圻：《混沌——〈语源〉初稿之一节》，载《说文月刊》

第2卷第11期，1941年。
[201] 郭豫才：《语原(上)》，载《河南图书馆馆刊》，第4册，1933年。
[202] (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中华书局，1956年。
[203] 杨树达：《释谓》，载《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
[204] 蒋礼鸿：《论辞书的书证及体现词汇源流的问题》，载《怀任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05] 戚桂宴：《再谈什么是六书》，载《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
[206] 骆鸿凯：《尔雅论略》，岳麓书社，1985年。
[207] (美)杰斯帕森：《语言之本质、发展与起源》，转引自(美)C.J.杜卡斯：《艺术哲学新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208] (美)Harry Hoijer：《语言的起源》，载《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2期。
[209] (美)S·南达：《文化人类学》，陕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
[210] 白文韬：《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3期。
[211] 伍铁平：《什么是心理语言学——斯洛宾的〈心理语言学〉简介》，载《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212] 伍铁平：《思想只有在词和句子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吗?》，载《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213] 姚荣松：《上古汉语同源词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82年。

[214] 董为光：《汉语侗台语语源联系举例》，载《语言研究》1984年第2期。
[215]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
[216] 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载《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史语所专刊之一)，1929年。
[217]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商务印书馆，1937年。
[218] (清)王念孙：《〈果裸转语记〉跋》，载《安徽丛书》第2期，安徽丛书编印处，1934年。
[219] 章太炎：《文始》，中文出版社(日本京都)影印，1970年。
[220] 章太炎：《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右文社，1920年。
[221] 黄侃：《尔雅音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22] 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
[223] 张世禄：《汉语同源词的孳乳》，载《张世禄语言学论集》，学林出版社，1984年。
[224] 伍铁平：《论反义词同源和一词兼有相反二义》，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
[225] (奥)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
[226]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
[227] 严学窘、尉迟治平：《说"有""无"》，载《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1984年。
[228] 孙雍长：《王念孙"义通"说笺释》，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229] 董绍克：《"声近义通"的适用范围及其与"约定俗成"的关系》，载《山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3期。

[230] 王力：《同源字论》，载《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
[231] 王力：《〈同源字典〉的性质及其意义——1981年10月6日在日本日中学院讲》，载《王力论学新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232] 刘师培：《古韵同部之字义多相近说》，载《左庵集》卷四。
[233] 刘赜：《古声同组之字义多相近说》，载《武汉大学文哲季刊》2卷2期，1936年。
[234] 李方桂：《与沈兼士书》，载《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235] (清)戴震：《转语二十章序》，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36] 张博：《试论王念孙〈释大〉》，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237]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
[238] 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载《王国维遗书》第6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
[239] 王文耀：《试论音韵学在王国维史学研究中的地位》，载《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240] 钱玄同：《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部，1924年。
[241] 刘盼遂：《说文声谱自序》，载《文学声韵学论丛》，北平人文书店，1935年。
[242] 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齐鲁书社，1981年。
[243] (苏)Е. Н. ПаноВ：《尼安德特人会说话吗?》，载《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1期。
[244] 郭振生：《谈通假原则》，载河南大学古代汉语研究室编

《古汉语研究》第2辑，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245] (美)梅祖麟：《内部构拟汉语三例》，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3期。
[246] 齐冲天：《论语源研究》，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
[247] 唐兰：《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载《文史》第10辑，中华书局，1980年。
[248] 孙宏开：《独龙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
[249] 严学窘：《周秦古音结构体系(稿)》，载《音韵学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84年。
[250] 殷焕先：《联绵字的性质、分类及上下两字的分合》，载《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79年第2期。
[251] 冯蒸：《古汉语同源联绵词试探——为纪念唐兰先生而作》，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252] (清)王筠：《说文句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年。
[253] 刘师培：《正名隅论》，载《左庵外集》。
[254]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
[255] 严学窘：《论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载《中国语文》1979年第2期。
[256] 《辞海·增补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257]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1年。
[258] 姚孝遂：《古汉语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载《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
[259] (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中华书局，1963年。
[260] 沈兼士主编：《广韵声系》，中华书局，1985年。
[261] (清)王念孙：《释大》，载《高邮王氏遗书》。

[262] 蒋礼鸿：《“雩”的语源记疑》，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6期。
[263] 周祖谟：《字族》、《词族》，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264] 《我国考古工作又一惊人发现：8000年前的甲骨契刻符号和骨笛在舞阳出土》，载《河南日报》1989年12月11日。
[265] （清）王筠：《说文释例·序》，世界书局印行。
[266] 杨树达：《释“镝”》，载《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
[267] 俞敏：《古汉语里的俚俗语源》，载《燕京学报》第36期，1949年。
[268] 吕叔湘：《〈汉语拼音方案〉公布30周年有感》，载《语文建设》1988年第1期。
[269] 伍铁平：《传统语文学某些著作的一个缺点》，载《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3期。
[270] 张清常：《音义关系在汉语汉字中的特殊组合》，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4期。
[271] 恩格斯：《反杜林论》。
[272]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73] 杨向奎：《〈吴越文化新探〉序言》。
[274] （美）张琨：《汉藏语系的“针”字》，载《民族译丛》1981年第1期。
[275] 杨剑桥：《汉藏比较语言学论略》，载《复旦学报》1987年第5期。
[276] 严学窘：《谈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载《江汉语言学丛刊》，湖北省语言学会，1979年。
[277] 邢公畹：《汉语“遇蟹止效流”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载《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

[278] 冯蒸：《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原则与方法——西门华德〈藏汉语比较词汇集〉评析》，载《温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279] 张均如：《壮侗语族塞擦音的产生和发展》，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1期。
[280] 吕叔湘：《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载《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原载《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
[281] 王平：《郭璞〈方言〉注释中的'声转'和'语转'》，载《山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3期。
[282]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283] (日)藤堂明保：《汉字语源辞典》，学灯社(东京)，1965年。
[284] 王继如：《藤堂明保〈汉字语源辞典〉述评》，载《辞书研究》1988年第1期。
[285] 王国维：《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序录》，载《国学季刊》1卷3期，1923年；又见《观堂集林》卷八。
[286] 王国维：《〈释大〉识语》，载《高邮王氏遗书·释大》。
[287] 夏渌：《"差"字的形义来源》，载《中国语文》1979年第1期。
[288] 周大璞：《论语音和语义的关系》，载《训诂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289] 洪诚：《训诂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290] (清)阮元：《释门》，载《研经室一集》卷一。
[291] (清)程瑶田：《九谷考》，载《皇清经解》第548卷。
[292]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293] 姜跃滨：《论声训的定义及范围》，载《学术研究》1987年

第3期。
[294] 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年。
[295] 王以公：《词的音义关系——从"右文说"到同源词》，载《铁岭教育学院院刊》(综合版)，1986年第1期。
[296] 邢公畹：《"别离"一词在汉语台语里的对应》，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4期。
[297] (英)R. H. Robins：《语言分类史》，载《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2期。
[298] 许嘉璐：《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载《训诂研究》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299] 李开：《论黄侃先生的字源学说和方法》，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300] (清)段玉裁：《〈广雅疏证〉序》。
[301] 陈亚川：《刘又辛》，载《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四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302] 刘又辛：《释"蘧篨"》，载《语言研究》1984年第1期。
[303] (苏)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
[304] 严学窘：《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与继承》，载《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305] 严学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汉语音韵学高级研究班开学祝词》，载《音韵学研究通训》第8期，1985年。

后　记

本书原拟分作两编：前编为汉语语源学理论，后编为汉语语源学史。开始写作后，因原拟题规模过大，遂放弃了后编。写完前编第四章初稿后，又虑字数过多，遂停写其第五章"语源学的几个问题"（语源意义、音变模式、流俗语源等）。自构思至完稿，屡得吾师蒋云从礼鸿先生指点迷津，学友蒋冀骋同志切磋琢磨；写作之前，承友人冯蒸之助得海外专著两种，均此一并志谢。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
记于杭州大学寄寮

本书根据王宁、张世禄、张永言、裘锡圭、刘坚、徐复、殷焕先、伍铁平，许威汉、鲁国尧、祝鸿熹诸多专家之意见及新发现的资料，作了全面的修改、校订。为了减少印刷困难，更换或删除了引文中的一些古僻字。在书稿输入电脑并多次修改、打印过程中，承蒙河南省教育委员会资助和刘健同志给予了很大帮助，特此申谢。

科学研究在不断发展，新的资料陆续发现，作者将不断吸收各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充实、完善汉语语源学理论体系。欢迎各位师友同仁不吝赐教，以便作者继续修订。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日
补记于河南大学寓所

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第一批书目

蜱螨学	李隆术　李云瑞著
变形体非协调理论	郭仲衡　梁浩云　编著
胶东金矿成因矿物学与找矿	陈光远　邵　伟　孙岱生著
中国天牛幼虫	蒋书楠著
中国近代工业史	祝慈寿著
自动化系统设计系统学	王永初　任秀珍著
宏观控制论	牟以石著
法学变革论	文正邦等著

第二批书目

中国自然科学的现状与未来	全国基础性研究状况调研组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局
中国水生杂草	刁正俗著
中国细颚姬蜂属志	汤玉清著
同伦方法引论	王则柯　高堂安著
宇宙线环境研究	虞震东著
头位难产	凌萝达　顾美礼主编
中国现代工业史	祝慈寿著
中国古代经济史	余也非著
劳动价值的动态定量研究	吴鸿城著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吴光辉等著
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	尹韵公著
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	陈　平著
艺术教育学	魏传义主编

儿童文艺心理学	姚全兴著
从方法论看教育学的发展	毛祖桓著

第 三 批 书 目

奇异摄动问题数值方法引论	苏煜城　吴启光著
结构振动分析的矩阵摄动理论	陈塑寰著
中国古代气象史稿	谢世俊著
临床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	江正辉主编
历代蜀词全辑	李　谊辑校
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理论——变革二元经济的选择	杜海燕著
中国企业运行的法律机制	顾培东著
法西斯新论	朱庭光主编
《易》与人类思维	张祥平著

第 四 批 书 目

计算流体力学	陈材侃著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环境	郑洪汉等著
质点几何学	莫绍揆著
中国城市昆虫学	蒋书楠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	李景源主编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	项启源主编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	李凤鸣　张海山主编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华文明	王戍笙主编
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莎学	王佐良著
中国现代诗学	吕　进著
汉语语源学	任继昉著
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	邓启耀著